

# 列寧主義問題

上卷·新版



大文委圖書室

斯大林著

中國出版社 出版

## 目 錄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8—84
一 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5
二 方法.....	10
三 理論.....	16
四 無產階級專政.....	29
五 農民問題.....	39
六 民族問題.....	49
七 戰略與策略.....	57
八 黨.....	70
九 工作體裁.....	82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85—118
一 十月革命底國內的和國外的環境.....	85
二 關於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者是十月革命與託洛茨基 同志底不斷革命論.....	88
三 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102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113
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117—176
一 列寧主義底定義.....	117

二 列寧主義底主要點	119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121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126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132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133
七 為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	165
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177—187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底口號	181—198
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199—212
一 代表團底問題與斯大林同志底回答	199
二 斯大林同志底問題和代表們底回答	224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238—240
糧食戰線上的問題	241—251
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	253—255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	255—275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277—329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277
二 關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283
三 關於國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288
1. 關於階級鬥爭問題 2. 關於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問題	
3. 關於農、問題 4. 關於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5. 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新式聯絡問題 6. 布哈林同志是怎樣的理論家 7. 是五年計劃呢，還是兩年計劃呢	
8. 關於耕種面積問題 9. 關於糧食採購問題	
四 關於與右傾鬥爭問題	327

## 編譯部底幾句話

本版“列寧主義問題”，中文譯本，是從第十版“列寧主義問題”，俄文原本翻譯出來的；共分上下兩卷。

爲着讀者底方便，在本書下卷末尾，將登載以下的附錄：個別名詞典故註解，名詞檢查表，人名檢查表，地名檢查表。

本書裏面所引證的“列寧全集”，都是指該全集第三版俄文原本說的。其他的被引證的著作，也是指俄文原本說的，請讀者注意。

“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編譯部

一九三五年一月



#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在斯維德洛夫大學裏的講演

我把這本書獻給那些在列寧死後繼續  
收黨員時加入黨的同志們 斯大林

列寧主義底基礎，是一個大題目。要盡量說明這個題目，必須要著作一本書。甚至於要著作好幾本書。因此，我的演講，自然不能是列寧主義底盡量的說明。這些演講至多只能是列寧主義底基礎底簡略的大綱。但是，我還是認為，敘述這個大綱，以便指出幾個為有成效地研究列寧主義所必要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益處的。

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這還不是敘述列寧底世界觀底基礎。列寧底世界觀與列寧主義底基礎——這兩個東西底範圍並不一樣。列寧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世界觀底基礎當然就是馬克思主義。但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敘述列寧主義應當從敘述馬克思主義底基礎開始。敘述列寧主義——這就是說，敘述列寧著作中的那些由列寧所放進到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裏的，而自然是和列寧底名字相聯的特別的和新的東西。我在自己的演講中，不過就是按照這個意思來敘述列寧主義底基礎的。

那末，列寧主義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環境特殊條件中的應用。這個定

我是有一部分真理的，但是牠還不能沒有証據全部真理。列寧的確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了俄國的實際情況中，而且應用得非常巧妙。但是，譬如列寧主義僅僅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特殊環境中的應用，那末，列寧主義就是純粹民族的，而且僅僅是民族的，純粹俄國的，而且僅僅是俄國的現象了。可是，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是國際的現象，她在整個國際發展中有自己的根柢，而不僅僅是俄國的現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以為，這個定義犯有片面性的毛病。

另外有些人說：列寧主義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主義革命原素底復活而與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不同；據說四十年代以後各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成溫和的，不革命的了。如果把這種舊馬克思主義分為革命部分和溫和部分的愚蠢而又庸俗的意見擱開不說，那末，根據我的承認，就是這個完全不充分的和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定義，也有一部分真理。這部分真理就在於，列寧的確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底那個被第二國際廢棄會主義者所埋沒了的小命內容。但是，這只是一部分的真理。關於列寧主義的全部真理是在於：列寧主義不只是復活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更進了一步，在資本主義底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新條件下面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 列寧主義究竟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革命（我們所說的是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時期，當時還沒有已經發展的帝國主義，他們生活在準備無產者們去作革命的時期，當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是直接的實際的不可免的事情。而列寧呢，馬克思與恩格斯底這位學生呢，則生活在已經發展了的帝國主義的時期，生活在無產階級革命正在展出的時期。這時，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裏取得了勝利，已經打破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已經開闢了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紀元，蘇維埃底紀元。

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發展。

人們通常指出，列寧主義帶有非常戰鬥的和非常革命的性質。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主義之所以有這種特性，是由於以下的兩個原因：第一，列寧主義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牠不能不帶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氣氛；第二，列寧主義是在與第二國際社會主義搏鬥過程中間長成和強壯起來的，而與這個機會主義鬥爭，曾經是，並且現在還是為擊敗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先決條件。不要忘記，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之間，隔着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而和這個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鬥爭，曾不能不是列寧主義底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 一、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面長成和形成的，這時資本主義底矛盾達到了極點，這時無產階級革命成了直接實際的問題，這時準備工人階級去革命的時期已經走到盡頭而轉變到了向資本主義直接衝擊的新時期。

列寧稱帝國主義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為什麼呢？因為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矛盾底緊張程度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便是革命底開始。在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以下三點：

第一個矛盾——這是勞動與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工業國家寡斷性的托拉斯和財團，銀行和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與這無上威權鬥爭時，工人階級底通常鬥爭方法——職工會和合作社，國會政黨以及國會鬥爭——已經是完全不勝了。或者向資本搖尾乞憐，依舊過着非人生活並每况愈下；或者是運用新的武器，——這就是帝國主義向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提出的問題。帝國主義推動著工人階級走向革命。

第二個矛盾——這是各個財政集團之間及各個帝國主義列強間為爭奪原料產地，為爭奪別國的領土而發生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就是為要獨佔這些原料產地而進行猛烈鬥爭，就是為要重新瓜分已經瓜分過的世界而進行鬥爭，就是那些尋求“日光下的地盤”的新興財政集團和列強進行

特別劇烈的鬥爭，來反對那些不肯放鬆自己的蠶物的老大財政集團和列強。各派資本家集團用這種猛烈競爭底特點，就在於牠包含着一種不可避免的原素——帝國主義的戰爭，為掠奪別國的領土而進行的戰爭。而這種情況底特點又在於牠使帝國主義者們互相削弱，使整個資本主義底陣勢都削弱，使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機接近，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為實際必要的事情。

第三個矛盾——這就是為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數萬萬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就是對最廣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內十數萬萬人民施行最殘暴的剝削和最無人道的壓迫。榨取額外利潤——便是這種剝削和這種壓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義在剝削這些國家的時候，不得不在那裏建築鐵路，工廠，及工業的和商業的中心。無產階級底產生，民族覺悟底興起，解放運動底加緊，——這些便是這種“政策”，底不可避免的結果。在所有一切殖民地及附屬國革命運動底加緊，便是顯然證明這一點。這個情形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情形根本撓動資本主義底神地，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底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備軍。

一般地說來，帝國主義底主要矛盾，把舊的“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那些矛盾，便是這樣。

十年以前爆發過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意義，就是在於，牠把所有這些矛盾都集合在一塊，結果就加速了和便利了無產階級底革命戰鬥。

換一句話說：帝國主義不僅已經使革命成了實際上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已經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壘壘的良好條件。

這便是產生列寧主義的國際環境。

有人會向我們說：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這種情形，對於當時並不是，而且也不能是模範式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俄國，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情形，對於首先是在俄國工作，而且首先是為着俄國而工作的列寧，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恰好是俄國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底故鄉呢？

---

##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

因為，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底這一切矛盾底集合點。

因為，在我國，革命體制底程度，會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厲害，因為這樣，所以只有俄國會能夠用革命方法來解決這些矛盾。

首先要講的，是沙皇威脅是各種壓迫——資本主義的壓迫，殖民地的壓迫及軍事的壓迫——底最無人道而最野蠻的形式底發源地。誰不知道，在俄國，資本底無上威權是與沙皇制度底專橫暴虐混合着？誰不知道，俄國民族主義底侵吞是與沙皇政府對於非俄羅斯民族的屠殺互相混合着？誰不知道，對土耳其，波斯，中國底整批區域的剝削是與沙皇制度對這些區域的侵佔互相混合着，是與侵佔領土的戰爭互相混合着？列寧說得很對：沙皇制度是“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沙皇制度把帝國主義底一些最壞的方面都聯合起來，而且使之加倍厲害了。

其次，沙皇俄國是西方帝國主義底最大的後備軍。不僅是說，牠放任了外國資本自由進口活動，讓外國資本操縱了俄國國民經濟中如燃料和冶金業這樣有決定作用的部門；而且是說，牠會能用千百萬兵士來供給西方帝國主義者。試問想一下，一千二百萬俄國軍隊，為保證英法資本家底極高度的利潤，在帝國主義大戰底前線上流血的事實。

再其次，沙皇制度不僅是帝國主義在東歐的看門狗，而且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代理人，牠從倫敦，巴黎，柏林，布律塞爾得到了借款而替牠們從人民身上榨取幾萬萬元的利息。

最後，沙皇制度是西方帝國主義在瓜分土耳其，波斯，中國等等方面最忠實的同盟者。誰不知道，帝國主義戰爭是沙皇制度與協約國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行的呢？誰不知道，俄羅斯是這次戰爭中一個重要份子呢？

所以沙皇制度底利益是與西方帝國主義底利益互相結合了的，而且終歸於合成為帝國主義利益底一個整體。西方帝國主義是不是能够不預先用盡一切力量來和俄國革命拚鬥決戰以圖維持和保存沙皇制度，而就甘心喪失當時的沙皇資產階級俄國這樣在東方的強大的支柱，這樣豐富的人力和物力底武器呢？

當然，是不能夠的！

可是由此可見，誰會想打擊沙皇制度，他就會必然要去打擊帝國主義，誰會暴動起來反對沙皇制度，他也就會應該暴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因為誰要是實際上會想不僅打碎而且還要永遠消滅沙皇制度，那麼他推翻了沙皇制度，他就也會一定要推翻帝國主義。這樣，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便接近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接近了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會應該轉變為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

而同時，在俄羅斯興起了最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個革命是由世界上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領導，而這個無產階級又有俄國革命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這樣的革命曾經不能半途中止，在勝利的時候，牠曾經應該向前進展，高舉反帝國主義的暴動旗幟，——這點難道還須證明麼？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俄國曾經是帝國主義各種矛盾底集合點。這不僅是說，因為這些矛盾在俄國帶有特別醜惡，特別難堪的性質，所以最容易暴露出來，也不僅因為俄國曾是西方帝國主義底主要支柱，牠將西方財政資本與東方殖民地聯接起來；而且是因為，祇是在俄國才曾經有真實的力量，能够用革命方法解決帝國主義底矛盾。

可是由此可見，俄國革命不能不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牠不能不一開始發展便帶着國際性，這樣，牠不能不驚動帝國主義底根基。

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俄國共產黨人曾經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僅限於俄國革命底狹隘的民族範圍以內嗎？當然，是不能够的！正是相反，無論國內的（深入的革命危機）和國外的（戰爭）環境，都曾經推動他們的工作超出這個範圍，把鬥爭轉變到國際舞臺上去，揭穿帝國主義身上的爛瘡，證明資本主義破產底必然性，打碎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最後，推翻本國的資本主義，並替無產階級鍛鍊出新的鬥爭武器，——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爲的是便利着全世界無產者推翻資本主義。

俄國共產黨人會不能不這樣行動，因爲祇有在這條道路上可以希望國際環

## 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境內產生某種變化，足以保證俄國不敢有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

因為這些原因，所以俄國便成了列寧主義底發源地，而俄國共產黨人底創始者列寧，便成了列寧主義底創造者。

這裏俄國和列寧所“遭遇的”，差不多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國和馬克思、恩格斯所“遭遇的”，一樣。當時，在德國，是醞釀着資產階級的革命，正好像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一樣。當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寫道：

“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德國身上，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階級革命底前夜，因為德國將在一般的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更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完成這個革命。因此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只能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直接序幕”。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已經移到了德國。

恰巧是德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故鄉，而德國無產階級底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底創造者，這件事情底確實原因正是馬克思在上面這段話內所指出的這種情況，這未必是可以懷疑的。

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也應該這樣說，而且更應該這樣說。俄國在這時期會處於資產階級革命底前夜，她會應當在歐洲更進步的條件之下和具備着比德國（英、法更不用說了）更發展的無產階級，來進行這個革命；並且所有一切的事實材料都已經指明，這個革命會經應當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底酵母和先導。列寧還在一九〇二年，當俄國革命還剛才萌芽的時候，在他所著的“做什麼？”，這本小冊子內，就說過以下的預言，這事實不能認為是偶然的。他說：

“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註）提出了一個追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底追近任務，此較起來都是最革命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把歐洲的，而且也把亞洲的反動勢力底最強大的支柱破壞，這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

換句話說，革命運動底中心會應當轉移到俄國。

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底過程已經詳細有據地把列寧這個預言證明了。

既是這樣，那末，作過了這樣的革命和具備着這樣的無產階級的這個國家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底故鄉，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這個無產階級底領袖，列寧，同時也成了這個理論和策略底創造者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底領袖，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 二 方 法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和列寧中間，隔著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獨佔統治的整個時代。為要說得確切起見，我應該補充說，這裏所指的，不是機會主義在形式上的統治，而只是機會主義在實際上的統治。在形式上，當時領導第二國際的，是“忠心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正統派”，——考茨基及其他等人。可是，在事實上，第二國際底基本工作，當時都是按照機會主義底路線進行的。機會主義者當時由於他們迎合性的小資產階級的天性而迎合了資產階級，而“正統派”，也是為着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為着維持“黨內和平”，起見而迎合了機會主義者。結果便弄成了機會主義底統治，因為，資產階級底政策和“正統派”，底政策間的嫌隙已經動起來了。

這是資本主義底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即所謂戰前的時期，那時，帝國主義底將要引起大災難局面的矛盾，還沒有來得及完全明顯地暴露出來，那時，工人的經濟罷工和職工會還多少“照常”，發展着，那時，選舉鬥爭和國會黨團還發生了“衝昏頭腦的”，成效，那時人們把合法的鬥爭形式頌揚得高入雲霄，想要用合法手段來“打死”，資本主義，——總而言之，那時，第二國際底政黨一天一天長得肥胖胖的，不願意認真想到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羣衆底革命教育。

不是完整的革命理論，而是脫離了羣衆底實際革命鬥爭的和變成了死板教條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觀點和理論斷片。為要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然也會想起馬克思底理論，可是，為的是要剷去這理論中的活潑的革命的精神。

不是革命政策，而是萎靡的庸俗態度和長篇的政客手腕，議會的外交手段和議會的拉攏行為。為裝飾門面起見，他們當時也會通過革命的決議和口號，可是，為的是要把這種決議和口號圈圍起來。

不是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領受教育和學習正確的策略，却反而小心躲避掉一切問題，掩蔽和抹煞這些問題。為裝飾門面起見，他們自然也會不據說到緊急問題，可是，為的是要用一些“掉皮性的”，決議來敷衍了事。

第二國際底面目，牠的工作方法，牠的武庫，就是這樣的。

而同時，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戰鬥底新時代，却已經到臨。在財政資本無上威權面前，舊的鬭爭方法，已經是顯然不夠的和軟弱無力的了。

當時，必須重新審查第二國際底全部工作，牠的整個工作方法，必須驅除庸俗態度，狹隘觀點，政客手腕，叛徒行為，社會大國主義和社會和平主義。

當時，必須審查第二國際底整個武庫，拋棄一切生锈的陳腐的東西，鍛鍊出新的武器。當時假如沒有做這種預備工作，那末就根本莫想去與資本主義作戰。當時假如沒有做這種工作，那末無產階級遇到新的革命爭鬥時，就一定會遇到武裝不足或者簡直沒有武裝的危險。

這個把第二國際底污濁馬腳拿來做一番總審查和總清洗的光榮任務，便落到了列寧主義身上。

列寧主義底方法，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和鍛鍊出來的。

這個方法底要求是怎樣的呢？

第一，是要在黨的革命鬥爭火線中，在具體的實際工作火線中，去審查第二國際底各種理論教條，這就是說，要恢復那個已被破壞了的理論和實踐間的一致，要消滅這兩者間的分離狀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造成那具備有革命理論的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

第二，是要不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決議和口號（牠們的決議和口號是不可相信的）而根據第二國際各黨底實際工作去審查第二國際政黨底政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和值得無產階級羣衆底信任！

第三，是要根據新的革命精神，根據教育羣衆及準備羣衆從事革命鬥爭的精神，去改造黨的全部工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準備羣衆去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第四，是要無產階級政黨進行自我批評，要無產階級政黨在自己的錯誤中受訓練和教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教育出黨的真正的幹部和真正的領袖。

這就是列寧主義方法底基礎和實質。

這種方法在實際中怎樣應用呢？

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們有一些理論的教條，他們總是死守成規，總是拿一些教條來做一切行動底出發點。試舉其中幾條來看吧。

第一個教條：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條件。機會主義者要人相信，無產階級如果在本國人口內不佔大多數，牠就不能夠而且不應該奪取政權。一點證據也沒有，因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沒有可能來辯護這個荒謬的觀點。  
列寧回答第二國際底先生們說，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如果造成了這樣一種歷史環境（戰爭，農業危機等等），在這種環境之下，無產階級雖在人口中佔少數，可是牠有可能來把極大多數的勞動羣衆團結在自己的週圍，——那末，為什麼牠不應當去奪取政權呢？為什麼無產階級不應當去利用順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來衝破資本主義的戰線，並加速繼續發到底呢？

難道馬克思不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說過，如果德國當時會有所謂“農民戰爭的再版”，來協助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底情況當時就會“很好”，了嗎？難道大家不是都知道，當時德國的無產者要比一九一七年俄國的（比方說）無產者相對地少些嗎？難道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實證還沒有證明。第二國際英雄們底這一個得意的教條對於無產階級是絕無絲毫實際的意義嗎？  
革命鬥爭底實證正在打擊和打倒這個陳腐的教條，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二個教條：無產階級如果還沒有足數的現成的能夠治理國家的文化人材和行政人材，牠就不能保持政權，——起初必須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造就這種人材，然後才可以奪取政權。列寧回答道，我們就假定是這樣吧，可是，為什麼

麼不能把事情這樣弄轉過來，起初先奪取政權，給無產階級底發展造成一種順利的條件，然後便一日千里地前進，以便提高勞動羣衆底文化程度，以便造就很多由工人出身的領導人材和行政人材。難道俄國底實際還沒有證明：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出身的領導人材底增長，要比在資本政權下面迅速百倍和澈底百倍嗎？羣衆革命鬥爭底實際把機會主義者底這一個理論的教條也在無情打倒，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三個教條：政治的總罷工的方法，無產階級是不能採用的，因為這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沒有根據的（請參看恩格斯底批評），在實際上是危險的（能破壞國家經濟生活底常態，能虛耗職工會底基金等等）。這種方法不能代替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議會的鬥爭形式。列寧主義者回答說：好吧。但是，第一，恩格斯所批評過的並不是任何的總罷工，而只是某一種總罷工，即無政府主義者為代替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而提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經濟總罷工；——這與政治總罷工的方法有什麼關係呢？第二，什麼人和什麼地方證明過，議會的鬥爭形式是無產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呢？革命運動底歷史難道不是證明，議會鬥爭僅僅是組織無產階級在議會以外的鬥爭的學校和助手嗎？難道不是證明，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運動底基本問題，是要用暴力，用無產階級羣衆底直接鬥爭，用他們的總罷工，用他們的暴動來解決的麼？第三，關於以政治總罷工底方法來代替議會鬥爭這個問題，是從那裏找來的呢？主張政治總罷工的人，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曾企圖用議會以外的鬥爭形式來代替議會的鬥爭形式呢？第四，俄國的革命難道還沒有指明：政治總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最偉大的學校，是在衝擊資本主義堡壘的前夜動員並組織廣大無產階級羣衆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工具麼？這與關於破壞經濟生活底常態及工會基金等等庸俗思想的怨言，有什麼關係呢？革命鬥爭底實際把機會主義者底這個教條也打得粉碎，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還有其他許多的諸如此類的教條。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列寧說過：“革命的理論不是教條”，“革命的

理論只是在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實際密切聯繫中，才能最終形成起來，（請參看“左派幼稚病，，），因為理論應該供實際使用，因為“理論應該回答為實際所提出的問題”，（請參看“人民底朋友，，），因為理論應該被人拿實際材料來考驗。

至於講到第二國際政黨底政治口號和政治決議，那末，祇要想起“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口號底歷史，就足以了解這些政黨底政治實質是何等虛偽和腐敗了，他們以漂亮的革命口號和決議來掩藏他們的反革命的工作。大家都還記得，第二國際在巴塞爾大會上作過盛大的示威，曾廣嚇帝國主義者說，要是帝國主義者們敢於開始戰爭，那就免不了要遇到暴動底一切慘狀，並且提出了“以戰爭對付戰爭，”的嚇人口號。可是誰不記得，不久以後，在戰爭正要開始的時候，巴塞爾的決議却已拋在腦後，而向工人們提出了新的口號——為資本主義和帝國底光榮而互相殘殺。革命的口號和決議，假如不加以實行，那就一個錢也不值，這難道還不明白嗎？祇要把列寧底那個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政策拿來和第二國際在戰爭時期的叛徒政策比較一下，便能懂得機會主義的政客是何等卑鄙，列寧主義的方法是何等偉大。我不能不在這裏引證列寧底“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書裏的一段，在這一段內，他無情地痛罵了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底機會主義企圖，這企圖就是想不按政黨底實際行動而按政黨底紙上口號與文件去估計政黨。列寧說：

“考茨基所實行的是標本式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政策，以為……提出口號便可以改變情況。整個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歷史都揭破這種空想：為了欺騙民衆起見，資產階級民主派過去和現在都總是提出各種各樣的‘口號’，問題是要考察他們是否誠意，把他們的言語拿來和他們的行動做比較，不要以噃心的或騙人的空話為滿足，而要澈底找到階級的實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七七頁）。

我更不用說第二國際政黨之懼怕自我批評，不用說他們的各種手腕——如掩藏自己的錯誤，株然迫切問題，用關於百事大吉的虛偽話頭來遮掩自己的缺

點，這種話頭消磨活潑的思想，阻礙黨在自己的錯誤上去領受革命教育。這些手腕會受到列寧底讚美和辱罵。列寧在他所著的左“派幼稚病”，這本書上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底自我批評說：

“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採取的態度，就是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根據這個標準就可以看到這個政黨是不是鄭重做事和是不是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暴露這個錯誤底原因，分析這個錯誤產生時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個錯誤的方法——這是鄭重的政黨底標誌，這便是政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然後也就是教育和訓練羣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一頁）

有些人說，揭露自己的錯誤和實行自我批評，這對於黨是危險的，因為敵人可以利用這一點來反對無產階級底黨。列寧會認為這種反駁是不鄭重的，並且是完全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還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當我們的黨還是幼弱微小的時候，列寧就在自己的“進一步退兩步”，這本書上面說道：

“他們（馬克思主義者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的爭論，便幸災樂禍和譏諷譏笑：他們爲了自己的目的，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地利用我這本小冊子（這本小冊子是專門談論我們黨底缺點和失誤的）中的個別地方。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戰鬥中已經受够了鍛鍊，不致爲這些小小的針刺所驚動，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其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這些缺點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發展而被克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六一頁）。

列寧主義方法底特點，大體上就是這樣的。

列寧底方法中所給出的東西，在馬克思底學說中大致已經都有了，這個舉說，照馬克思自己的口氣來說，“實質上乃是批評的和革命的學說，”。正是這一類批評的和革命的精神，自始至終地貫穿着列寧底方法。但是假如以爲列寧底方法僅僅是馬克思方法底恢復，那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列寧底方法不僅只

是馬克思底批評的和革命的方法底恢復，不僅只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底恢復，而且是這個方法底具體化和往前發展。

### 三 理 論

從這個題目內，我要拿出三個問題來講：第一，就是關於理論對無產階級運動的意義；第二，就是關於對自發“黨”的批評；第三，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

第一，關於理論底意義。有些人認為，列寧主義是實際重於理論，就是說，在列寧主義裏，主要的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化為事實，就是“執行”，這些原理，至於說到理論，那麼，他們認為列寧主義是不關心的。大家都知道，普列漢諾夫曾經屢次嘲笑列寧對於理論，特別是對於哲學的“不關心”。同樣大家亦知道，現在許多列寧主義的實際工作者不很注意理論，特別是因為他們由於環境的關係不得不一天到晚忙於實務工作。我應該申言，對列寧及列寧主義的這種非常奇怪的見解，是完全不正確的，而且是絕對不合於事實的；實際工作者忽視理論的傾向，是違反整個列寧主義底精神的，而且對於工作是包含着大的危險的。

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歸納起來的經驗。當然，理論假使不和革命的實際聯繫起來，就要變成無意義的理論，同樣，實際如果不受革命理論底指示，就要變成盲目的實際。但是假如理論是在革命的實際密切聯繫中形成的；那末，牠就能夠變成工人運動底極偉大的力量。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够給運動以確信力，給運動以確定方針的力量和對於四周事變底內部關係的了解。因為理論，而且祇有理論，才能够幫助實際不僅去了解目前各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而且去了解在最近的將來這些階級行動底道路和方向。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說過和幾十次重複說過一個著名的原理，就是：

“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運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

•第三八〇頁)。

列寧比誰都更了解理論底重要意義，特別是對於我們這個黨，因為這個黨是担负着國際無產階級先進職上底作用，而又處於四面這種極複雜的國內和國外環境之內。還在一九〇二年，他就預先看到了我們黨底這種特殊的作用，在那時候他就已經認為必須指出：

“只有為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執行先進職士底作用”，(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〇八頁)

現在當列寧關於我們黨底作用的預言已經化為事實的時候，列寧底這個原理是有特別的力量和特別的意義，這是無庸證明的。

在唯物主義的哲學方面，把從恩格斯到列寧這時代中科學上最重大的發明綜合起來，並從各方面去批評馬克思主義者隊伍裏的反唯物主義的派別，這是一個最重大的任務，執行這個任務的不是別人，而是列寧；這件事實也許可以算做列寧異常重視理論底最明顯的表現。恩格斯說：“每一個偉大的新發明出現後，唯物主義便要採取新的形式”。大家知道，不是別人，而恰好是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這本出色書籍裏而替當時執行了這個任務。大家知道，普列漢諾夫是喜歡嘲笑列寧“不開心”，哲學的，而這個普列漢諾夫，却甚至於沒有敢於憑真著手去執行這個任務。

第二，對自發論的批評，或屬於先鋒隊在運動中的作用。自發論，機會主義底理論，是崇拜工人運動自發性的理論，是實際上否認工人階級先鋒隊——工人階級政黨——底領導作用的理論。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工人運動向着反對資本主義底基礎這方面來進行。牠主張工人運動完全祇向着那些為資本主義“可以執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那方面去進行；牠完全主張“阻力最少的路線”。自發論是工聯主義底思想。

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使自發運動帶着覺悟的和計劃的性質。牠反對政黨走在工人階級前面；反對政黨把羣衆提高到有覺悟底程度，反對政

黨領導運動。她主張運動中的覺悟份子不要妨害運動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她主張政黨袒護從自發運動，做這種運動底尾巴。自發論是減低覺悟份子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是一切機會主義底邏輯的基礎。

這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這個理論就已經出現於舞台了，這個理論，在實際上曾經弄到使牠自己的信徒，所謂“經濟派”，否認了在俄國有獨立的工人政黨底必要，反對了工人階級為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鬥爭，鼓吹了運動中的工聯主義的政策，總而言之，把工人運動交給了自由資產階級去領導。

“舊火報”，底鬥爭和列寧在“做什麼？”，一書上對“尾巴主義”，理論所作的精彩的批評，不僅打倒了所謂“經濟主義”，而且創造了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革命運動底理論基礎。

假如沒有這種鬥爭，當時就莫要想去創造俄國的獨立工人政黨，就莫要想由這個政黨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了。

但是這種崇拜自發性的理論不僅是俄國的現象。她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政黨裏都是廣泛流行的，雖然表現的形式是稍微有些不同。我所指的是第二國際首領們所慣用的所謂“生產力論”。這個理論籠罩一切事物，調和一切人，牠當某些事實早已為大家聽得討厭以後，才把牠們指出來並加以解釋，指出以後，牠就安心下去了。馬克思說：唯物主義的理論不能祇限於解釋世界，牠還應該要改造世界。但是，考夫基和他的伙伴們却不管這一點，他們剛剛停留在馬克思公式底前半段上。請看應用這個“理論”的許多例子中的一個例子罷。人們說，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第二國際底政黨曾經發表恐嚇的言論，說假如帝國主義者開始戰爭，他們便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人們說，在戰爭正式開始的時候，這些政黨就把“以戰爭對付戰爭”，這個口號拋在腦後，而實行了一個相反的口號——為帝國主義的祖國而戰爭。人們說，因為這樣變更口號的結果，使幾百萬工人犧牲了性命。但是如果以為這裏有什麼人犯了罪過，某人變了或出賣了工人階級，那就想錯了。絕對沒有過這樣的事情！所有這些已經

發生的事情，都好像是必然要這樣發生的。第一，因為第二國際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競爭底工具。第二，因為在當時所有的那種“生產力底程度”之下，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這是“生產力底”罪過。考茨基先生底“生產力論”，正是這樣向“我們”，解釋。而誰不相信這種“理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黨底作用呢？黨在運動中的意義呢？但是，黨對於像“生產力底程度”，這樣的決定因素，能有什麼辦法呢？……

這種假冒馬克思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以掩飾機會主義底真面目為使命的假冒的“馬克思主義”，祇是這樣一種“尾巴主義”，理論在歐洲方面的變形表現，而列寧還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前就已經向這種理論作過鬥爭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打破這種理論上的枷鎖，是在西方創立真正革命政黨的先決條件。

第三，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從三個基本原理出發的。

第一個原理：資本主義先進國內財政資本底統治；發行有價證券是財政資本底主要營業；把資本輸出到原料產地是帝國主義底基礎之一；財政寡頭底無上威權是財政資本統治底結果，——所有這些，便揭露岀壟斷的資本主義底粗鄙的寄生的性質，使資本主義的新迪加和托拉斯底壓迫更加百倍令人難受，使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礎的義憤加強地增長，使羣衆趨向無產階級革命而把無產階級革命當作他們唯一的救星。（請看列寧著的“帝國主義”）。

從這裏便要得出第一個結論：就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宗主國”，國內的無產階級的戰線上爆發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原理：向殖民地和附屬國加緊輸出資本；擴大“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領土，直到包括全世界；資本主義變為由極少數的“先進”國對於世界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財政資本的奴役和殖民地政策的壓迫的世界系統；——所有這些，一方面使單個的民族經濟，單個民族領土，變為所謂世界經濟這整條鏈子

底各個環節，另一方面，將全世界的人民分成兩個營垒：剝削和壓迫廣大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那極少數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和被迫要作鬥爭以求解脫帝國主義的迫壓的那極大多數的殖民地及附屬國。（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要得出第二個結論：就是在殖民地國家裏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在國外的殖民地的戰線上反帝國主義的戰情底原素日益增長。

第三個原理：“勢力範圍”和殖民地底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底不平衡的發展，這種發展，引起已經搶得領土的國家和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額”的國家中間為重分世界而起的猛烈的鬥爭；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是恢復那已經破壞的“平衡”的唯一手段，——這些，便使得第三條戰線——即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線緊張起來，便減弱着帝國主義底勢力，並使頭兩條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戰線和殖民地的民族運動戰線，易於聯合起來。（請參看“帝國主義”）。

從這裏就要得出第三個結論：就是在資本主義之下，戰爭是不能避免的，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融合成為統一的世界的革命戰線，以對抗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

列寧又將上而這一切結論，綜合成為一個總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一頁）。

因此，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革命底性質、範圍、深度、以及革命底一般方案這些問題的觀點，亦隨着改變。

從前，通常都是從某個單獨國家底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了。現在，必須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或大多數國家底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從世界經濟狀況的觀點上，去觀察這個問題，因為各單個國家與各單個民族經濟已經不是自願自的單位了，已經成了所謂世界經濟這整條鍊子底各個環節了。因為舊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即是那為數極少的“先進”，國對地球上極大多數的人民施行財政資本奴役和殖民地政策壓迫的全世界系統。

從前，通常都是說在某些個別國家裏，或者更確切些說，在某一個發展了的國家裏，有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底客觀條件存在。現在，這個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說，在世界帝國主義經濟這個統一的整體底整個系統中，已經有革命底客觀條件存在。而且，如果，或者更確切些說，因為整個系統已經成熟到革命程度，那末這系統中的某幾個國家工業不甚發展，並不能成為對於革命的一種不可征服的障礙。

從前，照例總是找某一個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把他當作一個單個的自顧自的現象，而以單個的一國的資本戰線為敵手。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必須說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各單個的國家的資本戰線已經變成了所謂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線這條鏈子底各個環節了，必須拿各國革命運動底總戰線來對抗這個世界帝國主義戰線。

從前總是把無產階級革命看做純粹是某一個國家內部發展底結果。現在，這種觀點已經是不夠的了。現在應把無產階級革命首先看做是帝國主義世界系統中矛盾發展底結果，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條鏈子在某個國家裏破裂的結果。

革命將在那裏開始呢？資本底戰線首先會在那裏，會在那種國家裏被衝破呢？

以前，人們照例總是都回答道：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在無產階級佔多數的地方，在文化程度較高的地方，在民主精神較多的地方。

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反駁道：不，不一定要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等等的地方。資本戰線將在帝國主義鏈子較弱的地方被衝破；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線這條鏈子在他的最弱的地方破裂的結果。而且，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開始了革命的國家，衝破了資本戰線的國家，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低的國家，而其他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却依舊留在資本主義底範圍以內。

在一九一七年時，世界帝國主義戰線的鏈子，在俄國是比其他各國要薄弱

些。這錮子就在這裏被衝破了，使無產階級革命得以爆發。為什麼呢？因為，在俄國曾展開了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為首的最偉大的人民革命，而無產階級有了千百萬為地主所壓迫和剝削的農民這樣重大的同盟者。因為，在我國與革命對立的是沙皇制度這樣一個帝國主義最醜惡的代表，牠沒有絲毫精神上的威信，而為一般人民所痛恨。雖然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程度，會比較——譬如說——法國或德國，英國或美國低些，然而帝國主義的錮子却原來比較薄弱些。

在最近的將來，這錮子將在什麼地方被衝破呢？仍然是在牠較薄弱的地方。比如說，這錮子也許會在印度被衝破，這不是沒有可能的。為什麼呢？因為，印度有新興的奮鬥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無產階級有民族解放運動這樣的同盟者，——這無疑義的是一個偉大的和重大的同盟者。因為，那裏與革命對立的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個敵人，即外國帝國主義，這個敵人沒有精神上的信用，而為印度一般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羣衆所痛恨。

這錮子也許會在德國被衝破，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為什麼呢？因為，比方，那些在印度活動着的因素，在德國也開始活動着，同時，很明顯的，在印度與德國之間，發展的程度有莫大的差別，這不能不影響到德國革命底進程和結局。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列寧說：

“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完成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並非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中平衡的‘成熟’，而是經過一些國家之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第一個戰敗國家之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之被剝削。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就最慘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潮流，（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六頁）。

總而言之：帝國主義戰爭底錮子照例應該在牠較薄弱的環節上被衝破；但無論如何，也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較發展的地方，不一定要在工人佔百分之幾，農民佔百分之幾等等的地方。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關於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人口總數裏所佔百分數的統計數字，在解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時，並沒有什麼非常的意義。而第二國際裏的那些不懂帝國主義而又懼怕革命如瘟疫的書狀子們，却喜歡把這項統計當作有非常意義的事情。

其次，第二國際底英雄們曾經肯定說（而且現在還是肯定說）：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有一個無底的深淵，或者至少是有一座萬里長城，這座萬里長城使這兩個革命彼此隔清一個多少長久的距離時期，在這個距離時期中，得到了政權的資產階級，發展着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則積聚着力量和準備着反資本主義的“堅決鬥爭”，這個距離時期通常是以打幾十年來計算，或者更長久些。顯然用不着證明，這種萬里長城“論”，在帝國主義底環境內是毫無科學根據的，牠祇是，而且不能不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慾望底掩蓋和粉飾。顯然用不着證明，在含蓄着許多衝突和許多戰爭的帝國主義底環境內，在“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底環境內，當“興盛的”，資本主義變為“垂死的”，資本主義，而革命運動在全世界所有一切國家裏發展着的時候；當帝國主義聯合所有一切反動力量（直到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為止），因而使一切革命動力（從西方無產階級運動起到東方民族解放運動止），都必須聯合一致的時候，當非是與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便不能推翻封建農奴制度殘餘的時候！——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種條件之下，在一個多少發展了的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和無產階級革命接近起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的革命史已經顯然證明了，這個原理是正確的和不容辯駁的。無怪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時，在俄國第一次革命底前夜，在“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裏，就已經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做一條鍊子底兩個環節，看做俄國革命發展規模底一致的和完整的表現：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麻痺資產階級底不稳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

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驅逐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便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在其關於革命底規模問題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我還不去說列寧底其他的，比較晚些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這個觀念，比在“兩個策略”中更說得明顯。這個觀念就是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底基礎石之一。

而有些同志却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時才得出這個觀念，以為列寧在一九一六年以前還認為俄國革命將停滯在資產階級的範圍內，於是政權也將從工農專政機關手上轉到資產階級手上，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手上。聽說這種說法甚至流傳到我們共產黨的報章上來了。我應該說，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

我可以引證列寧在我們黨底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裏的著名演說。他在這篇演說中，把工農專政，即民主革命底勝利，不是當作“秩序底組織”，而是“戰爭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六四頁）。

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底關於臨時政府這篇著名論文（一九〇五年）；在這篇論文裏，他在描寫俄國革命底發展前途時，給黨提出以下的任務，就是：“務必使俄國革命成為多年的運動，而不是幾個月的運動；務必使這革命不僅達到現時執政當局底小小讓步，而要達到完全推翻這種執政當局，，，在這篇論文裏，他並且更把這個前途發揮下去，把他和歐洲革命聯繫起來，而繼續說道：

“假如能够做到這一步，那時……那時革命的火燄將燃起歐洲；在資產階級反動下疲困了的歐洲工人也將發動起來，並向我們表明‘這件事情應當怎樣做，：那時歐洲的革命高潮會反轉過來影響俄國，使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一頁）。其次，我還可以引證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發表的著名論文，他在

這篇論文中說：“無產階級在現時，而且在將來還要不惜犧牲地為着奪取政權，為着成立共和制度，為着沒收土地……為着吸收‘非無產階級的民眾，去參加那個使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即是沙皇制度）的解放運動，而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將立刻利用資產階級的俄羅斯擺脫沙皇制度和擺脫地主土地權力而得到解放的這件事情，這不是為着幫助農裕農民來反對農村工人，而是為着聯合歐洲無產階級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最後，我還可以引證列寧所著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小冊子裏的一段著名的話，在這段話內，他引了“兩個策略”，中的一節（即我們在上面引證過的，“關於俄國革命底規模”，這一節）而得到下面的結論：

“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底進程證明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與黃農一塊，與牛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資本主義，其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富農，投機商人，所以革命就變成社會主義的。除了無產階級底準備程度及牠和鄉村貧民的聯合程度之外，企圖用其他的東西來分隔這兩種革命，企圖在牠們之間建立一座人造的萬里長城，這便是對馬克思主義作極大的曲解，使牠鄙俗化，以自由主義來代替牠，（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大概已經够了罷。

有人會向我們說：好吧！但是既然這樣，那末列寧為什麼會和“不斷革命”，觀念作鬥爭呢？

因為，列寧主張“用盡”，農民底革命能幹，澈底利用他的革命能力，以便完全消滅沙皇制度，以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而“不斷革命”，派則沒有懂得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輕視農民革命能力底力量，輕視俄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能幹，因此便妨害了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解放出來的事

業，把農民團結於無產階級周圍的事業。

因為，列寧主張以政權之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上，來完成革命事業，而“不斷革命”，派却想直接從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開始，他們不懂得他們這樣便是不顧看見像農奴制度殘餘這樣的“小事情”，便是沒有看到像俄國農民這樣的重大力量；他們不懂得，這樣的政策祇能妨害無產階級去進行爭取農民的工作。

可見，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而是因為他們不懂得無產階級領導底觀念。

“不斷革命”，這個觀念並不是一個新的觀念。這個觀念最初是由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一八五〇年）中提出來的。我們的“不斷革命派”，也就是從這個文件中取得了不斷革命這個觀念。應該注意到：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從馬克思那裏把這個觀念拿來以後，就稍許使這個觀念改變了樣子，改變了樣子以後，就把它“弄壞了”，使牠不適於實用了。曾需要列寧底熟練手掌來糾正這個錯誤，取得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底真相，而使牠成為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石之一。

請看馬克思在“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會書”，中關於不斷革命所說的話。在這裏，馬克思在列舉了共產主義者應該爭得的許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後，說道：

“民主派的小資產者，是希望極端迅速地和至多是只要一實行上述的要求就結束革命，可是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却在於：要使革命成為不斷的，一直進行到一切大的或小的有產階級已經被撤消統治地位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已經爭得國家政權的時候，一直進行到無產階級的聯合不僅在一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統治國家內，已經發展到能使這些國家底無產者們間的競爭歸於停止的程度的時候，一直進行到至少是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已經集中到無產階級手裏的時候，。換句話說：

（1）馬克思並沒有主張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德國革命事業直接從無產階

級的政權來開始，這和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計劃相較。

(2) 馬克思社是主張以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來完成革命，一步一步地接着各派資產階級從政權底高峯上推倒下去，以便在達到無產階級政權以後，再把革命火燄燃遍於全世界。這與列寧根據他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的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而敎導了我們的以及他在俄國革命過程中所實行過的完全相合。

可見，俄國的“不斷革命派”，不僅是輕視了農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不僅是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觀念底意義，而且改變了(改變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觀念，使他不適於適用。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會嘲笑我們的“不斷革命派”，底理論，稱牠為“新奇的，和‘漂亮的’，理論；責備他們不願意‘想一想，為什麼實際生活在整個十年內都繞過這個漂亮的理論而前進了’。(列寧底這篇論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寫的，恰巧在“不斷革命派”，底理論在俄國發現以後已經過十年的時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七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會認為這個理論是半孟塞維主義的，他說，這理論“從布爾塞維克那裏拿去的是號召無產階級作堅決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而從孟塞維克那裏拿去的是‘否認，農民底作用’，(請參看同一卷上的論文‘關於革命底兩條路線’)。

列寧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關於利用資產階級革命來“立刻，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觀念，就是這樣。

其次，以前認為，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為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強迫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國革命底歷史，已經直接證明了這一點。不過這裏我

們必須要記住：只有一些完全必要的條件具備時，才能有成效地推翻資產階級；沒有這些條件，就簡直莫要想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請看列甫在“左派幼稚病”，這本小冊子內怎樣說到這些條件：

“為一切革命，局部地為二十世紀俄國三次革命所證明了的革命底基本定律，就在於：只是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羣衆覺悟到不能照舊生活和要求改革，這對於革命還是不够的；對於革命，還須要剝削者已不能照舊生活和管理下去。只有在‘下層’，不願意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夠照舊生活和管理下去的時候，只有那時候革命才能勝利。這個真理若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全國的（使被剝削者和剝削者同時都受到牽動的）危機，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對於革命，必須：第一，達到使大多數的工人（或者至少是大多數有覺悟的，有思想的，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完全了解革命是必要的並且已決意為着這個革命而舍身拚命；第二，要統治階級受到政府的危機，這危機甚至把最落後的羣衆都牽引來參加政治……，使政府軟弱無力和使革命者得以迅速推翻牠，（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但是在一個國家內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還不算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裏的無產階級，既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並領導着農民，就能夠而且應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不是說，這樣牠便會達到社會主義底完全的，最後的勝利呢？換句話說，這是不是說，牠單靠一國底力量能够最後鞏固社會主義並完全保證國家不受外國的武裝干涉的危險，也就是說，完全保證不受復辟的危險呢？不，不是的。為要達到這點，至少要有幾個國家內的革命底勝利。因此，發展及幫助其他國家的革命，乃是已經勝利的革命底一個重大任務。因此，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不應把自己看作自顧自的東西，而應把自己看作是加速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助手和工具。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用兩句話表明了這個意思，他說，已經勝利的革命底任務就是：“最高度地施行在一個國家裏所能實現的事情，以便發展、援助和激勵世界各國底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一般地說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底特點，就是這樣。

#### 四 無產階級專政

在這個題目中，我提出三個基本問題來講：（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這革命底運動，規模，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是革命底機關，是革命底最主要的支柱，牠的使命就是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和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將革命進行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够做到的。但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底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殊的機關以作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麼牠就不能夠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不能夠保持勝利和向前进展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不，不是的。取得政權——這樣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之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牠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任務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牠必勝不敗。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怎樣辦呢？為要做到這一點，至少是必須執行下面三個任務，這些任務在革命勝利後“第二天”，便要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

- 1、撲滅那些為革命所推翻了的和所剝奪了的地主和資本家庭反抗；消滅

他們謀恢復資本政權的一切的和任何的企圖。

2、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消滅和肅清階級的方向進行。

3、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底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

為了執行和完成這些任務，便必須要有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整個的歷史時代。當這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必然還希望復辟，而這種希望便變為復辟的嘗試。在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被推翻了的剝削者——他們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他們不相信這點，沒有想到這點——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起來鬥爭，謀恢復他們的已被奪去的‘天皇’，謀他們的家庭幸福——他們的家庭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的生活，而現在則談這般‘下賤人’，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弄到從事‘下賤的，勞動……’）。而在剝削者資本家後面，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跟着。幾十年來各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是猶豫不決和動搖不定的，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底困難而恐懼，因工人底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經錯亂，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在兩個營壘間跑來跑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做復辟底嘗試是有牠的根據的。因為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期內還比推翻了牠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

列寧說：

“要是剝削者僅在一國內被打倒了——而這一點當然是普通的事情，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乃是少有的例外，——那末他們仍舊還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請參看同上一卷，第三五四頁）。

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底力量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底國際聯繫底力量和統一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在於“在革命以後，剝削者在長時期內還保存着許多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立刻消滅金錢是不可能的），還有某些財產（往往是很多的），還有相互的聯繫，組織底和管理底技能，還有一切管理‘秘訣’，（習俗，方法，手段，機會）底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接近於高等的技術人員（那些過着資產階級式的生活與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還有比較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勢力，就在於小生產的勢力，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則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為‘消滅階級，這不僅是個個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而這種人是不能驅逐的，不能鎮壓的，應該和他們共居，能够（而且應該）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而且只能很長久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來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一九〇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為要反對最有力的敵人起見，為要反對資產階級起見而進行的最厲害的，最尖銳的最殘酷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反抗，將因牠自己之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為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見同上卷第一七三和一九一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來完成這些任務，要幾年內實行這一切，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

義的過渡，看做是一個很短的時期，看做是一個“最革命的，動作與訓令，而應該把她看做是整個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中充滿着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忍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守，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需要，不僅是為了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底經濟的和文化的先決條件，並且是爲了使無產階級能够：第一，教訓並鍛鍊自己成爲一種能够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教化並改造小資產階級的階層，以便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底組織。

馬克思曾告訴工人說：

“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鬥，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而且是爲了改變你們自己和使你們自己變成能够進行政治統治的人材，（請參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了和更加發展了馬克思底這個思想，他說：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須要教化成百萬的農民和小農主，成十萬的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使他們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來教化無產者自己，他們不是立刻便能脫除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不是用奇術，依聖旨，一提出口號，一通過決議，一公佈法令，便能脫除這些成見的，只有與大批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作長久的，艱難的羣衆鬥爭，他們才能够擺脫這些成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八和二四七頁）。

(二)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從上面的說話中，已經可以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不侵犯舊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條件下面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各國的孟塞維克與機會主義者非常懼怕專政，好像懼怕洪水猛獸一樣，他們因爲懼怕得太厲害，便把所謂“爭取政權”，的觀念來代替專政的觀念，他們通常把“爭取政權”，歸結爲更換“內閣”，，歸結爲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得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登上執政

•用不着解釋，這所以及諸如此類的更換內閣，是與無產階級專政，與由真正的無產階級爭取真正的政權，毫無相同的地方。麥克唐納爾和謝德曼在保留着資產階級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御用機關，祇是帝國主義者繩底遮蓋物，祇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方便，就不順利和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的時候，他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臘”，那裏，情況不安底象徵，但是無論如何，這類政府免不了仍舊是資本底加了粉飾的政府。麥克唐納爾或謝德曼底政府與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是相隔這樣遠，正好像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有新的地方政權機關和新的中央政權，是在舊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底廢址上面產生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秩序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而是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在破壞資產階級秩序的過程中，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是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拿來社會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把對於資產階級施行的暴力拿來做依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由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底反抗的機器。在這個關係上，無產階級專政在質實上與其他任何階級底專政都沒有區別，因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一切舊有的階級的國家是少數剝削者對多數被剝削者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的專政。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依靠着暴力，而得到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們底同情和幫助。（請參看“國家與革命”）

從這裏便要得出兩個基本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是給一切人的，也給貧人，也給富人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新式的民主國家——給★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以民主的國家；應該是新式的專政國家——為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專政的國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三頁）。

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底哲論，說什麼普遍的平等，“純粹的”，民主“十足的”，民主等等，這都是以資產階級的精神掩飾這樣一件無可置疑的事實：就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是不能有什麼平等的。“純粹”，民主底理論，是為帝國主義強盜所收買的和蒙蔽的工人階級上層份子底理論。這理論底使命，就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底瘡癥，粉飾帝國主義和賦與牠以精神上的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的羣衆。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者沒有得到而且沒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這至少是因為房屋，印刷所，紙料堆棧等等——為着利用“自由”，擺起兒所必須的東西——都是剝削者底特權。在資本主義之下，由被剝削羣衆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事情，是沒有，而且是不能有的，這至少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之下，甚至於就是在最民主的制度的國家裏，政府都不是由人民所指定的，而是由路特希理德和司丁尼斯，洛克齊爾和摩爾根這般人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底民主，是剝削者的少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被剝削者的大多數底權利的，是以反對這大多數人的。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被剝削者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底管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大多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剝削者的少數人底權利的，是用來反對這少數人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底發生，不能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底結果，——牠的發生祇的是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破壞資產階級的軍隊，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機關，破壞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內戰爭”，底序言上說：

★注重點是我加的——大林註。

“工人階級不能夠簡單地佔有現成的國家機器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本身的目的，”

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給顧格爾曼的書信內又說：無產階級革命應該

“……不像向來一樣，擅官僚軍閥的機器，一手倖一手，而應該將這黨機器打破……——這是歐洲大陸上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

馬克思在這裏只說到歐洲大陸，這樣便給了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塞維克一個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曾假定說，資產階級的民主，經過和平道路來發展到無產階級的民主，是可能的，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的幾個國家（英、美）是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曾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他曾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性，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帝國主義，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這些國家中還沒有發展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發展的帝國主義未出現以前，情形曾經是這樣。但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了；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已發展並普及到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時候，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了；在這個時候，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滅了——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這也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種例外要失去時效了。英國和美國，本來是英吉利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牠們已經完全墮入一般歐洲式的，征服一切和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這個污濁的，血腥的泥潭中了。現時，無論在英國，無論在美國，‘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就是打破，破壞‘現成的’，（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間，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善地步的）‘國家機器’，（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換句話說：歸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歸於以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

器作為這種革命首先決條件的規律，乃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或必不可免的規律。

當然，在近遠的將來，假如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假如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將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候，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們因感覺到國際環境“不利”，會認為最好是“自顧地”，向無產階級大讓步。但是這種推想祇是屬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種推想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絕對沒有任何根據的。

因此，列寧說得對：

“如果不用暴力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不用新的來代替牠，那就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三)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明顯的。但是要利用什麼組織才可以完成這項巨大工作呢？在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底舊式組織，對於這種工作是不適用的，——這是無容懷疑的事情。究竟是無產階級底那種新式組織能够成為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底掘墓人，不但能夠打破這架機器，不但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够成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種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與舊式組織比較，牠的優點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為牠，而且只有牠才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這樣唯一的一個羣衆組織，就是牠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陸軍兵士和海軍兵士。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可以最輕易地和最完全地實現牠對羣衆鬥爭的政治

領導。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羣衆暴動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有本事去打破財政資本底無上威權及其政治附屬物的機關。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組織，即是羣衆底最民主的，也就是最有威權的組織，牠能盡量便利着他們參加新的國家底建設和管理，牠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為破壞舊制度，在為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領導性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由各地方的蘇維埃聯合起來和形成起來的總的國家組織，無產階級——牠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先鋒隊，牠是統治階級——底國家組織，就是說，聯合起來的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正是從前受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廣泛的和最堅韌的組織，現在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一個基礎”，正是“這樣一些羣衆，這些羣衆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實際上’，則被千百種方法和诡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的權利和自由，而現在，這些羣衆則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三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蘇維埃政權是國家組織底新形式，牠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和議會主義的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牠是新式樣的國家，這個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一切壓迫和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蘇維埃政權一出現，“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主義底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章句：無產階級專政底時代，就開始了，”

• 蘇維埃政權底特點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在有階級存在的條件下一切可能的國家組織中的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最廣泛的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為，牠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的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聯繫和合作底應所，牠在自己的工作中既然依靠着這個聯絡和合作，所以牠就是大多數人民統治少數人民的政權，就是這大多數人民底國家，就是這大多數人民的專政底表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底一切國家組織中最具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為，牠既然是破壞一切的民族壓迫而依靠着各民族的勞動羣衆底合作，所以牠就使這些羣衆聯合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的事業，易於做到。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就能夠使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底先鋒隊，就是說使無產階級，就是說使蘇維埃底最有團結的和最有覺悟的核心，是於領導這些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訓我們知道：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統一和領導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中先進的和落後的階層，（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種經驗底指示易於實行。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為統一的國家組織並以生產的單位——工廠，來代替地域的選舉區，這樣，牠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與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育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是在於，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夠使軍隊擺脫對資產階級的指揮部，從而，將也也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壓迫工具變為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底鐵蹄下面解放出來的解放工具。

就是在於，“只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才能夠一下子和最終地破壞舊的機關，就是說破壞資產階級的宣傳的和司法的機關，（請參看同上的地方）。

就是在於，蘇維埃形式的國家，吸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羣衆組織來經營地和無償佔地的國家管理，只有牠才能平衡國家組織底衰亡，這種衰亡就是將來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基本成份之一。

這樣，蘇維埃和蘇聯她經過長久的尋找而終於尋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

這種形式的範圍中，應該完成無產階級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他的發展和完成。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式樣的民主機關底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够保證最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 五 農 民 問 題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四個問題來講：（一）問題底提法；（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三）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四）蘇維埃政權當後的農民。

（一）問題底提法。有人以為，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黨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但是，這種情況絲毫不使農民問題喪失絕對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所確有的重大的，迫切的意義。大家都知道，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開始認真研究農民問題，正是在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底前夜，那時，關於推翻沙皇制度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已全盤擺在黨面前了，而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就帶着迫切的性質。大家都也知道，俄國的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帶着更迫切的性質，這時，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這本是理所當然的：誰要去執掌和準備去執掌政權，誰就不能不注意屬於自己的真正的同盟者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牠這樣也就是列寧主義底最迫切的問題之一。

第二國際政黨之所以對農民問題取冷淡態度，甚至簡直取否定態度，不僅是因為西方各國有特殊的發展條件。這首先是因為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並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了，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不勝彌漫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譏諷態度，在他們那裏認為是文體家風底表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底表現。事實上，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底氣味都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對農民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取冷淡態度，這在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無疑義地是表示背叛馬克思主義。

問題是這樣：因為農民生存底某些條件而隱藏在農民裏面的革命可能性，是不是已經用完了呢？如果還沒有用完，那麼，是不是還有希望，還有根據為着無產階級革命來利用這種可能性呢？是不是可以將農民，將農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由資產階級底後備軍——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他們曾是這樣的，而且現在還是這樣的，——變為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為無產階級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大多數農民有革命的能力，並且可以為着無產階級專政底利益來利用這種革命的能力。俄國三次革命底歷史完全證實了列寧主義關於這一點的結論。

由此便得出實際的結論，就是說要援助，一定要援助勞動農民來為反對奴役及剝削的鬥爭，為解脫壓迫及貧困的鬥爭。自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應該援助任何的農民運動。這裏所說的是援助這樣一種農民運動和這樣一種農民鬥爭，這種農民運動和農民鬥爭能够直接或間接便利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能够這樣或那樣助長無產階級革命底力量，能够促進將農民變為無產階級底後備軍和同盟者的事業。

(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的農民。這一時期是從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起到第二次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止。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雖說自由資產階級底影響，離開立憲民主黨，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轉到布爾塞維克黨方面來。這時期底歷史，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自由資產階級）與布爾塞維克黨人（無產階級）彼此為爭取農民而鬥爭底歷史。便會時期就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因為四次國會底時期給了農民一個實驗的教訓，而這個教訓明白告訴農民說，他們從立憲民主黨人手中，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沙皇是完全幫助地主，而立憲民主黨人則是擁護沙皇的；農民只可以指望唯一力量底幫助，這唯一力量就是城市的工人——無產階級。帝國主義戰爭僅是證實了國會時期底教訓，使農民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使自由資產階級完全陷於孤立狀態，因為幾年的戰爭，證明了希望從沙皇及其資產階級的同盟者那裏得到和平，這完全是虛幻的，完全是欺騙的。沒有國會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會沒有可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在為推翻沙皇制度的共同鬥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便是這樣形成起來的。這種領導權結果弄到了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

大家知道，西方各國（英法德奧）底資產階級革命，曾經是按照另一條道路進行的。那裏，革命中的領導權，並不是屬於當時還由於自己的幼稚而沒有成為，並且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的這個無產階級，而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那裏，農民脫離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並不是從當時人數尚少而且又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來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與自由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舊制度的。當時在那裏，農民是資產階級後備軍。因此，在那裏，革命底結果使得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了。

在俄國，恰恰相反，資產階級革命給了直接相反的結果。俄國革命底結果，沒有使資產階級底政治力量加強，反而使牠削弱了，沒有使牠的政治後備軍增加，反而使牠喪失了基本的後備軍，就是說喪失了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

革命不是把自由資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而是把革命無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牠把數千百萬農民帶領到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陣團。

這一點，也就是以下這件事實底原因之一，這事實就是：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就轉變成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領導權，曾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底萌芽和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階段。

俄國革命為什麼有這種在西方各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上沒有看見過的特殊現象呢？這種特殊現象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這是因為在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當時是在比以前西方各國更發展的階級鬥爭條件下面發展着的，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到這時候已經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而自由資產階級則因懼怕無產階級底革命性，喪失了任何革命性的氣味（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教訓以後），並與沙皇及地主聯盟起來反對革命，反對工農。

必須注意以下的一些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情況：

（1）革命前夜俄國工業底空前的集中。比方，大家知道，俄國全體工人底百分之五十四是在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裏做工的，而在美國這樣的工業發展的國家裏，在這樣的大工廠裏做工的工人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光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像布爾塞維克黨那樣的革命政黨的情形之下，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裏的最偉大的力量。

（2）企業裏的惡劣無比的剝削形式，加上了沙皇衛戍兵底難堪的警察壓制，——這種情況便使工人底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了偉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為革命到底的力量。

（3）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萎靡不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竟變成了沙皇政府的僥倖和公開的反革命派。這不僅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到了沙皇制度底懷抱，而且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於政府的定貨。

（4）當時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殘餘，更加上地

主底專橫，——這種情況就把農民捲入了革命的漩渦。

(5) 沙皇制度壓制了一切有生機的東西，牠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底和地主底壓迫，——這種情況就把工人和農民底鬥爭合為整個的革命的巨流。

(6) 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機，並給革命以莫大的進攻力量。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農民趨向那裏去呢？農民向誰求得援助來反對地主底專橫，反對沙皇底專橫，反對那個害死人的，破壞了農民經濟的戰爭呢？向自由資產階級嗎？但是牠是敵人，——四次國會底多年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向社會革命黨人嗎？社會革命黨人當然比立憲民主黨人“好些”，他們的政綱也是“適合的”，差不多是農民的政綱，但是如果社會革命黨人祇想依靠農民，如果他們在敵人勢力底主要來源地點的城市中沒有力量，那他們能幹出什麼事情呢？什麼地方有一種新的力量，無論在鄉村或城市中，都能不顧一切，勇敢站在前線上與沙皇及地主作戰，並幫助農民擺脫束縛制，擺脫沒有土地的地位，擺脫壓迫制，擺脫戰爭呢？在俄國，一般說來，當時是不是有這樣的力量呢？是有，這就是俄國無產階級，牠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表示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鬥爭到底的能力，自己的勇氣，自己的革命性。

無論如何，別的同樣的力量，是沒有的，並且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取得別的同樣的力量。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農民離開立憲民主黨人而親近社會革命黨人的時候，同時就懂得了必須服從俄國無產階級這個勇敢的革命領袖底領導。

這就是決定了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底特殊性的一些情況。

(三) 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農民。這一時期是從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起到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止。這一時期比較不長，總共祇有八個月；但是，從羣衆的政治教育和革命訓練上看來，我們敢說這八個月是等於平常的立憲發展時期底幾十年，因為這八個月是革命底八個月。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更加革命化，他們對於社會革命黨人失望，他們離開社會革命黨人，而從新轉到

無產階級這一邊來，直接關係在無產階級周圍，認定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澈底的革命勢力，唯一能夠把國家引向和平的那個勢力。這一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布爾塞維克（無產階級民主派）之間為爭取農民，為爭取農民大多數而鬥爭的歷史。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的，是聯合政府時代，克倫斯基統治時代，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拒絕沒收地主底土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主張繼續戰爭，前線上的六月進攻，兵士死刑的法令和郭尼洛夫底暴動。

如果在前一時期內，革命底基本問題是推翻沙皇和地主政權，那麼在現在這時候，在二月革命後的時期中，在沙皇已經沒有了，而綿延不斷的戰爭，又將國家經濟破壞到底，使農民完全破產的時候，關於消除戰爭的問題，就成了革命底基本問題。重心顯然從純粹內部性質的問題轉移到了基本問題——關於戰爭的問題。“結束戰爭，”，“擺脫戰爭，——這就是疲憊於戰爭的全國人民，而首先就是農民所發出的一般的呼聲。

但是當時為要擺脫戰爭，就必須要推翻臨時政府，必須要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必須要推翻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因為，他們，而且祇有他們，在當時總是延長戰爭，要把戰爭延長到所謂“勝利的結局，”。當時，除了推翻資產階級以外，在實際上竟沒有別的可以擺脫戰爭的道路。

這曾是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為這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最後一派——極左派底政權，即社會革命黨底和孟塞維克黨底政權，以便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政權，以便使革命無產階級底政黨，主張以革命鬥爭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主張民主和平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來掌握政權。大多數農民，當時都贊助了工人為着爭得和平及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當時，對於農民，是沒有別的出路的，而且也不能有別的出路的。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就是對於勞動農民羣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的教訓，因為牠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是也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自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

蘇維克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許諾，實際上他們所施行的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是唯一能够領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底繼續延長，不過是更加證實了這個教訓底正確，促進了革命，推動了千百萬農民羣衆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底週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寧紗克黨人底獨立，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實。假如沒有聯合政府時期底明白教訓，無產階級專政一會沒有可能。

那曾經使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易於完成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達成了的。

(四) 蘇維埃政權當初後的農民。如果以前，在革命底第一個時期裏，主要的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以後，在二月革命之後，首要的問題却是經過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那麼在現時，在國內戰爭消滅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底問題就成了首要的問題。加強和發展國有化了的工業；為着這一點而利用受國家所調節的商業來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以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制，以便然後逐漸減少糧食稅底定額，而把事情弄成工業製造品同農民生產品的交換；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使千百萬農民都加入合作制：——這些便是列寧所擬定的，在建成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的道路上的經濟建設底任務。

有些人說，這些任務，對於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或許會是不能做到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種任務簡直是空想的，是不能執行的，因為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但懷疑派是錯誤了，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在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在這些情況中，主要的情況是：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為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為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的教訓，與

無產階級一塊並且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重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為有了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無產階級作經濟合作的非常順利的條件。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黨爭得政權，已成了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爭得政權，黨應當首先就從城市裏到鄉村裏去而成為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請參看恩格斯底“農民問題”，，，）。他說這段話的時候，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而他所指的是西方各國的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革命中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造成了西方各國的同志所夢想不到的影響和支柱——這點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使機關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經濟合作事業易於辦好，——這點怎麼能够否認呢？

懷疑派總是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一種原素。但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各國的小農所說的話罷：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盡可能設法來使小農生活改善，來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合作經濟，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如果那時他們還不能同意這一點，那末我們就要努力給他們以多量的時間，使他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去把這點想一想。我們所以將要這樣做，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獨立勞動的小農可以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蕭底直接利益起見。被我們救全着而沒有降落到無產者地位的和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引過來的農民人數愈多，則社會的改造亦愈是迅速和愈是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發展到極端的結果，等待到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小農民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的時候，才來進行這種社會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爲了農民底利益，而不得不用社會公款來擔負些物

質樸性，這從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上看來，好像是自費金錢，但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為正供擔負犧牲，在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或者可以節省十倍金錢。因此，在這個思想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請參看恩格斯“農民問題”）。

恩格斯這些話是指西方各國的農民說的。但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難道這點還不明顯嗎？現在只有在蘇聯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獨立勞動的小農得到我們這方面來”，實現為這點所必要的“物質樸性”，實現為這點所必要的“對待農民的慷慨”，這些以及同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俄國實行，這些難道還不明顯嗎？這種情況也毫無便利地並推進着蘇聯俄國的經濟建設事業，這點怎麼能够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為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這時候，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半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蘇維埃政權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社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廣大合作制，而由國家以優待的借款來幫助的這條道路。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底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底生產方面。

因有農業合作社底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產生的幾種新的現象，在這方面是極有意義的。大家知道，在農業合作社內產生了新的巨大的以農業生產部門（如麻、馬鈴薯、油類等）為單位的組織，這些組織有偉大的前途。譬如“麻業合作社總會”，包括了許多種麻農民底生產合作社。這個“麻業合作社總會”，供

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麻的生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並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合作總社，將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農業方面國家的社會主義的人生產底家庭農業系統。這裏我說的，是國家的社會主義生產底家庭農業系統，是與資本主義在紡織業——比方說——裏的家庭工業系統相比擬而來的，在資本主義底紡織業裏的家庭工業系統中，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的生產品交給資本家，因此，他們在事實上就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們這裏的農業發展究竟應該走那條道路的許多實例之一。其他農業部門中的其他的同樣的例子，我已用不着說了。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的農民，既然拋開了那私人資本主義的大地主和地主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和破產的道路，他們當然很願意去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我們的農業底發展道路所說的話罷：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這難道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祇是經過合作制（我們以前曾經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麼？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又說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的方法幫助合作制，因為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新的人民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他說：

“每個社會制度的發生，必須要有某個階級底財政幫助。”“自由的，，資本主義在她產生時費了多少萬萬盧布，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我們應當

了解和實行的，就是，現時我們應該特別幫助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制度。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應該是真正的幫助，就是說，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任何的合作社的過轉，這是不夠的，——並當把這種幫助看作是幫助有真正羣衆底真正參加的合作社的過轉，（請參看同上一卷，第三九三頁）

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這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這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認為勞動農民羣衆是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這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够利用而且應該利用這步後備軍，來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來給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這樣一個必要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那末就沒有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上去。

## 六 民族問題

在這個題目內，我提出兩個主要問題來講：（一）問題底提法；（二）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

（一）問題底提法。最近二十年來，民族問題有了許多極大的變化。第二國際時期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時期的民族問題，是大不相同的。不僅就他們的範圍來說，而且就他們的內部性質來說，都是大不相同的。

從前，民族問題通常總是限制在一些大半祇是關係於“文明”，民族的問題底狹隘範圍內。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及歐洲其他的某些民族——這些便是第二國際英雄們所曾經加以注意的幾個主權不全的民族。遭受着最粗暴和最殘酷的民族壓迫的幾千萬和幾萬萬的亞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落在他們的視線以外。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他們是不肯拿來相提並論的。第二國際底要人所能用以將口的，不過是

他們所通過了的那兩三個空洞的教條了事的，竭力躲避殖民地解放問題的決議案。現在，民族問題上的這種兩面性和不澈底性可以說是已被消滅了。列寧主義揭露了這種極端不符合的情形，毀破了那個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中間的，歐洲人和亞洲人中間的，帝國主義底“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中間的牆壁，這樣便使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連結起來。這樣一來，民族問題就由局部的和國內的問題變成了一般的和國際的問題，變成了世界問題，關於使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底壓迫的問題。

從前，民族自決的原則，通常總是被人曲解，常常被縮小到民族自治權。第二國際底某些首領甚至到了這樣的步驟，就是把民族自決權變成了文化自治權，即號壓迫民族有設立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利，而全部政權則仍保留在統治民族手中。這種情況便使民族自決觀念曾經有從反對吞併政策的武器變成粉飾吞併政策的武器的危險。現在，這種昏亂的思想可以說是已經被克服了。列寧主義擴大了民族自決底概念，把她解釋為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底完全分立的權利，是各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利。這樣，就使人完全沒有可能把民族自決權解釋為民族自治權來替吞併政策辯護了。從前，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民族自決底原則，無疑地是由社會大團主義派運用來欺騙民衆的工具，現在，牠却變成揭破一切帝國主義貪慾和拆破一切大資本主義陰謀的工具，變成用國際主義精神給人民以政治教育的工具。

從前，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通常都被看作是純粹法律上的問題。第二國際底政黨會拿來夸耀的，就是冠冕堂皇地宣布“民族平權”，發表無數的宣常來歌吹什麼“民族平等”，同時却抹煞了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當某一批民族（少數的）遭到剝削一批民族而生存的時候，所謂“民族平等”，不過是對於被壓迫民族的嘲弄。現在，民族問題上的這種資本階級的法律觀點應當認為是已經被揭破的了。列寧主義已把民族問題從冠冕堂皇的宣言底天空中拿到實地上來了。牠指出，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直接援助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則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不過是空洞的和虛偽的宣言。這樣一來

關於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就變成關於援助、幫助，真正地和經常地幫助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以爭取真正的民族平等，爭取牠們的獨立的國家的存在問題了。

從前，民族問題會被人以改良主義的精神來看待，被人看作爲單個的獨立的問題，與關於資本政權，關於推翻帝國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沒有關係的問題。這些人曾經暗中設想，以爲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可以不與殖民地解放運動直接聯合起來而得到勝利，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可以離開無產階級革命底大路，不要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而從容地“自流地”，得到解決。現在，這種反革命的觀點，應當認爲是已被揭破了。列寧主義證明了，而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則證實了：民族問題，祇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相聯絡和在無產階級革命底基礎上才能得到解決，而西方各國革命勝利底道路，須經過與殖民地和附屬國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的革命聯盟。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部份，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一部份。

問題是這樣：被壓迫國家底革命解放運動內部所含蓄着的革命可能性，是否已經都用完了？如果沒有都用完，那麼，是否有希望和根據爲着無產階級革命去利用這些可能性，將殖民地和附屬國，由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變爲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

列寧主義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就是說，承認被壓迫國家底民族解放運動內部有革命能力，認爲可以利用這些能力來推翻共同的敵人，來推翻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底關鍵，帝國主義戰爭和俄國革命，完全證實着列寧主義對於這點的結論。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必須幫助，堅決地和積極地幫助被壓迫和不獨立民族底民族解放運動。

當然，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在一切個別具體情形上：對於任何的民族運動都要加以幫助。這只是說幫助那些力謀削弱並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而不是那些力謀鞏固並保持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可以

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某些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會和無產階級運動發展底利益相衝突。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幫助。關於民族權利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和自願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個總問題底一部分，牠服從這個問題，並且要從這個總問題底觀點上去觀察。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曾贊成波蘭人底和匈牙利人底民族運動，而反對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為什麼呢？因為在當時，捷克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是“反動的民族”，是“俄國在西歐的前哨”，是君主專制制度底前哨，而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當時却是反對君主專制制度的“革命的民族”。因為在當時，幫助捷克斯拉夫人底和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運動，就是間接幫助沙皇制度，幫助歐洲革命運動底這個最危險的敵人。

列寧說：

“民主運動個別要求，民族自決也在內，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而是總的民主主義的（現在是總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運動底一部分。也許在個別的具體的情形之下，部分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應該擱棄這個部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到二五八頁）。

如果不是從形式的觀點上，不是從抽象的法權觀點上，而是從具體的革命運動底利益上來估量個別民族運動，那末關於個別民族運動問題，關於這些運動底能有的反動性質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一般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也應當這樣說。極大多數民族運動之毫無疑議的革命性，也正與某些個別民族運動之可能的反動性一樣，都是相對的和特別的。在帝國主義壓迫的環境中間，民族運動底革命性質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無產階級份子底參加，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革命的或共和的政綱，並不一定要這個運動有着民主的基礎。阿富汗國王為阿富汗底獨立而鬥爭，客觀上是革命的鬥爭，不管這個國王及其戰友是抱底君主制的觀點，因為這場鬥爭是弱者，破壞者和消磨者帝國主義；而這樣“激烈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共和派，如克倫斯基和蘇雷特利，倫諾能爾和瑞

捨曼，齊爾諾夫和席恩，亨德基和克萊因斯，他們在帝國主義戰爭時的鬥爭，却是反動的鬥爭，因為這種鬥爭底結果是粉飾和鞏固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恢復勝利。埃及的商人和資產階級智識份子謀埃及獨立的鬥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客觀上却是革命的鬥爭，不管埃及民族運動底首領是由資產階級出身，是帶着資產階級的名稱，不管他們是反對社會主義；而可是英國工黨政府為保持埃及底附屬地位的鬥爭，因為同樣的原因，却是反動的鬥爭，不管這個政府底組員是由於無產階級出身，帶着無產階級的名稱，不管他們“贊成”，社會主義。我還不用說其他較大的殖民地和附屬國，如印度和中國底民族運動了，這些國家在解放道路上的每一步驟，甚至於如果足達反動形式的民主底要求，也還是給帝國主義的嚴重的打擊，即無疑地是革命的步驟。

列寧說得很對：對於被壓迫國家底民族運動，不應該根據形式的民主底觀點去估量，而應該根據反帝國主義鬥爭底總結算中的實際結果去估量，就是說，“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五七頁）。

（二）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時，是從下面的原理出發的：

（1）世界已分成兩個營壘：一個營壘就是為數極少的文明民族，這些民族佔有財政資本並剝削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民；另一個營壘是殖民地和附屬國底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民族，就是說，絕大多數的人民。

（2）被財政資本所壓迫的和所剝削的殖民地和附屬國，是帝國主義勢力底最偉大的後備軍和最重要的來源；

（3）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是他們擺脫壓迫及擺脫剝削的唯一道路。

（4）最重要底殖民地和附屬國已經走上民族解放運動底道路，這種運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5）先進國無產階級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底利益，要求把這兩項

革命運動聯合為一條共同的戰線，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反對帝國主義。

(6) 如不建立和不鞏固共同的革命戰線，則先進國工人階級底勝利和被壓迫民族之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都是不可能的。

(7) 如壓迫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不加以直接的和堅決的援助，來反對“‘祖國的’，帝國主義”，那麼共同革命戰線底建立是不可能的，因為“‘壓迫着別民族的民族，是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的’，（馬克思底話）”。

(8) 這種援助，就是主張，擁護和實行這樣一個口號：民族底分立權，民族底獨立的國家的存在權。

(9) 假如不實行這個口號，則不能建立各民族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和合作，這整個世界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

(10) 這種聯合祇能是自願的，是根據各民族間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友愛關係而發生的。

由此而有民族問題上的兩個方面，兩例趨向：一種趨向就是趨向於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解放和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這種趨向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和殖民地剝削底基礎上發生的；另一種趨向就是趨向於各民族間的經濟的接近，這種趨向是由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底形成而發生的。

#### 列寧說：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就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底激發，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底創立。第二個趨向，就是民族間各類聯繫底發展和頻繁，民族界線底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底國際統一之創立。這兩個趨向都是資本主義底世界規律。第一個趨向盛行於資本主義發展底初期，而第二個趨向則是資本主義已經成熟並走向於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時的特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三九到一四〇頁）。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個趨向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帝國主義非剝削殖民

地，非以暴力將殖民地束縛在“單一的整體”，底細是不能够生存的，因為帝國主義祇有靠脅迫手段和奪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相接近，不然牠就不能成為帝國主義了。

對於共產主義，恰恰相反，這兩個趨向不過是一件事情底兩面，就是說，是使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這件事情底兩面。因為共產主義知道，各民族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祇有根據相互信任和自願協定的原則才有可能：建立各民族自願的聯合的道路，就是由殖民地離開“單一的”，帝國主義的“整體”，而分立，就是由殖民地變為獨立的國家。

因此，必須與統治民族（英、法、美、意、日等）裏的“社會主義者”，底巨大強國的大國主義作堅忍的、不間斷的、堅決的鬥爭，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與本體的帝國主義政府做鬥爭，不願意幫助“他們的”，殖民地底被壓迫民族為擺脫壓迫、為謀得國家分立的鬥爭。

不與這種大國主義作這樣的鬥爭，就不能夠以真正國際主義底精神，以接近附屬國和殖民地裏的勞動羣衆的精神，以真正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工人階級。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沒有獲得蘇聯國內各被壓迫民族底同情和援助，那末，俄國革命就不會勝利，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也就不會失敗。但是為要獲得這些民族底同情和援助，俄國無產階級應該首先就打破俄國帝國主義底鎖子，使這些民族擺脫民族的壓迫。不做這個工作，就不能夠與蘇維埃政權，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不能創造各民族合作萬能好的組織——這組織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組織就是各民族將來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聯合底具體的模型。

因此，必須進行鬥爭，以反對被壓迫國家裏社會主義者底民族的閉關主義和狹隘觀點，狹隘思想，這些社會主義者不願意走出自己的民族的觀念，不了解本國底解放運動和統治國底無產階級運動的聯繫。

沒有這樣的鬥爭，就不能保持被壓迫民族裏的無產階級底獨立的政策，就不能保持牠和統治國裏的無產階級間的階級聯合以推翻共同的敵人，推翻帝國

主義。沒有這樣的鬥爭，國際主義是不可能的。

這便是以革命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統治民族裏的和被壓迫民族裏的勞動階級的道路。

請看列寧關於共產黨的這個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的兩回工作所說的前龍：

“這種教育……在大的，壓迫的民族和小的，被壓迫的民族裏，在侵略的民族和被侵略的民族裏，能夠具體相同嗎？

一、固然不能的。目的是相同的，即所有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極密切接連，日益更加融合，但要達到此目的，却顯然要走各種不同的具體道路，這正好像從一張紙底左邊和右邊走向這張紙的中心點一樣。如果大的，壓迫的侵略的民族中的社會主義者一般地主張民族融合，同時却忘記，那怕就是一刻兒忘記“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第二，喬治，彭加勒等也主張與小民族“融合”，（用侵略手段）——尼古拉第二主張與加里西亞“融合”，威廉第二主張與比利時“融合”，等，——那麼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理論上就是書齋子，在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底幫手。

二、在壓迫的國家裏，工人階級國際主義教育底重心，必須在於鼓吹和堅持被壓迫國家有分立的自由。不然，便不會有國際主義。壓迫的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如果不做這種宣傳，那末我們就有理由而且應該鄙視他，稱他為帝國主義者，稱他為混蛋。這是一個無條件的要求，那怕在社會主義未成功以前，分立底機會祇有千分之一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

反之，小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應當把自己較徹底重心放到我們的總公式底後半節上，即各民族底“自願聯合”。他可以也贊成本民族底政治獨立，也贊成本民族與鄰近任何國家合併，而並不違反他的國際主義者底職務。但無論如何，他必須反對小民族的狹隘觀點，形而上主義，狹隘思想，他必須主張顧全整體和總體，他必須主張部分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

沒有恩來這問題的人，會以為壓迫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主張“分立自

由，而被壓迫民族裏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聯合自由”，這是有矛盾的。但祇要稍微思索一下，就可知道，要達到國際主義和民族融合，要達到這個目的，別的道路是沒有，而且是不能有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六一到二六二頁）。

## 七 戰 略 與 策 略

在這個題目中，我拿六個問題來講：（一）戰略與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二）革命底階段與戰略；（三）運動底浪潮與策略；（四）戰略的指導；（五）策略的指導；（六）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

（一）戰略和策略是指導無產階級鬥爭的科學。第二國際統治時期，主要的是在比較和平發展底環境中編成和教育無產階級軍隊的時期。這是以議會主義為階級鬥爭底主要形式的時期。關於各階級底偉大衝突問題，關於準備無產階級去作革命戰鬥問題，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問題——當時都似乎不是急待解決的問題。當時的任務祇是歸結於利用一切公開發展底道路來編成和教育無產階級的軍隊，適應着當時的條件，——在這條件之下無產階級仍然站在，並且似乎應當仍然站在反對派的地位——去利用議會主義。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時期和在這樣了解無產階級任務的情況之下，不能有完整的戰略，也不能有審慎選舉的策略。那時祇有過遲於策略和戰略的一些片斷的零碎的觀念，可是完義的策略和戰略是沒有的。

第二國際底該死的罪惡並不在於牠當時實施了利用議會鬥爭形式底策略，而在於牠擴大了這種鬥爭形式底意義，牠差不多把這種鬥爭形式看作唯一的形式，而一到公開的革命戰鬥時期，當非議會的鬥爭形式問題已成了首要的緊急問題的時候，第二國際底政黨就退避新的任務而不去接受這些任務。

祇有到了下一個時期，無產階級公開發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當關於推進資產階級問題已成了直接的實在問題的時候，當關於無產階級底

軍（戰略）問題已成為迫切問題之一的時候，當一切鬥爭和組織底形式——會議形式及非議會形式（策略）——已經完全確定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祇有到這個時期才能定出無產階級鬥爭底完整的戰略和籌劃精密的策略。馬克思和格斯關於戰略和策略的明哲思想，一向都是被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所埋沒的，正是在這個時期，織波列寧發掘出來而公佈於世界。但列寧不僅只是恢復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個別的策略的原理。他還更加發展了這些原理，補充了些新的意思和原理，將這一切聯合成了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規則系統和原則系統。列寧著的“做什麼？”，“兩個策略”，，“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幼稚病”，這一些書籍，無疑地都放進馬克思主義底總寶庫，馬克思主義底革命軍械局去的一種最貴重的東西。列寧主義底戰略和策略是關於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科學。

**（二）革命底階段與戰略。**戰略就是根據當時的革命階段來決定無產階級主要打擊方向，規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後備軍）底相當佈置計劃，這個階段底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

我們的革命已經過了兩個階段，在十月革命後已進到了第三個階段，戰略隨着改變過。

**第一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目標是推翻沙皇制，完全消滅中世紀制度底殘餘。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農民。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自由派的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孤立，這個資產階級想抓得農民並想用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取消革命。力量底佈置計劃：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為要達到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

**第二個階段。**這階段包含一九一七年三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目標是推翻國的帝國主義和擺脫帝國主義的戰爭。革命底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後備軍是農民。那國底無產階級是很可能的後備軍。戰爭底拖延和帝國主義

底危機是順利的時機。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孟塞拉克・社會革命黨人）孤立，這些民主派會想攜得勞動農民羣衆並想用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法去結束半命。力量底佈置計劃是：無產階級和農農聯盟。“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麻煩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確定性，（同上）。

第三個階段。這階段是在十月革命以後開始的。目標是鞏固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利用這專政作為支柱，以便推翻全世界內的帝國主義，革命已超越一國底範圍，世界革命時代開始了。革命底基本力量是：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全世界一切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主要的後備軍是：先進國家內的半無產階級和小農羣衆，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內的解放運動，基本打擊底方向就是使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孤立，使第二國際底政黨孤立，這些黨派是與帝國主義實行妥協政策底基本支柱。力量底佈置計劃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及附屬國底解放運動聯盟。

戰略是關涉到革命底基本力量及這些力量底後備軍的。牠因革命階段底過渡而起變化，而在每個現有階段底整個時期內，大體上是不變更的。6

（三）運動底來潮退潮與策略。策略就是無產階級在比較短促的時期內，在運動底來潮或退潮時期，在革命底高潮或低落時期內行動路線底決定，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代替舊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以新的口號代替舊的口號的方法，以及用配合這些形式等等的方法，來為實現這條路線而進行的鬥爭。戰略底目標是要戰勝——比方說——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要把反沙皇制度的或反資產階級的鬥爭進行到底；而策略底目標就沒有這機大，因為牠的任務不是在於收得整個戰爭底勝利，而是在於收得某些據點底勝利，某些戰鬥底勝利，有效地實行某些適合於當時革命底高潮或低落時期內的具體環境的運動與發動。策略是戰勝底一部分，是很從封戰略和服務於戰略的。

策略隨着來潮退潮而變。在革命底第一個階段中（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

七年底二月），戰略計劃並沒有變更，可是策略却變更了幾次。在由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這個時期內，黨底策略是進攻的策略，因為在這時候是有革命底來潮，運動是向上升的，所以策略也應當根據這個事實來決定。同時，與這個情形相適應的，就是鬥爭底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適應革命來潮底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罷工，政治示威，總的政治罷工，抵制國會，暴動，革命的戰鬥的口號——這就是這個時期內互相交替的鬥爭方式。當時，組織底形式也隨着鬥爭底形式而有了變更。工聯委員會，農民革命委員會，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多少公開的工人政黨——這就是這個時期內的組織形式。

在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三年這個時期內，黨不得不變到退守策略，因為那時候是有革命運動底低落，革命底退潮，策略也就不得不顧及到這個事實。同時鬥爭底形式以及組織底形式也適應著這個情形而變更了。不是抵制國會而是參加國會，不是公開的議會外的革命活動而是國會內的活動和國會內的工作，不是總政治罷工而是局部的經濟罷工或者簡直不作聲息。當然，黨在這個時期內不得不秘密起來，而黨裏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保衛社及其他合法組織所代替了。

關於革命底第二個階段和第三個階段也應當這樣說，在這兩個階段中策略變更了幾十次，而戰略却始終沒有變更。

策略是歸涉到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及組織形式，歸涉到這些形式底更換和配合。策略在革命底每個現有階段底路上可以隨著革命底來潮或退潮，高潮或低落而變更幾次。

**(四)戰略的指導。**革命底後備軍可有直接的和間接的：

直接的：(1)本國的農民及一般過渡階層，(2)鄰國的無產階級，(3)殖民地與附屬國的革命運動，(4)無產階級東政府底籌利品和獲得物，而對於一部分籌利品和獲得物，無產階級——只要是保持著自己的力量上的優勢——是可以暫時放棄的，這為的是要收買強有力的敵人和取得一個暫時休息的機會。

間接的：（1）在本國各個非無產階級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矛盾與衝突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利用去削弱敵人底力量和加強自己底後備軍的，（2）與無產階級國家敵對的那些資產階級國家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這些矛盾，衝突和戰爭是可以被無產階級在進攻時或在迫不得已而轉變地實行退守時所利用的。

關於第一種後備軍，是用不着說的，因為他們的意義是大家所知道的。至於第二種後備軍底意義却不是常常都很明白的，關於這種後備軍，我們應當說，有時牠們對於革命底進程具有頭等的意義。例如在第一次革命時及革命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自由派的君主派的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間的衝突，在使農民體脫資產階級底影響這個事情上是發生了作用的，這種衝突底偉大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在十月革命底時期，各基本的帝國主義者集團間拚命競爭底非常重大的意義，更是不可否認的，那時候帝國主義者忙於相互間的戰爭，沒有功夫集中力量來反對新起的蘇維埃政權，而無產階級却正因此得以乘機組織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政權及準備撲滅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很有把握說，現在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他們彼此間的新戰爭成為必不可免的事情，在這個時候，這種後備軍對於無產階級將有日益重大的意義。

戰略的指導底任務，就是要正確利用這一切後備軍來達到革命在其現有的發展階段上的基本目標。

怎樣才算是正確利用後備軍呢？

就是要實行幾個必要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中，主要的條件就是：

第一，當革命時機已經成熟的時候，當進攻以全力進行的時候，當暴動已急待發動的時候，當調動後備軍去緊緊跟上前鋒已成勝利底決定條件的時候，在這個決定勝負的緊急關頭，應當把革命底主要力量集中在使敵人最易受傷的地方。這樣利用後備軍底最好例子就是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這時期內的戰略，無產階級的，在這時期內使敵人最易受傷的地方就是戰爭。無誤謬的，電

正是在這一個基本問題上把極廣大的民眾集合到了無產階級先鋒隊底周圍。黨在這時期內的戰略就是以示威遊行等方法來訓練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作街道上的發動，同時經過後方的蘇維埃和前線的兵士委員會去調動後備軍，使其緊緊跟上前鋒。革命的結局證明了，後備軍曾經是利用得正確的。

為要說明這個在戰略上利用革命力量的條件，列寧用自己的話敘述了馬克思關於暴動問題的著名原理，請看列寧底這段話罷：

“無論何時都不要把暴動當兒戲，而既然要開始暴動時，那就應當牢牢记住，暴動是必須進行到底的。必須在決定勝負的關頭把大大超過敵人的力量集中在決定勝負的地點，不然，那末，準備得比較好些和組織得比較好些的敵人就會把暴動者消滅下去。暴動既已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來幹，並且一定要和絕對要轉爲進攻。“防守就是武裝暴動底死路，，。應當努力抓得良好時機，應當趁着敵人的軍隊還是一盤散沙的時候，突然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猛擊。每一天（如果祇是一個城市底暴動，就可說是每一小時）都要取得至少是小小的勝利，無論如何都得保持‘精神上的優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九到三二〇頁）。

第二，選擇實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暴動的時機，這種適當時機就是當着危機已達到高點，先鋒隊已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軍已有幫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隊伍內底情形已經混亂的時候。

列寧說：

“如果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力量已經充分混亂，他們彼此間已經打够了，如果“他們因爲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已經把自己弄得充分精疲力竭了，，，如果“一切動搖的，不堅定的，不穩固的中間份子，就是說，與資產階級有分別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已在民眾面前充分揭穿了自己，已經因實際上的破產而充分丟了臉皮，，，如果“在無產階級內部，羣衆贊成進行最堅決奮勇的革命行動以反對資產階級的這種情緒已經開始並且猛烈高漲；那末，“決戰時機就可算是完全成熟了，。那時候

，革命時代成熟了，那時候，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正確地預計了上述這一切……條件，正確地選擇了時機的話，就有保證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二〇至三二一頁）。

十月革命底進行可以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危險的錯誤，弄到所謂“失掉常度”，就是黨落在運動進程底後面，或者過於先到前面，這樣就造成失敗底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企圖由逮捕民主會議底代表來着手開始暴動，這就是這種“失掉常度”底例子，就是不會選擇暴動時機的例子，因為那時候在蘇維埃內部，還感覺着動搖的情緒，前線還在猶豫不決，後備軍還沒有拉來趕上先鋒隊。

第三，一往直前地實行已經決定的方針，不顧道路上的一切艱難和困難而向着目標進行，這個條件之必要，是為要使先鋒隊不敢失去鬥爭底基本目標，使羣衆不致于失道路，而向着這個目標走去，努力團結在先鋒隊底周圍。違背這個條件就要弄出極大的錯誤，就是海員們所熟知的“失掉方針”的錯誤。我們的黨在民主會議以後，立刻通過了決議，決定參加預備國會，這種錯誤的行為就是這種“失掉方針”底例了。那時候黨似乎忘記了預備國會是資本階級想把俄國從蘇維埃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道路上去的企圖，黨如果參加這種組織，就會混亂全局，就會使那些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口號下作革命鬥爭的工農羣衆迷失道路。後來布爾塞維克退出了預備國會，這個錯誤就糾正了。

第四，當敵人力量強大，退守必不可免，受敵人逼迫而去迎戰是顯然不利的時候，當在某時的力量對比之下只有退守才能使先鋒隊免受打擊而且保留其後備軍的時候，——那時候就要很巧妙地運用後備軍，以便作正確的退守。

列寧說：

“革命的政黨應當賞捕督習。他們已經學習怎樣實行進攻。現在應當瞭解，除了學會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怎樣來正確地實行退守，應當瞭解——而且革命的階級正根據自己的辛苦經驗來學習瞭解：不學會正確的進

攻和正確的退守，是得不到勝利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七頁）。

這種戰略底目的——就是要贏得時間，瓦解敵人，養精蓄銳以圖後來向敵人進攻。

總結“布列斯特和約”，可以算是這種戰略底模範，這和約曾使黨有了可能去贏得時間，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瓦解敵人底力量，保存跟着自己走的農民，養精蓄銳來準備向高爾察克和哥尼金進攻。

列寧在那時候說道：

“我們締結單獨和約，這樣，我們就在現時可能的最高限度內擺脫雙方彼此敵對的帝國主義的集團，利用牠們相互間的敵視和戰爭——這種敵視和戰爭阻礙着牠們勾結起來反對我們，——利用來取得相當的手足自由的時間，以便繼續和鞏固社會主義的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九八頁）。

列寧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三年以後說道：

“現在就是最蠢的傻子都看得到，“布列斯特和約乃是加強了我們的力量而分散了國際帝國主義底力量的一種讓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七頁）。

（五）策略的指導。策略的指導就是戰略的指導底一部分，牠是照從戰略指導底任務與要求的。策略指導底任務就是要熟悉無產階級所有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而且要保證正確地運用這些形式，以便在現有力量底對比中得到最高限度的為準備戰略的勝利所必要的效果。

怎樣才算是正確運用無產階級底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呢？

這就是執行幾個必要的條件，在這些條件裏，主要的條件就是：

第一，首先就應當注重的，正是這樣一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種形式因為最適合於當時的運動來潮或運動退潮底條件，所以能便利着和保證着引導羣衆到革命陣地上去，引導千百萬羣衆到革命戰線上去，能便利着和保證着把

這些羣衆佈置在革命戰線上。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使先鋒隊覺悟到保存舊制度底不可能和推翻這個舊制度底不可免。問題底本質是在於使羣衆，千百萬羣衆瞭解這一點並表示有決心去幫助先鋒隊。但是，羣衆只有經過本身的經驗才能瞭解這一點。任務在於，使千百萬羣衆有可能根據本身的經驗來瞭解推翻舊政權底不可免，並提出這樣一些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這些形式可以使羣衆易於根據經驗來認識革命口號是正確的口號。

黨在當時如果沒有決定參加國會，如系牠沒有決定集中力量去進行議會的工作，並根據這工作而發展鬥爭，以便利益羣衆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瞭解國會底無用，立憲民主黨口惠底虛偽，與沙皇制度妥協底不可能，工農聯盟底必要，——如果在當時沒有決定這樣做，那末先鋒隊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與羣衆的聯繫。如果沒有羣衆在國會時期的經驗，那末，立憲民主黨就不會被打破，無產階級底領導權就不會有可能了。

召回派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他們要使先鋒隊脫離自己的成千百萬人的後備軍。

如果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時候遵照着左派共產主義者底口號而去暴動，那末，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會失去牠在廣大的農民和兵士羣衆中的影響，因為，在那個時候，孟寧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沒有完全揭破自己是擁護戰爭和帝國主義的人，羣衆還沒有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認清孟寧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屬於和平，土地，自由的演說是帶着騙人的性質。如果沒有羣衆在克倫斯基統治時期的經歷，那末孟寧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也就不會孤立起來，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會沒有可能。因此“耐煩解釋”，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錯誤並在蘇維埃內部作公開鬥爭，這個策略，在當時是唯一正確的策略。

左派共產主義者策略底危險性，就在於他們有把黨由無產階級革命底首腦變成一小羣虛空而沒有根基的陰謀家的危險。

列寧說：

“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這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要使真正是整個階級，真正是廣大的勞動的和受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這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底視自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一切大革命底基本定律，這個定律現在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得到了非常有力的和明顯的證明。不僅俄國文化落後的和往往不識字的羣衆，就是德國文化程度高深的和個個識字的羣衆，也曾經須要根據親自的經驗來認識：第二國際勇士們底政府是何等懦弱無能，多麼沒有氣節，如何沒有辦法，怎樣向資產階級盡忠效勞，如何卑鄙齷齪，來認識：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便必然有極反動派（俄國的郭尼洛夫，德國的賈卜及其同類人物）底專政，——曾須要根據親自的經驗來認識這些事情，以便堅決地轉到共產主義方面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到二三〇頁）。

第二，要在每個現有時機內找到事變過程鍊子上的這樣一個特別的環節，一抓住這個環節，便可以掌握着整條鍊子而準備那些為達到戰略勝利所必要的條件。

問題底本質是在於，應當從黨的當前許多任務中間提出這樣一個當前的任務，這個任務底解決便是工作底中心點，這個任務底實行便能保證有成效地解決其餘的當前的任務。

我們可以用兩個例子來表示這個原理底意義：一個例子是很久以前的（黨底形成時期）事實，另一個例子是最近的（新經濟政策時期）事實。

在黨底形成時期，那時候，無數的小組和組織還沒有彼此聯繫起來，手工業工作方法和小團體個度腐蝕了整個黨，而思想離異竟成了黨內生活底特點——在這時期，整個旗子上的一個基本環節，擺在黨面前的各項任務中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創辦全俄的秘密報紙。為什麼呢？因為在當時那種條件之下，祇

有經過過一種全俄的秘密報紙，總能造成黨內這樣一種意見一致的中央幹部，這種中堅幹部能够把無數的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準備思想的和策略的統一底條件，並這樣來建立組織真正政黨的基礎。

在由戰爭過渡到經濟建設的時期，那時候，工業正處在破壞的狀態中，農業正苦於城市工業品底缺乏，那時候國家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聯絡已變成了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底基本條件，——在這時期，事變過程鍊子上的基本環節，所有任務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發展商業，為什麼呢？因為在新經濟政策底條件之下，工業和農民經濟祇有經過商業才能聯絡起來；因為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祇有生產而沒有銷路，就是致工業於死命；因為祇有用發展商業的方法去擴展銷路才能擴展工業，因為祇有在商業方面鞏固了以後，只有掌握了商業以後，只有抓住了這個環節以後，才可以希望把工業與農民市場聯絡起來，和有效地解決其他的當前任務，以造成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

列寧說：

“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底信徒，還是不够的……須要善於在每個時候裏找出這樣一個特別的環節，對於這個環節，應當用所有的力量把它抓住，以便握住整條鍊子並穩固地準備過渡到以下的一個環節，……‘在現今的時候……這樣的環節就是在國家的正確的節制之下來擴與國內的商業。商業——這就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底一些過渡形式中，在歷史事變底鍊子上須要用所有的力量來抓住的一個‘環節’，（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二頁）。

這就是保證能有正確的策略指導的主要條件。

(六) 改良主義與革命主義。革命的策略與改良主義的策略有什麼區別呢？

有些人以為，列寧主義是根本反對改良，調和及妥協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對於這一點布爾塞維克並不比任何別人知道得壞些，他們知道：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有一點總比完全沒有的好些”，在某種條件之下，一般改良，特別是

調和及妥協，乃是必要的而且有益的。

列寧說：

“以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為目的的戰爭，要比各個國家間的普通戰爭中的最堅持的戰爭困難百倍，長久百倍，複雜百倍；要進行這樣的戰爭而同時却預先就不願意使用看風轉舵的手段，不願意利用敵人間的利害矛盾（那怕就是暫時的矛盾），不願意與各種可能的（那怕就是暫時的，不穩固的，僵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妥協與調和，——這豈不是可笑到極點麼？這豈不是正像我們在攀登一座艱難險阻的，還沒有被人考察過的和從來為人跡所沒有到過的高山的時候，我們却預先就不願意有時曲折前進，有時回頭退後，不願意變更已經選定過一次的方向，不願意試用各種的方向，是同樣可笑嗎？，（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一一頁）。事情顯然不是在於改良或調和與妥協，而是在於人們怎樣應用改良與妥協法。

由改良派看來，只要改良就完了，革命的工作只是掛在口頭上空談，用來轉移視線的。所以，改良主義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條件下面，必然要變成強固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要變成瓦解革命的工具。

由革命家看來，便恰好相反，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家看來，改良乃是革命底副產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底條件下面，自然要變成瓦解資產階級政權的工具，變成強固革命的工具，變成向前發展革命運動的支柱點。

革命家之所以接受改良，為的是要利用牠來繫連環鉤，以便把公開的工作與秘密的工作聯繫起來，為的是要利用牠來做一個掩飾物以便加緊秘密工作，這種秘密工作底目標，就是用革命精神準備羣衆去推翻資產階級。

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來以革命精神利用改良與利用妥協底寶寶。

相反的，改良派之接受改良，為的是要拒絕一切秘密工作，破壞那準備羣衆去革命的工作，安息於‘恩賜的’改良之下。

這就是改良主義策略底實質。

關於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改良和妥協問題就是這樣。

可是，在帝國主義被推翻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情形就稍微改變了。在某種條件下，和某種環境下，無產階級的政權也許不得不暫時放棄用革命手段改造現存秩序的辦法，而採用逐漸改造現存秩序的方法，就是說用列寧在“關於金子底意義”，這篇著名論文裏所說的“改良的辦法”，採用繞道前進的辦法，採用改良和向非無產階級讓步的辦法，以便瓦解這些階級，給革命以暫時休息的機會，養精蓄銳和準備再行進攻的條件。不能否認，這種辦法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改良主義的辦法。只是應當記着，這裏有一個根本的特點，這特點就是：這裏的改良是從無產階級的政權那裏出發的，這種改良是鞏固着無產階級政權，給無產階級政權以必要的暫時休息機會，這種改良底使命不是瓦解革命而是瓦解那些非無產階級的階級的。

這樣一來，在這種條件之下，改良就變成相反的東西。

無產階級政權之所以能够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在前一時期內的革命規模是充分巨大，這樣，牠便造成了充分廣闊的地盤，使得有餘地可以實行退守，用暫時退守的策略，繞道前進的策略，來代替進攻的策略。

這樣一來，在從前，在資產階級政權之下，改良是革命底副產品，可是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改良底來源便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勝利品，便是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由這些勝利品所構成的後備力量。

列寧說：

“只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和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同時，馬克思只能從一方面，就是說祇能在當時這樣一個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個環境裏，無產階級甚至於在一個國家裏都還沒有獲得第一大的，多少穩固的，多少長久的勝利。在這樣的環境內，正確關係底基礎說是：改良是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階級鬥爭中的副產品……。當無產階級甚至

於是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在改良對革命的關係上，就發生一種新的東西。在原則上還是與以前的一樣，可是在形式上已發生了這樣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先見到的；可是只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和政策才能瞭解這個變化……。在革命勝利以後，牠們（即指改良——斯大林註）（在國際範圍內照舊還是副產品），除此以外，對於取得了勝利的國家、當這個國家底精力在極緊張地用過以後而弄得顯然不够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的時候，牠們就是一樣必要的和應有的暫時休息機會。勝利給我們以這樣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迫不得已而退守的時候也有把握可以支持下去，——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夠支持下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四到八五頁）。

## 八    黨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議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形式——在這種條件之下，政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牠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答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政黨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在戰爭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便沒有力量採取什麼嚴重的辦法。這是完全對的。可是這樣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第二國際底政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沒有用處的，他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的政黨——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政黨，而是一種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在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不是政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事實上，政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務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政黨領導之下，當然是談不上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然而，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公開的階級衝突底時期，無產階級的革命發動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底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即關於把整個黨的工作改進到新的革命的軌道上，關於以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訓練工人，關於準備和整頓後備軍，關於與鄰近無產階級聯盟，關於與殖民地和附屬國解放運動建立牢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的新任務。誰要是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主義底和平環境內培植出來的舊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這就是使自己必然陷於絕望的地步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地步。有這樣的任務在肩上而以陳腐的政黨為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體武裝的情況。因此，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

因此，就必需要有新的政黨，戰鬥的政黨，革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無產階級作奪取政權的鬥爭，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是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要這樣敏捷，以至於足以繞過一切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暗礁。

沒有這樣的政黨，就甚至於莫想要推翻帝國主義，莫想要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政黨，就是列寧主義底政黨。

這個新政黨有什麼特點呢？

(一) 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當首先應該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牠應當吸收工人階級底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可是要成為真正的先進的部隊，黨就必需用革命的理論，對於運動規律的知識和對於革命規律的知識，來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牠就沒有力量來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來引導無產階級。倘若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生活及思想，倘若牠跟着自發運動作尾巴，倘若牠不會克服自發運動底消極性和政治冷漠性，倘若牠不會超出於無產階級底暫時利益之上，倘若牠不會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牠

就不能成為真正的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底前面，牠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牠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是跟着自發運動做尾巴。第三國際底政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這些政黨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執行者，這種政策把無產階級弄成爲資產階級手上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的部隊底觀點上的，並能够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程度上底政黨——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使工人階級脫離工聯主義底道路而將牠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工人階級鬥爭底困難，鬥爭環境底複雜，戰略與策略，後備軍與隨機應變，進攻與退守。這些條件的複雜程度，即使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大，至少也不比戰爭條件底複雜程度小。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千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的方針呢？無論那一個在戰場上作戰的軍隊，要是牠不願意使自己必然遭受失敗，牠就一定要有經驗豐富的參謀部。無產階級如果不願把自己交與兇惡的敵人去看食，那麼牠就更其一定要有這樣的參謀部，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可是這種參謀部在什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政黨，才能够成爲這樣的參謀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這就等於軍隊沒有參謀部。黨就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參謀部。

但是黨不能僅僅是先進的部隊。同時牠應該是階級底部隊，階級底一部分。應當在自己生存底一切根蒂上與階級緊相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的時候，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的時候，當整個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去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時候，先進的部隊與其餘工人階級羣衆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種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自己閉關自守和脫離了非黨羣衆，那麼黨就不成其爲黨了。

如果黨不和非黨羣衆發生密切關係，如果在黨和非黨羣衆中間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受她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信用，那麼黨就不能領導階級。不久以前，我們的黨從工人中招收了二十萬新黨員。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這些人與其說是自己跑來加入黨，不如說是由所有其

餘的非黨羣衆派來加入黨內，這上非黨羣衆倉頡極參加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而且不得他們的贊同，根本就沒有接收過新黨員。這件事實證明，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都把我們的黨看作他們自己的黨，看作親切的和自家的黨，他們認為黨底發展和勞動人民與他們的利害血肉關係的，他們自願把自己的命運借託於黨底領導。顯然用不着說明，如果沒有這種不可拆散的精神上的關係，把黨與非黨羣衆聯合起來，那麼黨就不會成為本階級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列寧說：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則完全是整個階級）底行動都應該受我們黨底領導，都應該盡可能地緊密切換近於我們的黨，可是如果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差不多整個階級或者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底程度，自己的社會主義政策底堅韌性與積極性底程度，那就是廢棄主義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主義者懷疑過：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為落後羣衆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是完全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牠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的責任是在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先進部隊底程度，那末，這就是欺騙自己，不顧看見我們的任務底重大性，縮小這些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頁到二〇六頁）。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倘若牠想真正領導階級底鬥爭，牠應當同時還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黨的責任是非常偉大和繁雜的。黨應當在內部的和外部的發展底非常艱難的條件之下，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當環境需要進攻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去進攻，當環境需要退守時，牠就應該領導無產階級退開動敵底打擊。牠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模擬鬥爭中的紀律性和計劃性

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牠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代表時，只有當牠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談不上什麼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在列寧關於我們的黨章第一條的署名公式裏就確定了，在列賓底這個公式裏，黨是看作各組織底總和，而黨員則為黨組織中某一組織底成員。孟寧維克黨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種公式，他們提出了一個自由報名入黨的“系統”，這種“系統”，使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同情者”，和“罷工者”，，凡是多少幫助黨的，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黨的任何組織的人，都可以取得黨員底“稱呼”，，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系統”，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弄到黨裏充滿了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弄成了一個散漫的，無定形的，無組織的“結構”，，使黨沉沒在“同情者”底大海中，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丟開黨關於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底程度的責任。不用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系統”，之下，我們的黨是不能够在革命進程中充當工人階級底組織核心的。

列寧說：

“如果站在馬爾托夫底觀點上，那末黨底界線還是完全不確定的，因為在他看來，‘每一個罷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什麼益處呢？不過是‘名稱’底廣闊的散布。牠的害處就是灌入一種紊亂組織的觀念——把黨與右派混為一談的觀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一頁）。

但是黨不僅是黨組織底總和。當同時還是這些組織統一的系統，是這些組織正式聯合起來的一個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从多數的原則，有為全體黨員所必須履行的切實的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為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不能對工人階級底鬥爭實行有組織的和有計劃的領導。

列寧說：

“從前，我們的黨並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不過是許多部分的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了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為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權力底造成，思想底威信變成權力底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上級機關，（請參看同上卷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的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不穩定份子底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徹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沒有可能。在組織問題上，列寧主義總是一貫地實行這種原則的。列寧把那些反對這種原則的鬥爭叫做只值得受人譏笑的和受人唾棄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請看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那本書上關於這些不穩定的份子所說的話：

“俄國的虛無主義者特別具有這種老爺式底無政府主義。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神奇古怪的‘工廠’；部分很貧乏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奴隸來轉動’……一瞧見在中央機關領導之下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猶火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旋’……一提起黨的組織章程，他們飄飄出看不起人的樣子和說出眼中無人的意見，說什麼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顯然的，這種關於所謂官僚主義的喊聲，不過是為的要掩飾他們對於中央機關底人員的不滿意，不過是為的要掩飾門面……。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為你是由代表大會不根據我的意見而是違反着我的意見委任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依靠着代表大會底形式的決議，而不依靠我的同意；你作事極端機械，因為你只依靠黨的代表大會底‘機械的’，大多數，而不顧及我得到稿任位、值的希望；你是專制魔王，因為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親熱的老夥伴們，★（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〇頁和二八七頁）。

(三) 篓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籓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牠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的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別的許多組織，沒有這些組織，他就不能與資本制度作真正的鬥爭，這些組織就是職工會，合作社，工廠製造廠的組織，國會黨團，非黨的婦女聯合會，報館，文化的教育組織，青年聯合會，革命的戰鬥的組織（在公開的革命行動的時期），代表蘇維埃——國家形式的組織（假如無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這些組織底絕大多數都是非常地，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是成爲黨底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沒有牠們，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利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沒有牠們，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之使命的力量。但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的領導呢？有什麼把握可以保證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引起紛亂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各個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牠們彼此不致互相妨害。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這就是這一切組織應該在一個方向上進行工作，因爲牠們都是爲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爲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總路線，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是因爲有必要的經驗而足以定出這條路線，而且因爲牠有足够的威信而可以激勵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統一，而免除間斷現象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有一切根據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爲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

\*這裏所說的，是阿雪洛德，馬爾託夫，波特列索夫等人這些“夥伴”，這些人不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並且責備列寧爲“官僚主義者”。斯大林註。

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够導領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夠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道場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常組織都變成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當然這並不是說，非黨的組織，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順從黨的領導。問題底本質不過是在於，加入這些組織的黨員們，當然是有威信的人，他們在這些組織裏應該採用一切說服的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的組織在工作當中與無產階級底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黨是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這個最高形式底政治領導，應當普遍到無產階級底一切其他形式的組織方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五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那種主張把非黨組織看作“獨立”，組織和“中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這種理論產生了一些不依賴於黨的議員以及離開黨的出版人員，近親的工會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化的合作運動家——是和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階級內部的和這個階級底各組織中的基本的領導核心。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顧自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而且同時牠是無產階級手裏的工具，當還沒有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爭得專政，而在已經爭得專政的時候，便運用牠來鞏固和擴大專政。如果奪取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底條件，戰爭底必然性，危險底存在，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底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底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麼，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底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組織底一切別的形式。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爲黨是無產階級

利奪取政權時所必要的戰鬥參謀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够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的週圍和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集中起來的黨，那麼，俄國無產階級是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的。

但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祇是爲的要爭取專政，而且更其是爲的要保持專政，鞏固新政和擴大新政，以謀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列寧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無數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够領導或吸引其餘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極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麼，布爾塞維克不僅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向千百萬的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性和組織性；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造成骨幹和支柱以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底腐蝕影響，這就是說加強無產階級在從新教育和改造這些小資產階層方面的組織者的工作，這就是說幫助無產階級羣衆把他們自己訓練成爲這樣一種力量，以至於能够消滅階級和準備條件去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然而要做到這一切，如果沒有一個因爲自己的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的和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爲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會影響羣衆情緒的

黨，那麼，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爲的是要去爭取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可是，既然這樣，那麼，一到階級消滅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喪亡的時候，黨也一定會跟着喪亡的。

（五）黨是意志底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底存在。爭得和保持專政，要是沒有一個因爲有團結性和鐵的紀律而強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黨意志底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底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麼，黨內的鐵的紀律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意見鬥爭底可能。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且容許批評和容許黨內意見的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適當是“‘目的’”。正是相反，鐵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認爲要有自覺的和自動的服從，因爲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鐵的紀律。但是到了意見鬥爭已經完結，批評已經結束，決議已經通過以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就是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則無論統一的黨，無論黨內的紀律，都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在現在這個緊張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中間才能夠完成自己的責任，就是，如果黨的組織是最集中化的，如果黨內統治着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如果黨的中央是具有廣泛的全權的，具有權力的威信機關，爲全體黨員所信任的機關，（請參看‘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中，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應當這樣說，而且更應當這樣說。

列寧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收黨底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誰就是在事實上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請參看‘列

窮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可是，從這裏就可看到，派別組織底存在，是與黨底統一及黨內黨的紀律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示黨內沒有統的中央，就是等於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等於減弱和破壞紀律，減弱和破壞專政。當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和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的第二國際的黨，是可以主張派別組織自由這種自由主義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需要黨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底黨，把自己的工作建築在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和任務基礎上的黨，是既不能容忍“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的。黨是意志底統一，牠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底行動和黨內權力底分散。

因此，列寧曾“根據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無產階級專政成功底基本條件——這個觀點，解釋了派別組織底危險性”，我們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曾把這個解釋寫在“關於黨底統一”的這個特別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曾以“無條件地立刻清除黨籍，和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行動’，和‘立刻解散一切根據各種政綱形成起來的團體’，（請參看‘關於黨底統一’的決議案）。

（六）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機會主義的份子，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許多農民，小資產階級份子，知識份子都不斷地無產階級化，流入無產階級隊伍中。同時無產階級底上層份子中發生腐化過程，這些份子主要地是由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豢養的工會家和議員們。列寧說過：“這個資產階級化的工人階層或‘工人貴族’，就他們的生活方式，工資數量和他們整個的世界觀看來，都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是第二國際底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的（不是軍事的）支柱。因為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表，是資本家階級所僱用的工人僕僕，是改良主義和大國主義底真正執行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

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派別，這樣或那樣混入黨內，帶進貪污和機會主義底精神，弱化和猶疑底精神。他們主要地也就是派別組織行動和瓦解現象的來源，是使黨的組織涣散和使黨內發生爆發的來源。如果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這就是陷於背腹受敵的地位。因此無情地同這般份子鬥爭，將他們趕出黨外，就是與帝國主義作有成效的鬥爭的先決條件。

主張以黨內思想鬥爭的方法來“征服”，機會主義份子的這種理論以及主張在一黨底範圍內來“消除”，這些份子的這種理論，都是腐敗的和危險的理論，這種理論有使黨陷於麻煩和終身殘病的危險，有把黨交給機會主義者蠶食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失掉革命政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失去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內有了馬爾託夫與唐恩，波特列索夫與齊洛德這般人，牠就不能夠走上大道，不能夠取得政權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不能夠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我們的黨已能創立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自己隊伍底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牠能够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能够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塞維克。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和鞏固底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大國主義者，社會農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掃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寧說過：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孟塞維克，那末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爭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顯然是原則的問題。這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明白證明了……。在俄國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假使當時孟塞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一定就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

那些孟席斯克、改良主義者，都極端主張割裂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動搖或者正在動搖到和改良主義者保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撇清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可以成為甚至於有益處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勝利革命勝利而作最激烈的鬥爭的時候，黨內最小的動搖都可以毀掉一切，可以破壞革命，可以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為這政權還未穩固，因為對於這政權的進逼還過分強大。如果動搖被捕在這個時候流露出去，這不是減弱，而是又加強蘇聯，又加強工人運動，又加強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到四六四頁）。

## 九 工 作 體 裁

這裏發佈不是文學體裁，我所指的是工作體裁，是列寧主義文學中的這樣一種特別明白和明確的東西，這種東西必須用列式標出列寧主義的工作者。列寧主義是一個理論的和實踐的學科，這個學科適用於特種式樣的黨的和國家的工作者，造成特殊的列寧主義的工作體裁，這種體裁底特點在那裏呢？她的特點是什麼呢？

這樣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俄國的優秀傳統；第二，就是美國的求實精神。列寧主義底體裁，就是俄國的和美國的工作底的這兩項傳統底聯合。

俄國的革命規模是這樣的一而再再，這種消滅制可以消除一切消極態度，勾舊思維，保守主義，思想停滯和不肯採取先導地位，設想的革命規模就是這樣一種活力，這種活力喚醒人的思想，推動前進，破壞舊物，開闢前路。如果沒有牠，那麼任何前進運動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把牠與工作中的美國求實精神聯合起來，那就，牠就很有可能在實際中變化為一種空洞的“革命的”，“理想的”。這種僵化的例子很多。誰不知道，在我們這裏，曾有過“革命的”，杜撰主義和“革命的”，設計主義底毛病，這種毛病底來源，就是以為法令可以安置一切和改造一切。有一位俄國作家愛爾堅尼奇曾在一個標題為“盡善盡美

的共產主義人物，的小說中，描寫一個患者這種毛病的“布爾塞維克”，底風格，這個人立意擬定一個盡善盡美的人物底標準友格……而在這個“工作”裏淹死了，。在這篇小說中，有些過於誇大的地方，可是，這篇小說很正確地抓住了這個毛病，這却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會像列寧那樣無情地和苛刻地嘲弄過犯着這種毛病的人。他痛斥了這種迷信杜撰主義和發號施令主義的毛病，說他是“共產主義的誇大狂”，。

列寧說：

“共產主義的誇大狂，這就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加入了共產黨而還沒有被清洗出去，在那裏設想，以為他用共產黨的名義來發號施令，就可以解決他自己的一切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五〇到五一頁）。

列寧通常都是用平常的和日常的事務來對抗那種“革命的，空大砲，這樣也就是着重指明說，“革命的，杜撰主義是和真正的列寧主義底精神和字句都是相反的。

列寧說過：

“少說些空話，多做些平常的日常工作……。少發些政治的豪聲，多注意些極平常的，可是實在的……共產主義建設中的事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四三和三三五頁）。

反之，美國的求實精神却是這樣一種消毒劑，這種消毒劑可以消除“革命的，瘋想主義及幻想的杜撰主義。美國的求實精神是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認什麼障礙，這種力量以自己的求實的堅忍精神去掃除所有的各種各樣的障礙，這種力量只要已經開始做某件事情，就一定要把他做到底，那怕這件事情並不怎樣大；而沒有這種力量，嚴重的建設工作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不把美國的求實精神和俄國的革命規模結合起來，那末，牠就會很有可能弱化成爲狹隘的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誰不知道這種狹隘的實踐主義和無原則的實際主義的毛病，往往使某些“布爾塞維克”，蛻化和離開革命事

業呢？這種特別的毛病，在皮里略克所著的標題為“荒涼滿目的年份”，這篇小說中已經描寫過了，他在這篇小說裏描寫了某些俄國的“布爾塞維克”底風格，說他們充滿着意志和實際行動的堅決性，“幹得，很‘起勁’，可是沒有前途，不知道‘究竟為什麼’；因此而迷失了革命工作底道路。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厲害地嘲笑過這種實際主義的毛病，他痛斥了這種“近視的實踐主義”，底毛病，說他是“無頭腦的實際主義”。他通常都是用具體的革命事業和我們一切日常工作中的革命前途底必要性來對抗這種毛病，這樣就是着重指明說，無原則的實際主義，也同“革命的”，杜撰主義一樣是與真正的列寧主義相反的。

俄國的革命規模與美國的求實精神底結合，這便是黨的和國家的工作中的列寧主義底實質。

只有這樣的結合，才能給我們以列寧主義者的工作者底完整的風格，列寧主義的工作體裁。

#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在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上，這本書底序言

## 一 十月革命底國內的和國外的環境

有三種國外的情況，會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比較容易地打破了帝國主義底鏈子，並這樣推翻了資產階級底政權。

第一種情況：十月革命開始於兩個基本的帝國主義集團——英法集團和德奧集團——作拚命鬥爭的時期，當時這兩個集團忙於彼此間的決死鬥爭，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力量來認真注意到與十月革命鬥爭。這種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會有極大的意義，因為牠使十月革命當時能够利用帝國主義內部劇烈的衝突來鞏固和組織自己的力量。

第二種情況：十月革命開始於帝國主義戰爭底進程中，當時苦於戰爭並渴望和平的勞動羣衆，被客觀情勢引到無產階級革命，——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這種情況，對於十月革命會有最嚴重的意義，因為牠給了十月革命一個很有力的工具——和平，牠會使十月革命能夠更容易將蘇維埃革命與結束可怕戰爭的事業聯合起來，並因此給十月革命在西方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衆當中，造成了廣泛的同情。

第三種情況：當時在歐洲有廣大的工人運動，在西方和東方有因為長期的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一連串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的事實。這種情況，對於俄國革命會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她會保證俄國革命在其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俄國境外獲得可靠的同盟者。

但是除了這些國外的情況以外，十月革命還有一些會使她容易獲得勝利的國內的順利條件。

下述幾點，應認為是這些條件中的幾個主要條件：

第一，十月革命當時會有俄國工人階級中絕大多數底最積極的擁護。

第二，她當時會有正渴望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和大多數兵士底無疑的擁護。

第三，她會有布爾塞維克黨這個有鍛鍊的政黨為其首領，為其領導力量，這個政黨之所以有力，不僅因為她有自己的經驗和多年鍛鍊成的紀律，而且還因為她與勞動羣衆有廣泛的聯繫。

第四，當時十月革命所遇着的，是些比較易於克服的敵人，如比較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已經被多大農民“驅逐”，弄得氣勢完全頹喪的地主階級，以及已經在戰爭過程中完全遭受破產的妥協政黨（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

第五，十月革命會擁有新興國家底廣大疆域，在這個疆域內，她能夠自由隨意變動，能夠在環境要求退守時退守，能夠暫時休息，能够收集力量以圖再舉等等。

第六，國內具有充足的糧食的，燃料的及原料的富源，十月革命在反對反革命的鬥爭中，會能依靠着這一點。

這些內外情形底綜合，就造成了使十月革命比較容易獲得勝利的那個特殊的環境。

這自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在國內的和國外的環境方面，沒有壞的條件。例如十月革命，會處於相當孤立的地位，在她旁邊和附近未曾有一個可做她的依靠的蘇維埃國家，——這種壞條件底意義如何呢？將來的革命（例如德國革命）在這一點上，毫無意義地會處於比較便利的地位，因為在她附近存在有我

們蘇聯這個實力強大的蘇維埃國家。至於十月革命底這樣一個壞條件，即無產階級在全國人口中不佔大多數的情形，那更不必說了。

但這些壞條件，祇是着重地指出，十月革命底上述國內的和國外的條件底特殊性有莫大的意義。

我們一分鐘都不能忘記這個特殊性。在分析一九一三年秋季德國事變時，尤應牢記着這個特殊性。託洛茨基同志應當首先就要記着這個特殊性，因為他總統地拿十月革命與德國革命相比擬，並痛斥德國共產黨底真正的和虛構的錯誤。列寧說：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具體的，歷史上非常特別的形勢之下，會容易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要將這個革命繼續進行並進行到底，俄國却比歐洲各國難些。還在一九一八年初，我就已經指出這個情形，此後兩年來的經驗，已完全證明了這種論斷是正確的。這些特殊的條件如下：一，有可能把進行蘇維埃革命與因為發生這個革命而使帝國主義戰爭——已經使農民受苦不堪的帝國主義戰爭——歸於結束的事情，聯結起來；二，有可能在相當時期內利用兩個稱雄於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強盜集團間的決死鬥爭（這些集團，當時不能聯合起來反對蘇維埃這個敵人）；三，有可能支持比較長期的國內戰爭，這局部地是因為國家疆域廣大和交通不便；四，在農民中當時有極其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致使無產階級底政黨，採取了農民政黨（社會革命黨，該黨大多數是極端仇視布爾塞維主義的）底革命要求並因無產階級之奪得政權而一舉實現了這些革命要求；——這些特殊的條件，現時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重複這些條件或與此類似的條件，是不容易的。因此——除掉其他一些原因以外，——西歐比較我們難於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六至二〇七頁）。

列寧底這段話是不可忘記的。

## 二 關於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者是十月 革命與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這兩個特點之所以要加以說明，首先是為的去了解這個革命底內部意思和歷史意義。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是這樣的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們國家裏產生時，是這樣的一個政權，這個政權，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聯盟（在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勞動羣衆的情形之下）這種基礎上產生的。第二，是這樣的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們國家內成立，是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底結果，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關係上還不大發展，同時在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別些國家內仍保存着資本主義。這自然不是說，十月革命再沒有其他的特點。可是現時對於我們重要的正是這兩個特點，這不僅是因為她們明顯地表現出十月革命底實質，而且還因為他們極顯著地揭露“不斷革命論”，或機會主義的本性。

現在簡單地來分析這兩個特點。

關於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中的勞動羣衆的問題，關於將這些羣衆奪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極重要的問題。革命底命運和無產階級專政底鞏固程度，要取決於下述的情形：城市和農村中的勞動羣衆，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將擁護誰，是擁護資產階級還是擁護無產階級，他們將成為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還是將成為無產階級底後備軍。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法國革命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農民後備軍曾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勝利，是因為十月革命曾能從資產階級方面奪得資產階級底農民後備軍，十月革命曾能將這些後備軍奪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無產階級，曾在這個革命中成了城市和鄉村中千百萬勞動羣衆底唯一的領導力量。

誰沒有懂得這一點，誰就永遠不會懂得十月革命底性質，無產階級專政底

本性和我們無產階級政權國內政策底特殊性。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政府的上層機關，並不是什麼由“有經驗的戰略家”，用顧慮周到的手腕來“精巧地”，“挑選出來的”，並“精明地依靠着”，人民中某些階層的這種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為推翻資本，謀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做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為條件。

這樣，這裏所講的，並不是關於“稍微”，輕視或“稍微”，誇大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如“不斷革命，底某些外交的擁護者現時所愛說的一樣。這裏所講的，是關於因十月革命底結果而產生的這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本性。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無產階級政權底性質，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底基礎。

####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界等等），，，或者說與大多數勞動羣衆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底特別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為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為最終地創造和鞏固社會主義起見的聯盟，（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將這個拉丁文的，科學的，歷史學和哲學的術語，翻譯成為比較簡單的話，——這就是：在謀推翻資本束縛的鬥爭中，在這種推翻底過程中，在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的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祇有一定的一個階級，即城市的以及一般的工廠的工業工人，能夠領導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羣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六頁）。

列寧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底特點之一，就是，這次革命是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底模範的實踐。

有些同志，認為這個理論，是純粹“俄國式的”，理論，祇與俄國實際情形有關係的理論。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在說到那些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時，他所指的勞動羣衆，不僅是俄國的農民，而且還有蘇聯各邊區（這些邊區不久以前還是俄國底殖民地）中的勞動羣衆。列寧曾經堅決認為：如不與異族中這些羣衆聯合起來，則俄國無產階級即不能獲得勝利。列寧在自己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各篇論文中以及在共產國際各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曾屢次講過：如沒有各先進國家中的無產階級與被奴役的各殖民地中的被壓迫人民之間的革命的聯合，革命的聯盟，則世界革命決無勝利的可能。可是殖民地是什麼呢？不就是被壓迫的勞動羣衆嗎？不首先就是農民的勞動羣衆嗎？誰不知道，關於殖民地底解放問題，在質實上，就是關於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擺脫財政資本底扼制與剝削而獲得解放的問題呢？

可是由此可見：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不是純粹“俄國的”，理論，而是為世界各國所必須採用的理論。布爾塞維主義，並不祇是俄國的現象。列寧說：“布爾塞維主義，是‘世界各國所應該採用的策略模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六頁）。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底特徵就是這樣。

從十月革命這個特點上看來，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是怎樣的呢？

我們現在不來多講託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所採取的立場，那時他“簡直，忘記了農民這個革命力量，他提出了‘不要沙皇，就要工人政府’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主張不要農民參加的革命。甚至拉狄克同志——“不斷革命”，底這個要外交的擁護者——現在都不能不承認：在一九〇五年，“不斷革命”，是對消費祭情形而“掉到空中”，（請參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真理報”），現在，大概是人人都認為：不值得再和這種“掉到空中”的幻想來周旋了。

我們也不多講託洛茨基同志在那時時期中所採取的立場，例如一九一五年他在他的“為政黨而鬥爭”，這篇論文中，根據下述的觀點，即“我們處於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不是使資本階級的民族與舊制度對立，而是使無產階級與資本階級的民族對立，曾作出結論，說得心革命作用應當減少，說沒收土地的口號，已沒有從前那樣的意義（請參看“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九頁至二九二頁”）。大家知道：列寧當時分析託洛茨基同志這篇論文時，曾責備託洛茨基同志“否認”，“農民底作用”，並說“託洛茨基在事實上幫助俄國自由派的工人政治家，這些政治家們之所謂‘否認’，農民底作用就是不願意推動農民去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三一八頁）。

我們換不如來分析江洛茨基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的比較差的著作，來分析他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成立和他已能在事實上檢查自己的“不斷革命”，論並改正自己錯誤的這個時期內所發表的著作。就拿江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二年給“一九〇五年”，這本書所作的“序言”，來說吧。請看江洛茨基同志在這篇“序言”，中關於“不斷革命”，所說的話：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戰勝變和十月罷工之間的時期內，本書作者便規定了自己對於無產革命變和政治目的觀點，這些觀點得到了‘不斷革命論’，這個名稱。這個名稱廣泛地傳播，到是受：俄國革命，雖然是在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目的，可是真不能停止在這些目的上面。只有在被推翻的統治政權後，革命才能所以上自己最近的在階級性的任務。而無產階級手再政權後，又不能以革命中資本階級的關係肢解自己。恰恰相反，正是為了證自己的勝利起見，無產階級先頭隊，在自己取得統治地位的最初時期內，就不斷要階級地擴大自己所佔有的領土，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本階級的所有權。在這個階級下面，無產階級不僅要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援助了無產階級的一切資產階級機關，變化成敵對衝突，而且要與協助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農人把改革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人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底地位中的矛盾，只有在獨立時期內

，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底舞臺上，才能解決，（請參看託洛茨基同志所著“一九〇五年，這本書底‘序言’）★。

託洛茨基同志，就是這樣談論自己的“不斷革命”，的。

祇要把這段所拿來與以上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篇論文中所引過的話比較一下，就足以了解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論與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之間有何等深刻的區別。

列寧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階層間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照託洛茨基講來，“無產階級先鋒隊”，與“廣大農民羣衆”，即有“敵對的衝突”，。

列寧說，無產階級領導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照託洛茨基講來，則是“在農民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的工人政府底地位中的矛盾”，。

照列寧的意見：革命首先從俄國本國工農當中，吸收自己的力量。而照託洛茨基講來，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底舞臺上，才能吸收必要的力量”。

如果世界革命竟來得遲緩，那麼怎樣辦呢？我們的革命，有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呢？託洛茨基同志認為絲毫沒有光明的前途，因為“……工人政府底地位中的矛盾，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底舞臺上，才能解決”。根據這個計劃，我們的革命祇有一個前途，就是在自己本身所有的各種矛盾中苟延殘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自行衰亡。

照列寧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依靠着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底聯盟，以便“完全推翻資本”，以便“最終建或和鞏固社會主義”的政權。

據託洛茨基講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與“廣大農民羣衆”，發生“敵對的衝突”，並祇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底舞臺上，去找尋‘矛盾’底解決的一種政權”。

這種“不斷革命論”，與孟齊維主義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著名理論，有什麼差別呢？

---

★各處注重點是我加，——斯大林註。

在質上是毫無差別的。

毫無意義的，“不斷革命”，並不是對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的一種平常的標誌。“不斷革命”，乃是對農民運動的這樣一種輕視，這種輕視，結果就是否認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諸君矣若同志底“不斷革命論”，是孟塞維主義底一種。

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底特徵，又是怎樣的呢？

列寧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大陸時期內，發現了關於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和躍進式的規律。據這個規律底意思講來，各企業，各托拉斯，各工業部門，各個別國家底發展是不平衡的，並不是按照已定的秩序，並不是一個托拉斯，一個工業部門或一個國家總是在前，而其他的托拉斯或國家則按次落伍，——而是躍進式的，在某些國家底發展中發生停頓，而在別些國家底發展中却發生向前的躍進。而且各落伍的國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希圖保持舊的陣地，而各已躍進前去的國家，又同樣‘合乎情理地’，希圖奪取新的陣地，——結果，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軍事衝突，便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事情。例如德國過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五十年以前，德國同英國法國比較，曾是一個落後的國家。日本同俄國比較起來也曾經是這樣。但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已向前躍進得很遠，德國已追過了法國並已開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而日本則追過了俄國。大家知道，從這些矛盾裏，就發生了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

這個規律底出發點如下：

一，“資本主義已經變成爲數極少的‘先進’，即對於地球上極大多數人民施行殖民政策的壓迫和財政資本的束縛的全世界系統，（請參看列寧所著‘帝國主義’，法文版和德文版底序言，‘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七十四頁）。

二，“瓜分這種‘勝利品’的，便是兩三個稱霸全球的，全副武裝的

強盜（美、英、日），他們將全世界捲入他們自己的爲瓜分自己的勝利品而進行的戰爭，（同上）。

三，在財政壓迫的世界系統內各種矛盾底增長以及競爭擴大底必然發生，結果使帝國主義底世界戰線，容易被革命所擊破，而由個別國家來衝破這條戰線，是大概一定的。

四，在帝國主義較經底練了較弱的那些環節上和國家中，就是說在帝國主義最軟弱而革命最易展開的地方，最有衝破這條戰線的可能。

五，因此，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甚至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比較不發展，而同時在其他的國家裏，甚至是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比較發展的國家內，却仍舊保存着資本主義——是完全可能的和大概一定的。

簡括地講來，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底基礎，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底第二個特點是什麼呢？

十月革命底第二個特點，就在於這個革命是實際應用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榜樣。

誰沒有懂得十月革命底這個特點，誰就永遠不會懂得這個革命底國際性質，這個革命底偉大的國際勢力，這個革命底特別的對外政策。

列寧說：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牠們的國家，。因為‘不經過各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各落後國家作比較長期的和堅持的鬥爭，那末，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自由聯合，是不可能的，’（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

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各國機會主義者認定：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工業發展的國家中開始發生。假如據他們的理論說來無產階級革命一般地應在什麼地方開始發生的話；他們認定：這些國家在工業關係上愈是發展，則社會主義獲得勝利的機會愈多，並且照他們講來，在一個國家內，況且在資本主義關係上不大發展的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是絕對沒有的，是完全不近情理的。這在大戰時，列寧就已經根據帝國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拿自己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甚至這個國家在資本主義關係上是比較不發展的國家——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來與機會主義者對立。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是正確的。

從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看來，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同志所著的一本小冊子“我們的革命”，(一九〇六年出版的)來講罷。托洛茨基同志寫道：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底直接的國家的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權，不能把自己臨時的統治變為長期的社會主義的專政。這是不容片刻懷疑的，(請看“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

這段話底意思是什麼呢？這段話底意思就是說：“沒有歐洲無產階級底直接的國家的援助，，，就是說在歐洲無產階級沒有奪得政權以前，在一個國家內，這裏所說的就是指在俄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這種“理論”，與列寧關於“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可以勝利”的觀點，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

顯然的，這裏是毫無相同的地方。

可是就假定說，託洛茨基同志底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當時還難於決定我們革命底性質，所以這本小冊子含有無意中的錯誤，並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同志在較晚時期內的觀點。我們就拿托洛茨基同志所著的別一本小

發于「和平底論調」，來源是這本小冊子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出版的，現在（一九二四年）已翻印在「一九一七年」一書中。託洛斯基同志在這本小冊子中批評列寧所主張的關於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並拿歐洲聯邦這個口號來與這個理論對立。他認定：社會主義底勝利在一個國家內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底勝利，只有成為歐洲幾個聯合為歐洲聯邦的主要國家（英、俄、德）內的勝利，才有可能，否則完全沒有可能。他爽直地說道：「如果德國不起革命，則俄國或英國勝利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反過來說也是一樣」，《請參看“經濟底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一九一七年”，第八九頁）。

#### 託洛斯基底意見：

「拿來反對歐洲聯邦這個口號的唯一的，稱之其體的，歷史的理由，已在踏上叛變的「社會民主黨人」（布爾塞維克黨當時的中央機關報——斯大林派）用下述的一句話說出：“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特質，”“社會民主黨人”由此便作出了結論，說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可能的，而唯此能以造成歐洲聯邦為在個別國家內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平衡，——這是完全不容爭取的論據。但是這個不平衡性的本身，是非常不平衡的。英、美、德、法各國底資本主義的水平不是一樣的。但是與非洲及亞洲比較起來，這一切國家，却是資本主義的“歐洲”，這個“歐洲”，已經成熟到足以實現社會革命。任何一個國家，在自己的鬥爭中，不應“等待，別國，——這是一個錯誤的道理，並非提這等道理，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以便使半目的國際行動思想，不致為等待七找的國際不動思想所代替。我們脚下走的正是這一目的的門徑基點。請問：為何我們完全相信：我們的相應的社會主義底勝利？我們的鬥爭？而何點這一論責不能置現，那末，只有革命的論說——單純參照——能証據保守的歐洲，或以為社會主義的德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能孤立支持下去，這就是愚然希望的想法，——

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考慮，都證明這樣，（請參看“託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八九至九〇頁）。

可見，這裏仍是在歐洲各主要國家中社會主義勝利的理論，這種理論，照例是與列寧關於在一個國家中社會主義勝利的革命理論完全不相容的。

要社會主義完全勝利，要完全保證不致恢復舊制，就必須有幾個國家中的無產者們底共同努力。——這是不待說的。歐洲無產階級如不援助我們的革命，則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構成合力的運動，同時，俄國革命如不援助西方革命運動，則這種運動就不能以牠在俄國成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所具有的那種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不待說的。我們需要援助，——這是不待說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給予我們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們同情於我們的革命，他們有破壞帝國主義者底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這一切是不是援助呢？是不是重大的援助呢？當然是的。如果沒有這種援助，如果沒有這種不僅歐洲工人，而且各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家都給與我們的帮助，則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極困難的地位。這種同情和這種幫助，又加上我們紅軍的實力和俄國工農拚命藝術社會主義組織的決心——所有這一切，至今是否足夠去擊退帝國主義者底進攻並取得為進行認真的建設工作所必須的一種環境呢？是的，是足夠的。這種同情現在是發展着，還是低落着呢？無條件地，牠是發展着。這樣，我們有沒有各種順利的條件來不但促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事業，並且還去援助西歐的工人和東方的被壓迫人民呢？是有。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七年來的歷史明顯地說明這一點。能不能否認：我們這樣的雄偉的勞動高潮已經開始了呢？是不能否認的。

既然這樣，那末，託洛茨基同志說革命的俄國不能抵擋保守的歐洲，——能有什麼意義呢？

這種說法，祇能有一個意義：第一，託洛茨基同志沒有感覺到我們革命底內部勢力；第二，託洛茨基同志沒有了解西歐工人和東方農民給予我們革命的這種精神上的援助有不可估量的意義；第三，託洛茨基同志沒有看到現時正侵蝕

着帝國主義的那種內部的虛弱症。

託洛茨基同志，因醉心於批評列寧底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於是在自己的“和平底綱領”，這本小冊子中（此小冊子在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無意中打了自己的嘴巴。

但或許託洛茨基同志底這本小冊子也陳舊了，也許因為某種原因，此書已不再符合託洛茨基同志現時的觀點了？我們且拿託洛茨基同志最近的，當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內，在俄國獲得勝利以後的著作來講吧。例如“和平底綱領”，這本書底新版“書後”，是託洛茨基同志於一九二二年寫的。他在這篇“書後”，中寫道：

“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國範圍內不能勝利地完成，——這種曾在‘和平底綱領’，一書中屢次重複過的斷語，在某些讀者看來，勞累已經為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及五年來的經驗所推翻。可是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國家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內，曾抵擋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表明無產階級有莫大的實力，這個實力，在別些更先進，更文明的國家內，將能做出真正的奇事。但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雖已維持住自己這個國家底地位，我們却沒有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並且甚至還沒有走近這種工作………。在其餘的歐洲國家內資產階級仍然握着政權時，我們在反對經濟上孤立地位的鬥爭中不能不與資本主義世界謀妥協；同時可以深信不疑地說：這些妥協至多祇能够幫助我們醫治某些經濟上的傷痕，求得某種進展，可是俄國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却祇有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中無產階級獲得勝利後，才有可能，（請參看‘託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九二至九三頁）★。

託洛茨基同志就是這樣說的，這顯然是違反實際情形並拚命挑戰“不斷革命”，使之免於完全破產。

★注重點都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樣講來，那末，原來是無論你怎樣辯白，可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不懂“沒有着手”，而且甚至“沒有走近”。這樣看來，那末，原來是有人會希望“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妥協”，可是這些妥協，原來也不會有絲毫效果，因為無論你怎樣辯白，可是在“歐洲各最重要國家內，無產階級尚未勝利以前”，“社會主義經濟底真正高漲，總是辦不到的。

既然在西方還沒有勝利，那麼，俄國革命祇能“二者取一”：或者是幼年夭亡，或者是蛻化為資產階級的國家。

無怪託洛夫斯基同志說吾黨“蛻化”，已經說了兩年了。

無怪託洛夫斯基同志，在去年，已經預言我們國家定會“覆滅”。

這個奇怪的“理論”，與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內勝利”的理論，怎樣可以相容呢？

這個奇怪的“前途”，與列寧所說的前途：新經濟政策將使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怎樣可以相容呢？

這個“不斷的，悲觀失望觀點，與列寧下述的哲論——舉例來講——怎樣可以相容呢：

“社會主義現時已經不是遠遠將來的問題，或某種抽象幻景的問題，或某種偶像的問題。關於偶像這個東西，我們還是抱着舊的，很壞的意見。我們已經將社會主義應用到日常生活中，而在這裏我們就應當把事情弄清楚。這就是現時的任務，這就是現時代的任務。在結束演說時，我要表示這樣的信念，就是無論這個任務怎樣困難，無論這個任務和我們舊時的任務比較起來是如何新穎，無論這個任務會使我們受好多困難，——我們大家同心協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幾年以內，無論怎樣都一定會解決這個任務。這樣，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就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六六頁）。

這種“不斷的，喪失前途觀點，與列寧下述的哲論——舉例來講——怎樣可以相容呢？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這個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資制，而且祇是經過合作制（我們從前曾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嗎？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却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這裏既然沒有也不會有絲毫可以相容的東西。託洛茨基同志底“不斷革命”，論就是否認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反之，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就是否認“不斷革命”，論。

不信任我國革命底力量和能力，不信任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不斷革命”，論底基礎就是這樣。

過去，通常只是指出了“不斷革命”，論底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為說得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應補上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俄國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

孟塞維主義底通常理論，說如果沒有在“西歐各主要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底預先勝利，那末，在一個國家內，尤其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不可能的，——託洛茨基同志底理論，與這種理論有什麼區別呢？

質實上是毫無區別的。

毫無區別的，託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就是孟塞維主義底一種。

近來，在我們的出版物上，出現了一些苟敗的外交家，這些外交家極力偷罵“不斷革命”，論，說牠是一種與列寧主義可以相容的理論。他們說：自然，這個理論，在一九〇五年時曾是不適用的，可是託洛茨基同志底錯誤，在於他當時跑得太遠，企圖在一九〇五年的環境裏，應用當時還不能適用的理論。可是後來，——他們又說，——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當革命已經完全成熟時

• 託洛夫斯基同志底理論和很合乎實際了。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一個，就是拉狄克同志，——這是不難猜到的。請聽他的議論吧：

“戰爭在力謀奪取土地私有權和平的農民與各小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掘就了一條溝渠；戰爭將農民推到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布爾什維克黨底領導之下。當時已有可能（不是工農專政，而是倚靠着農民的工人階級底專政，盧森堡和託洛夫斯基在一九〇五年反對列寧而提出的主張（就是說，“不斷革命”，——斯大林註），事實上却成了歷史發展底第二個階段）（請參看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二期的‘真理’報）。這裏每字每句，都是強詞奪理。

我在戰爭時‘已有可能的，不是工農專政，而是倚靠着農民的工人階級底專政，，，是不對的。實際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便是工農專政在與資產階級專政的特殊錯綜結合中的實現。

設拉狄克同志所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斷革命”，論是一九〇五年時盧森堡和託洛夫斯基提出的，——這也是不對的。事實上，這個理論是巴烏斯和託洛夫斯基提出的。現在，經過了十個月以後，拉狄克同志認為應該糾正一下，於是就認為應該把巴烏斯罵一頓，說他不應該提出“不斷革命”的理論（請參看‘真理’，即上拉狄克關於巴烏斯的論文）。可是拉狄克同志卻應哭罵巴烏斯底同道人——託洛夫斯基同志，才算公道。

設已為一九〇五年革命所批評的“不斷革命”，，“在歷史發展底第二個階段”，即是在十月革命時，竟成了正確的主張，——這也是不對的。十月革命底全部進程，十月革命底整個發展過程，證明了並證明了“不斷革命”，論是毫無根據，證明了並證明了這個理論與列寧主義是絕不相干。

甜蜜的諂諛和苟好的外交手段，終不能掩盖“不斷革命”，這和列寧主義的

### 三 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

#### 布爾塞維克策略底幾個特點

要了解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底策略，至少要講明這個策略底準備特別重要的特點。在許多論布爾塞維克策略的小冊子中，正常常忽略過這些特點，所以尤其應該將牠們講明。

這是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個特點。聽了託洛茨基同志底言論後，就可以這樣設想，以為在準備十月革命的歷史中，總共只有兩個時期：偵探時期和暴動時期，除此以外都是誤信邪說。一九一七年四月示威遊行是什麼呢？“四月示威遊行結果比當時所預料的來得‘左些’，這次示威遊行，是一種偵探性質的發動，其目的就是檢驗羣衆底情緒和檢驗羣衆與蘇維埃內大多數人們間的相互關係，（請參看‘託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二十七頁）。而一九一七年七月間的示威遊行又是什麼呢？據託洛茨基同志底意見，‘在實質上說來，這一次示威遊行，也是在運動底較高的新階段上舉行的一種更大規模的新的偵探動作’，（請參看同上第三十二頁）。一九一七年根據吾黨底要求而舉行的六月間的示威遊行，照託洛茨基同志底觀點講來，不用說，更應稱為‘‘偵探動作’’。

這樣講來，就是說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時，布爾塞維克黨就已經有了現成的工農政治軍隊，如果布爾塞維克黨在四月間，六月間和七月間都不會調動這支軍隊舉行暴動，而祇作了一些“‘偵探動作’”，那末，這是因為，而且祇是因為，“‘偵探得來的消息’，當時不會報出順利的‘‘情報’’。

不用說，關於吾黨政治策略的這種簡單化的觀念，無非就是將通常的軍事策略與布爾塞維克黨底革命策略混為一談。

實際上，當時這一切示威遊行，首先就是羣衆向蘇反抗底結果，羣衆的行動上去表示憤怒戰爭的情緒底結果。

實際上，那時黨底作用，就在於把革謝底自發暴動組織起來，領導這種暴動，使其按照布爾塞維克底革命口號進行。

實際上，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時，布爾塞維克底會議有也不能將有現成的政治軍隊。在兩次暴動，只是在由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之間的階級鬥爭和階級衝突過程中才造成這種軍隊（而到一九一七年十月時，終於造成了這種軍隊），在兩次暴動，當時也經過四月示威遊行，也經過六月和七月示威遊行，也經過區議會和市議會的選舉運動，也經過反對新巴格拉特運動的鬥爭，也經過奪取蘇維埃的鬥爭，才造成這種軍隊。政治軍隊與軍事軍隊不同。如果軍事司令部在蘇聯時，就已經擁有現成的軍隊；那末，政黨却要在鬥爭本身底進程中，在階級衝突過程中，按照着羣衆本身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確信底的口號是正確的，確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這種確信程度，去造成自己的軍隊。

當然的，每一次強烈的示威遊行，同時也相當地顯示了各種力量底不可一望而知的對地關係，也有相當的偵探作用，可是在此底，偵探作用，並不是示威示威遊行衝動底，而是牠的自然結果。

列寧在分析十月暴動前夜發生的事變並拿這些事變與四月到七月間的事變相比較時，說道：

“這裏的情形，恰巧不是與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前夜，六月九日前夜，七月三日前夜的情形一樣，因為在那個時候所發生的是自發的激動，或是將牠約束而將牠形成爲和平的示威遊行（如六月九日和七月三日）。因為當時我們很知道：蘇維埃還不是我們的，我們所相信的還是李列爾唐恩，齊爾諾夫的道路，而不是布爾塞維克的道路（暴動），因此，當時還不能有大多數民衆跟從我們走的路徑，因此，暴動當時，還沒有到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頁）。

顯然的，專就社會主義者，這裏有什麼多大希望的。

問題顯然不在於“偵探”，而在於：

一，在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內，黨在自己的鬥爭中，會堅定地依靠着羣衆革命運動底自發高漲；

二，依靠着自發高漲時，黨會保持著對於運動的獨佔的領導；

三，對於運動的這種領導作用會使黨易於組成羣衆的政治軍隊以舉行十月暴動；

四，這種政策會不能不使得十月革命底全部準備工作，都在一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底領導下面進行；

五，十月革命底這種準備工作，又使得十月暴動以後，政權落到一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手上了。

總之，一個政黨，共產黨底獨佔領導，就成為十月革命這種準備工作中的基本關鍵，——十月革命底特點就是這樣，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黨底第一個特點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無產階級專政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的勝利便不可能，——這是無須證明的。

十月革命與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不同，而且優勝於牠的地方，就是這一點，在法國一八七一年革命時，革命底領導是分掌在兩個政黨手裏，這兩個政黨當中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稱為共產黨。

第二個特點。這樣，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是在一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底領導之下進行的。可是黨怎樣實現了這個領導呢？這個領導是循着什麼路線實現的呢？當時這個領導是循着各妥協黨——革命暴發時期內最危險的集團——獨立的路線，循着使社會革命黨和孟泰維克黨孤立起來的路線而實現的。

列寧主義底基本的戰略規則是什麼呢？

這個規則，在於認定：

一，在日益迫近的革命爆發的時期內，妥協政黨是半命敵人底最強烈的社會支柱；

二、如不使這些政黨孤立，即不能推倒敵人（沙皇制度或資產階級）；

三、因此，革命底準備時期內，必要的鮮芒，應該用來使這些政黨孤立，使廣大勞動羣衆離開他們。

在反對沙皇制度的時期內，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內（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六年），沙皇制度底最醜惡的社會支柱，是自由派君主派的政黨——立憲民主黨。為什麼呢？因為立憲民主黨是妥協黨，使沙皇制度與大多數民衆（即整個農民）妥協的政黨。當然的，黨在當時會將主要的打擊用去反對立憲民主黨，因為：如果不使立憲民主黨陷於孤立，當時即不能指望農民與沙皇制度決裂，而沒有這種決裂，當時就不能指望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了解布爾塞維克戰略底這個特點，並責備布爾塞維克黨過於“仇視立憲民主黨”，說布爾塞維克反對立憲民主黨的鬥爭“蒙蔽着”，布爾塞維克反對主要敵人——沙皇制度——的鬥爭。可是這些責備，是毫無根據的，祇是揭露這許多人簡直不了解布爾塞維克的戰略，這個戰略主張使妥協黨孤立，為的是要便利於擊敗主要敵人，使這種勝利更其迫近。

如果沒有這樣的戰略，那末，資產階級就不能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爭得領導權，——這是無須證明的。

在十月革命底準備時期中，各個鬥爭力量底重心，已移到了新的位置上。當時沙皇已經被打倒了。立憲民主黨已由妥協的力量，變成了當權的力量，變成了帝國主義底統治的力量。這個時候的鬥爭，已經不是沙皇制度與民衆間的鬥爭而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鬥爭。在這個時期內，帝國主義底最醜惡的社會支柱，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的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寧諾夫黨。為什麼呢？因為在當時，這些政黨是妥協黨，是主張勞動羣衆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政黨。當然的，布爾塞維克黨底主要打擊，當時會用來反對這些政黨，因為：如不使這些政黨孤立，當時即不能指望勞動羣衆與帝國主義決裂，而沒有這種決裂，當時就不能指望蘇維埃革命勝利。許多人當時不了解布爾塞維克黨戰略中的這個特性，責備布爾塞維克黨“過於仇視”，社會革命黨和孟寧諾夫黨，責

倫布爾塞維克黨“忘記了”“主要目標。可是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顯然指明：只有採用這種策略，布爾塞維克才能夠保證十月革命底勝利。

這個時期底特點，就是：農民勞動羣衆更加革命化，他們對社會革命黨和孟寧派克失望，他們脫離這些政黨，他們轉而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能引導國家到和平的唯一徹底革命的力量——底周圍。這個時期底歷史，就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寧派克黨這方面與布爾塞維克那方面為爭奪農民勞動羣衆而鬥爭底歷史。混合政府時期，克倫斯基政府時期，社會革命黨和孟寧派克黨之拒絕沒收地主土地，社會革命黨和孟寧派克黨之力謀繼續戰爭，前線上的六月發動，兵士死刑律底規定，郭尼洛夫暴動——便決定了這個鬥爭底命運。而且這些事變之決定這個命運，完全是證實了布爾塞維克的戰略底正確。因為如果不使社會革命黨和孟寧派克黨孤立，當時就不能推翻帝國主義者底政府，而不推翻這個政府，當時就不能擺脫戰爭。使社會革命黨和孟寧派克黨孤立的政策，在當時，原來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總之，使孟寧派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孤立，是領導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底基本路線，——這就是布爾塞維克策略底第二個特點。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那末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底聯盟，是不會能夠實現的。

託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底教訓”，這本書裏面完全沒有講到，或差不多完全沒有講到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第三個特點。這樣，黨曾是循着使社會革命黨和孟寧派克黨陷於孤立的路線，是循着使廣大工農羣衆脫離這些政黨的路線來領導了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的。但是黨怎樣具體實現了這種使這些政黨孤立的政策呢？採取了怎樣的形式呢？用了什麼口號呢？此種政策，是在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羣衆革命運動的形式中，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實現的，其方法是力謀將蘇維埃由動員羣衆的機關變為獎勵機關，變為收穫機關，變為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組織底機關。

為什麼布爾塞維克當時正要靠着蘇維埃，認為蘇維埃能够促進使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孤立底事業，能够推進無產階級革命底事業，並負有引導成千百萬勞動羣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使命的一個基本的組織上的槓桿呢？

蘇維埃是什麼呢？

還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就已經說過：

“蘇維埃是新的國家機關，這個機關，第一，給我們以工農底武裝力量，而且這種力量，並不和民衆隔離，像舊時的常備軍那樣；而是和羣衆有最密切聯繫；在軍事上講來，這個力量，比以前的軍隊要強大得不可比擬；在革命方面講來，牠是不能為任何其他的東西所代替的；第二，這個機關，使我們與羣衆，與大多數民衆發生這樣密切的不可分離的，易於審查的和易於刷新的聯繫，這種聯繫在從前的國家機關內，簡直是夢想不到的；第三，這個機關底成份，為民衆所選出，依民意而撤換，沒有官僚的形形式主義，所以比以前的機關要民主得多；第四，牠和形式極不一致的農業有堅固的聯繫。因此牠可以不經過官僚制而使形式極不一致的極深刻的改良，易於實行；第五，牠給我們以先鋒隊底組織形式，就是說，被壓迫階級，工人與農民底最覺悟的，最努力的，最先進的部分底組織形式，這樣牠就是這樣一種機關，各被壓迫階級底先鋒隊可以利用這種機關來激勵，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中的全體廣大羣衆，這些羣衆，從前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及歷史以外的；第六，牠使我們可以兼收議會制和直接民主制底長處，就是說牠把立法的職能和法律底執行合併於選出的民衆代表身上。和資產階級的議會制比較起來，這是在民主制底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進步驟……。如果各革命階級底民衆創造力，未曾創造蘇維埃，那麼，在我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會是絕望的事情，因為毫無頭腦的，無產階級不能利用舊的機關來維持政權，而新的機關又不能立刻造成，（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五八至二五九頁）。

所以布爾塞維克當時便靠着蘇維埃，認為蘇維埃是這樣一個基本的組織環

節，這個環節能夠使十月革命底組織工作易於進行，能够使建立無產階級國家底新的强大機關的事業，易於進行。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從牠的內部發展上看來，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布爾塞維克黨遭受七月失敗以前，兩個政權並存局面的時期）和第二個階段（郭尼洛夫暴動失敗以後）。

在第一個階段上，這個口號是要使孟塞維克黨及社會革命黨底聯盟與立憲民主黨決裂，由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成蘇維埃政府（因為蘇維埃當時是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底影響之下），使反對黨（即布爾塞維克黨）有權自由進行鼓動，各政黨在蘇維埃內自由進行鬥爭，布爾塞維克打算進行這種鬥爭，以便能够經過革命底和平發展，去奪取蘇維埃並改變蘇維埃政府底成份。這個計劃，自然還不是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可是，這個計劃毫無疑義地促進了為保證專政所必要的各種條件底造成，因為這個計劃，讓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執掌政權並強迫他們在事實上實行其反革命的政綱，就加速揭破了這些政黨底真正本質，就加速了使他們孤立的過程，就加速了使他們脫離羣衆的過程。但是布爾塞維克黨在七月間所遭受的失敗，截斷了這個發展過程，因為這次失敗使單獨的立憲民主黨的反革命獲得優勢並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投入反革命底懷抱。這種情勢，會使黨不能不暫時取消“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以便在革命新高漲的條件之下，再行提出這個口號。

郭尼洛夫暴動底失敗，展開了第二個階段。“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重新提到日程上。可是，當時這個口號底意義，已經不和第一個階段上一樣。這個口號底內容已經根本改變了。當時這個口號就是表示與帝國主義完全決裂和政權轉到布爾塞維克手上，因為蘇維埃內大多數，當時已在布爾塞維克影響之下了。當時這個口號，便是革命經過暴動而直接達到無產階級專政。不但如此，當時這個口號還是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並給無產階級專政以國家的形式。

將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器這種策略底不可估量的意義，在於這個策略使廣大勞動羣衆擺脫了帝國主義，揭破了孟塞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是帝國主義底

工具，並將這些羣衆一直引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總之，將蘇維埃變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這種政策，是使各派協議陷於孤立和使無產階級專政獲得勝利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黨策略底第三個特點。

第四個特點。爲要完全說明當時的情形，我們還得要研究以下的問題，就是：布爾塞維克怎樣能够和爲什麼能够將自己黨的口號變成廣大羣衆所接受並推動革命前進的口號，布爾塞維克怎樣能够和爲什麼能够不僅使工人階級先鋒隊，不僅使工人階級大多數，而且使大多數民衆確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政策。

要知道，爲要使革命勝利（如果這個革命是真正民衆的和包括着廣大羣衆的革命），——底是黨底口號正確，還是不夠的。要革命勝利，還要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即是：要羣衆自己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確定這些口號是正確的。更要在這個時候，黨底口號才能成爲羣衆本身的口號。祇有在這個時候，革命才能成爲真正民衆的革命。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底第四個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能够正確地決定某些道路和轉折，這些道路和轉折自然把羣衆引向黨底口號，可以說引向革命門口，這樣就使羣衆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捉摸，檢驗，證明這些口號底正確性。換句話說，布爾塞維克黨策略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個策略，不會將對黨的領導與對羣衆的領導混爲一談，就在於他明顯地看到了第一種領導和第二種領導之間的區別，這樣，就在於他不僅是領導黨的科學，而且是領導廣大勞動羣衆的科學。

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表現得最明較著的實例，就是在立憲會議底召集和解散方面的經驗。

大家知道，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時，布爾塞維克就提出了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口號。大家知道，立憲會議是資產階級的國會，是與蘇維埃共和國底基礎根本矛盾的。怎樣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布爾塞維克既然是向着蘇維埃共和國走，而同時却要求臨時政府立刻召集立憲會議呢？怎樣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布爾塞維克不僅參加了立憲會議底選舉，而且還親自召集了立憲會議呢？

?怎樣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是布爾塞維克在舉行暴動一月以前，曾容許在由舊制度過渡到新制度這個過程中可以有蘇維埃共和國和立憲會議共同暫時配合呢？

這種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

一，立憲會議這種主張，當時是在廣大民衆中最流行的主張之一；  
 二，立即召集立憲會議這個口號，便利了揭露臨時政府底反革命本質；  
 三，要在民衆眼前揭穿立憲會議這種主張，當時就要引導這些羣衆拿着他們關於土地，關於和平，關於蘇維埃政權的各種要求直接走到立憲會議底門口，這樣使他們與實在的和具體的立憲會議相接觸；

四，祇有這樣，當時才能使羣衆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去確信立憲會議底反革命性及解散立憲會議之必要；

五，既然有這一切情形，便自然可以容許蘇維埃共和國與立憲會議底暫時配合，作為用來消滅立憲會議的方法之一；

六，這種配合，如果是在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條件之下實現的，牠就祇能表示立憲會議服從蘇維埃，立憲會議變為蘇維埃底附屬品，立憲會議安然歸於衰亡。

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布爾塞維克黨底這個政策，則立憲會議底解散，就不會如此順利，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後來在“全行政機關立憲會議”，這種口號之下各逞發動，就不會這樣大奏敗聲。

列寧說：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時，我們幹參加俄國資本階級只會被選舉，就是設立憲會議底選舉。我們到底錯，是不是正確的呢？……我們服膺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的時候，豈不是比較西歐任何一國的共產黨人都有更多的權利來認為在俄國，議會主義在政治上已經失了作用嗎？自然，我們當時是有過重和極利，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會存在得久不久，而在於廣大勞動人民（思想上，政治上，實際上）接受

蘇維埃制度，準備解散（或者說是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會的程度如何。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時，俄國城市中的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因為一些特別的條件，已非常完善地準備去接受蘇維埃制度並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爭論和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然而布爾塞維克黨當時不會抵制立憲會議，而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以後都會參加了選舉，（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二至二〇三頁）。

究竟為什麼布爾塞維克黨不會抵制立憲會議呢？列寧說，因為：“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獲得勝利的幾個星期以前，甚至在已得這種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會，不僅不使革命的無產階級受害，倒使革命的無產階級易於向落後的羣衆證明為什麼這種國會應被解散，使解散這種國會的事業易於成功，使‘在政治上消滅’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這件事，易於達到，（同上）。

很值得注意的，就是託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布爾塞維克策略底這個特點，唾棄立憲會議與蘇維埃配合底“理論”，說他是希法亭主義。

他不了解：在暴動這個口號之下和蘇維埃很有勝利希望的情形之下，容許這個配合而召集立憲會議，是唯一革命的策略，這個策略與將蘇維埃變成立憲會議底附屬物的希法亭主義的策略，毫無相同之處；他不了解，某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並不能使他有根據去非難列寧和黨底完全正確的關於主張在相當條件之下成立“配合的國家政權”的立場。（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八頁）。

他不了解：如果沒有布爾塞維克關於立憲會議的特殊政策，他們就不能將成千百萬的民衆牽到自己方面來；而不牽得這些民衆，他們就不能將十月暴動變成深入的人民革命。

很有趣的，就是託洛茨基同志甚至唾棄布爾塞維克在論文裏應用過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認為應用這些字眼，即失去了馬克思主義者

底體面。

託洛茨基同志大概忘記了：列寧這個毫無疑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即是在專政勝利前一月，還寫道：“全制政權必需立刻過渡到由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手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八頁）。

託洛茨基同志大概忘記了：列寧這個毫無疑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引證馬克思給顧格爾曼的一封著名的信（這封信寫於一八七一年四月），在這封信裏，馬克思說破壞軍閥官僚的國家機制，是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列寧在引證這封信時曾白紙黑字地寫了下面一段話：

“馬克思說，破壞軍閥官僚的國家機器，是‘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指示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民”，革命這個概念，從馬克思那裏說出來，似乎有點奇怪，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派和孟寧維克們，司徒盧威這些信徒們，這些想把自己當作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們，或者會把馬克思這句話宣佈為“失言”。他們用這樣簡陋的自由主義精神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以為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對立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了解又是極端死板的……。在一八七一年，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沒有成為人民底大多數。把真正大多數的人民捲入運動漩渦的“人民”，革命，當時祇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包括在內，才能成為這樣的革命。這兩個階級組成了當時的“人民”。這兩個階級因為同受“官僚軍閥的國家機器”，底壓迫、摧殘、剝削而聯合起來。搗毀這個機器，破壞這個機器，這便是“人民”，大多數人民，工人們和大多數農民底真正利益，便是貧農和無產階級自由聯盟底“先決條件”，而如果沒有這個聯盟，則民主制是不穩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至三九六頁）。

列寧底這些話，是不可忘的。

總之，著於用引導羣衆走上革命立場的方法，去更羣眾根據自己既有的經驗來驗證撇向口號是正確的，這是把成千百萬勞動羣衆等到遠方而來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黨底沙西爾特點。

我認為以上的說話已經完全足以説明這個策略底各個特點。

#### 四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

產條體範的，所謂革命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內同時勝利的這個著名理論，所謂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得到的這個理論，——原來是一個派生造作的，毫無根據的理論。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七年來的歷史，並不是否定這個理論，而是廢斥這個理論。這個理論不能不能被看作爲世界革命底開端計劃，因爲牠與顯然的事實相矛盾。牠尤其不能被看作爲一個口號，因爲牠不能打開而驅來轉那些因爲某種歷史條件而簡單簡陋底本領以之可能的個別國家底領導性；因爲牠不是推動個別國家去積極進攻查木，而是推動個別國家去消極等待，“普遍爆發”，底時機；因爲牠不是在個別國家底撫養者中間養成革命堅決性底精神，而祇養成哈姆列特底猶疑精神：“萬一別國不援助，那要又怎樣呢？”。列寧說得完全正確：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乃是“普遍的事情”，“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祇能是“少有的例外”，（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五頁）。

可是大家知道，列寧主義的革命論，並不祇限於此。牠同時還是世界革命發展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的勝利，並不是一個自顧自的任務。革命已獲勝利的這個國家底革命，把自己不應看做自顧自的東西，而應看做用以加速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勝利的助手，工具。因爲在一個國家裏（在這裏就是指在俄國）革命底勝利，不僅是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和日益擴張中的產物，牠同時

★請參看我著的“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斯大林注。

還是世界革命底階梯增加前提。

毫無疑問的，世界革命發展底道路，並不像革命沒有在一國一家內獲得勝利以前，在這類發達的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夕’，——尚未出現以前，所能想像得那麼簡單。因為出現了這樣的新因素，即在發生的帝國主義底條件之下發生作用的，各資本主義國家應是不平均的定律；這個定律說明軍事衝突必然發生，說明資本之世界戰爭一般地內部和社會主義可以在個別國家內勝利。因為出現了這樣的新因素，如在西方與東方之間，世界財政資本剝削底中心與殖民地聚產底舞台之間已經存在這一偉大的蘇聯國家；單是這個國家底存在，已足以使全世界革命化。

在研究世界革命底道路時，所有這些具有比較次要的別的因素便不講，是不能不估計到的。

從前，人們通常認為，革命底發展底道路，首先是那些那些比較發展的‘先進的’，國家中，社會主義底成份平緩地‘成熟起來’。現在，這個觀念，須要有重大的改變。

列寧說：

‘國際關係底系統現在構成得這樣，就是歐洲有一個國家號各戰勝國所奴役——這就是德國。再則，西方有些國家，而且是最老的國家，由於勝利而處於這樣的境遇，即他們可以利用這種勝利來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重要底讓步，——這種讓步雖然是不重要的，可是到底足以抵消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造成幾許類似‘社會和平’的現象。

同時許多國家：東方各國、印度、中國等等，正因為最近這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走出了自己的常軌。牠們的變遷最終地走上了普通歐洲式的資本主義的軌道。普通歐洲式的和殖民地在牠們中間開始了。現在全世界都看得明白：這些國家已被牽入這樣的發展。這個發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

因為這一點和因為與這一點有聯繫，‘四歐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完成其

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過程……不是和我們以前所預料的一樣。這些國家完成這種發展的步驟，並不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的“成熟”，而是經過某些國家之被別些國家剝削，帝國主義戰爭時第一個戰敗國家之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之被剝削。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東方各國最終地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地被卷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總趨勢，（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五至四一六頁）

如果除此以外還加上這樣的事實，就是：不僅是各戰敗國和殖民地被各勝利國所剝削，而且一部分戰勝國也被最強大的戰勝國（美國和英國）底財政資本所剝削；這一切國家之間的各種矛盾是使世界帝國主義解體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除了這些矛盾以外，這些國家中每一國內部還存在着和發展着各種極深刻的矛盾；這一切矛盾，因偉大的蘇維埃共和國與這些國家並存的事實而加深着和緊張着，——如果注意到所資這一切事實，則對於國際狀況底特殊情形，將得到比較完滿的概念。

最有可能實現的，世界革命底發展，將經過這樣的道路，就是許多新的國家，將以革命的方法脫離帝國主義國家底系統，而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却援助這些新的國家裏的無產者。我們知道，第一個已脫離這個系統的國家，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已經為其他一切國家中工人羣衆和一般的勞動羣衆所擁護。如果有這種擁護，則這個國家就不能維持。毫無疑義的，這種擁護將會增強和發展。在第一個已獲勝利的國家內，社會主義之鞏固愈是徹底，這個國家之變為世界革命繼續擴展底基礎，變為使帝國主義繼續解體的楫擣，愈是迅速，則世界革命發展底本身，許多新國家由帝國主義系統中擺脫出來的過程底本身，也將愈迅速和愈徹底，——這也是毫無疑義的。

如果說，沒有幾個國家內無產者底共同努力，則在第一個已得解放的國家內，社會主義不能取得最後勝利——如果這種議論是正確的，那末，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一切國家中工人羣衆與勞動羣衆的幫助愈是切實，則世界革命底發展也將愈迅速和愈徹底，——這也是同樣正確的。

這種幫助底表現底是什麼呢？

這種幫助底表現，第一，應該是：這個已經勝利的國家，“最高限度地施行在一個國家裏所能實現的事情，以推進民主、援助和鼓動世界各國底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八五頁）。

這種幫助底表現，第二，應該是：一個國家中“已經勝利的地產階級”，“已經倒帶資本家並在本國機械社會主義生產，就與共產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國民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層次中掀起運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暴力反對剝削着商級和農門的國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已經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底特點，不僅在於牠加連到些國家中無產者底勝利，而且還在於，牠既然從這種勝利易於達到，這才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已經勝利的國家內得到最優的勝利。

最有可能實現的，是在世界革命發達底過程中，會造成個別蘇聯或國家內的社會主義底資源地及這步發高地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系統，以每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帝國主義底資源地及這些國家在全世界範圍內組成的系統相並列，而且在這兩個系統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擴展底歷史。

列寧說：

“因為，如果不經過各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各落後國家作比較長期的堅持鬥爭，那末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的自由聯合，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同前四頁）。

十月革命底世界意義，不僅在於牠是一個國家在撕破舊國際系統的那裏上的偉大創舉，不獨在於牠是帝國主義國家正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發高地，而且還在於牠是世界革命底第一個階段和世界革命繼續發展底强大基礎。

因此，不僅這樣一種人是不對的，這種人忘記了十月革命底國際意義，而宣稱一個國家中革命底勝利是純粹民族的現象和不是民族的現象。而且另外有一種人也是不對的，這種人雖記得十月革命底國際意義，但是企圖將這個革命看作一種被動的，就是以接受外來援助為使命的現象。實際上，不僅是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國家裏的革命底援助，而且其他國家裏的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底援助，以便加速和促進那個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 關於列寧主義底問題

我把這本書供獻給蘇共(布)

底列寧格拉組織。斯大林

## 一、列寧主義底定義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我給列寧主義作了一個著名定義；這定義大概已經為大家所公認了。這定義就是：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更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地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和策略。”

這個定義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想，這個定義是正確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一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歷史根源，認為牠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馬克思主義，正好和有些批評列寧的人所想的相反，這些人很錯誤地認為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產生的。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二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底國際性，正好和社會民主黨底說法相反，社會民主黨以為列寧主義祇能適用於俄國的特殊環境中。這個定義之所以正確，第三是因為這個定義很正確地指出列寧主義與馬克思學說間的骨肉相連的關係，認為牠是帝國主義時代

據馬克思主義，正和有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底說法相反，這些人以為列寧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底繼續發展，而僅是馬克思主義底恢復，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實際情形中的應用。

所有這些，顯然是不需要什麼特別評註的。

可是，在我們黨內，竟還有些同志認為有給列寧主義做出另外一種定義的必要。例如，季諾維埃夫同志就以為：

“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戰爭與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世界革命是在以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裏直接開始的★，。（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作的題為‘布爾塞維主義還是託洛茨基主義’的這篇文章，‘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三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同志所特別着重指出的句子，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將俄國底落後性及農民性，放进列寧主義底定義以內，這究竟表示什麼呢？

這就是表示：將列寧主義從國際的無產階級的學說變為俄國特殊情況底產物。

這就是表示：落入鮑威爾和考茨基圈套，鮑威爾和考茨基是否認列寧主義能在其他的資本主義更發展的國家內適用的。

不待說，農民問題對於俄國是有極大的意義，俄國是一個農民的國家。但是，這件事實對於列寧主義基礎底估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列寧主義僅僅是在俄國底基礎上和專為俄國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在帝國主義底基礎上和為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產生出來的嗎？難道列寧底這樣的著作，如‘帝國主義’，‘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等等，祇是對於俄國有意義，而不是對於一般帝國主義國家都有意義嗎？難道列寧主義不是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經驗底歸納嗎？難道列寧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不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所可以採用和定要採用的嗎？難道列寧說‘布爾塞維主義是世界各國所應該採用的策略模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

★這一點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自己加上的一段大註註。

三八六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說“蘇維埃政權與布爾塞維主義底理論基礎與策略基礎是有國際意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頁），這不是說得很對嗎？難道列寧底下面一段話不是說得很對嗎：

“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俄國很大的落後性與小資產階級性的緣故，所以和先進的國家比較起來，必然有一些兒特點。但是基本的力量——以及基本的社會經濟形式——在俄國與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都是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無論如何不能牽涉到最主要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五〇八頁）。

可是，假如這些都是對的，那末就不是應該說，季諾維耶夫同志所規定的列寧主義定義決不能算是正確的嗎？

給列寧主義規定這種民族狹隘的定義，這怎樣能與國際主義相容呢？

## 二、列寧主義底主要點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會說：

“有人以為，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是關於農民和農民底作用及其比重問題。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列寧主義底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關於爭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關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問題。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祇是附屬的問題，”。

這個原理是不是正確的呢？

我認為這個原理是正確的。這個原理是完全從列寧主義定義中推論出來的。真正是，如果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底理論和策略，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又是無產階級專政，那末，很明顯的，列寧主義底主要點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是規定這個問題，並且使這個問題有理論根據和具體化。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可是，季諾維埃夫同志顯然還是不同意於這個原理的。他在自己的“紀念列寧”，這篇論文裏說道：

“我已經說過了，關於農民作用的問題，是布爾塞維主義、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請參看“真理”，報第三十五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號出版）。

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這個原理，顯然完全是從他給列寧主義做出的不正確的定義中推論出來的。因此，這個原理也和他的列寧主義定義一樣，是不正確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底根本內容”，（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三七頁），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是絕對正確的。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策略，這個提綱是不是正確呢？我想是正確的。但從這裏應當得到怎樣的結論呢？從這裏就應當得到這樣的結論：列寧主義底基本問題，牠的出發點，牠的基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關於帝國主義發展的進步性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取得勝利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問題，關於這個國家底蘇維埃形式的問題，關於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正是列寧所規定的，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這些問題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底基礎，根基；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假如對於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規定，那就說不上從無產階級專政觀點上去規定農民問題，這點難道是不對的嗎？

不待說，列寧是一個精通農民問題的人。不得說，農民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底同盟者的問題，對於無產階級是有極重要的意義，他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底組成部分。但是，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基本問題，那末，也就不會產生關於無產階級同盟者的這個附屬問題，即關於農民的問題，這點難道還不清楚嗎？如果在列寧主義面前未曾擺着關於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這個實質問題，那末，也從不會發生關於與農民聯盟的問題。

假如列寧不是站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策略基礎上來規定了農民問題，而是撇開這個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以外來規定了這個問題，那末，他就會不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像他在實際上所辦的是那樣，而不過是一個平常的“農民哲學家”，像國外的著作界的人所常常描寫的那樣了。

在下面兩個定義裏，一定要選擇一個：

或者是，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對於非農民的國家，是不適用的，是不必要的。

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底主要點，那末，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們底國際學說，對於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資本主義先進發展的國家也在其內——都是適用的和必要的。

這裏應當選擇一個。

### 三 關於“不斷革命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上，認為“不斷革命論”，是輕視農民底作用的“理論”。那裏說：

“列寧當時與‘不斷革命派’鬥爭，並不是由於革命底不斷性問題，因為列寧自己就是站在不斷革命觀點上的；而是由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即無產階級底這個極偉大的後備軍——底作用。”

這種對俄國的“不斷革命派”的定義，至今都是大家所公認的。可是，這種定義雖然一般地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能認為是十分圓滿的。一方面，一九二四年的辯論，另一方面，對於列寧著作的仔細的分析，已經指明了，俄國的“不斷革命派”，底錯誤，不僅在於他們輕視了農民底作用，並且還在於他們輕視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力量和本質，在於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領導權這個思

因此，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庭審”，這本小冊子裏（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已經擴大了這個定義，並且用別的更完全的定義來代替了這個定義。在這個小冊子裏關於這點是這樣說的：

“過去，通常只是借出了‘不斷革命’，理論底一方面——不相信農民運動底革命可能性。現在，為我們公道起見，除這一方面以外，還要加上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就是不相信農民無產階級底力量和能力；”

這當然不是說，列寧主義曾經反對，或者現在反對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所提倡的那種沒有加括弧的不斷革命底思想。恰好相反。只有列寧這位馬克思主義者才正確地認識了和發展了不斷革命底思想。在這個問題上，列寧與“不斷革命派”之間的區別，就是：“不斷革命派”，曲解了馬克思底不斷革命思想，將牠變成了無生命的書本上的字眼。而列寧則採用了純潔的不斷革命思想，把牠變成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底基礎之一。應該記得，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來的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這個思想，就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理論底具體實現形式之一。請看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關於這點所說過的話吧：

“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而正是按照我們底力量，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我們將立刻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止……”

我們從不輕於冒險主義，並不違反自己的科學的良心，並不徵逐便宜的名譽。所以我們祇能說而且只是說：我們用全力來幫助全體農民去幹民主革命，以便使我們，無產階級底黨，比較容易些去盡量迅速地進到新的和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到一八七頁）\*

又請看列寧經過了十六年以後，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以後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考茨基，希法亭，馬爾托夫，齊爾諾夫，黑爾克維特，龍格，麥克唐納爾，都拉底，以及‘第二半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底其他的英雄好漢們，都不會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相互關係。第一個革命轉變為第二個革命★。第二個革命便解決第一個革命底問題。第二個革命鞏固第一個革命底事業。鬥爭，祇有鬥爭，才能解決，究竟第二個革命能夠如何趕到第一個革命前面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六頁）。

我要讀者特別注意第一個引證，這引證是從列寧底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發表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中引來的。有些同志至今還認為：列寧就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大概一九一六年左右，才有關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關於不斷革命的思想。我要這些同志特別注意這個引證。這個引證毫無意義地證明，這些同志是深入迷途了。

#### 四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顯著特點，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成為以下的五個基本要點：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底多少現成的形式已經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因為這種形式在公開的革命開始以前，就已經在舊制度底胎胞中生長和成熟了；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底現成形式還沒有存在或者差不多還沒有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和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去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第三，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祇是革命底開始，同時政權則被利用來作為改造舊經濟，建設新經

★注重點是我加的一——斯大林註。

濟的履行。

第四，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這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別一個剝削者集團去掌握政權，所以牠不需要打破舊的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取消所有的和各種的剝削者集團底政權，而使全體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底領袖——無產階級——去掌握政權；所以牠一定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和用新的去代替這個舊的。

第五，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多少長久的時期內把成千百萬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底周圍，這正是因為這些羣衆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牠想要完成牠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底政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那末牠就能夠而且應該使這些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這正是因為他們都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的胎胞裏，新的經濟組織就已經逐漸形成，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更改造封建社會底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這任務就是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是完成了這個任務，牠就完成了牠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為，牠加強着資本主義底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別樣的情況中。因為歷史底轉折步驟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是落後，那末，牠要由舊的資本主義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越是困難。這裏除了破壞的任務以外，更加上一種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的任務，（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接着又說：

“如果俄國革命底那個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的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還沒有創立蘇維埃。那末，他們在十月間就決不能取得政權，因為勝利是要依靠那包括有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底那些現成的組織形式存在與否為轉移。蘇維埃便是這種現成的形式，而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我們在政治方面就得到了那些為我們後來所經過的美妙的成功和節節勝利的進展，因為在當時，新的政治的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要發下幾道命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在革命最初幾月裏的胎兒狀態中變成法定的、在俄羅斯國家內發定的形式——變成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還剩下兩個極困難的任務，對於這些任務的解決，決不能像我們的革命在最初幾月裏所經過的那種節節勝利的進展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內部組織的任務，這就是擺在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正是在於：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的形式，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則得不到這些現成的關係，如果不拿資本主義底最發展的形式來講；而且就是這種最發展的形式在實際上也祇是包含工業底很小的上層部分；而在農業中却還完全很少涉及。組織統計工作；監督那些最大的企業，把整個國家的經濟的機械變成一個統一的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千百萬人衆都按照一個計劃來做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當時放在我們肩膀上的那個巨大的組織任務。據現時的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決不能用高呼‘萬歲’，來解決，如我們以前解決了國內戰爭底任務那樣。„(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莫大的困難……就是國際的問題。我們能夠那樣容易地征服了克倫斯基底黨羽，那樣容易地創立了政權，那樣毫不費力地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和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法令，——如果我們這樣容易地得到了

這一些東西，那末這只是因為在當時所徵辛慶合成了的條件，曾暫時給我們敞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具有自己的資本的莫大勢力，具有自己的高度組織的軍事技術，這軍事技術是國際資本底真實的力量，真實的要素，這樣的國際帝國主義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之下，都是不能與蘇聯共和國和平共居的，這也是由於牠自己的客觀地位，也是由於牠所代表的那個資本階級底經濟利益，——這是因為商業的聯繫，國際的財政的關係。在這裏，衝突是不可免的。這裏就擺着中國革命底極偉大的困難，牠的極偉大的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的任務，必須引起世界的革命，（請參看同卷第三一七頁）。

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

如果沒有暴力的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是不是可以完成這種根本改造舊的資產階級制度的事業呢？

顯然是不可以的。如果以為可以和平地，在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範圍中，完成這樣的革命，——那末，這或者就是神經錯亂和喪失人類的常態意識，或者是粗魯地和公開地離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應以很大的力量和很堅決的態度來着重指出這個原理，尤其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暫時還就是在一個國家內得到了勝利，這個國家又被那些仇視牠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裏的資產階級。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

“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是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在口頭上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底奴僕——說：首先要使大多數的人民，在保存着私有財產制度的情形下面，就是在保存着資本底政權和資本底壓迫的情形下

而去支持成無產階級底政黨，只有在那個時候，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够和才應該拿取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却說：首先要使革命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打倒資本底壓迫，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關，那時候，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便能很快地取得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們底同情與贊助，因為，牠能够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請參看同卷同頁）。

列寧繼續說道：

“無產階級為了要收得大多數的民衆，第一，牠應該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回國家政權；第二，牠應該粉碎舊的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牠就能夠立刻破壞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的統治、威信與影響；第三，牠應該用革命的手續，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實現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底經濟要求，以便徹底打破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請參看同卷第六四一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明顯的特徵就是這樣。

既是這樣，那末如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則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怎樣呢？

請看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的形式裏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了勝利的和已經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這階級鬥爭是為要反對那個已經失敗了的，可是還沒有消滅，還沒有絕跡，還沒有停止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是為要反對那個加緊了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列寧在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權，“普選”，政權，與“非階級的”，政權混爲一談的時候說道：

“把政治統治奪得在自己手裏的那個階級，在奪取這個政治統治權的時候，牠已覺悟到掌握政權的就是牠獨自一個階級。這一點是包含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以內的。只有當一個階級知道，只有牠獨自拿取政權，而不用‘全民的，普選的，全民認為神聖的，’政權這些空話來自欺欺人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才有意思，（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個階級底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這個不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而且也不能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政權，為要實現自己的目的起見，並不需要什麼幫助，並不需要與其他階級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結成聯盟。恰恰相反。這個政權，一個階級底政權，或有藉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尤其是與農民的勞動羣衆間的特殊形式的聯盟，才能建立和實行到底。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究竟是什麼呢？牠的本質是什麼呢？一般說來，這種與別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間的聯盟，是否與一個階級專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無產階級底黨，共產黨，這個黨並不與而且不能與別的政黨瓜分領導權。

由此可見，這裏的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入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者說與大多數勞動羣衆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底特別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為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為最終地創造和鞏固社會主義起見的聯盟。這是特別式樣的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的環境中，即猛烈的

國內戰爭的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底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中立派”，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從關於鬥爭的協定變成關於中立的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都各不相同的階級之間的聯盟★，（請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加米葉夫同志在他自己的某一個指導報告中，在反對這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說道：

“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見“真理”，報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我認為，在這裏，加米葉夫同志首先就是指我所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裏的一個地方說的，這個地方底原文就是：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政府的上層機關，並不是什麼由“有經驗的戰略家”，用顧慮周到的手腕來“精巧地”，“挑選出來的”，並“精明地依靠着”，人民中某些階層的這種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為推翻資本，謀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做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為條件，”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定義，因為我認為，牠與列寧底那個剛才由我們引證過的定義是完全符合的。

我斷定說，加米葉夫同志用這種肯定口氣所說的關於“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的話，是與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我斷定說，祇有那些不懂得聯絡思想底意思，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底意思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思想底意思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這個提綱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提綱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各國還沒有到來的時候，只有和農民妥協★才能够拯救俄國底社會主義革命，（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只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的原理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保存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目的之一——即壓倒剝削者這個目的的時候說道：

“專政底科學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東西所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規則所拘束的，直接憑藉於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永遠記着）不受限制的，憑藉於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一切已獲勝利的政權都祇能成為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及四三六頁）。

可是，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然而，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包含有暴力。

列寧說：

“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但是，專政並不僅僅只是暴力；牠並且還是比以前的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施行的暴力，而且甚至於主要的並不在於施行暴力。這個革命暴力底經濟基礎，牠富有生機與獲得成功底保證，就在無產階級是代表和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

---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力量底來源和共產主義必然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五到三三六頁）……

“他的（就是說，專政底，——斯大林註）主要質實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鋒部隊，勞動羣衆底先鋒隊，勞動羣衆底唯一領導者——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造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上的階級劃分，使社會上的全體人員都成為勞動者，消滅任何由人剝削人的剝削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是不能立刻實現的；牠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過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因為生產底改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是因為社會生活一切部門底根本改變需要時間；這是因為祇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鬥爭中才能征服那種巨大的習慣勢力——拘守小資產階級性的和資產階級性的管理方式的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底整個時期，是從資本主義過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請參看同卷第三—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顯著特點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有三個基本要點：

第一，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鎮壓剝削者，以便保衛國家，以便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間的聯繫，以便發展全世界各國底革命和使這些革命達到勝利。

第二，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使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以便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以便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以便使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的領導。

第三，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組織社會主義，以便消滅階級，以便過渡到無階級的、無國家的社會中去。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三點底聯合。在三點裏面，無論那一點都不能算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的特徵，反轉來說，在這三點裏面，只要是缺掉某一點，那末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專政便不成其為專政了。因此，在這三點裏面，隨便去掉那一點，就一定會發生曲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的危險。

祇有把這三點合而為一，才能給我們一個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完全的和周到的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是有自己的各個時代，自己的各種特殊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的。在國內戰爭時代，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暴力方面。但是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代，並沒有任何的建設工作。如果沒有建設工作，那末就不能進行國內戰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和平的，組織性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法律等等。但是，從這裏，同樣也是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代，專政底暴力方面已經消失或者可以消失。在建設時期中，鎮壓底機關，軍隊及其他組織，也和國內戰爭時代一樣，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末，專政底多少有保證的建設工作，是沒有可能的。不要忘記，革命暫時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不要忘記，既然還有資本主義的包圍，那末也就會有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產生的各種結果。

## 五 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黨和工人階級

在上面，我已經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牠的階級內容方面，牠的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由牠的那些應當在整個歷史時期——所謂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去完成破壞的和建設的任務方面，講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應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構造方面，從牠的“結構”，方面，從牠的那些“聯繫帶”，，“橫桿”，以及那個“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這些東西底總和便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列賓底話），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藉着這些東西來實現的——方面，來講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這些“聯繩帶”，或“橫桿”，呢？什麼是這個“指導力量”，呢？為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橫桿或聯繩帶就是無產階級底這樣的一些羣衆組織，如果不藉助於這些組

組織，就不能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部隊，就是他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種聯繫帶，橫桿與指導力量，是無產階級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無產階級在推翻資本家的鬥爭中，在有組織的和有武裝的資產階級面前，便會成為沒有武裝的赤手空拳的軍隊。這些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為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為鞏固自己的政權的鬥爭中，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便會遭受必不可免的失敗。這些組織底有系統的援助和先鋒隊底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底職工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及其他組織。職工會聯合着所有一切職業底工人。這不是黨的組織。職工會可以說是包含我們這裏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底全體工人的組織。是共產主義底學校。把自己隊伍中的優秀份子擇拔出來作所有一切管理部門裏的領導工作。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她把工人羣衆與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聯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無數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及其他國家的組織，更加上無數的自動的勞動羣衆團體，這些團體幫助着這些組織並使這些組織與人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城市中和鄉村中所有一切勞動者底羣衆組織。這不是黨的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來實行的。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的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三，這就是所有各種的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的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這種組織把他們聯合起來，最初是使他們以消費者資格

聯合起來，然後就使他們以生產者資格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掌握以後，在廣闊建設底時期，這種組織便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牠便利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羣衆間的聯繫，並造成一種吸收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可能性。

第四，這就是共產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但牠是很接近於黨的。牠的任務就在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青年。牠替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羣衆組織，造就一些供給所有一切管理部門工作的青年後備隊。在無產階級專政掌握以後，在無產階級底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這就是無產階級底政黨，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牠的力量就在於牠把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中的所有一切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收集在自己的隊伍裏面來。牠的任務就在統一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裏的工作，並指導牠們的行動，使其向着同一的目的走，向着解放無產階級的目的走。而聯合牠們和指導牠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走，是絕對必要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做到這一點，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領導無產階級羣衆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統一和指導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裏的工作。只有無產階級底政黨，只有共產主義者底黨，才能完成無產階級行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者底這個作用。

為什麼呢？

“第一，因為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常的組織有直接的聯繫，而且常常領導牠們；第二，因為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牠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够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為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風俗說來，牠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够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

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繫起來，（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底話）。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與階級聯繫起來；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底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國家事業方面，把黨和這些勞動羣衆聯繫起來；合作社主要地是農民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是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與農民羣衆聯繫起來；共產青年團是共產青年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底使命是幫助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去以社會主義精神教育青年和培養青年的後備幹部；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的指導力量，她的使命就是領導所有這些羣衆組織；——這就是導致“結構”，底一般狀況，“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底一般狀況。

如果沒有黨，沒有這個基本的領導力量，那末，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來，如果用列寧底話來說，那末“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的，敏捷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經過這個機關，黨與階級及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這個機關，在黨的領導之下，實現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够或者應該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羣衆組織，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黨並不是直接地來實現專政的，牠是藉助於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聯繫帶”，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如果沒有一些能够使先進階級底先鋒隊與這階級底羣衆們聯繫起來，使這階級和勞動羣衆們聯繫起來的‘聯繫帶’，那是不能實行專政的，……‘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如果

沒有職工會這樣基礎，那是不能實現專政的。那是不能執行國家的職能的。為要實現這些職能，就必須經過★許多也是新式樣的特別機關：就是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五頁和第六十四頁）。

比方，在我們蘇聯這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應當把這樣一件事實看作黨領導作用度最高的表現，這事實就是我們的蘇維埃的或其他的羣衆組織，在解決任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的時候，都要根據黨底指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是他的先鋒隊底“專政”，是他的黨底“專政”，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底基本的領導力量。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

“田納爾說，他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完全和我們所了解的一樣。他認為，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底專政。而且真的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當工人階級是遭受着不斷的剝削而不能發展自己的人類的才能的時候，工人政黨底最大的特點，正是在於應該只能包括本階級底少數。政黨祇能團結本階級底少數，正好像在無論那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真正覺悟的工人，祇是佔全體工人底少數。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只有這個有覺悟的少數，才能夠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而如果田納爾同志說他是政黨底仇敵，而同時又主張由工人階級中少數最有組織的和最革命的份子來給整個無產階級指示道路，那末，我就要說，在我們彼此中間，實際上是沒有什麼意見分歧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四七頁）。

可是這是不是說，可以在無產階級底專政和黨底領導作用（黨底“專政”）之間放一個等號呢？可以將前者與後者看作一個東西呢？可以將後者代替前者呢？當然不是樣說。當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蘇聯同志就說過“無產階級底專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政就是黨底專政，（請參看“列寧關於黨的學說”，第九十五頁）。這個說法顯然是把“黨底專政”，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從列寧主義底立場上看來，可不可以認為這種把兩個東西看作一個東西的事情是正確的呢？是不可以的。這是因為：

第一，在我們剛才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的演講中引來的一段話裏面，列寧絕對地沒有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他祇是說，“祇有覺悟的少數（就是說政黨——斯大林註），才能夠指導和引導廣大的工人羣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底那個有組織的和有覺悟的少數的專政。”說“在實質上就是”，這還不是說“完全就是”。我們常常說：民族問題，在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而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還不是說，農民問題可以包括民族問題。農民問題底範圍就等於民族問題底範圍，農民問題和民族問題就是一個東西。雖然用不着證明，民族問題底範圍是比農民問題廣泛些和豐富些。關於黨底領導作用和關於無產階級底專政，也應當和關於這個例子所說的一樣說。如果祇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底“專政”，那末，這不是說，“黨底專政，（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彼此一樣的東西，前者底範圍就等於後者底範圍。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專政底範圍是比黨底領導作用底範圍廣泛些和豐富些。黨實現無產階級底專政，但牠所實現的正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什麼別的專政，雖時黨底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這就是用黨底“專政”，來代替無產階級底專政。

第二，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底無產那一個重要決議，都一定要根據黨的領導的指示。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僅僅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呢？這是不是說，因此就可以把黨的領導的指示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呢？當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領導的指示再加上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行，再加上民衆對於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這裏顯然是有許多過渡和中間階段，這些過渡和中間階段是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原素。因此，在黨底領導的指示與這些領導的指示底實施之間，還存在着許多東西，這就是：被領導者底意志和行動，階級底意志和行動，牠是否有決心去擁護這些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執行這種指示，牠是否有本事去依照環境底需要而實行這些指示。雖然用不着證明：負有領導責任的黨是不能不顧到被領導者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是不能不注意到本階級底意志、情況和覺悟程度的。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的指示來代替階級底意志和行動。

第三，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勝利的和已經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鬥爭，（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這個階級鬥爭可以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她可以表現在無產階級為反對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底襲擊或反對外國資產階級底干涉起見而進行的許多武裝鬥爭中。在無產階級政權沒有鞏固的時候，這種階級鬥爭可以表現在國內戰爭中。在政權鞏固以後，她的表現，就是無產階級進行廣大的組織的和建設的工作，並吸收廣大的羣衆來進行這種工作。在所有這些情形之下，行動者都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黨，僅僅一個黨，單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藉宗教底援助來進行所有這些鬥爭的。黨照例祇是領導這些鬥爭，而牠所以能够領導這些鬥爭，祇是因為牠有階級底援助。因為，黨不能包括階級，不能代替階級。因為，無論黨底領導作用怎樣重要，黨始終還是階級底一部份。因此，誰將黨底領導作用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誰便是用黨來代替階級。

第四，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底直接當權的先鋒隊，就是領導者，（列寧）。在這個意義上，黨掌握政權，黨管理國家。但是，這還不是說：黨可以超過國家政權，不要國家政權而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黨可以越過蘇維埃，不經過蘇維埃而來統治國家。這還不是說：可以把黨和蘇維埃，和國家政權看作彼此一樣的東西。黨是政權底中堅。但是，牠並不是國家政權

，並且不能把牠和國家政權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說：“我們宣稱是一個當權的黨，所以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與黨的‘上層’，混合起來，在我們這裏，他們現在是混合的，而且將來還會是混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八頁）。這種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列寧這段話底意義絕對不是說：我們的那些整個的蘇維埃機關，如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運輸機關，我們的經濟機關等等，都是我們黨底機關，黨能够代替蘇維埃及其支脈，可以把黨和蘇維埃看作同樣的東西。列寧屢次說：“蘇維埃底系統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與第十五頁）。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黨就是國家政權，黨與蘇維埃是一個東西。有幾十萬黨員的黨，領導着那些包括有幾百萬人——黨員及非黨員——的蘇維埃及其在中央的和在各地方的支脈，但是黨不能够而且不應該用自己來代替他們。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列寧說：“專政是由那個組織在蘇維埃裏的和受布爾塞維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所實行的，：“黨底一切工作都是經過★蘇維埃——蘇維埃把屬於所有一切職業的勞動羣衆都聯合起來——進行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到一九四頁）。專政“需要經過★蘇維埃的機關而實現”，（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四頁）。因此，誰把黨的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是用黨來代替蘇維埃，來代替國家政權。

第五，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是一個國家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包含着暴力的概念。如果確切地了解專政這個名詞底意義，那末，沒有暴力，便不會有專政。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五頁）。所以，如果說黨底專政對於無產階級的關係，同時又把這個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那末這就是說：黨不僅應當是本階級底指導者，領袖與教師，而且應當是一種對本階級實行暴力的國家政權。因此，誰將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專政”，看作同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樣的東西，誰就是罪中以爲可以把黨底威信建築在暴力上面，而這種想法是毫無根據的，是完全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黨底威信是由工人階級底信任來維持的。工人階級底信任不適用暴力可以獲得的，暴力祇能消滅工人階級底信任；而要黨有正確的理論，黨有正確的政策，點對工人階級的忠貞心，當時工人階級羣衆的聯繫，要強有決心，有才幹去說服羣衆來相信黨的口號是正確的口號，——只有這樣，黨才能取得工人階級底信任。

從所有這些話裏面，我們可以得到些什麼樣的結論呢？

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一、列寧用黨底專政這兩個字時，他並不是指專政這兩個字底原來意思（依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假借這兩個字底意思，就是說指頭領底意思。

二、誰把黨底領導及無產階級底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誰就曲解列寧底意思，很錯誤地以為整個工人階級底專政是暴力的職能，歸之於黨。

三、誰把那些實際上爲黨所沒有的，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職能歸之於黨，誰就違背了先鋒隊和羣衆間的、黨和無產階級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底基本要求。

這樣一來，我們就直接碰到了關於黨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關於工人階級裏的黨員和非黨員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了。

照列寧所下的定義來說，這種相互關係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的相互信任★”，（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黨應該仔細聽聽羣衆底意見；牠應該極力注意羣衆底革命本能；牠應該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根據這實際來檢查自己政策底正確性。因此，黨不僅應該教育羣衆，而且應該從羣衆那裏學習。

第二，這就是說：黨應該一天一天地取得無產階級羣衆對牠的信仰，黨應該以自己的政策和工作，來造成羣衆對牠的擁護，黨不應該命令羣衆，而首先要說服羣衆，幫助他們在自己的經驗上認識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政策；因此，

黨應該是本階級底領導者，領袖與教師。

違背這些條件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的相互關係，就是破壞他們的“相互信任”，就使得無論是階級底紀律，無論是黨底紀律，都受到破壞。

列寧說：

“大體現在差不多無論什麼人都看到了，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如鐵一般的紀律，如果不是工人階級全體羣衆那樣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就是說，如果不是工人階級中一切有思想的，忠實的，不怕犧牲的，有威信的，能够領導或吸引落後階層的人們那樣完全地和大無畏地擁護黨，那末，布爾塞維克不但不能把自己的政權維持到兩年半，而且不能維持到兩月半，（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列寧往後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為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幾百萬幾千萬人底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鐵一般，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如果沒有一個為本階級裏全體忠實份子所信任的黨★，如果沒有一個會注意羣衆情緒和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末，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一頁）。

但是，黨是怎麼取得階級底這些信任和擁護的呢？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鐵的紀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牠是在什麼基礎上生長起來的呢？

請看列寧關於這點所說的話吧：

“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紀律，是由什麼東西來維持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審查的呢？是由什麼東西來蒙周的呢？第一，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底覺悟性；他們對革命的忠實心，堅毅性，犧牲精神，英勇精神。第二，

---

★注重點是我加的一——斯大林註

是由於他們能與極廣大的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階級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聯繫，最近，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與他們聯成一片★。第三，是由於這先鋒隊所實現的政治領導底正確性，政治的戰略與策略底正確性，而且還要有一個條件，就是使極廣大的羣衆們都根據親自的經驗來相信這個正確性。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在革命的政黨內，就是設在擔任有推倒資產階級和改造全社會的使命的先進階級底政黨內，便不會有紀律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一切要建立紀律的企圖，都一定要變爲空談，變爲虛言，變爲笑話。而從另一方面說來，這些條件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產生的。只有長久的工作，困苦的經驗，才能造成這些條件；只有正確的革命理論，才能使這些條件易於造成，而這個理論本身，又不是教條，而是只有與真正羣衆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底實際發生密切聯繫時才能形成起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

列寧繼續說道：

“為要戰勝資本主義，那末，在領導黨（共產黨），革命階級（無產階級）——與羣衆（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總和）中間，就要有正確的相互關係。只有共產黨，如果牠真是革命階級底先鋒隊，如果牠是包含革命階級底一切優秀的代表，如果牠是由完全覺悟的忠實的，受堅持的革命鬥爭底經驗所教育過和鍛鍊過的共產主義者所組成的，如果這個黨能將自己和本階級底全部生活密切聯繫起來，並且經過這個階級去與全體被剝削的羣衆聯繫起來和得到這個階級和這些羣衆底完全的信任★——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夠領導無產階級去作極無情的，堅決的，最後的鬥爭，以反對資本主義底一切勢力。從另一方面說，只有在這樣的黨底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革命進攻底全部勢力，完全打消那爲數很少的被資本主義所腐化的工人羣衆，舊有的工聯主義者以及合作運動領袖等等底不可免的

\*這重點是我加的一期大林註

反感和反抗；——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才能够展開自己的全部力量，而他的這種力量，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底原故，是比牠在人民總數中所佔的份量大得不可計量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一五頁）。

從這段引證裏，應該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黨底權威和工人階級中間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鐵的紀律，不是靠威嚇或黨底“無畏”，權力建立起來的，而是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靠工人階級對於黨的擁護建立起來的；

（二）工人階級對於黨的信仰，並不是一下子就造成的，並不是藉着對工人階級施行的暴力壓迫手段造成的，而是全靠黨在羣衆中的長期工作，黨底正確的政策，全靠黨善於根據羣衆自身底經驗教訓他們，使之相信黨的政策之正確，全靠黨善於保證自己得到工人階級底擁護，善於引導工人階級底羣衆；

（三）沒有黨底那種為羣衆底鬥爭經驗所證實了的正確的政策，沒有工人階級底信仰，就沒有，而且不能有黨底真正領導；

（四）如果黨得到階級底信仰，如果黨的領導是真正的領導，就不能把黨和黨的領導拿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因為要是沒有一個得到工人階級底信仰的黨底領導（黨底“專政”），就不能有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

要是沒有這些條件，那黨底權威和黨的紀律，或者就是一句空話，或者就是誇張和冒險。

不可以把無產階級專政拿來同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黨底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中的主要東西，如果是講到多少羣衆的與完全的專政，而不是過去那樣，例如巴黎公社那樣的不完全的和不鞏固的專政。其所以不可以的，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和黨底領導，是處在工作底一條線上的，是在一個方面內行動的。

列寧說：

“只要提出問題來我問‘黨底專政還是階級底專政？領袖底專政（猶

抽底黨）還是羣衆底專政（羣衆底黨）？，，，就可以證明這個提問題的人底思想是僵化到了驚人的和沒有止境的地步……。大家都知道，羣衆分成階級……。通常，或在大多數情形中，至少是在現代文明國內，階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底管理人，原則都是多少比較穩固的一批有威信的，有影響的，有經驗的，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的職務的所謂領袖們……。把問題弄到一般地將羣衆專政與領袖專政對立，這就是荒謬和愚蠢到可笑的地步，（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八和一八九頁）。

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這種正確的原理，是從這樣的前提出發的，就是：先要在先鋒隊與工人羣衆之間，黨與階級之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牠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就是：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還是所謂常態的，這是在「相互信任」底範圍以內。

可是，如果先鋒隊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如果黨與階級之間的“相互信任”，關係都被違背了，那時又將怎樣呢？如果黨自己開始這樣或那樣使自己與階級對立，違背自己與階級之間的正確相互關係的基礎，違背“相互信任”，底基礎，那時又將怎樣呢？這樣情形一般地是不是可能的呢？是的，是可能的。這樣的情形是可能的：

（一）如果黨開始不靠自己的工作與羣衆底信任，而靠自己的“無限”權力來在羣衆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二）如果黨底政策顯然不對，而牠却不願重新審查和糾正自己的錯誤；

（三）如果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可是羣衆還沒有達到領會這個政策的程度，而黨却不願或者不會等待，不讓羣衆得到機會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來信服黨底政策是正確的。

在我們黨底歷史 上，有過好些次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各種集團和派別組織之所以墮落和消散了，都是因為牠們違背了這三個條件之一，而有時連三個都一起違背了。

可是，從這裏可以知道，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領導）對立起

來的觀點，只有在以下的情況中間，才不能認為是正確的，就是：

(一) 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不是了解為原來意思上的專政（“依賴暴力的政權”），而是了解為黨底領導，這個領導絕不使用暴力去對付整個階級，去對付牠的大多數；而列寧就正是這樣了解的：

(二) 如果黨有根據做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即是，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如果這個政策適合階級底利益；

(三) 如果階級，如果階級底大多數都了解這個政策，接受這個政策，由於黨底工作而信服這個政策之正確，信任黨和擁護黨。

違背這些條件，就一定會引起黨與階級間的衝突，引起牠們彼此的分裂，引起牠們彼此的對立。

可不可以用強迫力量來強迫階級接受黨的領導呢？不，是不可以的。無論如何，這樣的領導不能是多麼長久的。如果黨想依舊是無產階級底黨，他就應當知道，牠首先和主要地是工人階級底領導者，領袖，教師。我們不能忘記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小冊子裏面說於這點所說的話：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黨，就是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這先鋒隊能夠奪取政權和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和組織新制度，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這件事情上做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教師，領導人，領袖，★。（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六頁）。

如果黨底政策不正確，如果她的政策與階級底利益相衝突，是不是可以認爲她是階級底真正領導者呢？當然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依舊做領導者，牠就應當修改自己的政策，應當糾正自己的政策，應當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糾正這個錯誤。爲證實這個原理起見，至少可以從我們黨底歷史中引證這樣的事實，如取消根食徵收制時期，這時工農羣衆顯然表示了不滿意我們的政策，這時黨就實行，公開地和誠實地實行修改這個政策。請看列寧當時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在聯共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取消糧食徵收制及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所說的話：

“我們不應當設法隱瞞什麼，而應當公開說，農民是不滿意我們與他們彼此間相互關係表現有形式的，他是不願意要這種形式的，並且再不會這樣生存下去的。這是無容爭辯的。他們的這種意志表現得很肯定。這是絕大部份勞動人民意志。我們應當顧計到這一點，而且我們是這樣清醒的政治家，以至於能够公開說：讓我們來把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修改一下罷。★，（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如果黨底政策雖然在大體上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政策，由於（比方說）階級底政治落後，而還沒有得到階級底信仰與擁護，如果黨由於（比方說）事變還沒有成熟，而還沒有能夠說服階級使之相信黨底策略是正確的；既然是這樣，那末是不是可以說，黨只要根據自己的政策在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一點，就應當自己擔任提倡責任和領導責任，去組織羣衆底決定勝負的發動呢？不，是不可以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如果想做真正的領導者，牠就應當善於等待，應當說服羣衆使之相信黨的政策是正確的，應當幫助羣衆去根據自己的經驗信服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列寧說：

“如果革命政黨在各革命階級底先進隊伍內以及全國內沒有佔得大多數，那就說不上什麼暴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二頁）。

“沒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底見解上的轉變，革命是不可能的。而這種轉變是由於羣衆底政治經驗造成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三頁）。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爭得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連走到勝利的第一步都不能作。可是這與勝利相隔還很遠。單靠一支先鋒隊，是得不到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抱定直接援助先

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至少是抱定對先鋒隊採取好意的中立態度的立場和完全不能援助牠的敵人的立場的時候，却叫一個先鋒隊去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為要使真正整個階級，真正廣大的、勞動的和被資本壓迫的羣衆都走上這樣的立場，光是宣傳，光是鼓動，還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就要有這些羣衆底統治的政治經驗，（請參看“列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二九頁）。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在一九一七年由列甯底四月提綱到十月暴動這時期內，正是這樣行動的。也正因為牠依照列甯底這些指示行動了，所以牠就爭得了暴動底勝利。

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的相互關係底條件，大體上就是這樣。

如果黨底政策是正確的，而先鋒隊與階級間的正確關係又不受到破壞，那末什麼叫做領導呢？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領導就是等於說服羣衆，使其相信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提出實行這樣一種口號，這種口號可以把羣衆引上黨底立場，使他們易於根據自己的經驗來看清黨底政策是正確的，把羣衆提高到黨底覺悟程度並這樣來保證得到羣衆底援助，使羣衆有進行堅決鬥爭的決心。

因此說服方法是黨領導階級的基本方法。

列甯說：

“如果我們現時在俄國，在兩年半以來，空前地戰勝了俄國及協約國底資產階級以後，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農工會的條件，那我們就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在羣衆裏的影響，幫助孟寧維克。因為共產黨員底全部任務，就是要會說服落後份子，會在他們裏面做工作，而不要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來與他們隔離，（請參看“列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九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應當說服一切工人，到最後一個人為止，不是說，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着手行動，只有做到這步以後才能開始行動。絕不是的。這

只是說，黨在進行決定勝負的政治行動以前，應當進行長久的革命工作以保證自己得到大多數工人羣衆底擁護，至少是得到工人階級大多數底好意中立。不然，則列寧所說的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黨方面來乃是勝利革命底必要條件的這個原理，就絲毫沒有意思了。

可是，如果少數人不願意，如果他們不同意自願服從大多數人底意志，那末對他們應怎樣呢？黨既然得到了大多數人底信任，牠是不是可以強迫，是不是應當強迫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底意志呢？是的，可以的，而且應當的。領導是由說服羣衆的方法，由黨用以影響羣衆的這個基本方法來保證的。可是這並不是不容許強迫手段，而是容許強迫手段，如果這種強迫手段有工人階級大多數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做基礎，如果牠是在說服了大多數人以後對少數人使用的。應當記起我們黨內在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關於這一點所有過的爭論。當時反對派底錯誤，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底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不是在於反對派當時認為可以採取強迫手段呢？不是的，並不是在這裏。當時，反對派底錯誤是在於，牠既不能說服大多數人使他們相信牠自己的立場底正確，並沒有大多數底信仰，而還是要去採用強迫手段，堅決主張“再三檢查”，那些負有大多數人底信仰的人。

請看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職工會的演說內是怎樣說的：

“為要建立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與工人羣衆間相互關係，相互信任，那末，如果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犯了錯誤……就應當糾正這個錯誤。可是當人們開始來擁護這個錯誤時，這就會成為政治危險底來源。如果我們沒有根據杜拉夫在這裏所表示的那些情緒，來採取盡量可能的民主辦法，那我們就會走到了政治的破產。我們首先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無論如何應當說服，然後才強迫★。我們沒有能夠說服廣大羣衆，於是就破壞了先鋒隊與羣衆間的正確相互關係，（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五頁）。

列寧在他的關於職工會這本小冊子內也說了同樣的話：

“只有當我們已經能够給強迫手段建築起說服手段底基礎的時候，我們才算正確地和有成效地使用了強迫手段，（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七十四頁）。

而且這是完全對的。因為沒有這些條件則任何領導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拿黨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黨內行動底一致；如果拿階級來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階級行動底一致。沒有這一點，就會使工人階級隊伍分裂，渙散和頹體。

黨底正確調導底基礎，大體上就是這樣。

凡是拿別的態度來看待領導，那就是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官僚主義，隨便什麼都可以，——只不是布爾塞維主義，只不是列寧主義。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之間，先鋒隊與工人階級之間，已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末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可是從這裏應該得出結論，就是尤其是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蘇林同志，根據關於不能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這一點，便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可是列寧不但說到這樣的對立是不容許的。他同時還說到把“黨底專政與領袖底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可容許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走上這一條路，我們就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的領袖底專政”。而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這種政策，實際上正是弄到這樣的愚蠢的議論……。

季諾維埃夫同志關於這一點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實質上也與蘇林同志底觀點一樣。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不過有這樣的分別，就是蘇林同志說得更直截、更明確，而季諾維埃夫同志却在那裏說含糊話。只要拿季諾維埃夫底“列寧主義”，這本書裏的下面一段話來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季諾維埃夫說：

“蘇聯現存的制度，從牠的階級內容看來，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簧機是怎樣的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底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蘇聯政權底法律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請參看‘列寧主義’，第三七〇至第三七一頁）。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關係了解為黨底領導的話。可是怎能根據這一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底‘專政’之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會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是對的，因為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在黨底領導之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會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把黨底‘專政’，與蘇維埃制度看作相等的東西，如現在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幹的一樣呢？不僅只是黨底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底領導（‘專政’）也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相矛盾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黨專政底國家，就是說，領袖專政底國家呢？季諾維埃夫同志所偷着和粗小地實行的‘原則’，——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恰巧就要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

據我所找到的在列寧底無數著作中，只有五個地方，他曾經順便提到黨底專政。

第一個地方，就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爭論，那裏他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還勸你們已經騎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時，我們說：‘是的，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而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礎，因為這是這樣一個黨。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這個黨在幾十年中爭得了全體工廠製造廠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為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者”中，那裏他說：

“有人（特別是孟寧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甚至於他們的‘左派’，）以所謂‘一黨專政’，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人底專政這些恐嚇字眼來恐嚇農民。在高爾察克底實例中，農民已經學會不怕什麼恐嚇字眼了。或者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與田納爾的爭辯中。在上面，我已經引了這段演說辭。

第四個地方是在“幼稚病”，裏面有幾行。在上面，我已經把這段話引用過了。

第五個地方是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大綱草稿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一黨專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集”，第三卷裏發表（請參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

應當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有兩個地方（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的“一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就是指明這個公式底不確切的，是借用的意思。

同樣應該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關於“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列寧並不是看作照字面本意來講的專政（“倚靠著暴力的政權”，），而是看作黨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的任何一種主要的或次要的著作中，在無聲或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及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過，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底專政”。恰巧相反，這些著作底每一頁和每一行都是顯然反對這個公式的（請參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黨”，，“左傾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正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底專政的。而這個提綱却是在列寧直接指導之下規定的，並且列寧曾屢次引用過牠，認為是關於黨底任務和作用的正確說法底模範。

所有這些都是說明什麼呢？

都是說明：

(一)列寧未曾認為“黨底專政”，這個措辭是無容置疑的、精確的措辭。因此這個措辭在列寧底著作中用得非常之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有少數地方，列寧與敵手辯駁時曾不得已而提到黨底專政，他在那裏通常講的是“一黨底專政”，即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與別黨分掌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應當了解為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凡是在列寧認為須要以科學精神規定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他完全只是講到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情形有幾千次）；

(四)正因此列寧“連沒有想到”，把“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寫在關於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案內——我所說的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延決議案；

(五)有些同志把黨底“專政”，因而也是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或者企圖看作同樣的東西，從列寧主義上看來，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的條件。

我還不去說，“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如果沒有上述的附帶語，可以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使用這個沒有附帶語的措辭，那就等於：

(一)暗中告訴非黨的羣衆說：不要胆敢反對，不要胆敢議論，因為黨無所不能，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二)暗中告訴黨的幹部說：行動要勇敢些，氣勢要強硬些，也可以不聽從

非黨羣衆底意見，——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三)暗中告訴黨底上層說：可以任意自滿，或許這可以稍許矜誇，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因而，也是領袖底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為現在是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底時期，這時候黨有決心仔細聽聽羣衆底意見，這對於我們有特別的價值；這時候，黨很細心地看待羣衆底要求，這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這時候，黨應當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這時候矜誇的危險是黨底正確領導羣衆這事情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能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極寶貴的話。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我們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只有那時候我們才能管理國家。沒有這一點，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中取得基本領導力量這個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 六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四月出版），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有兩種措辭。第一個措辭是：

“以前認為，在一個國家內，革命底勝利是不可能的，以為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要有一切先進國家內的，或至少是大多數先進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共同發動。現在這種觀點已經不合於實際情形了。現在必須根據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這點來出發，因為帝國主義環境內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發展上的不平衡的和躍進的性質，帝國主義內部那種必然引起戰爭災難的矛盾底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底增長——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

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

這個原理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不需要什麼評註。他的目標是在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理念，社會民主黨人認為，當其他各國不同時發生勝利的革命而無產階級在一國內取得政權，那就是空想。

可是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內還有第二個措辭。這個措辭是★：

“可是在一國以內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這還不就是保證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社會主義底主要任務——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還擺在前面。沒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能不能解決這個任務，能不能在一國內達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呢？不，是不可能的。為要推翻資產階級，只要一國底努力就够了，——這一點，有俄國革命底歷史可以證明。為要取得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為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一國底努力，特別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底努力，却就不够了，——為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有幾個先進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第一版”）。

這第二個措辭底目標，是反對那些批評列寧主義的人們底論調的，是反對託洛茨基派的，託洛茨基派說過，一國無產階級底專政，在別國還沒有獲得勝利時，決不能“擋住守舊的歐洲，”。

因為——但只是因為，——這個措辭在當時（一九二四年四月）是足夠的，牠無疑義地是給了相當的益處。

可是後來，當列寧主義在這方面所受的批評在黨內已被克服了的時候，當在眼前發生了新的問題，發生了關於有可能不用外來幫助而只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的時候，——第二個措辭已經顯然不够了，於是也就不對了。

★這裏所講的是該書第一版。

這個措辭底缺點在什麼地方呢？

牠底缺點在於，牠把兩個不同的問題聯結成爲一個問題：這兩個不同的問題就是：一個是關於有沒有可能用一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肯定的回答，而另一個則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是不是可以認爲，在其他好些國家沒有勝利的革命時，牠完全可保障自己不受外國干涉，於是也就不致發生舊制度底復辟，——對這個問題應當給以否定的回答。我還不去說，這個措辭可以使人這樣誤想，就是以爲用一國底力量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想法當然是不對的。

根據這一點，我在我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小冊子內（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改變了，修正了這個措辭，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關於完全保障不發生資本階級制度底復辟，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有可能在一國以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點是用以下兩個方法達到的，第一，把“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解成爲“完全保障不致恢復舊制度”，這只有經過“全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第二，是根據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宣佈一個無可爭駁的真理，就是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

這種新措辭也就成了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底任務”，這個著名決議案底基礎，這決議案，因爲估計到資本主義底穩定（一九二五年四月）而討論到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並認爲用我們一國底力量建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這種新措辭也成了我的“關於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工作總結”，這本小冊子底基礎，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在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閉會後出版的。

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這問題底提法，在這本小冊子內說：

★這種新措辭，後來已經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底以後各版內代替了舊的措辭。

“我們的國家有兩批矛盾。一批是國內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這裏所講的是關於一國內面社會主義建成——斯大林註）。另一批是國外的，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共產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斯大林註），……。”第一矛盾是完全可用一國底努力克服的，第二矛盾則唯有幾國無產階級底共同努力才能解決，誰要是把這兩批矛盾混淆起來，他就犯着最粗鄙的反列寧主義的錯誤。他就或者是櫛齒蟲，或者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請參看“關於聯共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工作總結”，）。

關於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在這小冊子上說：

“我們能够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與農民一塊，在工人階級底領導之下來建設牠，……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克服國內的一切困難以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能夠而且應當用自己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請參看同書）

關於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問題，那裏說：

“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就是完全保障不致受到外國干涉的企圖，於是也就是不致發生復辟的企圖，因為多少重大的復辟企圖，只有在外來的鄰國幫助之下，只有在國際資本底幫助之下，才可以發生。因此各國工人所給我們革命的幫助，尤其是這些工人即使在蘇聯以內的勝利，就是完全保障第一個勝利國不致受着外國干涉和復辟企圖的必要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底必要條件，（請參看同書）。

問題大概已經明白了吧。

大家知道，在我的“問題與回答”，這本小冊子（一九二五年六月）內和聯共（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中央政治報告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是以同樣的精神解釋這個問題。

事實就是這樣的。

我想，這些事實是大家和每個人所知道的，李諾維埃夫同志也是知道的。

現在，在黨內發生思想鬥爭以後和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以後，差不多已有兩年了，如果季諾維埃夫同志現在還認為可以在他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做的結論中把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所著的小冊子內陳述的，完全不充分的措辭拉出來，來解決這個已經解決了的關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的問題，——那末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這個特殊的風格，只是證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弄糊塗了。在黨已經前述了以後把牠拉轉去，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已由中央全會批准了以後去迴避這個決議案，——這就是絕無希望地陷入了矛盾，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離開列寧底道路，自己承認自己的失敗。

什麼是在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呢？

這就是說，有可能用我們一國底力量來解決工農間的矛盾，這就是說有這樣的可能：由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在其他各國無產者們底同情與幫助之下，但是並沒有其他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底預先勝利，而就利用這個政權來在我們國家內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沒有這樣的可能，社會主義底建設就是沒有前途的建設，就是不相信可以建成而建設社會主義。誰如果不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建成，誰如果不相信我國底技術落後並不是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這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礙，那末，他就不能進行社會主義底建設。否認這個可能性，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就是離開列寧主義。

所謂沒有其他各國底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在一國以內的完全的最後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沒有至少幾國革命底勝利，要完全保障不受受到外國的干涉，因而也不致發生資產階級制度底復辟，是不可能的。否認這一個無可辯駁的原理，就是離開國際主義，離開列寧主義。

列寧說：

“我們不僅生存在一國以內，而且是生存在世界各國底系統以內。蘇

維埃共和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長時間內的並存，是不可避免的。歸根到底或者是這個勝利，或者是那個勝利。而在這個結果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聯與資本階級國家之間必然發生一些極可怕的衝突。這就是說，無論階級這個統治階級，只要牠願意統治和想要統治，牠就適應當用自己的軍事上的組織來證明這一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二頁）。

列寧在另一個地方說：

“我們面前有一個極不穩固的，可是到底是無變的，不可否認的，相當的平衡。這是否長久——我不知道，而且我想，這是不可以知道的。因此在我們這方面須要極其謹慎。我們的政府底是一個訓練，由我們的政府在一年以來的工作中所得出來的第一個教訓，一切工農所應當領會的教訓，這就是要小心提防，要記着，我們是處在那些公開表示非常仇視我們的人們，階級和政府底包圍之中。須要記着，我們隨時都可以受到侵襲的危險，”（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一七頁）。

大概是明白了吧。

季諾維埃夫同志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的觀點，是怎樣呢？

請聽吧：

“對於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了解，至少應當是：（一）消滅階級，於是也就是（二）取消一個階級的專政，在這裏所說的就是取消無產階級底專政，……季諾維埃夫同志往下又說道：‘為要更確切地認識一九二五年在我們蘇聯國內問題是怎樣的，就要分清兩件事情：（一）社會主義建設底有保證的可能性——這樣的社會主義建設底可能性，當然是在一國範圍內也完全可以設想到的，（二）社會主義底最後建成和實現。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底實現，’（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列寧主義》，二九一和二九三頁）。

所有這一些說法能夠表明什麼呢？

這就是表明季諾維埃夫同志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不是了解為免除外國干涉和免除復辟底保障，而是了解為社會主義社會建成底可能。季諾維埃夫同志所了解的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的建設，這種建設不能够而且不應該達到社會主義底建成。季諾維埃夫同志底立場是這樣的：得過且過的，沒有前途的建設，明知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却來建設社會主義。

沒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明知不能建設成功而去建設，——你們看季諾維埃夫同志是荒謬到了什麼地步。

可是要知道這是欺弄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在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做的結論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你們看一看，例如雅可福烈夫同志在最近這次庫爾斯克省黨代表會議上講出了什麼話。他問道：“我們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在四面都受資本主義敵人所包圍的條件下面，在一個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呢？”。他自己回答道：“根據以上所說的話，我們是有理由來說，我們不僅建設着社會主義，而且我們雖然暫時還是孤獨的，暫時還是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國度，唯一的蘇聯按國家，——我們將建成這個社會主義”，（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庫爾斯克真理報第二七九期”）。這難道是列寧主義的問題提法嗎？難道這不是民族狹隘主義精神底表現嗎？，★

這樣一來，依季諾維埃夫說起來：承認在一國內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就是站在民族狹隘主義底立點上，而否認這種可能，就是站在列寧主義底觀點上。

可是如果這是對的，——那末一般地說來，是不是值得進行鬥爭以謀取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呢？既是這樣，那豈不是應當說這樣的勝利是沒有可能的嗎？

\*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論據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引起結果。

而這種毫無列寧主義氣味的荒謬論，季諾維埃夫同志却拿來贈給我們，說這是“國際主義”，是“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

我敢斷定說，季諾維埃夫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是離開列寧主義而滾到孟寧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上去了。

讓我們來看列寧底論點。列寧還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九一五年八月，對於一國內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就說了以下的話：

“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底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一個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都是可能的。這個國家中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一經剝奪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與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這樣就吸引別國被壓迫階級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暴動來反對資本家，遇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反對剝削者階級和牠們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列寧底這句由我加上着重點的話：“一經在本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已勝利了的國家底無產階級，在爭得了政權以後，能够而且應當在自己本國裏面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而“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用不着證明，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和確定的原理是無須再加註註的，不然，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號召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就會是不可了解的事情了。

從這裏就可以看到，列寧底這個明顯的原理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底以下的糊塗的，反列寧主義的的“原理”，——我們可以在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的條件下面來“在一國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天壤之別的。

這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在無產階級未奪取政權以前寫的。可是，也許在一九一七年以後，經過奪取政權經驗以後，他的觀點有改變吧？現在來看列寧

在一九二三年寫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列寧說：

“實際上，一切大的生產資料歸國家管理，國家政權操在無產階級手裏，這個無產階級與千百萬的小農及最小農聯盟，這個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還不是一切必要的條件，來經過合作制，而且只是經過合作制（我們從前曾鄙視合作制為營業性的東西，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之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來這樣鄙視合作制），——難道這不是為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這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但這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和足夠的一切條件★，（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二頁）。

換句話說：我們能够而且應該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我們管轄着為這種建成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夠的一切條件。

要比這些話說得更清楚些，大概是很困難的罷。

請你們把列寧底這個模範原鄉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反對雅可福烈夫同志的論調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雅可福烈夫不過是重複了列寧關於一國裏面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的話，而季諾維埃夫既然起來反對這個原理，斥責雅可福烈夫同志，那末，他就是離開了列寧底觀點，而是走上了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孟塞維克蘇漢諾夫底觀點就是以為：在我們的國家裏，因為技術落後，所以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

所不知道的只是，要是我們沒有指望把社會主義建設成功，那我們何必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呢？

本來是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間取得政權的，——這就是季諾維埃夫同志蘇聯底內部邏輯所必然得出來的結論。

其次，我現在要肯定說，在關於社會主義勝利的這個最重要問題上，季諾維埃夫同志是反對了我們黨底明確的決定，這些決定會規定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因召集共產國際擴大會議而應負的任務”，這個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著名的決議案<sup>★</sup>。

我們來看這個決議案吧。在這個決議案裏，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獲得勝利的問題，會有以下的決定：

“兩個直接相反的社會制度之存在，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的經濟壓迫形式，武裝干涉，復辟底經常威脅。因此保證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即擔保不致復辟★的唯一保障，就是某些國家裏面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主義教訓道，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即是說完全保證資本主義關係不致復辟，這只有在國際範圍內才有可能……，。“從這一點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如果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帮助，（託洛茨基底話），就不能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請參看決議案）。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把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解釋為保證不致發生武裝干涉和不致發生復辟。——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中的解釋完全相反的。

你們可以看到，決議案認為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即使得不到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那些國家底‘國家的帮助，，也能够建成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與季諾維埃夫同志在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在結論中反駁雅可羅烈夫同志時的那種斷言完全相反的。

這不是季諾維埃夫同志反對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鬥爭是什麼呢？

當然，黨的決議案有時也不是沒有過錯的。有時黨的決議案也包含着錯誤。一般說來，可以作這樣的假定，就是說假定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也含有一些錯誤。也許季諾維埃夫同志認為該決議案是錯誤的。如果這樣，那末他就應當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明白地和公開地指出這一點。但不知為什麼原故，季諾維埃夫同志却沒有這樣做。他寧願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即從後方

<sup>★</sup>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來攻擊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同時却連一個字也不提起這個決議案，對決議案不作任何公開的批評。季諾維埃夫同志大概以為這條道路最容易達到目標，而他底目標只有一個，即“改善”，決議案和“稍微”，修改一下列寧底觀點。用不着證明，季諾維埃夫同志是打算錯了。

季諾維埃夫同志底錯誤從什麼地方來的，這個錯誤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看來，這個錯誤底根源，就在於季諾維埃夫同志深信，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對於圓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建成是一種不可克服的障礙；他深信，由於我們國家底技術上的落後，無產階級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季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爾采夫同志有一個時候曾企圖在我們黨底四月代表會議以前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發表這個論據。可是他們却受到了回擊，而不得不退守，表面上服從了與他們相反的觀點，即中央大多數底觀點，可是，雖然季諾維埃夫同志在表面上服從了中央大多數底觀點，然而他始終還是與這個觀點繼續作了鬥爭（請參看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列寧主義”，一書和他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辯論）。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在其給列寧格拉省黨代表會議的“覆信”，中，關於聯共中央內部這次“事件”，曾說了以下的話。

“不久以前，加米爾采夫和季諾維埃夫兩同志曾在政治局擁護了一個觀點，就是以為要是國際革命不起來拯救我們，我們由於技術上及經濟上的落後，就不能克服內部的困難。我們和中央大多數却共同認為，雖然我們在技術上落後，而且違反着這種技術上的落後，我們還是能够建設社會主義，而且正在建設着並一定會建成這個社會主義。我們認為，這個建設底進行自然要比已在全世界獲得勝利底條件下面緩慢得多，可是我們終究是前進着，而且將來還會繼續前進。我們同樣也以為，加米爾采夫和季諾維埃夫兩同志底觀點，是表示不信任我們工人階級和跟着工人階級走的農民羣衆底內部力量。我們以為，這個觀點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立場，（請參看“覆信”，）。

這個文件是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開頭幾次會議的時候在刊物

表的。季諾維埃夫同志自然曾經有可能就在代表大會上起來反對這例文件。很可注意的一回事，就是季諾維埃夫和加米葉夫兩同志竟找不到論據來駁斥我們黨底莫斯科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他們的那個嚴重責備。這是不是偶然的呢？我以為不是偶然的。這畢竟是因為這個責備正是名符其實，季諾維埃夫同志和加米葉夫同志之所以用沉默的態度來“回答了”，這個責備，這正是因為無法“推翻”，牠。

新民對派因人們責備季諾維埃夫同志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底勝利事業而生氣起來。可是，既然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底勝利問題已經討論過年，既然季諾維埃夫同志底觀點已被中央政治局所駁倒（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我們黨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主張，並把這種主張規定在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著名決議案上（一九二五年四月），——既然這樣，而季諾維埃夫同志却還是敢於在其“列寧主義”，一書上（一九二五年九月）發表意見來反對我們黨底觀點，以後還在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重複這項意見，——那末，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樣頑強固執堅持自己的錯誤，不是因為季諾維埃夫同志不相信，極端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是因為什麼呢？

季諾維埃夫同志想把自己這種不信任態度解釋為國際主義。但試問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這裏竟把那種在列寧主義根本問題上離開列寧主義的行為解釋為國際主義呢？

在這裏犯了反對國際主義的和反對國際革命的過錯的，不是我們黨，而是季諾維埃夫同志，這樣說不是正確些麼？因為試問我們的“建設的社會主義”，底國家不是世界革命底根據地是什麼呢？但要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來建成社會主義，那末牠能够不能够做世界革命底真正的根據地呢？要是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在自己國內達到勝利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的成份，達到獲得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那末牠能够不能够依舊是對於全世界工人們的一種莫大的中心吸引力，像牠現在實在是這樣的中心吸引力這樣呢？我以為是不能够的。但從這裏是不是應當得出結論，說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鼓吹這種不相信的態度

，結果會使我們的國家喪失世界革命根據地資格，而喪失這種資格，就會削弱世界革命運動呢？社會民主黨人先生們會用什麼東西來恐嚇工人，以便使他們離開我們呢？他們所用的，就是關於“俄國人是幹不出什麼事情來的”，這種宣傳。我們現在是用什麼東西來打擊著社會民主黨人，並吸引一批一批工人代表團到蘇聯來參觀，鞏固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的運動呢？我們所用的，就是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既然如此，那末誰宣傳不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成功，誰就是間接幫助社會民主黨人，誰就是削弱國際革命運動底勢力，誰就必然離開國際主義……這難道還不明白麼？

你們可以看到，季諾維埃夫同志底“國際主義”，並不比他在關於一國要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的那種“百分之百的列寧主義”，稍為好些。

因此，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把新反對派底觀點估計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曲解列寧主義’”，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這種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 七 為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

我以為，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這乃是新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我之所以把這個錯誤看作他們的基本錯誤，是因為新反對派底其餘的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當中產生出來的。新反對派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底性質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合作制底作用問題，關於與富農的鬥爭方法問題，關於中農底作用與比重問題都犯了錯誤，這一切都是從反對派底一個基本錯誤中產生出來的，這個基本錯誤就是：他們不相信有可能用我們本國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什麼叫做不相信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呢？

這首先就是不相信農民底基本羣衆由於我國發展底某些條件而能够被吸引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第二就是不相信我們國家裏的無產階級，不管擔着國民經濟底命脈，就

有能力把基本農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裏。

反對派關於我們的發展道路問題的議論，暗中就是以上面這兩個原理作出發點的，——反對派是自覺地還是不自覺地這樣做的，那都是一樣。

可以不可以把蘇聯農民或基本農民吸收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呢？

在“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這本小冊子裏，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基本原理：

第一，“決不可以把蘇聯的農民和西方各國的農民混為一談。蘇聯的農民是不能不與西方各國的農民不同的，因為蘇聯的農民經過了三次革命底教育，與無產階級一塊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得到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而西方的農民，却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作了鬥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土地，並因此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的農民，慣於看自己與無產階級的政治統一和政治合作底意義，而且因為有了這種觀念和這種合作才得到了自由，——這一點不能不是他們與資產階級作經濟合作底非常順利的條件。”\*

第二，“決不可以把俄國的農業和西方各國的農業混為一談。西方的農業是依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軸所處的環境是農民中發生深刻的分化，這時既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主和私人資本主的大地主，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階級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各國，分裂和解體完全是自然的。在俄國就不是這樣。在俄國，單是由於耕種或播種之存在和重要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都收歸國有這兩個原因，農業底發展就不會走這條道路。在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走上別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就是在農村中發展各種由國家以優待的情況來維持的廣大的合作制底道路。列寧在他的論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底發展應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

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度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生產方面，，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對多數的農民將願意走上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棄那條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和僱傭奴隸制度道路，拋棄那條貧困和破產的道路，，。

這兩個原理是不是正確呢？

我覺得這兩個原理，對於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我們的整個建設時期是正確的而且是無可置疑的。

這兩個原理祇是列寧幾個著名提綱底表現，這些提綱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實行聯絡，把農民經濟歸併到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底系統以內，無產階級應當與基本農民羣衆一同進展到社會主義去，千百萬農民羣衆底合作化是農村裏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康莊大道，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底條件之下，“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度發展已經就等於社會主義底發展，（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事實上在我們國家裏，農民經濟能夠循着而且應該循着那條路去發展呢？

農民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農民經濟，如果拿絕大多數的農戶來說，是一種小商品性的經濟。但什麼叫做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呢？這就是一種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個十字路口的經濟。牠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面去，也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方面去；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牠正在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而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牠就應該向社會主義方面而發展。

為什麼農民經濟這樣不穩固，這樣不獨立呢？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原因就在於農民經濟散漫，無組織，牠們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信貸制度，依賴着國內政權底性質，最後，其原因還由於這樣一個大家所知道的原理，即無論在物質方面或文化方面，農村是跟着城市走，而且應當跟着城市走。

農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就是經過農民底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是巨大的大地主，而在另一極端上則是廣泛的貧困化。這樣的發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必不可免的，因為那裏的農村，農民經濟，是依賴着城市，依賴着工業，依賴着城市裏面集中的信貸，依賴着政權底性質的。而在城市裏統治地位的則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主義的信貸制度，資本主義的國家政權。

在我們的國家裏，城市底面目是完全不同的，工業是由無產階級管轄着，運輸業，信貸制度，國家政權等等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裏，土地國有化是全國通行的法律，——在這樣一個國家裏，農民經濟是不是一定要走這條發展道路呢？當然是不一定要走的。正是相反。正是因為城市是農村底領導者，而在我們國家裏統治城市的是把國民經濟底一切命脈都管轄在自己手裏的無產階級，正是因為這樣，農民經濟在自己的發展中就應該走另外一條道路，走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這條道路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這條道路就是：使千百萬農戶在各種合作方面廣泛地合作化起來，把渙散的農戶團結在社會主義工業週圍，在農民當中推行集體制度，起初是在農產品底銷售方面和農民所需要的城市製造品供給方面，以後就在農業底生產方面。

而且愈是下去，則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環境之下，這條道路愈是成為必不可少的道路，因為銷售事業底合作化，供給事業底合作化，最後，信貸及生產事業底合作化（農業協作社），是提高農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使廣大農民脫離說貧窮破產的唯一辦法。

有人說，在我們這裏，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因此他們沒有能力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說農民就其經濟狀況說來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並不能根據這一點來否認農民經濟能够按照社會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因為既然已經證明了，農村是隨着城市走的，而統治城市的則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在十月革命的時候，農民就其地位說來也不是社會主義性

的，他們當時並不想在國內建立社會主義。他們當時所努力要求的，主要地是消滅地主政權和停止戰爭，肯定和平，然而他們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為什麼呢？因為在當時，推翻資產階級和由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道路，是肯定和平的唯一道路。因為在當時沒有別的道路，而且不能有別的道路，因為在當時我們的黨得以找到，得以找到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農民底特別利益（推翻地主，肯定和平）與國家底一般利益（無產階級專政）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後者，這種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的和有利的。因此，農民雖然有其非社會主義性，當時還是隨從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關於吸收農民走上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問題，也應該這樣說。農民就其狀況說來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可是他們應該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社會主義發展底道路，因為除了與無產階級聯絡以外，除了與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以外，除了使農民經濟經過農民廣泛的合作化而走上社會主義發展軌道以外，就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的道路足以使農民擺脫貧窮破產的境地了。

#### 為什麼一定是經過農民底廣泛的合作化呢？

因為廣泛的合作化就是“我們所抓到的這樣一個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可以使私人的利益，私人商業的利益，和由國家對這種利益的審核及監督聯合起來，可以使這種利益受一般利益底支配”，（列寧）。這個標準，對於農民是可以接受和有利的，這個標準可以保證無產階級有可能來把基本農民羣衆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去。正因為對於農民，經過合作社來銷售自己的商品和經營合作社來為自己的經濟贏得機會，是有利的事情。正因為這樣，所以農民應當走上而且一定會走上廣泛的合作化底道路。

而在社會主義工業佔統治地位的條件之下，農民們底廣泛的合作化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小商品性的農民經濟離開舊的，使農民大批破產的資本主義道

路，而過渡到新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建設底道路。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為農民經濟新的發展道路而鬥爭，為吸收農民基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鬥爭，是我們黨底當前任務。

因此，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正確的。決議上說道：

「農村裏面社會主義建設底基本道路就在於：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工農・國家的信貸機關以及握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其他經濟命脈底經濟領域日益發展的條件之下，把基本農民羣衆吸收到合作社組織裏去，並保證這種組織循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而發展。其方法就是利用、克服並排擠掉的資本主義成份」（請參看大會根據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案）。

新反對派底最嚴重的錯誤，就在於牠不相信農民底這條新的發展道路，看不見或者不懂得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之下，這條道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牠之所以不懂得這一點，是因為牠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能在我國獲得勝利，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有能力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新經濟政策底兩重性，就誇大新經濟政策底短處，就把新經濟政策看成多半是退守的政策。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誇大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底作用，而輕視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的各種積極底作用（社會主義工業，信貸制度，合作制，無產階級政權等等）。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我們的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就懷疑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底正確性。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誇大農村底階級分化現象，在農業面許表示張惶失措，而忽視中農底作用，企圖破壞黨底保證與中農堅同聯盟的政策，而且一時地在黨底農行政策問題上動搖不定。

因為這個原故，牠就不懂得黨所進行的重大工作：吸收千百萬工農羣衆來參加工業與農業底建設，來整頓合作社和蘇維埃，來管理國家，來與官僚主義鬥爭，來為改善和改造我們的國家機關而鬥爭，——黨底這種工作是表明發展

於新階段，如果沒有這種工作，則任何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原因，牠就在我們建設底困難面前表示驚惶失措，懷疑我們的國家能被工業化，悲觀地空談什麼徹底奴化等等。

在他們那裏，在資產者們那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好的；在我們這裏，在無產者們這裏，一切事情都多少是壞的；要是西歐的革命不能趕快跑來救急，——我們的事情就要倒台了，——新反對派底一般論調就是這樣，這種論調，在我看來是取消主義的論調，但不知為什麼（大概為着令人發笑），反對派竟把她贊充為“國際主義”，

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季諾維耶夫這位，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一切說法當然都是不對的。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是蘇聯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許許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並計算到社會主義成份能够擊敗資本主義成份。事實上，新經濟政策只在開始時是退守的，但是牠卻到在退守過程中重新擺布力量而舉行進攻。事實上，我們實行進攻已有幾年了，而且進攻得有成效，因為我們發展着我們的工業，發展着蘇聯的商業，排擠着私人資本。

但是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這種提綱底意思是怎樣的呢？這種提綱是以什麼為出發點的呢？

牠的出發點就是一種不正確的設想，以為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的，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單是資本主義底“復元”，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懷疑我們的工業底社會主義的性質。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這樣急忙地把那些關於農民分化的不正確的數字拿來作根據。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特別忘掉了一點，就是在我們這裏，中農是農業經濟的中心人物。只有這種設想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反對派輕視中農底比重和懷疑到底合作制計劃。只有用這種設想才可以說明，為什麼新反對派不相信農村底新的發展道路，即吸收農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事實上，在我們這裏現時所發生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本主義恢復的過程，而是雙方面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和社會主義底發展同時進行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底矛盾的過程，是社會主義成份克服資本主義成份的過程。這一點無論對於城市或對於農村都是一樣不容否認的。在城市裏，社會主義底基礎是國家工業；在農村裏，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體質是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繫着的廣泛的合作社系統。

單是資本主義底恢復，是沒有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為，在我們這裏，政權是無產階級的，大工業都是握在無產階級手裏，運輸業和信貸業都是由無產階級的國家管轄着。

階級分化不能有過去那樣的範圍，中農仍是農民底基本羣衆，而富農不能再有從前那樣的力量，這至少是因為，在我們這裏，土地已經國有化，土地已經成為不可買賣的東西，而我們的商業的、信貸的、賦稅的以及合作事業的政策，目的是在限制富農底傾向，增高最廣大的農民羣衆底幸福和剷除農村中向兩個極端分化的情形。我還不去說，在我們這裏，與富農的鬥爭，現在不僅採用着舊的方法，即組織貧農來反對富農，而且還採用着新的方法，即靠固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羣衆的聯盟來反對富農，反對派不懂得採取這第二個方法來與富農鬥爭底意思和意義，這一件事實就是再次證明反對派是走到了農村變民底舊時的道路，走到了農村發展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富農和貧農是農村中的基本力量，而中農則“被沖散”，。

反對派說合作制是國家資本主義底一種，在說這種話的時候，他們引用列寧著的“糧食稅”，這篇文章，因為他們這樣說，所以他們就不相信能够利用合作制作為農村社會主義發展底基本體質。在這裏，反對派也犯了最嚴重的錯誤——這樣來解釋合作制，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在列寧著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是足夠的和可以滿意的，當時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當時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設想為我們經濟中可能的基本形式，而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繫着的東西。但是這樣的解釋到現在已經是不夠了，已經

成為歷史上的舊話了，因為從那個時候起，情形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發展起來，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生活到我們當時所希望的那種程度，而現在包括千萬以上會員的合作社系統，却已經開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絡起來。

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列寧在寫了“糧食稅”，這篇文章以後兩年，在一九二三年，就用另外一種觀點來觀察合作制，認為“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相符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對於這一點的解釋就是：在這兩年之內，社會主義工業已經長大起來，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沒有發展到應有的程度，因此列寧就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國家資本主義相聯結的東西，而把牠看作與社會主義工業相聯結的東西了。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可以解釋這件事實呢？

合作制底發展條件已經改變了。對於合作制問題的態度，當時也應當變更。

在列寧“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有絕妙的一段話說明這個問題，這段話就是：

“在國家資本主義下面，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的企業，第二是集體的企業。在我們現存的制度下面★，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合作企業是集體的企業，但是牠們與社會主義企業却沒有區別★，要是牠們是建立在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土地上，是依靠於國家所有的，即工人階級所有的生產資料上的話，（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九六頁）。

在這段小小的引證中，解決了兩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存的制度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第二個問題就是，與“我們的制度”，相聯結着的合

★注重點是我加的一期大林註。

作企業，是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的，，。

我想很難比這些話還說得更清楚了。

請看列寧這本小冊子中的另一段話吧！

“在我們看來，單是合作制底發展已經就等於（只有上面所指出的一些“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底發展，而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根本的變更，（請參看同卷同頁）。

很明顯的，我們在“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上看到對於合作制的新的估計，而這種新的估計是新反對派所不願承認的，新反對派違背事實，違背淺顯的道理，違背列寧主義而竭力隱瞞這種新的估計。

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繫着的合作制，是一回事，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繫着的合作制，是另外一回事。

但從這一點上並不能做出一個結論，說在“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社”，這本小冊子中間，橫着什麼鴻溝。這種說法當然是不正確的。譬如只要引證“糧食稅”，這篇文章裏的下面這段話，就馬上可以懂得“糧食稅”，這篇文章與“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在合作制估計問題上，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請看這一段的話吧：

“從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大生產底一種形式過渡到大生產底另一種形式。從小經濟主底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從小生產過度到大生產，就是說，這樣一種過渡，這種過渡比較複雜，但是牠如果成功，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拔出舊有的與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甚至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底更深遠的和更有生機的根蒂，而後面這種關係，在反抗一切“維新”的意思上講來，是最頑強不屈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三七頁）。

從這段引語中可以看出，列寧還在作“糧食稅”，這篇文章的時候，就是說我們還沒有已經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的時候，就已認為合作制如有成效，就可以把牠變成反對“社會主義以前的，關係，亦即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關係的那

極端有力的鬥爭工具。我覺得正是這一個思想，後來成了他的“關於合作制”，這本小冊子底出發點。

但是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一切話當中，應當得出的結論就是：新反對派對合作制問題的觀點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形而上學的。新反對派不把合作制看作與其他現象聯繫着的，譬如是與國家資本主義聯繫着（一九二一年）或與社會主義工業聯繫着的（一九二三年）歷史現象，而把她看作一種永久的和一成不變的東西，看作“自在的物”。

於是反對派關於合作制問題就犯了錯誤，由此反對派就不相信農村可以經過合作制而發展到社會主義去，於是反對派就滾到舊時的道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新反對派對於社會主義建設底各個實際問題的立場，大體上就是這樣。

結論只有一個：反對派底路線（要是他有路線的話），反對派底猶豫和動搖，反對派底不信任和在困難面前的驚惶失措，——結果是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因為，如果新經濟政策多半是退守政策，如果國家工業底社會主義性質引起懷疑，如果富農差不多有無上威權，對合作制很少希望，中農底作用日益降低，農村新的發展道路很成問題，黨差不多是變化着，而西歐的革命還沒有這樣逼近，——既然這樣，那末在反對派底軍械局裏究竟還剩下什麼呢？在反對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中，他們指望於什麼呢？須知只靠一種“時代哲學”，是決不能跑去作戰的。

顯然的，新反對派底軍械局，要是一般地可以稱之為軍械局的話，是不值得羨慕的。這個軍械局不是為着進行鬥爭，尤其不是為着勝利。

顯然的，如果黨拿着這樣的軍械局而去挺身作戰，那黨“一下子”，就會斬送自己的生命，——那時她就簡直只好向我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投降。

因此，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是完全正確的，決議上說道：“為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底勝利而鬥爭，是黨底當前任務”，解決這個任務的必要條件

之一，就是“與不相信我們國家裏面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觀點以及與想把‘徹底社會主義式的’（列寧底話）企業——我們的企業——看作‘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這種企圖作鬥爭；這樣的思潮既使羣衆不能自覺地對待一般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不能自覺地對待社會主義工業，牠們就只能妨礙社會主義經濟成份底增長並使私人資本易於去與社會主義經濟成份作鬥爭，；‘代表大會因此認為必需進行廣泛的教育工作來克服這些對列寧主義的曲解，（請參看‘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根據聯共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而通過的決議，）。

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這次大會能够根本揭露了新反對派底錯誤，排斥了牠那種不相信和叫苦的觀點，明確規定了往前爭取社會主義的道路，給黨指出了勝利的前途，這樣就用相信社會主義建設勝利這種不可打破的信仰心來武裝了無產階級。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 關於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哈暢——斯基同志的回憶

楊——斯基同志！

你的信，我當然已經按時收到了。回信寫遲了一點，請你原諒。

(一)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二頁）。政權集中在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手上；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被推翻，那個階級或那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底最主要問題，。”

黨在革命底某個階段整個時期內都發生效力的基本戰略口號，如果不是完全地和整個地依據列寧底這個基本提綱，就不能稱為基本口號。基本口號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之下才能算正確的，如果牠們是建立在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個基礎上，如果牠們規定出階級鬥爭戰線上革命力量佈置底正確計劃，如果牠們便利於引導羣衆走上爭取革命勝利底鬥爭戰線，走上由新階級奪取政權底鬥爭戰線，如果牠們使黨易於從廣大民衆中來組成爲完成這種任務所必需的廣大的和強大的政治軍隊。

在革命底某個階段當中，有發生失敗和退却，失利和個別策略錯誤的可能，可是這却不是表示，基本的戰略口號是不對的。例如，俄國革命第一個階段

上的基本口號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產階級，為達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而鬥爭”，——這個口號，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了。

可見，決不可以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拿來與革命在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遭受失敗或失利的問題混淆起來。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黨底基本口號在革命過程中已經達到推翻某些舊階級或某個舊階級底政權，可是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一些重要的革命要求却沒有實現，或者他們的實現延長到整個時期，或者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來實現他們，可是這也不是表示，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沒有達到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等等，然而這却不是表示，我們在革命第一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或者再舉一個例子：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使政權過渡到了無產階級手上，可是並沒有一下子就達到：第一，一般地，將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第二，特別是使鄉村中的富農孤立，而却把這件事情延長到相當的時期，可是這也不是表示，我們在革命第二個階段上的基本口號——“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裏的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為無產階級底政權而鬥爭”，——是不正確的。

可見，決不可以把黨底基本口號問題拿來與關於實現從這個口號中所產生出來的那些要求的期限和形式問題，混淆起來。

因此，決不可以根據某個時期內革命運動底個別的成功或失敗來估計我們黨底戰略口號，更不可以根據實現某些由這種口號中產生出來的要求的期限或形式來估計我們黨底戰略口號。只有根據以下的觀點，才可以估計黨底戰略口號，就是要看這些戰略口號，是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階級的力量，是不是在為着革命勝利，為着使政權集中在新階級手上底鬥爭戰線上，正確地佈置革命底力量。

楊——斯基同志，你的錯誤就在於，你避開了這個最重要的方法學上的問題或沒有懂得這個問題。

## (二) 你在自己的信內寫道：

「有人斷定說，我們只是在十月革命前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斷定是不是對的呢？是不對的。『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口號，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第一時期都有效力，因為全體農民當時都樂意於澈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

這樣一來，從你的這段話裏面，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在革命底第一個階段內（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即是在推翻沙皇地主政權和建立工農專政的時候，與在革命底第二個階段內（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即是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在這兩個階段內，黨底戰略口號是沒有分別的。可見，你就是否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基本區別。而你犯這個錯誤，顯然地是因為你不願意瞭解這樣的簡單事情，即戰略口號底基本問題就是關於革命某個階段上底政策問題，就是關於那個階級應該推翻和政權應過渡到那個階級手上的問題。顯然用不着證明，你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是根本不對的。

你說，在十月革命時候和十月革命以後的第一時期，我們都實行了『與全體農民聯盟』，這個口號，因為全體農民當時都樂意於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可是誰告訴過你，說十月政變和十月革命只限於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或者把澈底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作為自己的基本任務呢？你這個觀點是從那裏找到的呢？難道可以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安排在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以內嗎？難道取得無產階級專政還沒有超出資產階級革命底範圍以外嗎？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須知這也是農民）能夠贊助推翻資產階級和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呢？怎麼可以否認：關於土地國有，廢除土地私有權，禁止土地買賣等等的法令，雖然牠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法令，可是我們是在與富農的鬥爭中而不是在與富農的聯盟中才能實行的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富農（也是農民）能够幫助蘇維埃政權關於剝奪工廠，鐵路，銀行等等的法令或無產階級對於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呢？怎麼可以斷定說，十月革命裏的基

本內容不是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實，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呢？

當然的，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如果沒有十月革命，那末，資產階級革命當時就不能進行到底；同樣的，如果十月革命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那末，十月革命本身，當時也就不能鞏固起來，而既然十月革命曾經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牠就曾經應當得到全體農民底同情。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點就斷定說，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件事，不是十月革命過程中的附帶現象，而是牠的本質和牠的基本目的呢？十月革命底主要目的是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剷除資本家等等。你把這個主要目的拋棄到什麼地方去了呢？要是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是任何革命底基本問題，即是政權由一個階級手內過渡到另一個階級手上的問題，那末由此難道還不可以明白看到：決不可以把資產階級革命由無產階級政權進行到底的問題，拿來與關於推翻資產階級和取得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混淆起來，即是說拿來與那成為革命第二階段中的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底問題混淆起來。

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大的成績之一，就在於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牠把中世紀制度底污垢完全肅清了。這對於鄉村曾有最重要的並且真正是決斷的意義。沒有這一點，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兩者的匯合，當時就不能實現，體於這一點，馬克思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就已經說過了。沒有這一點，無產階級革命本身當時就不能鞏固。並且這裏須要注意下面這個重要情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件事，並不是一次的動作。實際上，牠延長成了整個時期，不僅包括一九一八年的一段時間，如你在你的信內所斷定的那樣，而且還包括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時間（窩瓦河流域和烏拉爾）和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時間（烏克蘭）。我所指的是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底進攻。這時在整個農民面前都擺着地主政權復辟底危險，這時農民，正是整個地，不得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底周圍，以便來保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和替自己保全這個革命。

底果實。這種實際生活過程底複雜性和多樣性，專政底這種直接社會主義任務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之“奇巧的，錯綜結合，時刻都應當注意到，以便正確地認識你從列寧著作中所引來的這幾段話以及當實行自己的口號底訣竅。是不是可以說，這種錯綜結合證明革命底第二個階段上黨底口號是不正確的，即是說這個口號是與革命底第一個階段上的口號沒有分別呢？不可以這樣說的。正是相反，這種錯綜結合只是證實革命底第二個階段上黨底口號——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裏的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底政權而鬥爭等等——是正確的口號，為什麼呢？因為，為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就須要首先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因為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而要在十月革命中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就須要在十月革命以前準備和組織一種能夠推翻資產階級，能够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相當的政治軍隊，並且無論證明，這樣的政治軍隊，我們當時只有在以下的這個口號之下才能夠準備和組織起來，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繫，反對資產階級，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顯然的，沒有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間所實行的這樣的戰略口號，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治軍隊，於是也就不會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不會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於是也就會有可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決不可以把將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件事情拿來與革命底第二階段上以保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為任務的戰略口號對立。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這一切“矛盾”，——承認革命底第一階段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略口號與革命底第二階段上（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口號間的基本區別，承認在革命第一階段時期，我們是與全體農民共同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鬥爭；而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我們是與貧農共同去反對資本家底政權，為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而這一點是必須要承認的，因為對革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上的階級力量的分析，使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不然便不能解釋這樣的一件事實，就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們會是在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底口號之下進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已經把這個口號改換為無產階級和貧農底社會主義專政口號。楊——斯基同志，你同意吧？就是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將一個口號改換為另一個口號的這種更改，如果採用你的措辭，是不能解釋的。

列寧在他的“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裏面，早已指出了黨底三個戰略口號間的這個基本區別。他把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專制制度底反抗和拆散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請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十六頁）。

換一句話說，就是與全體農民一塊，反對專制制度，中立資產階級，實行民主革命。

至於黨在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時的口號，那末他是這樣規定的：

“無產階級應當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為要做到這點，就要把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暴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和拆散農民及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同上）。

換一句話說，就是與貧農以及人民中一般的半無產者偕着一塊反對資產階級，中立城市中及鄉村中的小資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這是在一九〇五年寫的。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把當時的政治情況估計為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與資產階級的實在政權鉛錫結合的局面，他說：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底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充分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農，（請參看列寧底‘四月提綱’，即‘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十八頁）。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當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正以全力進行時，列寧在“工人與農民”這篇專門的論文內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能够推翻私有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斯大林注）基本規定。而這種規定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只有領導農民（我們的黨網上所謂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能够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治好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開始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已成為絕對必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了——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規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不應這樣去瞭解這一點，就是以為我們這裏現在好像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底專政。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底口號下面走到十月革命的，並且在十月革命的時候，已經在形式上實現過這個口號，其具體表現就是我們會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有過聯盟並與他們分掌過領導，雖然在事實上，我們在那時候就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我們布爾塞維克在當時就已經佔大多數。然而，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自亂”，以後，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破裂以後，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連在形式上也不存在了，因為這時候領導已完全轉到了一個政黨手上，轉到了我們的黨的手上，我們的黨不與而且也不能與其他的政黨分掌國家底領導。這在我們這裏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迴顧革命所經過了的道路的時候，曾寫道：

“是的，當我們還與整個農民一塊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這一點我們會最明顯不過地認識到，從一九〇五年起，我們已說過幾百次和幾千次了，我們從來沒有打算去跳過歷史過程底這個必然要經過的階段，也沒有打算用法令去把她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在十月革命以前好久，在我們奪取政權以前好久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公開說過了並向民衆解釋了：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前進了，資本主義已前進了，破產現象已達到了空前的範圍，這種破產現象要求（無論誰願意不願意這一點），要求到社會主義去的前進步驟。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挽救被戰爭所摧殘了的國家，就不能減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痛苦。結果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一樣。革命底進程證明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所以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與貧農一塊，與半無產階級一塊，與一切被剝削者一塊來反對資本主義，其中也反對鄉村富人，富農，投机商人，所以革命就要成為社會主義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由此可見，列寧曾經屢次着重指出第一個戰略口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略口號與第二個戰略口號——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的戰略口號之間是有極端深刻的區別。在那裏的口號：與全體農民一塊來反對專制制度，在這裏的口號：與貧農一塊來反對資產階級。

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在十月革命以後延長到很久時期，而既然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就使得“全體”，農民當時不能不同情於我們，——這個事實，如我在上面說過的，却絲毫都不能掩飾這樣一個基本原理：我們是與貧農一塊走到十月革命和與他一塊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勝利，我們與貧農一塊兒，在富農（也是農民）底反抗和中農底動搖之下，共同推翻了資產階級收權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會是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之一）。

大概明白了吧。

### （三）你在信內往下又寫道：

“有人說，‘我們是用與貧農聯盟和使中農中立的口號而走到十月革命的，，，這個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是不正確的。依上面所說過的理由及從列寧底著作中摘引過的幾段話看來，就可以明白，這個口號只有在‘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已經成熟了，，（列寧）的時候才能夠發生，即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夠發生，，。

照這段話看來，黨走上使中農中立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時候，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貧農委員會成立以後。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正是相反，使中農中立的政策，不是在貧農委員會成立以後，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的，而恰是在那時候定結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上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在我們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辭時說過：

“舊時的社會主義底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和在論理上及思想上替革命出力的時候，——曾說過使農民中立，就是說，使中農雖不能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社會階層，那麼，至少也使他變成不妨礙革命，取中立態度，不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一個社會階層。這個抽象的，理論上的對任務的提法，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够的。我們已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底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須要具體地，詳細地規定出一種為鄉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了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遵照着這些規則和指示來對中農採取堅固聯盟底立場，（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四頁）。

由此可見，你在你的信內所說的話與列寧上面所講的話恰恰相反，而且你把我們黨的真正實際顛倒過來，把中立中農底開始與牠的終結混淆起來。

當還在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時候，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的時候，中農還灰心呻吟着，還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動搖着，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中立。當中農已開始相信資產階級是“真的”，被推翻了，相信蘇維埃政權是在鞏固起來，正在戰勝富農，紅軍開始在內戰的戰線上取得勝利的時候，他便開始轉到了我們這方面來。正是在這樣的轉變之後，黨的第三個戰略口號才有可能提出來，這口號就是列寧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依靠貧農並與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向前去實行社會主義建設。

你為什麼忘記了這件人人皆知的事實呢？

其次，根據你的指說來，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時和在這個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時期裏使中農中立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不適用的，因而是不能採納的。楊——斯基同志，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情形恰好相反，正是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底時候和在無產階級政權未鞏固以前，中農最是表示動搖和反抗的。正是在這個時期，必須與貧農聯盟和使中農中立。

你為要堅持自己的錯誤，所以斷定說，農民問題，不僅對於我們的國家，而且對於其他“與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底經濟有多少相像的”，國家，都有大的意義。這後一點當然是對的。可是，請看列甯在他提交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土地問題的提綱內，怎樣說到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期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對待中農的政策。列甯曾把貧農，或更確切些說，把“農村中的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規定為一個單獨的集團，——由農村工人、半無產者和極小農和小農組成的一個集團，然後就講到中農問題，把中農看作農村中的特別集團，他說：

“從經濟意義上說來，所謂‘中農’，就是這樣的一些小農人，這些農人根據所有權或者佃權而佔有的，也是一塊兒面積不大的土地，可是，這塊土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照例還是不僅使他可以勉強維持家庭和產業，而且有可能得到一些兒剩餘，這些剩餘至少在很好的年頭中能夠變為資本，這些農人很時常地僱用別人的勞動力……。革命的無產階級不能為自己提出這樣一個任務，——至少不能為最近的將來和為無產階級專政開始時期提出這樣一個任務，——就是說，把這個階層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牠只應當為自己提出使這個階層中立底任務，就是說要迫使牠不積極幫助資產階級去與無產階級作鬥爭，（請參看‘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遠記錄’，第六一〇至六一一頁）。

看了這段話以後，怎麼還可說，使中農中立的政策，在我們這裏“只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夠‘發生’，即是‘只是，在鞏固蘇維埃政

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在實際上得到了決斷的成效以後才能「發生」呢？

可見，關於各無產階級政黨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時候的戰略口號問題，也像使中農中立的問題一樣，都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四)由上述一切看來，可見你從列寧底著作內所引的幾段話，絲毫不能拿來與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對立，因為這幾段話：第一，不是論到黨在十月革命以前的基本口號，而是論到十月革命以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第二，牠們並不駁倒而是證實這個口號底正確性。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但現在不能不再重複說一遍的，就是不能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所實行的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拿來與黨在革命底第二階段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的戰略口號——這個戰略口號底主要題目就是政權問題——對立起來。

(五)你請到莫洛託夫同志底那篇登載在“真理報”，上的著名論文——“論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革命”，(請參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的“真理報”，)並且說，原來恰是這篇論文“推動了”，你來向我要求解釋。楊——斯基同志，我不知道你是怎樣讀人家底文章的。我也讀過莫洛託夫同志底文章，而且我認爲這篇論文與我們在我們黨底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黨對待農民的口號問題所說的話，絲毫不相矛盾。莫洛託夫同志在他的論文內，並不是論到黨在十月革命時期的基本口號，而是論到，既然黨在十月革命以後曾經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因而牠就曾經得到一切農民底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把這一個事實指出來，這並不是否認，而恰是證明這樣一個基本原理底正確性，這個原理就是，我們是與貧農一塊，使中農中立，反對城市裏與鄉村裏的資產階級，達到了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這一點，我們當時就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

“布爾塞維克”，第七八兩期合刊



##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無產階級 和貧農專政底口號

給B·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的回信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

我以為，你在今年五月二號寫給我的信，使我沒有緣由，也沒有根據來作詳細的回答，來作過餘的回答。其實，你的這封信和楊——斯基同志底信比較起來，並沒有絲毫特別新的東西。要是我現在還是來回答你的這封信，那是因為這封信包含有一些直接恢復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的加米葉夫思想的成份。只是為要拆破這些恢復加米葉夫思想的成份起見，我認為須要簡單回答你的信。

(一) 你在你的信裏面說道：“在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時期內，我們實際上是有過與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時期內，黨堅持了和擁護了自己對農民的舊口號——與整個的全體農民聯盟，，。

第一，這就是說，布爾塞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四月到十月內)是沒有努力於把貧農與豐裕農分開，而是把農民看作了整個的東西。

第二，這就是說，在準備十月革命時期內，布爾塞維克是沒有把“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拿來代替“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這個舊口號，而是停留在舊的立場上，就是說，停留在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寫的“兩個策略，，這

本小冊子裏所規定的立場上。

第三，這就是說，布爾塞維克在準備十月革命時期（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月內），與蘇聯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作鬥爭的政策，與中農在蘇聯境內及在前線上的動搖態度作鬥爭，與那些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動搖態度作鬥爭，與那些在七月事變時帶有特別激烈性質的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作鬥爭的政策（在七月事變時，在社會革命黨人的及孟慶維克的妥協派領導之下的蘇維埃，協同反革命的將軍們來從事於孤立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與某些農民階層底這種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的鬥爭，原來是無的放矢的和絕對不需要的。

末了，這就是說，加米葉夫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堅持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是對的；而列寧當時認為這個口號已經陳舊並宣布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却是不對的。

只要把這些問題一提出來，就可以明顯，你的信是從頭到尾都自相矛盾的。

可是，你既然是一個很愛從列寧著作裏摘引個別引證的人，那末，就讓我們來摘引列寧的話罷。

不必花費多大的工夫就可以證明一點，就是列寧曾認為，從革命向前發展的觀點上看來，在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上的新現象，並不是無產階級與整個農民之間有了共同利益，而是貧農與豐裕農之間發生了分裂，當時貧農傾向於無產階級，而豐裕農則跟隨着臨時政府走。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與加米葉夫及加米葉夫派爭論時，關於這一點是怎樣說的：

“現在來靠望與農民有共同利益，這對於無產階級的黨是不可容許的，（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四五頁）。

又說：

“我們在現時就已經在一些農民代表大會裏決議上看見一種要等到有

集立憲會議的時候才來解決土地問題的思想，——這是傾向於立憲民主黨的亞格農★底勝利，（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又說：

“也許農民會拿取一切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但不忘記這個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只限於今天一天，而且，我在直接了當地規定土地綱領時，還顧計到這樣的新現象，就是：佃農及貧農與農民地主間的更深的分離★，（請參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寫的論文——‘關於策略的信’‘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三頁）。

在列寧看來，這就是二月革命以後在鄉村裏的新環境中所發生的新的重要現象。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的時期內規定黨底政策時的出發點。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是根據這個原理出來說話的，他說：

“只是在這裏，在當地我們才知道，工兵代表蘇維埃已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工兵代表蘇維埃是無產階級與兵士等政底實現；而在兵士中間，大多數都是農民。這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底專政。可是這個‘專政’，已與資產階級妥協了。在這裏就正是須要重新審查‘舊的’，布爾塞維主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七六頁。）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以下一段話的時候，也是根據這個原理出發的。這一段話就是：

“誰要是現在還只說‘無產階級與農民底革命民主專政’，那末他就是落在實際生活之後，因此他在實際上就是跑到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就應當被趕到‘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以前的古董陳列所（可以叫做‘老布爾塞維克，陳列所’裏去，（請參看‘列寧全集★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集，第二十卷，第一〇一頁）。

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以代替舊口號——無產階級和農民底專政。

你也許會說（你在你的信內正是這樣說），這是託洛茨基所主張的，躡過還沒有完成的農民革命的政策。可是這種話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正如優加米爾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反駁列寧時所說的話一樣。當時列寧完全料到會有這樣反駁，所以他說道：

“託洛茨基主義——‘不要沙皇，就要工人政府’，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着，不能把她拋出去。可是牠有兩部分。牠的貧苦的★部分是與工人階級一塊兒走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二頁）。

加米爾夫同志底錯誤，而現在也是你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底錯誤，就在於不會指明，不會着重指出小資產階級底兩部分間的區別，在這裏就是指農民底兩部分間的區別；就在於不會從整個全體農民羣衆中分出那部分貧農，並根據這一點來規定黨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第二階段的環境內的政策；就在於不會由這一點推論出一個新的口號，黨底第二個戰略口號——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

現在來在列寧底著作裏面循序考察‘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間的實際歷史。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由革命底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底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充分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貧農，★（請參看列寧底‘四月提綱’，‘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十八頁）。

一九一七年七月：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只有革命的工人，如果有貧農★去幫助他們的話，只有他們才能够打破資本家底反抗，引導人民去無償價地奪取土地，去得到完全的自由，去消除飢荒，去打倒戰爭，去達到正義的和鞏固的和平，（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七十七頁）。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領導貧農★（我們的黨綱上所謂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能够用民主和平來結束戰爭，治好戰爭所造成的創傷，開始實行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已成為絕對必要和刻不容緩的了，——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規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無產者和貧農★底專政，能够打破資本家底反抗，表現出政權底真正偉大的勇氣和決心，保證自己在軍隊裏和農民裏都能得到羣衆們底高興的，奮勇的，真正英勇的贊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四七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月，列寧在‘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這本小冊子內與‘新生活報’，爭論的時候寫道：

‘或者是全部政權歸資產階級——你們早已不據護這個主張，而且連資產階級自己也提都不敢提到這一點了，因為他知道，在四月二十號到二十一號，人民只把肩膀一聳就拋開了這樣的政權，而現在呢，將更堅決幾倍地和更殘酷幾倍地拋開這樣的政權。或者是政權歸小資產階級，就是說歸這個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聯盟，協定），因為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也不能夠單獨地和獨立地來奪取政權，這是一切革命底經驗所證明了的，是經濟科學所證明的，這科學說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或者是站在資本方面，或者是站在勞動方面，可是站在中間是站不住的。這種聯合在俄國半年以來已經嘗試了數十種方法而終歸失敗了。末了，或者是，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全部政權歸無產者和貧農<sup>\*</sup>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這是還沒有嘗試過的，而且是你們，新生活報方面的先生們，勸人民不要去幹的，你們用自己在資產階級面前的恐懼心理去恐嚇人民。第四種情況是連空想也空想不出來的，（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七五頁）。

事實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準備史中所有這一切事實和事變，你都“平安地，逃避過去了，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塞維克與蘇維埃內的“農民業主”，底動搖態度和妥協行為所作的鬥爭，你都從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上“平安地，一筆勾消了，你把列寧底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平安地，帶走了，而你同時却以為這還不是霸蠻曲解歷史，霸蠻曲解列寧主義。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從這幾段話裏——列寧底這類話還可以多摘引出來——你應當看到，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並沒有拿整個農民做出發點，而只是拿農民裏的貧苦部份做出發點，他們並不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這個舊口號之下，而是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之下，走向十月革命的。

由此可見，布爾塞維克實行這口號時，是經過了與蘇維埃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的鬥爭，與坐在蘇維埃裏的那部份農民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的鬥爭，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底動搖態度及妥協行為的鬥爭，這些政黨底名稱就是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新口號，我們當時就不會收集充分強大的政治軍隊，這支軍隊能夠克服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底妥協主義，能够使某一部分農民底動搖中立起來，能夠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並這樣來使資產階級革命可以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我們是和貧農一塊，在富農（也是農民）底反抗和中農底動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拖之下走到了十月革命，並且在十月革命中取得了勝利，（請參看我給拉——斯基同志的回信）。

這樣一來，那末就應當說，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以及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內，對的原來是列寧，而不是加米葉夫。而你，波克洛夫斯基同志，現在却來恢復加米葉夫思想，那末免是落到不大的伙伴裏去了罷。

（二）你引證列寧底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是在整個農民贊助之下取得了政權這句話，來與上面所講過的一切話對立。說我們在整個農民底相當贊助之下取得了政權，這是完全對的。可是你忘記了補充一件“小事情，：就是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整個農民只是在我們會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個限度以內，才贊助了我們。這是很重要的‘‘小事情，，，她在這裏決定問題。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忘記，，這樣重要的‘‘小事情，，和這樣來抹煞極重要的問題，這對於布爾塞維克是不可容許的。

從你的信內可以看出，你是把列寧底關於整個農民底贊助的話，拿來與黨底“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對立，而這個口號也是由列寧所規定出來的。可是要想拿列寧底這句話來與以上從列寧底著作中所引出來的幾段話對立，要想有根據用你所引的列寧關於整個農民的話來駁倒以上所引的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的口號的幾段話，——要想這樣，就至少要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就要證明：把資產階級的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裏的主要點。列寧認為，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底“副，，產物，十月革命“順便，，，解決了這個任務。就要首先駁倒列寧底這個原理，並證明十月革命裏的主要點不是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不是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而是把資產階級的革命進行到底。波克洛夫斯基同志，請你試一試來證明這一點罷，你如果能够證明這一點，那末我就決意承認，在一九一七年由四月到十月期間我們黨底口號不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從你的信內可以看出，你認為自己不可以擔任這個過於冒險的任務，可是你却企圖“順便，，證明，在十月革命底最重要問題之一上面，在和平問題上面，全體農民整個都贊

助了我們。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波克洛夫斯基同志，在和平問題上，你落到庸人的觀點上去了。實際上，關於和平的問題當時在我們這裏就是關於政權的問題，因為在當時，只有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才可以指望擺脫帝國主義戰爭。你大概忘記了列寧底以下的話，就是“只有使政權過渡到別一個階級手裏，才可以結束戰爭”，就是“打倒戰爭——這並不是拋棄槍枝，而是使政權過渡到別一個階級手裏”，（請參看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在彼得格拉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八一和一七八頁）。

總之，兩者必取其一：或者你應當證明，十月革命裏的主要點，是使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或者你不能證明這一點，——那時自然要發生這樣的結論，就是在十月革命裏，整個農民只是在我們會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這個限度內，才贊助了我們。

第二，你應當證明，布爾塞維克不必在十月革命底整個準備時期裏有系統地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不必根據這個口號來與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妥協行為作有系統的鬥爭，不必同是根據這個口號來有系統地揭露某些農民階層及共在蘇維埃裏的代表底動搖態度，而就能夠在十月革命時及十月革命以後在他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波克洛夫斯基同志，請你試一試來證明這一點罷。實際上，為什麼我們能夠保證自己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呢？因為是我們有了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可能性。為什麼我們有了這種可能性呢？因為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和用無產階級的政權代替了她，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夠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為什麼我們能够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呢？因為我們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下面進行了十月革命底準備工作，因為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來與小資產階級政黨底妥協行為作了有系統的鬥爭，因為根據這個口號來與蘇維埃裏面的中農底動搖態度作了有系統的鬥爭，因為我們當時只有在這樣的口號之下才能克服中農底動搖態度，打破小資

產階級政黨底妥協行為和集合一支能够為着使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而鬥爭的政治軍隊。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些決定了十月革命底命運的先決條件，那末我們無論在十月革命時無產在十月革命以後，都是不能得到整個農民底贊助的。

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這兩個東西底匯合問題是應該這樣來了解的，波克洛夫斯基同志。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把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以後整個農民底贊助拿來與在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個口號下面準備了十月革命的事實對立——這就是絲毫不懂得列寧主義。

你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十月革命過程中社會主義的任務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互相錯綜結合的事實，也沒有懂得實現十月革命底這樣一些個別要求的訣竅，這些要求是從黨底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第二個戰略口號得出來的。

讀你的這封信的時候，可以發生這樣的感想，就是說，原來不是我們曾經把農民拿來替無產階級革命效勞，却反而是“整個農民，，富農也包括在內，曾經把布爾塞維克們拿去替自己效勞。如果布爾塞維克們曾經這樣容易地替非無產階級效過勞，那末他們的事業就會很壞了。

波克洛夫斯基同志，一九一七年四月間的加米葉夫思想，這就是使你脚跟動搖的東西。

(三) 你斷定說，斯大林看不見一九〇五年的環境與臨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時的環境中間的差別。這種斷言，當然是不嚴重的。我沒有這樣說，而且不能夠這樣說。我在我的信內只是說到，黨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來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口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證實。這當然是對的。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列寧在“農民和工人”這篇論文內就正是這樣描寫情況的：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纔能夠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的（指一九〇五年。——斯大林註）基本的規定。而這種規定

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已經再一次地證明了這一點，（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一一頁）。

太過於“講辯證法的”，同志呵，你不過是想來吹毛求疵罷了！

（四）其次，你又企圖搗破斯大林，說他有自相矛盾的說話，把他在“列寧主義問題”，這本小冊子裏所說的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有與中農共建社會主義的可能的這段話，拿去和他關於在十月革命以前中農底妥協行的這個提綱對立。不必花費多大的工夫就可以證明，這樣把兩個不同的現象作一個東西，是絕對不合科學的。在十月革命以前的，當資產階級當政時的農，與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鞏固以後的，當資產階級已被剝奪，合作制已經展，基本的生產資料已經集中在無產階級手上的時候的中農，是兩個不同的西。把兩種中農當作一個東西，將他們混為一談——這就是在觀察現象時，現象看作是與歷史環境沒有聯繫的東西，並且是喪失一切前途。這與季諾維夫用混淆年月時期的方法來引證別人的言論相同。如果這就叫做“革命的辯法”，那末應當承認，在玩弄“辯證法的”，魔術這方面，波克洛夫斯基同志是天下無雙的能手了。

（五）其餘的問題，我不談及，因為我認為，在我與楊——斯基同志的通內，已經把這些問題說得透澈無遺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 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 一 代表團底問題與斯大林同志底回答

第一個問題：列寧和共產黨在實際上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了那一些新原則呢？說列寧會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却比較喜歡等待經濟力量底登峯造極的發展，這種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

回答：我以為，列寧並沒有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任何“新的原則”，同樣，他也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底“舊”，原則裏的任何一個原則。列寧曾經是，而且始終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最忠實的和最一貫到底的學生，他是完完全全依靠着馬克思主義底原則的。可是列寧並不僅僅只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底執行者，他並且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底繼續者。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根據着發展底新條件，根據資本主義新階段底條件，根據帝國主義底條件而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底學說。這就是說，列寧既然是在階級鬥爭底新條件下而繼續發展了馬克思底學說，這樣他就在馬克思主義底寶庫內放進了一些為馬克思恩格斯所沒有給出來的新東西，放進了一些在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所不能給出來的新東西，同時，由列寧所放進馬克思主義底寶庫內去的這些新東西，完完全全是以馬克思恩格斯所規定的原則做基礎的。正是在這個

意義上，我們說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在向前發展馬克思學說的時候，曾在幾個問題方面給了一些新東西，請看這是那幾個問題罷：

第一，就是關於壟斷資本主義問題，關於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底新階段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裏面，已經分析了資本主義底基礎。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在壟斷資本以前的資本主義統治時代，生在資本主義平穩進化和“和平”，推廣於全地球的時代。這個舊階段到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已經終結，這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去世了。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會只能猜想資本主義發展底這樣一些新的條件。這些新的條件是因為資本主義底新階段代替了舊階段而發生的，是因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壟斷的階段而發生的。在這時候，資本主義底平穩的進化已被資本主義底躍進式的，必然引起災難恐慌的發展所代替了，在這時候，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性和矛盾已表現得特別厲害，因為在這時候，在這種極不平衡的發展底條件下面，為爭取銷售商品的市場和輸出資本的市場的鬥爭，已經使這種為着定期重新分割世界及勢力範圍的定期帝國主義戰爭，成為必不可避免的了。列寧底功勞，也就是說，列寧底新東西，就在於他依靠着“資本論”，底基本原理，對於帝國主義和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作了一個有根據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揭露了牠的爛瘡和那些使牠必定滅亡的條件。在這個分析底基礎上，就產生列寧底一個著名的原理，這個原理就是：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面，社會主義有在個別的，單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面取得勝利的可能。

第二，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思想，認為這種專政是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是用暴力推翻資本政權的方法。列寧在這方面所給的新東西就在於：（一）他發明了蘇維埃政權，認為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為着這個發明，他利用了巴黎公社底和俄國革命底經驗；（二）他根據關於無產階級底聯盟者問題來解釋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公式，他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導者的無產階級與被領導的非無產階

級的（農民及其他等等）被剝削羣衆間的階級聯盟底特殊形式；（三）他特別着重指出了一件事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內最高式樣的民主制，是代表多數人（被剝削者）底利益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底形式，——與代表少數人（剝削者）底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制相反。

第五，就是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的國內，社會主義勝利建設底形式和方法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會把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看作是多少長久的，充滿着革命戰鬥和國內戰爭的時期，在這時期內，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採取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和組織上的那些必要辦法，以便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無階級的社會，無國家的社會，以便代替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列寧是完完全全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這些基本原理底基礎上的。列寧在這方面所給的新東西就在於：（一）他在理論上證明了：被各帝國主義國家所包圍着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如果他不會被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底武裝干涉所撲滅，那末在這個國家內就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二）他規定了經濟政策底具體道路（“新經濟政策”，），藉着這些具體道路，握有經濟命脈（工業，土地，運輸業，銀行等等）的無產階級就可以把社會化了的工業與農村經濟聯絡起來（“工業與農民經濟底聯絡”，），這樣來引導整個國民經濟走到社會主義；（三）他規定了那種經過合作制來漸漸把農民基本羣衆引導到和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軌道上去的具體道路，合作制是由無產階級專政拿來改造小農經濟和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教化農民基本羣衆的最偉大的工具。

第四，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所有一切人民革命中，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給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觀念底基本大綱。列寧在這裏所給的新東西就在於，他向前發展了這些大綱，並且把這些大綱擴張成為無產階級領導權底嚴密系統了，擴張成為無產階級不僅在推翻沙皇制度及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業上，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裏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都對城市的和鄉村的勞動羣衆施行

領導底嚴密系統了。大家知道，無產階級領導權底觀念，因為有列寧和列寧黨的緣故，在俄國得到了巧妙的應用。俄國革命，結果弄到了建立無產階級底政權，局部地也是因為這個原故。從前的情形，照例總是這樣，就是在革命底時候，工人在街頭上作了鬥爭，流了血，推翻了舊制度，可是政權却落到了資產階級手裏，而資產階級後來又壓迫和剝削工人。英國和法國底情形曾經是這樣。德國底情形曾經是這樣。我們俄國底情形，就不是這樣了。在我們俄國，工人會不僅是革命底突擊力量。俄國無產階級既是革命底突擊力量，同時又會力圖成為領導者，成為城市和鄉村的一切被剝削羣衆底政治領導者，把這些羣衆團結在牠自己的周圍，使這些羣衆脫離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孤立起來。俄國無產階級既然是被剝削羣衆底領導者，牠時刻都作了鬥爭，以便奪取政權和利用這政權來擴廣自己的利益以反對資產階級，以反對資本主義。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俄國革命底每一個強有力的發動，無論是在一九〇五年十月也好，無論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也好，都把工人代表蘇維埃提到了舞臺上，把這個擔任着鎮壓資產階級的使命的新政權機關底萌芽，提出來對抗資產階級的國會——擔任着鎮壓無產階級的使命的舊政權機關。我們俄國的資產階級曾兩次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的國會和消滅蘇維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在“預備國會”，時期，就是就在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以前，以及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在“立憲會議”，時期，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而每次都遭了失敗。為什麼呢？因為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孤立了，千百萬勞動羣衆已認定無產階級是革命底唯一領袖，而蘇維埃已受了羣衆底審查和試驗而被他們看作自己的工人政權，如果把這個政權拿去換成資產階級的國會，這對於無產階級便是一個自殺政策。因此，難怪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在我們俄國並沒有發育過。所以革命在俄國就到了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這就是實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裏的領導權的觀點系統的結果。

第五，就是民族殖民地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分析愛爾蘭，印度，中國，中歐各國，波蘭，匈牙利，這些國家裏面的事變的時候，關於民族殖民

地問題定出了基本的，出發點的思想。列寧底著作是以這些思想為基礎的。列寧在這方面的新供獻就在於：（一）他把這些思想集成為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的觀點底整個系統；（二）把民族殖民地問題與推翻帝國主義的問題聯繫起來；（三）把民族殖民地問題宣佈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底一個組成部分。

末了，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底政黨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定出了關於政黨的基本大綱，認為無產階級底政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沒有牠（沒有政黨）無產階級就不能得到解放，就是說也不能奪取政權，也不能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列寧在這方面的新增供獻就在於，他繼續向前提發展了這些大綱，使其適用於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鬥爭底新條件，因為他指明了，（一）黨是無產階級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牠比無產階級組織底其他各種形式（職工會，合作社，國家組織）都要高些，牠的使命就是要統納和指揮其他這些組織底工作；（二）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經過黨才能實現，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指導力量；（三）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由一個政黨，由共產黨來領導——共產黨是不與而且也不應與其他的政黨瓜分領導權的，——牠能夠成為完滿的專政；（四）如果在這個政黨裏沒有鐵的紀律，那末就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底那些關於最壓制者的和把階級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

列寧在自己的著作裏，具體化了馬克思的學說和向前發展了這個學說而使其適用於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鬥爭底新條件，列寧在這裏所給的新東西，大體上就是這樣。

因此我們就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

由此可見，既不能把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分開，更不能把牠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

在代表團的問題中往下又說：“說列寧曾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却比較喜歡等待經濟力量底登峯造極的發展，這種說法，是不是正確的呢？”，我認爲，這種說法是完全不正確的。我想，無論那個人民革命，如果牠是

真正的人民革命，都是創造性的革命，因為牠打破舊制度，和創造建立新制度。當然，例如在阿爾巴尼亞有時發生這些部落反對別些部落的兒戲的“暴動”，在這樣的所謂“革命”，真是不能有絲毫創造性的。可是這樣的兒戲的“暴動”，從來沒有被馬克思主義者認作革命。這裏所說的，顯然不是關於這樣的暴動，而是關於發動着被壓迫階級去反對壓迫階級的那種羣衆的人民革命。而這樣的革命却不能不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和列寧所主張的正是這樣的革命，——而且僅只是這樣的革命。而且，很明顯的，這樣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面都能發生的，牠只是在一定的順利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下面才能發生的。

#### 第二個問題：是不是可以說共產黨監督着政府？

回答：這全靠對於監督兩字的瞭解如何而決定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於監督的瞭解，是有些特別的。我知道，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雖然是有著“民主的”，國會，而資本主義的政府，都是受最大的銀行所監督的。國會總是叫人相信，說正是他們監督着政府。而實際上，政府閣員底成份都是由最大的銀行團所預先決定的，政府底行動是由這些銀行團所監督的。誰不知道，無論在那一個資本主義“強國”，裏都不能違反最大的財政大王底意志而組織內閣，只要財政大王一實行財政逼迫，內閣總長們就要馬上辭職逃走。這就是銀行對政府的真正的監督，而違反着國會底那種有名無實的監督。如果，你們所問的是關於這樣的監督，那末我們就應當聲明，金錢大王監督政府的事情，在我們這裏是行不通的，而且是絕對沒有可能的。這至少是因為，在我們這裏銀行早已收歸國有，而金錢大王却早已被趕出蘇聯境外了。

也許代表團所問的，不是關於黨對於政府的監督，而是黨對於政府的領導吧？如果代表團想問到這一點上，那末我就回答道：是的，我們這裏是黨領導政府。而這種領導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為我們的黨得到工人和一般勞動者大多數底信任，所以牠就有權代表這個大多數來領導政府機關。

#### 蘇聯底工人政黨——共產黨，對於政府的領導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就是表現在，共產黨總是努力經過蘇維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而把自己

的候選人，自己的優秀工作人員，就是說忠實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和願意誠心誠意為無產階級出力的人提出去擔任我國國家工作底基本職務。這一點，黨在極大多數的情況中都能做到，因為工人和農民都是信任我們的黨的。我們這裏政權機關底領導人是共產黨員，他們——這些領導人——在國內享有莫大的威信，這都不是偶然的。

第二是表現在，黨審查着管理機關底工作，政權機關底工作，同時糾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錯誤和缺點，幫助牠們去實行政府底決議，努力保證牠們得到羣衆底擁護，而且牠們通過任何一個重要決議，都得到黨底相當的指示。

第三是表現在，當各個政權機關規定自己的工作計劃的時候，無論這個工作是工業和農業方面的也好，是商業和文化建設方面的也好，黨都給以一般的領導的指示，以決定這些機關在計劃有效期內工作底性質和方向。

資產階級底報紙，對於我們的黨這樣“干涉”，國事，通常都是表示“驚奇”，可是這種“驚奇”，完全是假裝的。大家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的政黨也是一樣“干涉”，國事和領導政府的，而且那裏的領導是集中在極少數人底手內，這些人是與大銀行有各種各樣的聯繫的，因此，他們總是拼命在人民面前隱瞞自己的作用。誰不知道：在英國或別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每個資產階級的政黨都有一個由包攬領導權的極少數人組成的秘密內閣呢？你們只要回想起路易喬治關於自由黨底「陰暗」，內閣的著名演說就够了。在這方面，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分別就在於：（一）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產階級的政黨是為着擁護資產階級底利益和反對無產階級而領導國家的，可是，在蘇聯，共產黨却是為着擁護無產階級底利益和反對資產階級而領導國家的；（二）資產階級的政黨在人民面前隱瞞自己的領導作用，為着這個目的，便組織自己的形迹可疑的秘密內閣，而在蘇聯，共產黨却不需要任何的秘密內閣，牠斥責秘密內閣底政策和行為，並公凜向全國聲明，說牠自己擔負着領導國家的責任。

有一位代表問道：黨是根據同樣的理由來領導職工會的嗎？

斯大林回答道：在基本上是這樣的。在外表上，黨是不能給職工會以任何訓令的。可是，黨可以給在工會內作工的共產黨員以訓令。大家知道，在職工會內也同在蘇維埃內，合作社等內面一樣，是有共產黨集團的。這些共產黨集團底責任就在於，要在職工會，蘇維埃，合作社和別的機關內用說服的方法去做到通過與黨底訓令相符合的決議。這一點，他們在極大多數的情形裏都能够實現，因為黨在羣衆裏的影響極大，黨在羣衆裏得到很大的信任。無產階級各種各樣組織彼此行動底一致，就是這樣達到的。如果沒有這種情形，那末，在工人階級這些組織底工作中，就會發生各行其是的現象。

第三個問題：既然俄國只有一個政黨是合法的，那末你從那裏知道羣衆是同情共產主義呢？

回答：對的，在蘇聯是沒有合法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在蘇聯，只有一個黨，工人黨，共產黨，才是合法存在的。然而，我們有沒有方法和手段來使自己確定相信，大多數工人，大多數勞動羣衆都是同情共產黨員的呢？這裏所講的當然是指農工羣衆，而不是指新資產階級，不是指那些已被無產階級打破的舊的剥削階級底殘餘。是有的，我們是有可能，我們是有方法和手段來知道工農羣衆是否同情共產黨員的。就拿我國生活上最重要的事情來說，看看有沒有根據來斷定說，羣衆真正是同情共產黨員的。

首先就拿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期這樣重要的關頭來說，這時共產黨正是以黨底資格，公開號召了工農去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這時牠這個黨是得到了工農兵絕大多數底擁護。那時環境是怎樣的呢？那時與資產階級聯合了的社會革命黨人及社會民主黨人（孟寧維克）掌握着政權。中央及各地方的政權機關，以及一千二百萬軍隊底指揮機關，都操在這些政黨手裏，操在政府手裏。共產黨那時處在半公開的情況中。各國資產階級都預料布爾塞維克黨是一定會失敗的。協約國在當時是完完全全擁護基底政府的。可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黨，並沒有中止號召無產階級去推翻這個政府，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結果怎樣呢？絕大多數的勞動羣衆，在後方和前線上都最堅決地擁護了布爾塞維

克黨。——而克倫斯基政府就被推翻了，無產階級底政權就建立起來了。雖然那時全世界資產階級都以敵視態度預言布爾塞維克一定會滅亡，可是布爾塞維克終究成了勝利者，試問怎麼能有這樣的事情呢？這種情形不是證明廣大勞動羣衆同情布爾塞維克黨嗎？我想是的。這就是共產黨在廣大民衆中間的威信和影響所受的第一次審查。

拿往下一個時期，武裝干涉時期，國內戰爭時期來講吧，在這個時期，英國資本家佔領了俄國北部，亞爾漢格爾和謨爾曼斯克，這時美英日法各國資本家抬出了高爾察克，佔領了西伯利亞，這時法國的和英國的資本家會設法佔領“南俄”，援助鄧尼金和佛蘭格爾。這是協約國和俄羅反革命將軍們所進行的戰爭，為的是要反對莫斯科的共產黨政府，反對我們十月革命底勝利品。這是共產黨在廣大農業羣衆裏的力量和隱固性受最大的審查的時期。結果怎麼樣呢？誰也不知道，國內戰爭結果，是外國反帝軍被趕出俄國境外，而反革命的將軍們被紅軍打得落花流水呢？原來戰爭底命運，歸根到底並不是取決於技術（蘇聯底敵人會把很多的技術供給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而是取決於正確的政策，取決於千百萬民衆底同情和掩護。布爾塞維克黨那時竟成了戰勝者，這是不是偶然的事情呢？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這種情形不是證明共產黨在我們這裏是享受着廣大勞動羣衆底同情嗎？我想是證明這點的。這就是蘇聯共產黨底力量和隱固性所受的第二次的審查。

現在來講現今時期，來講戰後時期，這時候，和平建設問題已成為當前的問題，這時候，經濟破壞階段已為工業恢復階段所代替了，末了，已為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我國全部農民經濟的階段所代替了。我們現在有沒有方法和手段來審查共產黨底力量和隱固性，來決定廣大勞動羣衆對共產黨同情到什麼程度？我想是有的。

首先就拿那大約包含有一千萬無產者的職工會來講，看看我們的職工會領導底成份。共產黨員領導着這些機關，這是不是偶然的事情呢？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如果以為蘇聯工人對職工會領導機關底成份漠不關心，那就是最

黨的想法了。蘇聯工人是在三次革命底浪潮中長大起來和教育出來的。這種工人比任何人都更學會了怎樣去審查自己的領導者，要是這些領導者不能滿足無產階級底利益，那末，工人們便要把他們趕走了。曾經有一個時候，我們黨內最有名望的人就是普列漢諾夫。然而工人已經相信普列漢諾夫是離開了無產階級路線的時候，他們就不惜來斷然使他孤立。而如果這樣的工人表示信任共產黨員，推舉他們去擔任職工會內重要職務，那末這個事實，就是直接指明，共產黨在蘇聯工人中間的力量和體制性是極端偉大的。這就是廣大工人羣衆絕對同情共產黨員這件事實底審查。

拿最近的蘇維埃選舉來講罷。在我們蘇聯，除掉那些剝削別人勞動的和被剝奪了選舉權的資產階級份子以外，凡屬成年人，從十八歲起，不分性別和民族，都享有蘇維埃選舉權。這大約有六千萬的選舉人。其中絕大多數當然是農民。這六千萬選舉人中間，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一，即是三千多萬人，是實行了自己的選舉權。現在請看看我們在中央的和在各地方的蘇維埃領導機關底成份。被選出的領導份子，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這難道可以說是偶然的事情嗎？當然是不可以的。這件事實不是證明共產黨是得到千百萬農民羣衆底信任嗎？我想是的。這就是共產黨力量和體制性底又一個審查。

拿那個大約包含有兩百萬青年農民的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來講吧。青年團內選舉出來的領導份子，絕大多數都是共產黨員，這件事實可以說是偶然的事情嗎？我想是不可以的。這就是共產黨底力量和威信底又一個審查。

末了，拿我們的那些包含着蘇聯境內所有一切民族的，成千百萬的勞動男女，男工和女工，農夫和農婦的代表會議，會議，代表會等等來講罷。西歐人有時譏笑我們這些會議和代表會議，說俄國人總是喜歡多說話。可是這些會議和代表會議對於我們是有莫大意義的，因為這些會議和代表會議既可以調查羣衆底心理，又可以發露我們的錯誤和定出消滅這些錯誤的方法，因為我們的錯誤並不少，而且我們並不隱瞞自己的錯誤，認為發露錯誤和誠懇改正錯誤，乃是改善國家領導的最好的方法。你們只要看看這些代表會議和會議上的發言者

底言論，看看這些由工農出身的這些“平常人物”，底切實的和誠實的意見，看看他們的決議，——你們就可以看出，共產黨底影響和威信是偉大到什麼程度，你們就可以看出，世界上無論那一個政黨都會要羨慕這種影響和這種威信的。這就是共產黨底獨創性底又一個審查。

這就是我們可以審查共產黨在民衆裏的力量和影響的方法和手段。

我就是從這裏來知道蘇聯的廣大工農羣衆是同情於共產黨的。

第四個問題：如果有一批非黨的人組織了自己的派別組織，在選舉時提出了自己的那些站在擁護蘇維埃政府的立場上的候選人，可是同時又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他們能不能有自己的經費和進行擴張的政治運動呢？

回答：我認為這個問題本身就包含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決不能有這麼一批人，這批人一方面主張擁護蘇維埃政府，而另一方面又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為什麼呢？因為對外貿易壟斷制，是蘇維埃政府“立場”，底堅固基礎之一。因為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一批人決不會主張擁護蘇維埃政府。因為這樣的一批人只能是深深地仇視整個蘇維埃制度的一批人。

在蘇聯當然是有要求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份子。這就是耐溫曼，富農，已被打碎的剝削者階級底殘餘等等。可是，這些份子是佔人民底極少數的。我想，代表團在發問題時所講的，不是這種份子。如果代表團所講的，是工人和農民中的勞動羣衆，那末，我就應當說，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這種要求只能引起他們的哈哈大笑和敵視態度。

老實說，由工人們看來，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這是什麼一回事呢？由工人們看來，就是放棄國家工業化，放棄新工廠和新製造廠底建造，放棄舊工廠和舊製造廠底擴充。由工人們看來，這就是讓資本主義國家運來的商品充塞蘇聯市場，使我們自己的比較軟弱的工業縮小，使失業人數增加，使工人階級底物質生活變壞，使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削弱。歸根到底，這就是使耐溫曼和一般新資產階級底勢力加強。蘇聯無產階級能不能去實行這種自殺政策呢？當然是不能的。

而由勞動農民羣衆看來，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又是什麼一回事呢？這就是把我們的國家由獨立的國家變為半殖民地的國家和使農民羣衆貧窮化。這就是恢復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時代所風行一時的“自由貿易”，制度。當時，反革命的將軍和“協約軍”，底聯合勢力，自由地搶劫和剝削了千百萬農民羣衆。歸根到底，這就是使富農和鄉村裏其他的剝削份子底勢力加強。農民在烏克蘭，在北高加索，在高瓦區，在西伯利亞，已經嘗到了這個制度底滋味。有什麼根據可以預定說，農民忽然又想逃進這個圈套呢？農民勞動羣衆是不能主張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的，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有一個代表起來說道：代表團提出了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制問題，關於取消這個壟斷制問題，代表團提出這個問題來，是認為，如果在蘇聯沒有一個政黨底壟斷制，沒有合法權壟斷制，那末，就會有整批人根據着這一點而組織起來了。

斯大林回答道：這樣，代表團又回頭說到共產黨——在蘇聯唯一合法的政黨——壟斷制問題了。當我講到有什麼方法和手段來審查千百萬工農羣衆對共產黨的同情時，我已簡單回答了這個問題。至於其他的人民階層，富農，附溫營，已被打破的舊時剝削階級底殘餘，那末，他們在我們蘇聯，已被剝奪了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的權利以及選舉的權利。無產階級不僅從資產階級方面奪取了工廠，製造廠，銀行，鐵路，土地和礦山。牠還奪去了資產階級具有自己的政治組織的權利，因為牠是不願意恢復資產階級底政權的。蘇聯無產階級已從資產階級和地主方面奪去了工廠，製造廠，土地和鐵路，銀行和礦山，代表團對於這一點大概是沒有什麼反對意見的（笑聲）。可是我覺得，代表團對於下面一點却有點懷疑，就是：為什麼無產階級並沒有限於這一點，却進一步地奪去了資產階級底政治權利，我以為這是不完全合乎邏輯的，或者更正確點說，這是完全不合乎邏輯的。根據什麼理由來要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取寬宏態度呢？難道西方資產階級在自己掌握政權的時候，對工人階級採取絲毫寬宏態度嗎？難道他不是把工人階級底真正革命的政黨逼到秘密狀態中去嗎？根據什

麼理由來要求蘇聯此無產階級對自己的階級敵人採取寬宏態度呢？我認為，邏輯是一定要人推論到底的。誰要是認為可以把政治權利歸還資產階級，他就應當——如果他想合乎邏輯——更進一步地主張把工廠、製造廠、鐵路和銀行也交給資產階級。

有一個代表起來說道：代表團底任務是要弄清楚，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面與共產黨意見不同的意見是怎樣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現。如果以為代表團是注意關於把政治權利交給資產階級的問題，注意關於資產階級底意見怎樣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現的問題，那就不對了。問題正是關於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面與共產黨意見不同的意見怎樣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現。

另外一個代表起來說道：這樣不同的意見是不是可以在工人階級底羣衆組織內，在職工會及其他等等內面得到表現。

斯大林回答道：很好。那末，問題不是關於恢復資產階級底政治權利，而是關於在工人階級和農民內面的意見上的鬥爭。現時工人和農民羣衆內面有沒有意見上的鬥爭呢？當然是有的。要想千百萬工人和農民都是一樣的想法，那是不會有的事情。這樣的事情，是實際生活裏所沒有的。第一，工人和農民，無論就他們的經濟地位來講，無論就他們對某些問題的觀點來講，在他們彼此中間，都是有很大的區別的。第二，在工人階級本身內，也有一些觀點上的不同，教育不同，年齡不同，性格不同，基本工人和從鄉下來的工人間的不同等等。所有這些都要引起工人和農民勞動羣衆內面的意見上的鬥爭，這種鬥爭，在會議上，在工會內，在合作社內，在蘇維埃選舉的時候等等都得到合法的表現。

可是，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的意見上的鬥爭，與以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意見上的鬥爭，有根本的區別。在以前的時候，工人和勞動農民內面的意見上的鬥爭，主要地是集中在關於推翻地主，推翻沙皇制度，推翻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制度的問題上。而在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意見上的鬥爭却不是關於推翻蘇維埃政權，不是關於打破蘇維埃制度的問題，而是關

於改善蘇聯政府機關，關於改善這些機關底工作的問題。這裏是有根本的區別。在以前，關於用革命手段打破現存制度的問題而發生的意見上的鬥爭，會使得在工人階級和農民勞動羣衆裏面可以發生幾個互相競爭的政黨，這是毫不足怪的。這些政黨就是：布爾塞維克黨，孟寧維克黨，社會革命黨。另一方面，在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意見上的鬥爭底目的，並不在於打破現存的蘇維埃制度，而在於改善和鞏固這個制度，所以這種鬥爭決不能成為使工人和鄉村勞動羣衆裏面有幾個政黨存在底根源，——這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因此，只有一個政黨——共產黨——底合法存在，這個政黨底壟斷，不僅不會引起工人們和勞動農民們底反對，反而被他們看作是一種必需的和恰意的事情。

我們黨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共產黨底壟斷），我們黨底這種地位，並不是什麼人工造成的，不是故意想出來的。這樣的定位是不能用人工造成的，不能用行政手腕等等造成的。我們黨底壟斷，是從實際生活中生長出來的，是在歷史上形成起來的，是由於社會革命黨和孟寧維克黨在我們的實際環境裏完全破產和滾下舞台的結果。在以前，社會革命黨和孟寧維克黨是什麼東西呢？是在無產階級裏面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人。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這些政黨底生存是由什麼東西培養着和維持着的呢？是由於當時有資產階級存在，末了，是由於有資產階級政權底存在。資產階級一被推翻，這些政黨存在底基礎也就不得不跟着消滅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而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這些政黨又變成了什麼東西呢？牠們變成了以恢復資本主義和推翻無產階級政權為目的的政黨。這些政黨曾經不得不失去他們在工人和農民底勞動階層裏的任何基礎和任何影響，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共產黨與社會革命黨及孟寧維克黨為着影響工人階級而彼此進行的鬥爭，並不是從昨天才開始的。還在一九〇五年以前，當俄國的羣衆的革命運動還只最初表現出來的時候，這種鬥爭就已經開始了。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時期，是在我們俄國工人階級內面發生劇烈的意見上的鬥爭的時期，是布爾塞維克，孟寧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彼此為爭奪工人階級內面的影響而進行

鬥爭的時期。我們蘇聯的工人階級，在這個時期裏經過了三次革命。工人階級在這三次革命底火線裏試驗了和審查了這些政黨，看他們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否中用，他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如何。臨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時候，當歷史把過去的整個革命鬥爭做了總結的時候，當歷史在自己的天秤上衡量了工人階級內面互相鬥爭的各政黨底比重的時候，——在這個時候，蘇聯底工人階級，到底作了最後的選擇，選上了共產黨，認為她是唯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工人階級選上了共產黨，這事實怎樣來解釋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例如在列寧格拉蘇維埃內，布爾塞維克還祇佔極少數，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齊維克那時在各蘇維埃內還佔絕大多數，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臨到十月革命的時候，整個政權機關和一切壓迫工具都操在那些與資產階級聯合着的社會革命黨和孟齊維克黨手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這是因為，那時候共產黨主張消滅戰爭，主張立刻實行民主和平，而社會革命黨和孟齊維克黨却主張“把戰爭進行到勝利的結局”，主張繼續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是因為，那時候共產黨主張推倒克倫斯基底政府，主張推翻資產階級底政權，主張把工廠和製造廠、銀行和鐵路收歸國有，而孟齊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却為擁護克倫斯基底政府而鬥爭和掩護資產階級佔有工廠和製造廠、銀行和鐵路的權利。這是因為，那時候共產黨主張立刻把地主土地沒收來交給農民，而社會革命黨和孟齊維克黨却總是把這個問題推延到那個被推延到遙遠無期的立憲會議。結果，工人和農民到底選上了共產黨，這究竟有什麼奇怪呢？社會革命黨和孟齊維克黨很快就墮落到底了，這究竟有什麼奇怪呢？共產黨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而爭得了政權的。

往下一個時期，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的時期，國內戰爭時期，就是孟齊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完全滅亡的時期，就是布爾塞維克黨完全勝利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孟齊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自己就便利了共產黨底勝利。孟齊維克底及社會革命黨底那些已被打破的和在十月革命時已經墮落到底的殘餘，已經與富農的反革命暴動聯絡起來，與高爾察克的隊伍及鄧尼金的隊伍聯合起來，已

跑去替協約國出力效勞，這樣就在工農羣衆面前完全把自己揭破了。結果造成了這樣的景象，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已由資產階級的革命家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家，幫助了協約國來撲滅新的蘇維埃的俄羅斯。而布爾塞維克黨却把所有的生動的和革命的力量統一到自己的週圍，發動了一批一批新的工農隊伍去作擁護社會主義祖國的鬥爭，去作反對協約國的鬥爭。共產黨人在這個時期內的勝利，應當使，並且實在已經使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受到完全的失敗，這完全是自然的事情。既是這樣，那末共產黨成了工人階級底和農民底唯一政黨，這究竟有什麼奇怪呢？

在我們這裏，共產黨，這個在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底壟斷制就是這樣形成了的。

你們所說的，是現時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的工農中間的意見上的鬥爭。我已經說過，意見上的鬥爭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是有的。不是這樣，就不能前進。可是，在現今的條件下面，工人裏面的意見上的鬥爭並不是關於推翻蘇維埃制度的這個原則問題，而是關於改善蘇維埃，關於糾正蘇維埃機關底錯誤，於是也就是關於鞏固蘇維埃政權的這些實際問題。這樣的意見上的鬥爭，當然只能鞏固和改善共產黨。這樣的意見上的鬥爭，當然只能鞏固共產黨底壟斷制。這樣的意見上的鬥爭，當然不能成為使在工人階級及勞動農民內部成立別的政黨的一種滋養料。

**第五個問題：你能不能把你和託洛茨基間的基本的意見分歧簡單告訴我們？**

**回答：**我首先就應當說，與託洛茨基的意見分歧並不是個人的意見分歧。如果意見分歧是帶着個人的性質，黨就會連一點鐘的工夫也不花費在這件事情上面了，因為黨是不受什麼個別人物來出風頭的。問題大概是關於黨內的意見分歧。我是這樣瞭解這個問題的。是的，這種意見分歧在黨內是存在的。關於這些意見分歧底性質，不久以前李可夫同志在莫斯科做報告的時候和布哈林同志在列寧格拉做報告的時候都已經說得很詳細。這些報告已經公佈出來了。我

對於這些報告裏的關於意見分歧問題所說過的話，並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東西。要是你們沒有這些文件，我可以給你們找到這些文件。（代表團告訴說，他們有這些文件）。

有一個代表起來說道：在我們回國後，人家會來向我們問到這些意見分歧，可是我們並不是所有的文件都有。例如，我們並沒有“八十三人”，處政綱。

斯大林說道：我並沒有在這個政綱上簽名。我沒有權利來支配別人的文件。（代表們笑起來）。

第六個問題：在資本主義各國生產發展底基本推動力，是根據於榨取利潤的希望而來的。這種推動力在蘇聯當然是相對缺乏的。代替牠的是什麼東西，而且這種代替，依你的意見，有多少效果？牠能不能是經常的？

回答：資本主義經濟底基本推動力就是榨取利潤，這是對的。說榨取利潤不是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目的，也不是牠的推動力，這也是對的。既是這樣，那末，我們工業底推動力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首先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在我們這裏，工廠和製造廠是屬於全體人民，而不是屬於資本家的，管理工廠和製造廠的不是資本家底代理人而是工人階級底代表。覺悟到工人不是為着資本家作工而是為着自己的國家作工，為着自己本階級作工，——這種覺悟心就是我國工業發展和改善底極偉大的推動力。應當指出，在我們這裏工廠和製造廠底經理，絕大多數都是由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在商得職工會底同意以後，指派的工人擔任的，並且沒有一個經理能够違反工人們或相當工會底意志而保留自己的職位。其次應當指出，就是在每個工廠或製造廠內都有自己的工廠委員會，這委員會是由工人選舉的，是監督本工廠管理處底工作的。最後，應當指出，在每個企業內部舉行生產會議，本企業裏的全體工人都參加這種會議，工人在這種會議上審查工廠經理底全部工作，討論工廠管理處底工作計劃，指出錯誤和缺點，並有可能經過職工會，經過黨，經過蘇維埃機關開去糾正這些缺點。不難明白的，所有這些情形是根本改變了工人底地位以及企業裏的規則。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工人把工廠看

作牢獄，那末在蘇埃維制度下面，工人却已經不把工廠看作牢獄，而把他看作自己的親近的和切身的事業了，對於這種事業底發展和改善，他是非常願意的。顯然用不著證明，工人對企業的這種新的態度，工人底這種親近企業的感覺，就是我們的全部工業底最大的推動力。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由工人出身的生產技術證明家和工業組織者底人數，就一天一天增長着。

第二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我們這裏的工業收入不是用去使個人發財致富，而是用去繼續擴大工業，改良工人階級底物質的和文化的狀況，用去減低工農所都需要的工業品底價格，即是說又是用去改善勞動羣衆底物質的狀況。資本家不會把自己的收入用去提高工人階級底幸福。他是為利潤而生活的。不然他就不是資本家了。他榨取利潤，為的是要積成利鎰資本而輸出於比較不發達的，缺少資本的國家，以便榨取新的更大的利潤。資本就是這樣從美國流到中國，流到南洋羣島，流到南美洲，流到歐洲，從法國流到法屬殖民地，從英國流到英屬殖民地的。我們這裏的情形就不同了，因為我們不進行並且不承認殖民地政策。我們這裏的工業收入是留在國內，用去繼續擴張工業，用去改善工人底狀況，用去減低工業商品價格來提高國內市場底銷售能力——農民市場底銷售能力也在內，在我們這裏，百分之十的工業利潤是用去改善工人階級底生活的。在我們這裏，由國家開支的工人階級保險費等於工人所領的貨幣工資底百分之十三（每年八萬萬多盧布）。有一部份的收入（我現在不能確定說有多少）是用去供給文化上的需要，工廠參訪學校及工人休閒費的。很大部分的收入（我現在也是不能確定說有多少）是用去每年增高工人底貨幣工資的。其餘部份的工業收入是用去繼續擴張工業，用去修理舊工廠，用去建立新工廠，末了，用去減低工業商品價格的。這些情形對於我們的全部工業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一）這些情形使農業易於和工業接近，使城市與鄉村間的樹立形勢易於消滅；（二）這些情形促進國內市場，城市與鄉村的市場銷售能力底增長，這樣就替工業底繼續擴展造成不斷增長的基礎。

末了，就是這樣的情況，就是工業國有化的事實，使整個工業經濟底有

劃的經營易於進行。

我們工業底這些刺激和推動力會不會是經常的因素呢？牠們能不能成為經常有效的因素呢？是的，牠們一定會是經常有效的刺激和推動力。我們的工業將來越是發展，這些因素底力量和意義便會越加增長。

第七個問題：在那種程度裏，蘇聯可以和別國底資本主義工業合作？對於這種合作是否有一定的界限，或者這只是一種嘗試，以便弄清楚那一種合作在那一部份裏是可能的，在那一部份裏是不可能的。

回答：這裏所講的，大概是關於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方面，商業方面，也許還在外交方面的暫時的協定，我認為，兩個彼此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底存在，並不使類種協定絕對沒有可能。我認為，這樣的協定在和平發展底環境內是可能的和適當的，輸出和輸入就是這種協定底最適當的基礎。我們需要機器設備品，原料（例如棉花），半製造品（金屬的以及其他地的），而資本家却需要銷售這些貨物。這就是協定底基礎。資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糧食，而我們却需要銷售這些貨物。這就是協定底又一個基礎。我們需要信貸借款，資本家需要在這種貸款上得到好利息。這就是協定底又一個基礎，而且這是信貸方面的協定底基礎；同時，大家知道，蘇維埃的機關是最守信用的付債人。

關於外交方面也可以這樣說。我們進行着主張和平的政策並決意與各資產階級國家簽訂互不侵犯的公約。我們進行着主張和平的政策並決意簽訂關於裁軍，一直到關於完全取消常備軍的協定，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在熱那亞會議上就已經向全世界宣言了。這就是外交方面協定底基礎。

這些協定底界限呢？界限是由那彼此競爭著的與鬥爭著的兩個制度間的對立形勢所決定的。在這兩個制度所容許的範圍內，但只是在這種範圍內，協定才是完全可能的。與德國，與意大利，與日本及其他等國協定底經驗，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這些協定是否只是一種試驗，還是牠們能具有多少長久的性質呢？這不僅

是取決於我們，這還要取決於我們的對方。這是取決於一般的環境的，戰爭能够把所有的和各種的協定推翻。末了，這是取決於協約底條件的。帶束縛性的條件我們是不能接受的。我們與加里曼簽訂了關於讓他開採格魯西亞鐵礦的協定。協定期限是二十年。可見期限是不很短促的。我們還與庫拿、哥爾德非爾特公司簽訂了關於讓他開採西伯利亞金礦的協定。協定期限是三十年，——期限更長。末了，還與日本簽訂關於開採庫頁島底石油礦及煤礦的協定。

我們希望這些協定帶有多少隱固的性質。可是，這當然不僅取決於我們，而且還取決於我們的對方。

**第八個問題：俄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與資本主義國家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有什麼基本分別？**

回答：你們所說的，大概是屬於蘇聯境內那些從前被沙皇制度及俄國剝削階級所壓迫的和從前沒有自己的國家組織的民族。基本的分別就在於，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存在着民族壓迫和民族束縛，而在我們這裏，在蘇聯，這兩種東西，都根本消滅了。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除了第一等民族，特權民族，“有國家的，民族以外，同時還存在着第二等民族，“無國家的，民族，權利不全的民族，被剝奪了這種或那種權利的，首先是被剝奪了國家權利的民族。在我們蘇聯却相反，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壓迫底這一切原素，都被消滅了。我們這裏一切民族都是平權的有主權的，因為在從前佔統治地位的大俄羅斯民族底民族特權和國家特權已被消滅了。這裏所講的，當然不是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關於民族平等的宣言，無論那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和社會民主黨都發出不少。要是宣言不見於實行，那宣言有什麼價值呢？這裏所講的是消滅那些做民族壓迫底代表，創造者及實行者的階級。在以前的俄國，地主和資本家就是這樣的階級。我們推倒了這些階級，因而也就消滅了民族壓迫底可能性。正因為我們推倒了這些階級，我們這裏才有了真正民族平等的可能。在我們這裏，這就叫做主張民族自決直到分立為止的思想底實現。正因為我們實現了民族自決，所以我們才得以消除了蘇聯境內各民族勞動羣衆間彼此互不相信的心理，並把各民族根

據自願性的原則合併為一個聯盟的國家。現時存在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就是我們好民族政策底結果和蘇聯各民族自願聯合為一個聯盟國家的表現。顯然用不着證明的，就是這樣的民族政策，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不可能的，因為那裏還是由資本家們當政，而資本家就是民族壓迫政策底創造人和實行者。不能不指出這樣一件事實做例子，就是在蘇聯底最高機關內，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裏做主腦的，不一定是由俄國人充當的主席，而是六個主席，這是按照加入蘇聯的六個聯邦共和國分配的，在這六個人中間，一個是俄羅斯人（加里寧），另一個是烏克蘭人（彼特羅夫斯基），第三個是白俄羅斯人（齊爾可夫），第四個是阿塞拜彥人（莫薩別可夫），第五個是土耳其門人（愛達可夫），第六個是烏茲別克人（何扎也夫）。這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的民族政策底明顯表現之一。不消說，無論那一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無論牠是怎樣最民主的，都是不會去作這樣的步驟的。可是，由我們看來，這一個步驟却是由我們整個民族平等政策裏產生出來的一件當然的事實。

**第九個問題：**美國工人首領們以下的兩例理由來辯護他們自己與共產黨人間的鬥爭：第一個理由就是說，共產黨人在工會內進行着派別組織的鬥爭和攻擊着工會裏的那些不急進的服務人員，這樣，共產黨人就破壞着工人運動。第二個理由就是說，美國共產黨人遵照着由莫斯科發出的命令做事情，所以他們不能是優秀的工會工作者，因為他們對國外組織的忠順態度超過對自己的工會的忠順態度。怎樣來消除這種困難，以便使美國共產黨人可以與美國工人運動底其他組織進行共同的工作呢？

**回答：**我以為，美國工人領袖們企圖這樣來辯護自己反對共產黨人的鬥爭，這種企圖是經不住任何的批評的。誰都還沒有證明，而且也不能證明，說共產黨人是破壞工人運動的。可是有一點却應當認為是完全證明了的，這就是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美國也在內，都是工人運動底最忠實和最勇敢的戰士。在工人罷工和遊行示威時，共產黨人站在工人階級底前列，首先當受資本家底打擊，而改良派的工人領袖們在這時候却躲在資本家底後院子裏，這難道不是事實

嗎？共產黨員怎麼能够不批評改良派工人領袖們底這種長怯性和反動性呢？這種批評只能加強和鞏固工人運動，這難道不明顯嗎？固然，這樣的批評是要破壞反動的工人領袖們底威信的。可是，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呢？反動的工人領袖們儘可以提出反駁的批評來，但不應把共產黨人趕出於工會以外。我以為，美國工人運動，如果他想活潑並向前發展，他就不能不經過工會以內的意見上的與派別間的鬥爭。我以為，工會以內的意見上的與派別間的鬥爭，對反動首領們的批評等等，將會日益發展起來，不管改良派工人領袖們是怎樣反抗這一點。而美國工人階級却絕對需要這樣的意見上的鬥爭和這樣的批評，以便使牠能够在各種不同的派別裏選擇一個，和終於把自己變成美國社會裏的有獨立的和有組織的力量。美國改良派首領們埋怨共產黨人，這只是證明，他們不相信自己有理，不相信自己的地位底穩固。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們害怕批評如同害怕瘟疫一樣。美國工人首領們比美國很多資產者都更是堅決反對初步的民主制，這到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說美國共產黨人“遵照着由莫斯科發出來的命令”，做事情，這是完全不對的。你們在世界上一定找不到這樣的共產黨人，這種共產黨人會同意遵照外來的“命令”，做事情，而違反自己的信念，違反自己的意志，不顧環境底指示。如果在什麼地方有這樣的共產黨人，那末他們是一錢不值的。共產黨人，是最勇敢的和最察不顧身的人，他們向強有力的敵人進行鬥爭。共產黨人底價值，局部地也就在於他們善於堅持自己的信念，因此，說美國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信念而只會遵照外來的“命令”，做事情，這真是很奇怪的說法。工人首領們底話內只有一點是對的，這就是，美國共產黨人是加入共產黨人底國際組織和時常與這個組織底中心機關商量各種問題。可是這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呢？難道美國工人首領們反對組織工人的國際中心機關嗎？固然，他們是沒有加入阿姆斯特丹國際。可是他們之所以不加入到那裏去，不是因為他們反對工人的國際中心機關，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阿姆斯特丹國際是太左的組織。（代表們笑起來）。為什麼資本家可以在國際範圍內組織起來，而工人階級或工人階級底一部分，

却不應當有自己的國際組織呢？格林和他的美國勞動同盟會裏的朋友們，誤認為美國共產黨人，卑鄙下賤地重複着資本家關於所謂“由莫斯科發出來的命令”的奇談，這難道不明顯嗎？有些人以為，共產國際底委員們在莫斯科專門坐着寫命令來送給世界各國。而既然加入共產國際的，共有六十多個的共產黨，那末，共產國際底委員們原來是這樣的一些人，這些人既不睡覺，也不吃飯，而只是專門坐在那裏不分日夜地起草命令以供給這六十多個國家。（代表們笑起來）。美國工人首領們公然企圖用這種可笑的奇談來掩飾自己的害怕共產黨人的心靈，來抹煞共產黨人是美國工人階級底勇敢的和最忠實的工作人員的這件事實！

代表團問到擺脫這種狀況的出路。我想，出路只有一條：這就是容許美國工會以內的意見上的與派別間的鬥爭，拋棄把共產黨人逐出工會以外的反動政策，以便使美國工人階級有在這些派別中間自由選擇一派的可能，因為在美國還沒有發生過自己的十月革命，美國的工人還沒有在工會裏的各種不同的派別中間最後選擇一派的可能。

第十個問題：現在是不是從這裏匯錢到美國去援助美國共產黨或共產黨報紙“工人日報”，呢？如果不是，那末美國共產黨人向共產國際繳納多少金錢來作為每年的黨費呢？

回答：如果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美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間的相互關係，那末，我就應當說，美國共產黨既是共產國際底一部分，那末當然是向共產國際繳納黨費的，同樣，共產國際既然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底中心，那末在必要時，當然又給美國共產黨以可能的協助的。我以為，這裏並沒有絲毫奇怪的和例外的事情。如果這裏所講的是關於美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間的相互關係，那麼，我就應當聲明，我一次也沒有看見美國共產黨底代表來向蘇聯共產黨請求援助的事情。你們也許認為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可是這却是事實，這件事實證明美國共產黨人是太清高了。可是，如果美國共產黨來向蘇聯共產黨要求幫助，那又會怎樣呢？我以為，蘇聯共產黨一定會給美國共產黨以可能的幫助。實在

是，如果共產黨，而且是掌握行政權的共產黨，竟拒絕給別國的處在資本主義鐵蹄下的共產黨以可能的幫助，那麼牠還值得什麼呢？我敢說，這樣的共產黨是一錢不值的。假如說，美國工人階級推翻了本國的資產階級，爭得了政權；又假如說，別一國的工人階級跑來向在反資本主義的大鬥爭中取得了勝利的美國工人階級要求可能的物質上的幫助，——那時候，美國工人階級能不能拒絕這種幫助呢？我以為，如果牠不馬上斷然給以幫助，牠就會完全使自己丟臉了。

**第十一個問題：**我們知道，有些好的共產黨員並不完全同意共產黨底這樣一個要求，就是要所有的新加入的共產黨員都做無神論者，因為在現時，反動的僧侶們已被壓倒了。如果將來宗教是掩護整個科學而不對抗共產主義，那末共產黨將來能不能對宗教採取中立態度呢？如果宗教的信仰並不與對黨的忠順態度相抵觸，那末，你將來能不能允許共產黨員抱着宗教的信仰呢？

**回答：**在這個問題上有幾點不能當的地方。第一，像代表團在這裏所說的這樣的“好的共產黨員”，我是不知道有的。恐怕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共產黨員罷。第二，我應當聲明，在形式上講來，在我們這裏徵收黨員入黨的條件裏，是沒有要求候補黨員一定要做無神論者這種條件的。我們的徵收黨員的條件就是，承認黨綱和黨章，絕對服從黨底和黨機關底決議，繳納黨費，加入黨底某一個組織。

**有一個代表起來說道：**我常常讀到這樣的消息，就是有些黨員因為信仰上帝而被開除黨籍。

**斯大林說道：**我只能重複上面所講的關於徵收黨員入黨的條件，別的條件在我們這裏是沒有的。

這是不是說，黨對於宗教取中立態度呢？決不是的。我們進行着反對宗教成見的宣傳，而且將來也要進行這種宣傳。國家立法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信奉任何宗教。這乃是各人底信仰事情。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已經實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可是，我們確是實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宣佈了信教自由，

可是，我們却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利用說服方法，用宣傳和鼓動方法去反對各種宗教，反對任何宗教。黨對於宗教不能取中立態度，牠進行反宗教的宣傳以反對一切任何宗教的成見，因為牠推進科學，而宗教成見是反對科學的，因為無論那一種宗教都是與科學相反的。不久以前在美國舉辦了達爾文主義者，這種事情在我們這裏是不能有的，因為黨實行盡力擁護科學的政策。黨對宗教成見不能取中立態度，牠將進行宣傳以反對這些成見，因為這種宣傳是這樣一種可貴的手段，牠可以打破反動的僧侶界底影響，而反動的僧侶界是贊助剝削階級和勸誘人們去服從這些階級的。黨對宗教成見底代表，對於那毒害勞動羣衆底意識的反動僧侶界是不能取中立態度的。我們是不是已經壓到了反動的僧侶界呢？是已經壓到了。只是可惜地還沒有完全被消滅。反宗教的宣傳就是把反動僧侶澈底消滅的手段。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在黨員中間，有人有時候就礙儘量擴展反宗教的宣傳。如果把這樣的黨員開除，這是很好的，因為在我們黨內，不能容留這樣的“共產黨員”。

**第十二個問題：你能不能給我們簡單說明共產主義所企圖創造的那個將來的社會底情形呢？**

回答：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一般的說明，在馬克思、恩格斯及列寧底著作內已經有過。要是對於共產主義社會作簡單的解剖，那末這將是這樣的社會：（一）那裏不會有生產工具的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而只會有公共所有權，集體所有權；（二）那裏不會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只會有工業的和農業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共同聯合成為勞動者自由聯合會，共同管理經濟；（三）那裏按計劃組織起來的國民經濟，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將都是以高度技術為基礎的；（四）那裏不會有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的對立形勢；（五）那裏生產品底分配將按照當時的法國共產主義者底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六）那裏科學與藝術將得到充分順利的條件，以至於可以達到全盛的繁榮；（七）那裏每個人因為不必去煩惱口而操心，不必去奉承“世界上的強者”，所以就會成為真正自由的人。以及其他等等。顯然的，我們離這樣

的社會還遠哩。

至於為共產主義社會底完全勝利所必要的國際條件，那麼牠們是會隨着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危機及工人階級革命爆發底增長而形成和增長起來的。決不能這樣設想，以為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底工人階級將進到社會主義，尤其是進到共產主義，而別些國家底資本家却冷漠地看待這一點，袖手旁觀。更不能這樣設想，以為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會同意只做一個旁觀者來旁觀着這一個或那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勝利的發展。實際上，資本家們將採取一切為他們所能做到的辦法來撲滅這樣的國家。實際上，在這個或那個國家裏，每一個走向社會主義，尤其是走向共產主義的嚴重步驟，都必然會使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不可阻遏地發動起來，以便在這些國家裏爭取專政和社會主義。這樣一來，在國際革命向前發展底過程中將形成兩個世界中心：一個是社會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吸引那些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兩個中心為佔有世界經濟的鬥爭，將在全世界上解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底命運。因為世界資本主義最後的失敗，就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勝利。

## 二 斯大林同志底問題和代表們底回答

斯大林說道：如果代表們還不很疲倦，就請允許我也來問你們幾個問題。  
（代表團表示同意）。

第一個問題：在美國工人中間，組織在職工會裏的工人底百分數，是很小的，這是為什麼緣故呢？在美國，大概約有一千七百萬工業工人。（代表們起來說道：在美國有一千八百萬到一千九百萬工業工人）。有組織的工人大概約有三百萬。（代表們起來說道：在美國勞動同盟會內大約有三百萬有組織的工人，此外，其他的職工會內有五十萬有組織的工人，這樣，總共便有三百五十萬有組織的工人）。我個人認為，這個組織在職工會內的工人百分數，是很小的。在我們蘇聯這裏，全體無產者底百分之九十都組織在職工會內。我想問

問你們代表團，你們代表團是不是認為，在美國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數目比較少，這是一件好事實呢？你們代表團是不是認為，這個事實是證明美國無產階級底貧弱，說明牠在經濟方面與資本家作鬥爭的鬥爭武器底軟弱？

布洛非回答道：職工會底會員人數少，這並不是因為職工組織內存在著不妥當的策略，而是因為國內一般的經濟條件，這些條件不激起全體工人羣衆去加入組織，並且由於這些經濟條件底順利，甚至於還給小工人階級反資本家鬥爭底必要。這些條件當然會要改變，這些條件一改變，工會就會發展起來，而整個職工運動就會走上另一條道路。

都格拉思回答道：我同意上一個發言人底解釋。我還要補充說幾點。第一，須要注意一點，就是在美國的工資近來由資本家自己提得很高。這種增高工資的現象，在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和以後都有過。如果把現時的實際工資同一九一一年的工資比較，那就可以知道，現時的實際工資是高得多了。職工運動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起初和現在都是按照行會原則，按照職業性質組織的，而且職工會主要地都是為着熟練工人而成立起來的。站在這些工會底領導地位的，都是那些一定的首領，他們代表著閉塞的空體，只替自己的會員謀得良好的條件。他們從來沒有過要擴張職工會範圍和把不熟練工人組織在職工會裏面來的動機。此外，美國職工運動須要顧到那個組織得很好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掌握有一切用以阻礙全體工人組織在職工會內的資料。比如說，拉斯化了的生產部門，如果在自己的某一個企業內遇着職工會底太厲害的反抗，牠就甚至於採用這樣的辦法：關閉這個企業和把工作移到自己的另一個企業裏去。這樣一來，職工會底反抗力量就分散起來。美國資本主義自動增高工人底工資，可是並不給工人以任何的經濟權力，不給以可能去為改善自己的經濟生活而鬥爭。在美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資本家在各種民族底工人中間散佈民族仇視的思想。在大多數情形下，不熟練工人都是過去從歐洲來的工人，或者在最近以來，就是黑種工人。資本家極力離開各種民族底工人。這種按民族性的劃分，也按着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底標準來劃分。資本家們毫無

統地在各種民族底工人中間散佈彼此敵對的思想，而不管他們的勞動底熟練程度怎樣。最近十年來，美國資本主義進行着比較開明的政策，就是說牠建立了自己的職工會，即所謂公司協會。牠吸收工人們來參加牠自己的企業底工作，使工人們希望該企業得到利潤等等。美國資本主義現在企圖用縱線的劃分制去代替橫線的劃分制，即是企圖引誘工人階級和使工人階級希望資本主義獲得利益，這樣來分裂工人階級。

郭意爾說道：我不是從理論上而是從實際上來觀察這個問題。固然，在順利的時候是最容易組織工人的，可是問題底本質是在於，美國勞動同盟會底會員增減底統計指明，美國勞動同盟會是漸漸失去不熟練的工人而增加熟練的工人的會員。這樣一來，美國勞動同盟會是願意變成並且正在漸漸變成以熟練工人為主要成份的組織。美國的職工運動差不多沒有包括不熟練的工人。大工業部門底工人並沒有職工會的組織。在這些大工業部門裏，只有煤礦工人和鐵路工人稍許有一些組織，可是就在採礦工業，橡皮工業，汽車工業這些部門底工人，差不多完全沒有職工會的組織。可以說，職工會是沒有包括着不熟練的工人的。許多站在美國勞動同盟會以外的職工會組織，是極力想組織不熟練的工人和少熟練的工人的。至於說到美國勞動同盟會首領們底態度，那末，比方，有一個這樣的首領——五金工會底主席，就曾經完全公開地聲明說，他是不願意吸收不熟練的工人加入自己的工會的。工會領袖底地位是這樣，就是：幾十個領取很大的薪資的人，每年領得一萬元或一萬多元美金的人，組合成為一個特殊的領袖的等級，要想讓進這個特殊等級裏面去，那是非常困難的。

杜恩說道：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問題是提得不公道的，因為，要是在他的國家內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組織在職工會內，那末這是因為這裏的政權是握在工人階級手裏的，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都是被壓迫的階級，而且資產階級採用一切辦法來使工人沒有組織工會的可能。此外，那裏還有反動的職工會，由反動的首領所領導的職工會。在美國那樣的情況內，是很難使職工會

底觀念深入到工人底意識裏去的。在美國，職工會不大發展底原因，也就在這裏。

斯大林問道：最後這位說話的人，是不是同意那位在他以前說話的人底意見呢？那位在他以前說話的人是認為：美國工人運動底有些領袖們，自己就是極力誣衆小職工運動底規模。

杜恩說道：我同意。

斯大林說道：我沒有想得罪什麼人，我不過是想知道美國情形和蘇聯情形之間的差別。如果我得罪了什麼人，使他覺得難過，那就請他原諒。（各代表們都笑起來）。

杜恩說道：我一點也不覺得難過。

斯大林問道：在美國，有沒有國家替工人保險的制度？

有一位代表回答道：在美國，是沒有國家替工人保險的制度的。

郭意爾回答道：在大多數省份內，工人在生產裏受傷殘廢時，可以領取補償金，可是，補償的份額，至多也不過等於勞動能力損失底百分之三十。這是在大多數州份裏通行的制度。照法律規定，工人在某個企業內損失了勞動能力，他就應當向該企業所有人的私家商號領取補償金。

斯大林問道：在美國，有沒有由國家擔任的失業保險呢？

有一位代表回答道：是沒有的。現在籌集着的失業保險基金，把全國各州總共起來計算，也只能夠維持八萬到十萬失業工人。

郭意爾回答道：對工業裏的受傷殘廢的保險（不是國家的保險），即是對生產裏的受傷殘廢的保險是有。可是因疾病或年老而弄成殘廢的，却絲毫也得不着保險。保險基金是由工人納費籌集的。實際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全部基金都是由工人自己付出的，因為如果工人不籌集這筆基金，他們就可以領取比較多的工資，而既然這筆基金是由工人和企業主協商籌集的，所以工人就領取較少的工資。差不多所有的基金都是由工人們這樣納費籌集起來的。企業主事實上只出這些基金底很小一部份，大約是百分之十。

斯大林說道：我想，要是我告訴大家，說我們蘇聯每年由國家拿出八萬萬多盧布來做工人保險費，你們是會高興聽的。還不妨告訴大家，我們這裏所有各工業部門裏的工人，除了通常的貨幣工資以外，還可以享受保險，生活上的改善，文化上的供給等等，工人在這方面所領得的補充工資，大約等於貨幣工資底百分之三十。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在美國沒有特別的羣衆的工人的政黨？美國的資產階級有兩個黨——共和黨和民主黨，而美國的工人却沒有自己的羣衆的政黨。同志們是不是認為，沒有自己的羣衆的工人政黨，——哪怕就是像英國那樣的工人政黨（工黨），這可以減弱工人階級在與資本家作政治鬥爭中的力量？其次，為什麼美國工人運動底領袖們，格林及其他等人，堅決表示反對在美國成立工人政黨呢？

布洛菲回答道：是的，首領們會有過這樣的決定，認為沒有組織這種政黨的必要。然而有少數人，認為組織這種政黨是必要的。現時在美國的客觀條件是這樣的，就是像上面所已經說過的，美國職工運動是很薄弱的，而職工運動底薄弱又是因為工人階級暫時還沒有組織起來的需要，還沒有與資本家進行鬥爭的需要，因為資本家自己提高工人底工資和保證他們有滿意的物質生活。

斯大林說道：可是，在生活上有保證的工人，主要的都是些熟練的工人。這裏有一個矛盾。一方面，說是沒有組織的必要，因為工人的生活是有保證的；另一方面，却又說組織在職工會內的，正是那些生活方面最有保證的，即是熟練的工人；而在第三方面，那些沒有組織在職工會內的，恰好又是在生活上最少有保證的，即是不熟練的，是最需要組織的那些工人。關於這一點，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懂得。

布洛菲說道：是的，這裏是有矛盾的，可是，美國底政治方面的和經濟方面的實情也是有矛盾的。

布列普尼爾說道：雖然不熟練的工人沒有組織在職工會以內，可是他們却有政治發言權。所以，不熟練的工人如果有不滿意的意見，他們就可以利用自

己的政治發言權來表明這些意見。另一方面，加入了職工會的工人，如果遇到什麼特別困難的事情，那末，他們並不是利用職工會，而是利用政治發言權。所以，沒有職工會組織的情形，是由政治發言權來補償的。

伊索頓爾思說道：基本的困難之一就是制度本身，就是美國選舉制度本身。那裏在選舉總統時，當選的不是獲得全國底大多數選票，或甚至某一個階級底大多數選票的人。那裏每州都有選舉幹事會，每州都有一定的參加總統選舉的選舉票數。要當選為總統，一定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票數。如果有三四個政黨，那就會弄成這樣的情形，就是誰也不會當選，而選舉就應當移到議會內去。這就是用以反對成立第三個政黨的理由。反對成立第三個政黨的人提出這樣的理由：不要提出第三個候選人，因為如果你們提出第三個候選人，那你們就會分散自由黨的票數，使自由黨底候選人不能當選。

斯大林說道：可是，上議院議員拉佛列特曾經組織過資產階級的第三個政黨。這樣看來，那末事情原來是這樣：就是如果第三個政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她就不會分散選舉票，而如果她是工人的政黨，她就會分散選舉票了。

戴維思說道：我並不認為上一個發言的人所指出的原質是基本的因素。照我的意見，以下的情形才是基本的因素。我舉出我所居住的那個城市做例子。在進行選舉運動時，就有某個政黨底代表出來活動，給職工會底首領一個什麼重要職位，因為選舉運動而轉交工會首領以相當的款子，由他拿去使用，後來，他因為擔任重要職務，便得到相當的榮譽。結果弄成這樣的情形，就是職工運動底首領自己就是某個資產階級政黨方面的人。因此，自然的，當有人倡議成立第三個政黨，即成立工人政黨的時候，職工會底這些首領是絲毫不願意設法組織這樣的政黨的。而且他們還藉口說，如果成立第三個政黨，就會引起職工會內的分裂。

都格拉思說道：組織在職工會內的只是熟練的工人，這主要地是因為，要想加入職工會，須要有相當的基金和相當的保證，因為會費很大，不熟練的工人是嫌不想這樣高的入會費的。此外，不熟練的工人經常受着這樣的愚昧，就

是如果他們企圖組織起來，企業主就要開除他們的工作。不熟練的工人只有在得到熟練的工人底積極援助時才能夠組織起來。而這種援助，他們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是得不到的。這種情況，就是使不熟練的工人不能加入職工會的基本障礙之一。工人羣衆保護本身權利的基本方法，就是在政治上來保護這些權利。我認為不熟練的工人之所以沒有組織，其主要原因也就在這裏。我認為經濟基礎就是使不熟練的工人在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都沒有組織起來的基本要點。我應當指出美國選舉制度底一個特點，這就是直接選舉制：在那裏，無論什麼人都可以跑到選舉會場上去宣佈自己是民主派或共和派和投票選舉。我確信，如果羅伯思沒有這個歸於主張直接投票的論據，他就不能把工人束縛在非政治的綱領上。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向工人們說，如果工人們想去作政治活動，那末他們就可以加入現存的兩個政黨，在那裏奪取職位，在那裏取得威信。羅伯思總是利用這個口實來束縛工人，使工人們不想到組織工人階級和成立工人政黨。

**第三個問題：**為什麼在承認蘇聯的問題上，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比許多資產者還更反動些呢？為什麼像波拉先生以及其他這樣的資產者，都主張承認蘇聯，而美國工人運動底首領，從羅伯思起到格林止，却進行了而且還在繼續進行最反動的宣傳，反對承認第一個工人共和國，反對承認蘇聯？為什麼連以前的美國大總統威廉遜這樣的反動人物，都認為可以“祝賀”，蘇俄，而格林和美國勞動同盟會底其他的首領却想比資本家還更反動些？請看威廉遜底“祝賀”，原文，這是他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當德皇軍隊進攻蘇維埃的列寧格拉的時候，致給波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

“我想趁着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的機會，來代表美個人向俄國人民表示誠摯的同情，特別是在目前這個時候，目前，德國軍隊深入俄國境內，其目的是在於妨害爭取自由鬥爭，消滅這鬥爭底一切勝利品，實現德國底陰謀和束縛俄國人民。雖然美國政府現時可惜不能給俄國以他自己所願意給的那種直接的援助，可是，我還是想經過現在這次代表大會來使俄國

人民相信：美國政府是利用着一切可能來保證俄國重新得到內政上的完全自主和完全獨立，來保證俄國完全恢復她在歐洲底和現代人類底生活中的偉大作用。美國人民極強烈地同情於俄國人民底那種想永遠解脫專制制度而謀得獨立自由的志願，（請參看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號的“真理報”，第五十期）。

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們到底比反動的威爾遜更反動些的人，這是是不是常態的現象呢？

布洛非回答說：我不能確切說明這個問題，可是我認為，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們主張不承認蘇聯的原因也與美國勞動同盟會不加入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原因一樣。不同處就在於美國工人有特別的哲學，就在於在美國工人與歐洲工人之間存在有經濟上的差別。

斯大林說道：可是據我所知道的，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們並不反對承認法西斯統治着的意大利或波蘭。

布洛非說道：你指出法西斯統治的波蘭和意大利來做例子，這樣你就說明了美國不承認蘇聯的原因。這絕對蘇聯的惡感就是因為美國工人運動底首領們和美國共產黨人有很不好的關係。

杜恩說道：上一個發言的人所引述的原因，——說既然他們與本國共產黨人感情不好，他們怎麼能够承認蘇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他們還在美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就已宣傳不承認蘇聯了。基本的原因是在於，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首領們反對任何類似社會主義的東西。而資本家又在這方面懇求他們，這些資本家有一個組織，叫做“全國公民協會”，這個協會拼命想把整個美國的社會來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這個組織曾經反對愛維里底立場，因為愛維里曾經主張發展美國和蘇聯間的商業關係。這個組織底首領們曾經說過：既然自由派都開始發出這樣的主張，我們還怎麼能够維持我們工人階級裏面的秩序呢？“全國公民協會”是這樣一些資本家庭組織，這些資本家會把大批款子投在這個組織裏並且領導着這個組織。須要指出的，就是美國勞動同盟會底副

主席奧爾在這個反動的協會內擔任副主席底職務。

布洛菲說道：與工會首領底反對性有關係的那些原因，還不是基本的原因；對於這個問題須要更深一層來觀察。美國代表團來到蘇聯，這就是很好的回答，很足以表明美國一部分工人對蘇聯的同情態度。我認為，美國勞動同盟會底領袖們對於蘇聯的意見，與美國工人階級大多數底意見是沒有分別的。工人階級大多數對蘇聯的這種態度，是由於蘇聯與美國相隔太遠。美國工人階級對於無論什麼國際事情都是不肯注意的，而在對於蘇聯的態度問題上，又受了資產階級底很厲害的影響。

# 十月革命底國際性質

爲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而作

“眞理報”，第225期1927,11,6—7。

十月革命並不是單單“一國範圍內的”革命。牠首先是帶着國際性質的，帶着世界性質的革命，因爲這個革命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中山莊的資本主義世界進到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的一個根本的轉變。

過去的革命，其結果通常是由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來掌管國政。剝削者更換了，而剝削制則依然存在。在奴隸解放運動時，有過這樣的情形。在農奴暴動時，有過這樣的情形。在英、法、德各國著名的“大”革命時期，也有過這樣的情形。我現在不說巴黎公社，因爲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初次的光榮的英勇的企圖，企圖迴轉歷史來反對資本主義，但是這種企圖還是沒有成功。

十月革命在原則上與這些革命不同。牠所抱定的目的，並不是用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不是由一個剝削者集團來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而是消滅任何一種剝削人的現象，消滅所有一切剝削者集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那迄今所有一切被壓迫階級中最革命的階級底政權，組織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正因為這樣，十月革命底勝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資本主義歷史運動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全世界被剝削羣衆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是他們風俗、傳統、文化和思想上的一個根本的轉變。

十月革命是帶着國際性質的，帶着世界性質的革命，——這一點底基礎就在這裏。

世界各國底被壓迫階級對於十月革命表示深刻的同情，認為十月革命是使他們獲得解放的保證。——這一點底根源也是在這裏。

我們可以指出這樣幾個基本問題，在這幾個問題上，十月革命是影響着全世界革命運動底發展。

第一，關於十月革命，首先應當指出的，就是它打斷了世界帝國主義底戰線，在各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國家裏，推翻了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並使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掌握着政權。

被僱傭的，被驅策的，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階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地昇到了統治階級底地位，用自己的實例來感化着世界各國底無產階級。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在各帝國主義國家裏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十月革命奪取了地主和資本家庭生產工具和資料，並把這些工具和資料變成了公共的財產，這樣便把社會主義的所有權同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對立起來。這樣，她便揭破了資本家們底妄談，資本家們妄談說資產階級的所有權是不可侵犯的，神聖的，永遠不朽的。

十月革命奪取了資產階級底政權，剝奪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權利，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並把政權交給了蘇維埃，這樣便把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來同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度（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對立起來了。拉法格還在一八八七年就說過：在革命以後第一天，“所有從前的資本家都將被褫奪選舉權”，他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這樣，十月革命便揭破了

社會民主黨人底妄談，社會民主黨人妄說現在有經過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度而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

但是十月革命不會停留而且也不會能停留在這一點上。十月革命破壞了舊有的，資產階級的制度以後，就已經着手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十月革命底十年，就是黨，職工會，蘇維埃，合作社，文化組織，運輸業，工業和紅軍底建設事業的十年。蘇聯社會主義在建設戰線上的無疑義的成績，已經顯然地表明了：無產階級能够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很有成效地管理國家；能够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很有成效地建設工業；能够不要資產階級和反對着資產階級，來很有成效地領導全部的國民經濟，能够不顧資本主義的包圍，而很有成效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一種舊的“理論”，說被壓迫者非有弱弱者不行，如同服裝和身體上的其他部份非有胃部不行一樣，這種“理論”，不僅是古代史上有名的羅馬元老梅萊尼、阿格里波底心得。現在這種“理論”，一般地是社會民主黨政治“哲學”，底基礎，尤其是社會民主黨聯合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這種政策底基礎。這種已帶有成見性質的“理論”，現在是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走上革命化這條道路上的最厲害的障礙之一。十月革命給了這種虛妄的“理論”，以致命的打擊，這件事實，就是十月革命底極重要的結果之一。

十月革命這些結果和與此類似的結果，曾經不得不而且現在還不能不大大影響到各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人階級底革命運動，這一點還要證明嗎？

資本主義各國裏的共產主義日益發展着，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對蘇聯工人階級的同情日益增長，工人代表團或羣結隊地來參觀蘇維埃國家，——這些人人皆知的事實，無誤義地證明十月革命所散播的種子，已經在開始出產果實了。

第二，十月革命不僅在帝國主義底統治中心，不僅在“宗主國”，裏動搖了帝國主義。十月革命還打擊了帝國主義底後方，帝國主義底周圍地帶，因為牠搃動了帝國主義在各殖民地和附屬國中的統治。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這樣就打破了民族壓迫和殖民地壓迫的鎖

予，使一個龐大國家中各被壓迫民族一概擺脫了這種壓迫。無產階級如果不解放被壓迫民族，便不能解放自己。十月革命在蘇聯實行了民族的殖民地革命，不是在民族仇視和國際搆突旗幟下實行的，而是在蘇聯各民族中工農互相信任和友誼聯合旗幟下實行的，不是為着民族主義的名義實行的，而是為着國際主義的名義實行的，——這件事實，就是十月革命是一個特點。

正因為民族的和殖民地的革命在我們這裏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在國際主義底旗幟下進行的，所以被蔑視的民族，被看作奴隸的民族第一遭地在人類歷史上到了真正自由的和真正平等的民族底地位，這樣，牠們就用自己的實例來感化了全世界底被壓迫民族。

這就是說，十月革命展開了一個新時代，殖民地革命底時代，而這種殖民地革命，在世界各被壓迫國家裏，是在與無產階級聯盟中，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的。

從前“照例總是”，認為：自古以來，世界就分成了下等的和高等的部族，分成了黑色人種和白色人種，這兩種人種中，第一種人種是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而只有淪為剝削對象的命運，而第二種人種却是文明的唯一的代表人物，負有剝削第一種人種的使命。現在可以說這種奇談已被打碎，已被拋開了。十月革命給了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為她在實際上證明了已被解放的，已被吸引到蘇維埃發展軌道上來的非歐洲的民族，是能够推進真正先進的文化和真正先進的文明，絲毫不比歐洲民族壞些，——這件事實是十月革命底極重要的結果之一。

從前“照例總是”，認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方法，民族彼此脫離底方法，民族分開底方法，加強各民族勞動羣衆間民族仇視底方法，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唯一方法，現在應該認為這種奇談已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給了這種奇談以致命的打擊，因為她在實際上表明了無產階級的和國際主義的解放被壓迫民族的方法，是唯一正確的方法；實際證明了這個方法是可能的而且適當的；因為她在實際上表明了，在自願性和國際主義基礎上，各個極不相同的民族的工農

們建立親愛的聯盟，是可能的而且必需的——這種事實，是十月革命底極重要結果之一。

蘇維埃社會主義和國際體，是世界各國勞動者將來在統一的世界經濟中聯合底重要物標，這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底存在，不能不成為上述這一點底直接證明。

十月革命底這些結果和與此類似地結果，曾經不得不而且現在還不能不大地影響殖民地和附屬國裏的革命運動，這是不待說的。在中國，南洋羣島，印度等等國家裏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底發展，這些民族對蘇聯的同情日益增長，——這些事實無疑地證明上述這一點。

平安無事地剝削和壓迫殖民地及附屬國底紀元，已經過去了。

殖民地和附屬國裏的解放革命底紀元，這些國家裏的無產階級覺醒底紀元，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底紀元，已經到來了。

第三，十月革命既然把革命底種子散播到了帝國主義底中心和後方，既然滅弱了帝國主義在“宗主國”的力量並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統治，這樣，她便使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存在本身成了問題。

如果在帝國主義底條件下，因資本主義底不平衡性，因相互衝突和武裝挑撥底不可避免，最後因空前的帝國主義的屠殺，致使資本主義自發的發展，已過渡成熟而達到了資本主義“腐化”，和“死亡”，底過程，那末，十月革命和一個極大的國家因十月革命而脫離了資本主義底世界系統，便不能不加速這種過程，而一步一步地破壞世界帝國主義底基礎本身。

而且，十月革命不僅是動搖了帝國主義，牠同時還建立了世界革命運動底強大的和公開的基礎，——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世界革命運動從前不會有這個基礎，現在牠却可依靠着這個基礎。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革命運動底這樣一個強大的和公開的中心，世界革命運動從前不會有這種中心，而現在牠却可以在這個中心周圍團結起來，組織全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人民底統一革命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

這首先就是說，十月革命使世界資本主義受了一個致命傷，這是世界資本主義永遠再不能治好的致命傷。正因為這樣，所以資本主義永遠不能恢復十月革命以前牠所具有的那種“平衡”，和“穩固”，了。資本主義可以局部地穩定，牠可以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他可以把國家管理事業交給法西主義去辦，可以暫時壓制工人階級，但是牠永遠也不能恢復牠從社會引為自豪的那種“安靜，，，那種“確信，，，那種“平衡，，，和那種“穩固，，，了，因為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這時候，革命底火燄時而在帝國主義底中心，時而在帝國主義底周圍地帶，必然地要爆發起來，使資本主義的彌補方法，一概無效，使資本主義底死期日益迫近。有名的寓言說得好：“‘抽出了尾巴，又掛上鼻子，抽出了鼻子，又掛上尾巴，，，現今資本主義的情形，剛好就是這個樣子。

其次，這就是說，十月革命把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底力量和比重，勇氣和戰鬥決心提高到了相當的高度，逼得統治階級不能不感到被壓迫階級——這個新的重要因素。現在已經不能把世界勞動羣衆看作徘徊於黑暗鄉和沒有前途的“盲目入衆，，，了，因為十月革命為他們建立了燈塔，為他們照出道路和給他們指出前途。如果從前沒有全世界的公開的集議場可以表示和定明被壓迫階級底希望和希圖，那末，現在却已經有這種集議場了，——這就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如果這個集議場一消滅，則急遽的黑暗的反動勢力，就要長期地籠罩着“先進各國，底社會的和政治的生活，——這差不多是不能懷疑的。甚至單是“布爾塞維克國家，存在的這一件事實，就足以阻礙反動的黑暗勢力，使該壓迫階級謀自己的解放鬥爭易於進行，這是不能否認的。全世界各國庭剝削者所以這樣肆行般地怨恨布爾塞維克，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歷史正在重複着，不過是在新的基礎上重複着罷了。從前在封建“中衰落時期，“鄂可賓黨人，，這幾個字，會引起全世界各類貴族們底驚恐和憎惡，現今在“一·戰”時期，“布爾塞維克，，這幾個字，正同樣地引起資產階級國家底驚恐和憎惡。反過來說，從前巴黎曾是蒸蒸日上的資產階級底革命的代表們底避難所和學校，

現在莫斯科是蒸氣日上的無產階級革命代表們底辦事所和學校。怨恨雅可賓斯基人，這不會挽救封建的支庶滅亡。怨恨布爾奇維克，這也不能挽救資本主義底粉飾，這還能叫復辟嗎？

資本主義“穩固”，底紀元，已隨身帶着那種說什麼資產階級制度率不可破的苟談而一去不返了。

資本主義復亡底紀元，已經到來了。

第四，十月革命不僅是經濟關係和社會政治關係上的革命。十月革命同時又是智慧中的革命，是工人思想中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在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底旗幟下，在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下誕生和強健起來的。因此十月革命表明馬克思主義戰勝改良主義，表明列寧主義戰勝社會民主主義，表明第三國際戰勝第二國際。

十月革命，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在列寧主義政策與社會民主主義政策之間，擱下了一個不可越過的鴻溝。從前，在無產階級專政未獲得勝利以前，社會民主黨還不公開地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思想，可是，絲毫沒有設法，絕對沒有設法去促進這種思想底實現，社會民主黨當時還能够這樣拿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來裝飾門面，因為社會民主黨底這種行為，並沒有為資本主義造成任何的危險。當時，在那個時期，社會民主黨在形式上還與馬克思主義匯成一氣或者差不多匯成一氣。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獲得勝利以後，大家都已顯然地看見：馬克思主義所引導的方向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底勝利能表明什麼，在這個時候，社會民主黨已經不能拿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來裝飾門面了，已經不能向無產階級專政思想表示媚態了，因為這會給資本主義造成相當的危險。社會民主黨早已和馬克思主義底精神決裂，結果竟不能不與馬克思主義底旗幟也實行決裂，而公開和決然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底虛兒，反對十月革命，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現在社會民主黨不能不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而且實實在在地和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了，因為在現時的條件之下，不去公

開始和忠誠地擁護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不進行革命鬥爭反對本國資產階級，不去造成本國無產階級專政還得勝利的條件，即不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已經產生一條鴻溝。從那時起，列寧主義，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唯一<sup>的</sup>代表和統領者。

但是事情並不限於這一點。十月革命使社會民主黨與馬克思主義分開以後，還往往錯進了，就是說還把社會民主黨拋到那些反對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直接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底營壘中去了。當阿德列爾，鮑威爾，威爾斯，列維，龍格，布留諾這些先生們談論“蘇維埃制度”，誇獎議會的“民主制”時，他們這樣就是要表示：他們現在是進行鬥鬥爭，而且將來還要進行鬥爭，爲着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制度，爲着要在“文明”，國家保存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現在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底思想上的支柱。列寧曾經說得萬分正確，他說現在的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資本家階級底工人僕僕”，“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裏”，他們必然要跑到“凡爾賽派方面去反對巴黎公社社員”，“不消滅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便沒有可能來消滅資本主義”。因此資本主義死亡底紀元，同時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中死亡底紀元。十月革命底偉大意義，局部地也就在於，十月革命表明列寧主義必然戰勝世界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主義。

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工人運動裏統治底紀元，已經完結了。

列寧主義和第三國際統治底紀元，已經到來了。

## 糧食戰線上的問題

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紅色教授學校，  
共產主義學院以及斯維德洛夫大學  
學生們談話底一部份。

問題：那一點要算是我們糧食事業困難中的基本困難呢？逃出這些困難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既然有這些困難，那末，對於我們一般工業發展底速度方面，特別是從輕工業與重工業間的對比關係上看來，應當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回答：初看起來，也許覺得我們的糧食困難是偶然的現象，只是因為計劃工作底不好，只是因為經濟計算工作有了許多錯誤。可是，只是初看起來才可以覺得是這樣。實際上，困難底原因在這裏是更深刻得多的。至於計劃工作底不好和經濟計算底錯誤在這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可是拿不好的計劃工作與偶然的錯誤來解釋一切困難，——就是落於極端嚴重的錯誤。過於看小計劃工作底作用與意義，那是錯誤的。可是過於將大計劃原則底作用，以為我們已達到了這樣的發展程度以至於可以計劃與調節任何的和所有的東西，那就是更大的錯誤了。不要忘記，在我們的國民經濟底成份內，除了服從於我們的計劃影響的那些成份之外，還有其他的暫時不服從於計劃工作的成份，最後，還有些敵視我們的階級，要克服這些階級，單是

用蘇聯計劃局的計劃工作手續，那是做不到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以為，不能把一切都歸結為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為計劃工作底錯誤等等。

那末，我們在糧食戰線上的困難底基礎在那裏呢？

我們的糧食困難底基礎就在於，在我們這裏，商品糧食生產底增長是比糧食需要量底增長慢些。工業是在增長着。工人數量是在增長着。城市是在增長着。來了，工藝原料（棉，麻，糖蘿蔔等等）生產區域——需要商品糧食的區域，是在增長着。所有這些情形，就使糧食底需求，商品糧食底需求迅速增長起來。而商品糧食生產底增長却慢得要命。不能說，我們國家在今年採辦得來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些。反之，我們國家今年所採辦得來的糧食比過去幾年多得多。可是現在我們還是遇到糧食的困難。請看幾個數字。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度，我們到四月號止已採辦了四萬三千四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二千三百萬普特。所以，採辦到的糧食在國內剩下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度，我們到四月一號止採辦了五萬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萬五千三百萬普特。在國內還剩下四萬四千三百萬普特。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度，我們到四月一號止採辦了五萬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萬普特。在國內還剩下五萬四千九百萬普特。換一句話說，我們今年到四月一號止，已經採辦來供國內需要的，是比去年多一萬萬普特，比前年多二萬三千萬普特。可是，我們今年，在糧食戰線上，還是有困難。

我在自己的有一個報告裏面已經說過，這些困難曾被鄉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首先是曾被富農利用來破壞蘇維埃的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採取了好些辦法來消滅富農底反蘇維埃的發動。因此關於這點我這裏不來多講；這裏我所注重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商品糧食生產之所以增長得緩慢的原因問題。就是關於，雖然我們的耕種面積和糧食總出產量已經達到了較前的程度，而我們這裏的商品糧食底生產量還是比糧食底需要量增長得慢些的問題。

真的是，我們的耕種面積已經迷到了戰前的程度，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是事實。糧食出產總量在去年就已經等於戰前的生產標準，就是說，達到了五十萬萬普特糧食，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是事實。既然如此，那末為什麼雖有這些情況而我們所生產的商品糧食却比在戰前的時候少一倍，而輸出國外的糧食却差不多比在戰前的時候少十九倍呢？這裏首先的和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十月革命底結果，我們的農業底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就是因為我們的農業已由那些出產商品糧食極多的，大規模地主經濟和大規模富農經濟，過渡到了我們現在這些出產商品糧食極少的，小農的和中農的經濟。在大戰以前，我們曾有一千五百萬到一千六百萬個農戶，而現在我們却有二千四百萬到二千五百萬個農戶，單單是這一點已經證明，我們的農業底主要基礎，就是出產最小限度商品糧食的小農莊。農業上大規模的農莊，無論牠是地主的，富農的，或者是集體的，牠的強有力的地方就在於，牠有可能來使用機器，利用科學底成績，施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並因此而產出最多數量的商品糧食。反過來，小規模的農莊底軟弱的地方就在於，牠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這些可能性，因此牠也就是半消費的經濟，少帶商品性的農業。比方，拿集體農莊和蘇聯農莊來講。牠們出產的商品糧食，等於自己的總生產量百分之四七點二。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比在戰前時候的地主經濟所出產的還多些。而小農的和中農的經濟呢？牠們所出產的商品糧食却只等於自己的總生產量底百分之十一點二。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大的。

請看幾個數目字，這些數目字可以說明過去的大戰以前的與現在的十月革命以後的糧食生產底結構情形。這些數目字，是中央統計局幹事會的幹事員赫蒙齊諾夫同志製定的。這些數目字，好像赫蒙齊諾夫同志在自己的說明書裏所附帶聲明的那樣，並不能說是完全精確的，——牠們只是使人有可能來作大約的核算。可是這些數目字完全足以使人明白，從一般的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特別是商品糧食生產底結構上看來，在大戰以前與十月革命以後，是有多大的差別。

大戰以前：

糧食總生產量			商品糧食 (運出鄉村以外的)		
	以百萬普特 為單位	百分數	以百萬普特 為單位	百分數	商品額度 百分數
1.地主	600	12.0	281.6	21.6	47
2.富農	1,900	38.0	650.0	50.0	34
3.中農和 貧農	2,500	50.0	369.0	28.4	14.7
總計	5,000	100	1,300.6	100	26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

糧食總生產量			商品糧食 (運出鄉村以外的)		
	以百萬普特 為單位	百分數	以百萬普特 為單位	百分數	商品額度 百分數
1.蘇維埃 農莊和集體農莊	80.0	1.7	37.8	6.0	47.2
2.富農	617.0	13.0	126.0	20.0	20.0
3.中農和 貧農	4,052.0	85.3	466.2	74.0	11.2
總計	4,749.0	100	630.0	100	13.3

這個統計表是證明什麼呢？

第一，牠是說明，絕大部分浪食品底生產，是從地主和富農方面過渡到了小農和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和中農，因完全解脫了地主的壓迫和在基本上削弱了富農底勢力，於是就得到了最切實地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的可能。這是十月革命底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那裏所取得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品，首先就表現在這裏。

第二，牠是說明，在我們這裏，商品糧食底基本所有人，就是小農，首先就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從糧食總生產量看來，而且從商品糧食底生產上看來，蘇聯由於十月革命底結果，已變成了小農經濟底國家，而中農則變成農業底“中心人物”，了。

第三，牠是說明，地主的（大規模的）農業已經消滅，富農的（大規模的）農業縮減了三倍多，由大規模的農業過渡到那只出產百分之十一的商品額的小農民的農業，同時在該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多少發達的大規模的公共的農業（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情形本來應當弄到，而且真的已經弄到了商品糧食底生產比大戰以前的時候有劇烈的減少。雖然我們現在的糧食總出產量是與大戰以前的標準一樣，而我們現在所有的商品糧食，却比大戰以前少一倍，這是事實。

我們在糧食戰線上的困難底基礎就在這裏。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不能認為我們食糧採購事業上的困難是簡單的偶然現象。

無疑義的，下面這一個情形，在這裏也是起了相當的壞作用，這個情形就是：我們的商業機關，曾經擔任了一個為牠們所不必擔任的，給許多小城市和中等城市供給糧食的義務，這在相當程度上曾經不能不減少國底糧食儲存。可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就是我們糧食戰線上的困難底基礎，並不是這種情形，而是下面這一個事實，就是我們的農業底商品額增長得很遲慢，而同時商品糧食底需要却增長得很迅速。

出路在那裏呢？

有人認為，出路就在於恢復富農的農業，在於發展和擴展富農的農業。這些人不敢說要回到地主的農業，因為大概他們知道，在現在這個時候來談論這樣的事情，是很危險的。可是，他們却更高興說什麼有必要來盡力發展富農的農業以謀……蘇維埃政權底利益。這些人認為，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倚靠着兩個相反的階級，——倚靠以剝削工人階級為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同時又倚靠以消滅任何剝削為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只有反動派才表演得出來的把戲。值不得證明，這些反動的“計劃”，是與工人階級底利益，與馬克思主義底原則，與列寧主義底任務，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有人說，富農並不“劣於”，城市資本家，富農底危險絕不比城市耐溫曼底危險還大些，因此我們現在用不着“害怕”，富農，——這種說法完全是自由派的廢話，是用來催眠工人階級及基本農民羣衆底警惕性的。不要忘記，在工業方面，我們可以拿出產全部工業商品底十分之九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來對抗城市小資本家，可是在農村生產方面，我們可以拿來與農村裏的大規模的富農生產對抗的，不過是那些還沒有強固的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所生產的糧食要比全體富農農莊所生產的糧食少七倍。不懂得大規模的富農農莊在農村中的意義，不懂得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是比資本家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高百倍，——這就是神經錯亂，與列寧主義斷絕關係，跑到工人階級底敵人方面去。

那末，出路到底在那裏呢？

首先，出路就在於，由小規模的、落後的和散漫的農民的農莊過渡到聯合的、大規模的、公共的農莊，用機器來供給的，用科學成績武裝起來的，能够生產最多的商品糧食的公共的農莊。出路就在於，在農業方面，由個人的農民的農業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的農業。

列寧在十月革命底前幾天裏就已經號召我們的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個時候起，在我們黨內，集體農莊思想的宣傳，總是沒有停止過。然而，組織集體農莊的號召只是近來才得到大規模的響應。這種影響首先是因為，農村中

合作運動廣泛發展，在農民心理上已準備了一個轉變趨向於集體農莊的，而現有的許多集體農莊，現在就已經得到每頭耕牛產一百五十到兩百普特的收成，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商品額；這種情形又很厲害地吸引着貧農和下層中農去組織集體農莊。這有一個情形在這裏也有不小的意義，這就是我們的國家只是在最近以來才得到了大大資助集體農莊運動的可能。大家知道，今年國家已支出去幫助集體農莊的款子比去年多一倍（在六千萬盧布以上）。黨底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曾經認為大規模的集體農莊運動所需要的條件已經成熟，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國內糧食生產底商品額的最重大的方法之一，——這是完全正確的。

根據中央統計局底統計材料，集體農莊在一九二七年的糧食總出產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一般的平均商品額是百分之三十。在今年初期發生的成立新集體農莊和擴大舊集體農莊的廣闊的浪潮，應當使集體農莊底糧食生產量到年底的時候有很大的增加。任務就在於，保持集體農莊運動發展的現時的速度，擴大集體農莊底範圍，取消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用真正的集體農莊來代替牠們，並規定這樣的規則，就是要集體農莊把自己的全部商品糧食都交給國家和合作社機關，不然就得不著國家的津貼和貸款。我想，只要是遵守這些條件，那我們就能夠做到這一步。就是：經過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夠從集體農莊方面得到四五千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與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這些人大概是認為，集體農莊是一個東西，而合作社却是另一個東西。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還把集體農莊與列寧底合作制計劃對立起來。不消說，這樣的對立是絲毫不符眞情的。實際上，集體農莊是合作社底一種，是生產合作社底最明顯的一種。有銷售合作社，有供給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一般地是合作社運動底分不開的一部分，局部地是列寧的合作制計劃底分不開的一部分。實行列寧的合作制計劃——這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集體農莊的合作社。局部地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才有下面這

樣的事實，就是：在我們這裏，我們農莊只是由於錯巧合作社和供給合作社擴展和加強的結果才開始產生和發展起來。

第二，道路實在於，擴大在當前的合作經營農莊，組織和發展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莊。根據中央火燒瓦斯局統計，現有蘇維埃農莊成績食糧出產量，在一九二七年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商品糧佔百分之六十五。無疑義的，如果蘇維埃農莊得到國家方面的相當的幫助，他們就可以大大地提高糧食生產。可是任務不只是限於這一點。蘇維埃政權已經通過一個決議，規定在那些沒有農民份地的區域內組織新的大規模的蘇維埃農莊（每個農莊有一萬到三萬俄畝），這些農莊，經過五六年後，應當創造大約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組織這些蘇維埃農莊的工作，已在着手進行。任務就在於，無論如何要實現蘇維埃政權底這個決議。我想，只要執行這些任務，我們就能夠做到這一步，就是：經過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够在新的和舊的蘇維埃農莊方面得到八千萬至一萬萬普特的商品糧食。

第三，最後，出路就在於，有系統地提高小的和中等的個人農民經濟底收成額。我們不可以而且不應當幫助大的個人富農經濟。可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幫助小的和中等的個人農民經濟，提高牠的收成，把牠引上合作組織底軌道。這個任務是難的，還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糧食徵收制的時候就已把牠提倡得特別厲害。這個任務，由我們的黨在十四次和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批准了。現在因為在糧食戰線上發生困難，這個任務底重要性便更加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執行這個任務，正如堅決地執行頭兩個任務——關於集體農莊的任務和關於蘇維埃農莊的任務——一樣。

所有的材料都是證明，農民經濟底收成額，可以在幾年以內增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現時在我們這裏使用的木犁，不下五百萬。只要一用鐵犁去代替這些木犁，就可以使我國的糧食生產有極大的增長。更不必說用某種最少限度的肥料，乾淨的種子，小號的機器等等去供給農民經濟。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與整批農村和村落訂立條約，規定供給牠們以種子及其他等等，同時一定

要從他們方面得到相當數量的糧食品，——這個方法是提高農民經濟收成額和吸收農民加入合作制的最好的方法。我想，只要是在這方面認真進行工作，那末，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就可以從小的和中等的個人農民經濟方面得到不下於一萬萬普特的新有的商品糧食。

這樣一來，只要是執行這一切任務，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就可以得到二萬萬到二萬五千萬普特的新有的商品糧食，這就多少足以使我們在國內和國外都能夠實行應有的調節辦法。

為選出糧食戰線上的困難所必要的辦法，大體上就是這樣。

除這些基本辦法以外，還採用一些臨時辦法以改善在把商品供給農村這方面的計劃工作，並且叫我們的商業機關不要再擔任許多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底糧食供給任務，——這就是現時的任務。

除了這些辦法以外，是不是還要採取許多別的辦法，譬如說，既然工業增長使得對於糧食的需要，迅速增長着，使得牠暫時還超過商品糧食生產增長底速度，那末，在這裏是不是還要採用弄慢工業發展速度的辦法呢？是不對的。無論如何都不要！弄慢工業發展底速度，這是削弱工人階級底勢力，因為工業發展上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的輕工廠和重工廠，依列寧底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底“新要塞”，足以加強他在與小資產階級底自發勢力的鬥爭中，與我國經濟內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中的陣地。恰巧相反，我們應當保持工業發展底現時的速度，我們應當儘可能地更加發展這個速度，以便把大批商品輸到農村，而從那裏多多收取糧食，以便把機器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以便使農業工業化並提高農業生產底商品額。

也許，為着多多少少“慎重”，起見而應當阻撓重工業底發展，以便把那個主要是為農民市集而生產的輕工業變成我們的工業底基礎吧？無論如何也是不應當的！這是自殺政策，這是要破壞我們的全部工業，輕工業也在其內。這就是離開我國工業化底口號，把我國變為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底附屬品。我們在這裏所依據的出發點就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所發表的著名的訓

等的原理，這些原理是我們全黨所絕對應該遵守的。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上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罷：

“爲要挽救俄國，就不僅是需要農民經濟底好收成，——這還不够，——也不僅是需要那替農民供給消費品的輕工業底好情況，——這也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重工業，，。

或者還請看這樣的話：

“我們節省一切用費，連小學校底費用也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爲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會根本喪失自己這個獨立國家底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九頁）。

列寧底這些指示是不可忘記的。

既然採用上面所指出的那些辦法，那末工農聯盟又將怎麼樣呢？我認，這些辦法只能使鞏固工農聯盟的事業易於進行。的確是，如果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將以加大的速度發展起來；如果由於直接幫助小農和中農的結果，他們的農莊底收成額將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將包括日益廣大的農民羣衆，如果國家又得到幾萬萬普特新的商品糧食，以供給調節辦法底需要；如果由於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底結果，富農將受到抑制而漸漸被征服，——那末在工農聯盟以內的工農間的矛盾將因此而日益消滅下去，糧食採購方面的非常手段，將沒有採用的必要，廣大的農民羣衆將日益轉向集體形式的農莊，而爲征服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將日益帶有羣衆的和有組織的性質，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工農聯盟底事業從這種辦法裏只能得到好處，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只是要注意一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平常的聯盟。這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底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聯盟，這種聯盟底目的就是：（一）加強工人階級底陣地，（二）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以內的領導作用，（三）消滅階級與消除階級社會。凡對於工農聯盟作另外的瞭解，那就是機會主義，孟塞維主義，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做什麼都可

以，不過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過不是列寧主義。

怎樣可以使工農聯盟底思想與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這個著名原理彼此相容呢？這裏沒有矛盾嗎？這裏的矛盾，不過是表面的，似是而非的。實際上，在這裏並沒有絲毫矛盾。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裏曾經把農民說成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同是在這個報告裏，他又再三說明工農聯盟底必要，他說，“專政底最高原則——這就是根據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以便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顯然的，無論如何，列寧不認為這裏有絲毫矛盾。

列寧說：農民是“最後的資本主義階級”，對於這個原理，應當怎樣來解釋呢？這不是說農民是由資本家組成的嗎？不，不是的，這是說，第一，農民是一個特別的階級，牠把自己的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權基礎上，因此，牠與無產階級不同。因為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公有權基礎上的。這是說，第二，農民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在自己隊伍中分化出，產生着和培養着資本家、富農以及一般的各種各樣的剝削者。

這種情形不是擺在工農聯盟組織事業面前的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嗎？不，不是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並不是與全體農民的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就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的聯盟。不與農民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不與富農作鬥爭，這樣的聯盟是不能實現的。不組織貧農——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這樣的聯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現在的條件之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底下面的一個著名的口號之下方能實現，這個口號就是：去倚靠貧農，去與中農成立堅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鬥爭。因為只有實行這個口號，才能把農民基本羣衆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底軌道上來。

這樣一來，你們就可以看到，列寧底兩個公式間的矛盾，不過是思想中的似是而非的矛盾。實際上，在他們中間，是沒有絲毫矛盾的。



## 列寧和關於與中農聯盟問題

給同志的回信

S同志！

把列寧在他的那篇關於蘇洛辦的著名論文裏所提出的一個口號——“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著貧農”，看作是“貧農委員會時期”，底口號，看作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期”，底口號，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貧農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我們在鄉村中的勢力已超過富農，中農已經轉向蘇維埃政府方面。在這個轉向底基礎上也就產生了中央委員會底決議，決定取消蘇維埃與貧農委員會這兩個政權並存制，決定改選蘇維埃和村蘇維埃，決定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內。因而就是決定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這個決議在蘇維埃方面的規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上號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我這裏所說的就是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號所通過的那個關於改選蘇維埃和村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溶化在蘇維埃內的決議案。而列寧在自己的那篇標題為“蘇洛辦底實質的自供”的論文裏，宣布了與中農協定的口號以代替中立中農的口號，這篇文章是在

本文內容，略有刪減，——斯大林註。

什麼時談發表的呢？她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號發表的，就是說，差不多是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這個決議案以後兩星期的時候才發表的。列寧在這篇論文內簡直說道：我們之所以採取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因為中農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了。請看列寧底話：

“在鄉村裏，我們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打破剝削者和富農投機家庭反抗；為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堅固地倚靠半無產者，倚靠‘貧農’，可是中農不是我們的敵人。他過去動搖過，現在動搖着，將來還會動搖：影響動搖者的任務與推倒剝削者及擊潰積極敵人的任務並不是一樣的。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這是現時的任務，因為正是現在，由於上述的原因，中農轉向到我們這方面來乃是必不可少的事情★，（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九四頁）從這裏就要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裏得出的論結就是，列寧底口號不是關係於舊時期，不是關係於獨立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而是關係於新時期，與中農協定的時期。這樣一來，他所反映的就不是舊時期底末尾，而是新時期底初頭。

可是，你關於列寧口號的那種斷言，不僅是在形式上不對，不僅是在年月方面不對，而且在實質上也不對。大家知道，列寧底這個與中農協定的口號，這個新口號，在我們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已成為全黨宣佈的口號。大家知道，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就是這樣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給我們與中農作堅固聯盟的政策奠定了基礎。大家知道，我們的黨綱，蘇聯共產黨底黨綱，也是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的。大家知道，這個黨綱內，有幾項是專門關於黨對鄉村裏各個集團的態度；對貧農，對中農，對富農的態度的。在聯共黨底這幾項內，關於鄉村中的各個社會集團，關於黨對他們的態度，說了一些什麼話呢？請聽罷：

“蘇聯共產黨，在自己的整個農村工作裏，照舊還是倚靠着農村裏的

★注意點都是我加的一—斯大林註。

無產階級的和半無產階級的力量，首先就要把他們組織為獨立的力量。在農村裏成立黨的支部，成立貧農組織，成立農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底特別式樣的職工會等等，竭力使他們與城市無產階級接近，竭力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財產利益底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富農階級，對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是堅決反對他們的剝削者的企圖，鎮壓他們對於蘇維埃政策的反抗。

俄國共產黨對中農的政策就是漸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他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工作。黨底任務就是使中農離開富農，仔細關心他的需要，這樣來把他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上影響的辦法，而絕對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與他的落後思想鬥爭，在一切與他的切身利益有關係的地方，都要努力與他作切實的協定，在決定關於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的時候，向他讓步，★（請參看“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五一頁）。

請你試一試，來在黨底這幾項條文與列寧底口號之間找出即使是最小的，即使是最微小的分別罷！你是找不出這樣的分別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這種分別。而且，絲毫不可懷疑的，就是列寧底口號不僅與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不相矛盾，而且反而是這些決議底最精確的和最妥當的措辭。須知事實是這樣，就是聯共黨綱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在我們黨底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底那篇反對蘇洛博的論文，那篇宣佈了與中農協定的口號的論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報章上發表的，是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四個月發表的。

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完全全肯定了列寧在他那篇為反對蘇洛博而作的論文內所宣佈了的口號，認為這是黨在整個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在自己的農村工作裏所應該拿來當作指南的一個口號，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事嗎？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旨為什麼地方呢？

★注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列寧這個口號底要旨就是，他極其正確地找到了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這個任務表現在下面這樣的一個簡短的公式裏：（一）去倚靠貧農，（二）去與中農成立協定；（三）一分鐘也不要停止與富農的鬥爭。請試一試，從這個公式內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來作現今農村工作底基礎，而忘記他的其餘的部分，——那時候你就一定要弄到走途無路的地步。在現今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底條件下面，不倚靠貧農和不與富農進行鬥爭，最不是可以和中農建立真正的和堅固的協定呢？是不可以的。在現今發展底條件下面，不倚靠貧農和不與中農成立協定，是不是可以與富農作有成效的鬥爭呢？是不可以的。怎樣去數中肯地把黨的農村工作底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有一個續續的口號裏表現出來呢？我想，列寧底口號是這個任務底最中肯的表現。應當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中肯些。

為什麼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底現今條件下面必須着重指出列寧這個口號底妥當性呢？

因為，正是在現在，可以看見個別同志有這樣的傾向：就是想把黨的農村工作底三位一體的任務撕成幾部分和把這些部分弄得彼此脫離。這一情形已由今年一二月間我們的糧食採購運動底實際工作所完全證實了。應當與中農成立協定——這是所有的布爾塞維克都知道的。可是要怎樣成立這個協定呢——這就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拒絕與富農的鬥爭或是減弱這種鬥爭的辦法來成立與中農的協定；據他們說，與富農的鬥爭可以嚇去一部分中農，動那部分豐裕的中農。另外有些人想用拒絕組織貧農的工作或者減弱這種工作的辦法來成立與中農的協定；據他們說：組織貧農的工作弄得使貧農獨處一幟，這樣，就可以把中農從我們這裏嚇開。這樣離開正確路線的結果，就弄得忘記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就是忘記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忘記只有與富農鬥爭的鬥爭和加強在貧農裏的工作，才能使與中農協定堅固起來，忘記沒有這些條件中農就可以認為富農是夢者而動搖到富農方面去。請記起列寧在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

“必須決定對那個沒有一定不移的堅固立場的★階級的關係。無產階級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決定這兩個階級的關係是容易的。只是當我們談到中農這樣的階層時，那就知道，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局部地是私有主，局部地是勞動者。他不剝削別的勞動者。他在數十年內費了極大的力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他親自受了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他忍受了一切痛苦；而同時他又是私有主。因此我們懂得這個動搖的階級的關係是有莫大的困難的，（請參看‘蘇聯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三〇〇頁）。

可是也有另外的離開正確路線的傾向，這些傾向底危險性並不比上述的傾向少些。有這樣的現象，就是有人進行着反富農的鬥爭，可是進行得這樣拙劣，這樣粗率，以致打擊到貧農和中農頭上來了。結果富農還是沒有受損傷，而與中農聯盟的事業却發生了裂痕，而一部分貧農竟暫時落在進行着反蘇維埃政策的鬥爭的富農爪牙裏了。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有人企圖反把富農的鬥爭變為剝奪富農，而把糧食採辦工作變為糧食徵收，他們忘記了，在我們這樣的條件下面剝奪富農乃是一件蠢事，而糧食徵收並不是與中農聯盟，而是與中農鬥爭。

這些離開黨底路線的傾向是由於什麼東西產生出來的呢？

是由於不懂得，黨的農村工作項三方面的任務是一個單一的和分不開的任務。是由於不懂得，決不可以把與富農鬥爭的任務和與中農協定的任務分開，決不可以把這兩個任務和將貧農變為黨在農村中的支柱的任務分開★。

為要使這些任務在我們的日常的農村工作過程中不致彼此互相脫離，那就須要做些什麼呢？

為要達到這點，至少須要發出這樣一個頌達的口號，這個口號要能够把這一切任務合併為一個總的公式，因而不致使這些任務彼此互相脫離。

在我們黨的軍械局內是不是有這樣的公式，這樣的口號呢？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是有的。這樣的公式就是列寧底口號：“善於達到與中農的協定，而同時連一分鐘也不放棄與富農的鬥爭和只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

因此我認為，這個口號是最妥當的和包羅一切的口號。認為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此現今條件下面，須要把他提到第一位。

---

★從這裏就得出結論說，離開正確路線的傾向，給工農聯盟事業造成兩種危險：一方面的危險就是由於有些人想把（舉例說）糧食採購方面的廢止非常辦法變為黨的經常或長久的方針；另一方面的危險就是由於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辦法這件事情來放縱富農，來宣佈貿易底完全自由，使貿易不受國家機關底調節。因此，為要保證正確的路線，就必須要有兩條戰線上的鬥爭。

我還要順便指出，就是我們的出版物並不時常都遵守這個規則，而有時却表現出一些片面態度。例如，有這樣的情形：人們描寫了這樣一種人，這種人想把糧食採購方面的臨時非常辦法變為我們的政策底經常方針，因而使聯絡發生危險。這種規範是很好的。可是不好的和不對的就是他們同時却不充分注意到和：好好描寫那些從另一邊威脅聯絡的人，不描寫這一類人，這種人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影響，要求減輕與農村資本主義份子的競爭和規定貿易完全自由，使它不通過某所機關，因而從另一端來破壞聯絡。這就不好了。這是片面態度。

也有這樣的情形，就是人們描寫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否認（舉例說）極與個體的小農的和中農的農莊（在現今階段上是農業底基礎）底可靠性和妥當性。這種描寫是很好的。可是，不好的和不對的，就是他們同時却不描寫這樣一種人，這種人忽視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庄底意義而不懂得，在現時，極與個體的小農的和中農的農莊的任務，應當在實際上拿極與集體農莊底關係來建設的任務來作補充。這也是片面態度了。

為要保證正確的路線，須要進行“細緻戰線上”的鬥爭和拋棄任何的片面態度。

你認為列寧底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而在你的信內發問道：“這一個反對派的口號，公然在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號的時候，在‘真理報’上登載出來了，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的呢？為什麼這個口號在聯共中央委員會底機關報真理報上出現了，這是否只是技術上的疏忽，或者是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的妥協呢？”。不消說，請到是說得氣勢凶凶的！s同志，可是，總還是請你在“轉寫地方”，慎重一點兒罷，使得你再氣頭上得出結論說要禁止刊印我們的黨綱，而這個黨綱是完全證實了列寧底口號（是事實呵！）的，基本上是由列寧（絕對不是反對派！）起草的和由我們黨的（也不是反對派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請多尊重我們的黨綱上面關於農村裏各個社會集團的那些著名的條款吧！請多尊重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吧！……。至於你說“在中農問題上與反對派妥協”，那末，我以為這句話簡直不值一擊，這句話大概是把你冒火說出來的。

使你難過的，大概是這樣的情形，就是在列寧底口號以及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聯共黨綱上面說的是與中農協定，而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底開幕辭內講的却是與中農的堅固聯盟。你大概認為在這裏有什麼矛盾。也許你甚至還想作這樣的設想，以為與中農協定的政策是一種什麼離開與中農聯盟的政策的東西。這是不對的，s同志。這是一個大的迷誤。只有那些會讀口號底字面而不會考究口號底意思的人，纔能這樣想。只有那些不知道關於與中農聯盟，關於與中農協定這個口號底歷史的人，纔能這樣想。能這樣想的只有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以為：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辭內說與中農“鞏固聯盟”的政策，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的另一篇演說內以及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內却又說我們現在需要與中農“協定”的政策，這就表示列寧在這裏是自相矛盾的。

事情底本質，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事情底本質是在於，列寧和代表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並不認為在“協定”，與“聯盟”，這兩個概念中間有絲毫分別。事情底本質是在於，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一切演說內，到底都把“聯

盟，和“協定”，這兩個概念當作相等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案也是一樣，那裏把“協定”，和“聯盟”，這兩個概念當作是相等的。因為列寧和黨認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和很快就成過去的，而是一個長期的政策，他們曾經有，而且現在還有完全的理由來把與中農協定的政策稱爲與堅固聯盟的政策，反轉來說，他們曾經有理由，而且現在還完全有理由來與把中農堅固聯盟政策稱爲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只要讀一讀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底速記錄及這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的決議案，就可以深信這一點。

請看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辭裏的一段話。

“因為蘇維埃工作人員沒有經驗，因爲問題困難，用來對付富農的打擊往往落到了中農身上。我們在這裏犯了非常大的過錯。在這方面集合起來的經驗，將幫助我們來採取一切辦法以便在今後避免這樣的情形。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們很是知道：這個任務是困難的。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幸福可以給與中農，而中農却是物質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他要求具體的物質幸福，這種幸福是我們現在所拿不出來的，而國家也許還要在沒有這些幸福的情況下面，來渡過那個在現在已表明有完全勝利希望的艱難鬥爭度月份。但是，我們在我們的行政的實際工作裏，可以做出很多事情：改善我們的機關，改正許多濫用職權現象。我們可以而且應當糾正和改正我們黨的路線——沒有充分注意到與中農聯盟，與中農協定★的路線。（‘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錄’，第二〇頁）。

可見，列寧並沒有認爲“協定”，與“聯盟”，之間有絲毫分別。

請看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案內的一段話：

“把中農和富農混淆起來，把反對富農的辦法在這種或那種程度上施行到中農身上，是就不僅是最粗魯地違背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法令和牠的全

<sup>★</sup>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部政策，而且是最粗鄙地違背共產主義或一切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指出，無產階級在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決鬥時與中農的協定，是平安過渡到消滅任何剥削的條件之一。

因為農業技術比較工業落後的緣故——莫說在俄國，就是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這樣，——中農是具有比較堅固的經濟根蒂的，所以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後，中農還會支持到很久的時間。因此，蘇維埃工作人員和黨內工作人員在農村裏的策略，應該是打算到在長時期裏與中農實行合作……。

……這樣，蘇維埃政權在農村裏的完全正確的政策，便保護勝利的無產階級與中農的聯盟和協定……

……工農政府及共產黨底政策，以後也是應當本着這種由無產階級及貧農去與中農協定的精神進行的，★（“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追記錄”，第三七〇頁到三七二頁）。

可見，議決案也沒有認為在“協定”與“聯盟”之間有絲毫分別。

不妨還指出一點，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底這個決議案內，沒有一個字講到與中農的“堅固聯盟”。可是，這是不是說，決議案因此就離開了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呢？不，不是的。這只是說，決議案認爲“協定”，“合作”，的概念與“堅固聯盟”的概念是相等的。這是顯而易見的：沒有與中農的“協定”，就不能有與中農的“聯盟”，而要是沒有與中農的“長期的”協定和合作，那末，與中農的聯盟就不能是“堅固的”了。

事實就是這樣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寧和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違背了列寧關於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意見，或者須要拋棄這種不認真的推測，而來承認，列寧和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並沒有認爲“協定”與“堅固聯盟”這兩個概念之間有絲毫分別。

\*注意點是我加的——附大林註。

總之，誰要是不想做專門咬文嚼字主義底犧牲品，誰要是想考究列寧關於倚靠農民，關於與中農協定和關於與富農鬥爭這個口號底意義，他就不會不懂得，與中農協定的政策就是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反對派底虛偽的把套。聽信了他們的謠言，落到了敵人替你掘好了的陷阱。反對派的禿子們在那裏大喊大叫，要別人相信“說他們是贊成列寧關於與中農協定的口號的，同時他們故意作出造謠生事的暗示，說與中農的‘協定’，是一回事，而與中農的‘堅固聯盟’，却是另一回事。他們想這樣來一舉兩得：第一，瞞騙自己關於中農問題的真正立場，這種立場底內容就是不與中農協定，而是‘與中農分野’，（請參看反對派斯米爾諾夫底著名的演說，這篇演說到我在莫斯科省黨的第十六次代表會議上已引證過了）；第二，利用‘‘協定’，與‘‘聯盟’，間的虛偽的分別來搞拿布爾塞維克裏的那些頭腦簡單的人，完全迷住他們，推着他們離開列寧。

而我們的有些同志是怎樣應付這一點的呢？他們並不去撕破反對派騙徒們底假面具，並不去揭露他們對黨瞞騙自己的真正立場的欺騙行為。——却反而去上圈套，滾進陷阱，讓別人推着他自己離開列寧。反對派大呼大擂，高聲談論列寧底口號，反對派分子把自己裝成擁護列寧口號的人，——因此我應當離開這個口號，以便使別人不要把我混在反對派一塊，不然人家就可以說我和‘‘反對派妥協’，——這些同志底想法就是這樣的！

而且這還不是反對派掩騙手段底唯一的例子。例如，拿自我批評的口號來誘。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的口號是我們黨的行動底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是布爾塞維克培養幹部的方法底精華，反對派高聲叫喊，要別人相信，說自我批評的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說黨是從他們那裏襲取了這個口號。而這樣一來，黨就向反對派投降了。反對派這樣幹法，至少是想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想瞞着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不能知道，在以破壞黨性為目的的反對派的自我批評和以鞏固黨性為目的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中間，是隔着一條鴻溝；第二，——使某些頭腦簡單的人走上圈套并逼迫

他們避開黨的自我批評的口號。

而我們的某些同志是怎樣應付這一點呢？他們並不去撕破反對派騙子底假面具和堅持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口號，——却反而落入陷阱，離開自我批評的口號而聽受反對派支配，……向牠投降而同時却錯誤地設想，以為他們是避開反對派了。

這樣的例子本來可以引出一大堆。

可是，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中是不能聽受任何人來支配的。我們尤其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以反對派對於我們的批評為指南。我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既申斥反對派底切騙行為，也申斥我們的個別的上了反對派挑撥過場的布爾塞維克底錯誤。請記起馬克思底話：“一心按照着你自己的道路走，讓人們隨便怎樣來說吧！”，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真報”，第一五二期。



##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

監察委員會全體出席會議上的演說辭

同志們，我以為，首先就要撇開小事情，撇開個人問題等等，以便解決那個引起我們注意的右傾問題。在我們黨內是不是有右傾的，機會主義的危險；是不是存在着有利於這種危險的客觀條件；怎樣和這個危險鬥爭——這就是現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可是，如果我們不除淨那一切蒙蔽了這個問題的和妨礙着我們來瞭解問題質實的小事情和次要成份，那末，我們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查波爾斯基同志以為右傾問題是一個偶然問題，這是不對的。他斷定說，這裏的事情，並不在於什麼右傾，而完全是在於意氣鬥爭，在於個人野心等等。就暫時假定，說這裏也同在任何鬥爭裏一樣，意氣鬥爭和個人野心是有幾許作用。可是拿意氣鬥爭來解釋一切，只看見意氣鬥爭而不看見問題底本質，這就是離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就是像莫斯科組織這樣一個毫無意義地是巨大的，年老的，團結一致的組織，會因為幾個意氣鬥爭者或野心家底努力而整個組織都波瀾動了，都被推動了。不，同志們，天下是不會有這樣的怪事的。更不必說，對於莫斯科組織底力量和能力，是不可

以這樣輕視的。在這裏發生了作用的，顯然是一些更深刻的的原因，這些原因無論與意氣鬥爭，無益與個人野心，都是沒有關係的。

福翁托夫同志雖然是承認有右傾危險存在，可是他並不認為這個危險會值得由認真的正經人去認真研究，他這種態度也是不對的。照他這樣說來，右傾問題，原來是空喊家研究底對象，而不是正經人研究底對象。我完全懂得福翁托夫同志底意思，他是這樣忙於日常的實際工作，以至沒有工夫來想到我們的發展前途。可是這還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某幾個黨務工作員底狹隘的和求實的實踐主義變為我們的建設工作底教條。健全的實踐主義本來是一件好事情，可是如果她在工作中間失掉創造和使自己的工作服從黨的基本路線，——那末，她就會變為壞事情了。可是不難明白，右傾問題就是我們黨底基本路線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發展前途，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呢。

有些同志在討論關於右傾的問題的時候，把問題完全着重在代表右傾的個人身上，這些同志也是不對的。他們說，請指出右傾份子或調和份子來，請說出他們的姓名來，以便使我們可以來對付他們。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正確的。個人當然是有相當的作用。可是，這裏的事情並不在於個人，而是在於產生黨內右傾危險的那些條件和那種環境。可以把個人排除，但是這還不是說，我們這樣就算撲滅了黨內右傾危險底根源。所以關於個人的問題雖然也確實有意思，可是他並不能解決問題。說到這裏，使我不能不回憶起奧德沙地方的一件故事。這是一九一九年年末和一九二〇年初的事情，那時我們的軍隊將鄧尼金底軍隊逐出了烏克蘭，完全打敗了奧德沙區內鄧尼金軍隊底最後殘部。那時有一部分紅軍兵士在奧德沙忽然搜尋了協約國，因為他們相信，如果他們拿獲了協約國，戰爭就會終結了（全場發笑）。就假定說紅軍兵士，當時是在奧德沙拿獲了協約國底某個代表。可是，關於協約國的問題當時是不會因此而倒決的。因為雖然那時奧德沙是鄧尼金隊伍底最後一塊地盤，可是，協約國底根源並不在於奧德沙，而是在於世界資本主義。關於我們的某些同志也可以這樣說，這些

同志在關於右傾的問題上把事體着正在代表右傾的個人上，同時却忘記了產生這種傾向的條件。

所以在這裏我們首先應當說明的，就是關於離開列寧路線的右傾和“左”傾（托洛茨基主義的傾向）產生底條件問題。

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下面，共產主義裏的右傾，就是一部份共產黨人底一個傾向，個向，固然是沒有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可是畢竟是一種偏向——離開馬克思主義底革命路線而走向社會民主黨方面去的偏向。既然有些共產黨員認為選舉鬥爭中的“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是不妥當的（法國）；或者起來反對共產黨提出自己的單獨的候選名單（英國），或者不願意重提出與“左派”，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問題（德國）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末，這就是說，在共產黨以內，是有人正在極力想使共產主義去遷就社會民主主義。如果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麼，這就會使共產黨在思想上被人粉碎，使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而社會民主主義底大大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資本主義底加強和鞏固，因為社會民主黨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裏的主要支柱。所以，如果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使那些為保存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條件日益增長起來。

在蘇聯廢除底條件下面，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可是資本主義底根基還沒有被拔除的地方，共產主義裏的右傾，就是一部份共產黨人底傾向，偏向，固然是沒有正式形成的，也許是還沒有覺悟到的，可是畢竟是一種偏向——離開我們黨底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偏向。既然在我們這裏，有些共產黨員企圖拉着我們黨離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底決議而往後退，否認有向農村資本主義成份進攻的必要，或者是要求縮小我們的工業，認為現時的工業發展速度，是足以使國家滅亡的，或者是認為設立發展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是不妥當的，是枉費金錢，或者是認為在自我批評底基礎上與官僚主義鬥爭是不妥當的，認為自我批評可以振動我們的機關底模樣，或者是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底獎勵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那末，這就是說，在我們黨內，

是有人在企圖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去繼續（也許自己不覺得），“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和需要。如果我們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使我們黨內的資本主義成份大大加強。而我們國內資本主義成份底加強又為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恢復和資本主義恢復機會底加強。所以，如果我們黨內的右傾得到勝利，這就會使那些為恢復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所必要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我們蘇聯國家內，是不是存在着使資本主義底恢復（復辟）成為可能的事情的條件呢？是存在的。同志們，這也許好像是很奇怪的，可是這却是事實。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並以加速度發展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同時將農民經濟與我們的社會主義的工業聯絡起來。可是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這些根蒂到底是深藏在什麼地方呢？牠們是深藏在商品生產裏，深藏在城市的和特別是在農村的小生產裏。資本主義底力量，如列寧所說的，是在於“小生產底動力”，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則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顯然的，既然我們這裏的小生產是具有大批的甚至於是優越的性質，既然它經常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面，——那末，我們這裏就有使資本主義底恢復成為可能的事情的條件。

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蘇維埃的國家內，是不是存在着為資本主義底恢復底可能性所必要的工具和力量呢？是存在的。列寧關於在蘇聯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提綱，其所以是正確的，正因為牠是以這一點為基礎的。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需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工農聯盟，根據國家工業化底觀點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命脈，用很快的速度來發展工業，使國家電氣化，物質開國民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使農民大批合作化和提高農民經濟底收成額，漸漸使個人的農民農莊聯合成為公共的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和克服城市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成份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請看列寧關於這一點所說的話：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這是必需記著的。凡是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和將牠與城市生活作過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我們還沒有打動國內敵人底基礎。國內敵人支持在小經濟上面，為要打動牠底基礎，就只有一個方法——這就是把全國底經濟——農業也在內，都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大生產底技術基礎上。只有電氣，才是這樣的技術基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不然，國家就仍舊還是小農民的國家，我們須要明白覺悟到這一點。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國內，我們都比資本主義軟弱些。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我們已經覺悟到這一點，而且一定會做到這一步，就是使經濟基礎從小農民的過渡為大工業的。只有當國家已經電氣化的時候，當工業、農業及運輸業都有現代的大工業底技術基礎的時候，——只有在這時候，我們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到四七頁）。

由此可見，第一，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當我們還沒有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的時候，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可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把樹砍倒了，而根沒子却還沒有拔出，因為力量不夠的原故。由此也就產生出在我們國家內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

由此可見，第二，除了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以外，在我們這裏還有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性，因為我們能夠消滅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性，能够拔出資本主義底根蒂和達到徹底戰勝資本主義，如果我們努力進行更國家電氣化的工作，如果我們給工業、農業、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的話。由此也就產生出在我們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底可能性。

最後，由此可見，不可以只是在一箇工業裏面建設社會主義，而同時却令農業服從自發的發展，以為農村“自己會跟着，，城市走。城市裏社會主義底工

業存在，就是農村裏社會主義改造底基本因素。可是，這還不是說，這個因素是完全足夠的。要使社會主義的城市能夠引導農民的農村到底，要做到這一步，就須要如列寧所說的，「將國家底經濟，農業也在內，轉移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移到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上」。

列寧底上面這段話，不是與他所說的「新經濟政策完全保證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基礎的可能性」，這段話相矛盾嗎？是不相矛盾的。恰巧相反，他們彼此是完全相符合的。列寧並不是說，新經濟政策給我們現成的社會主義。列寧只是說，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在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與社會主義底實在的建成之間，是有很大的差別的。不能把可能性與實在性混為一談。正是要將這個可能性變為實在性，正為着這一點，列寧在上面那一大段話裏面，才主張國家電氣化，主張給工業，農業及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大工業底技術基礎，以作為社會主義底實在的條件。

可是要在一兩年內就要實現這個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是沒有可能的。不能在一兩年內就將國家工業化，建成強大的工業，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給農業建立起新的技術基礎，將個人的農莊合併為大的集體農莊，發展蘇維埃農莊，限制和克服城市裏和鄉村裏的資本主義成份。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底多年的加強努力的建設工作。當這一點還沒有做到的時候，——而這一點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的，——我們便仍舊還是一個小農民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裏小生產經常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在這個國家裏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還是存在的。而既然無產階級並不是生活在沒有人烟的孤島裏，而是生活在帶有各種複雜情形的最實在的和最實際的生活裏，所以在小生產基礎上生長着的資產階級的成分，是「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用這種自發勢力來侵染無產階級，來腐化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內部經常重複發生小資產階級的無氣節性，換取性，個人主義，由醉心轉為灰心的心理」（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三六頁），並這樣把相當的擔憂，相當的動搖，帶進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裏面去。

我們黨內各種動搖和各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其根源和基礎就在這裏。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關於我們黨內的右傾或“左”傾問題，不能認為是微小的問題。

我們黨內的右傾，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傾向底危險，是在於什麼地方呢？是在於這個傾向不充分估計我們敵人底力量，資本主義的力量，看不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危險，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面的階級鬥爭底關鍵，因而就這樣輕易去向資本主義讓步，要求降低我們工業發展底速度，要求緩和對待農村裏和城市裏的資本主義分子，要求把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的問題推到後面去，要求減弱對外貿易壟斷制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毫無意義的。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末，這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底勢力，就會破壞無產階級底革命立場，就會提高資本主義在我們國家裏恢復起來的機會。

我們黨內“左”傾（託洛茨基主義派的傾向）底危險是在於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於牠過份估計我們敵人底力量，資本主義的力量，只看見資本主義恢復底可能而看不見有用我們國家底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陷於絕望地步而不得不拿這樣的空談——說我們黨正在特米多爾化——來安慰自己。列寧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民的國家裏的時候，在俄國，資本主義所有的經濟基礎是比共產主義所有的更加堅固的，——從列寧底這句話當中，“左”的，傾向就作出都極不正確！結論，說在蘇聯根本就不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說對農民是一點沒有辦法的，說工農聯盟底思想是已經失去時效的思想，說要是沒有西歐已經勝利的革命趕快來幫忙，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會倒台或是蛻化，說如果不採納超工業化底幻想計劃——那怕就是用與農民分裂的代價來實行的計劃，——那末，社會主義底事業便應當認為是已經滅亡的了。因此就有“左”，傾政策中的冒險主義。因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類的，躍進。毫無意義的。如果“左”，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末就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自己的農民基礎，使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說來，就是工人羣衆，——因而使無產階級遭受失敗，使恢復資本主義的條件易於形成。

可見這兩個危險，無論是“左的”，或是右的危險，這兩個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無論是右傾，或者是“左”，傾，雖然各從不同的兩端出發，而他們兩者所引起的結果，却總是一樣的。

在這兩個危險之間，那一個這些呢？我以為兩個都是很頗的。站在與他們作順利的鬥爭底觀點來說，這兩個傾向中間的差別就在於，在我們黨看來，“左”，傾現時是比右傾明顯些。我們與“左”，傾已經作了幾年的加緊努力的鬥爭，——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不給我們黨許多益處。顯然的，在與“左的”，託洛茨基主義傾向作鬥爭的幾年中，我們的黨已學會了許多東西；用“左的”，那句來欺騙我們的黨，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至於說到右傾危險——這個危險，從前也是存在過，現在由於因去年糧食控制危機而使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加強的原故，所以更加公開暴露出來，——那末我認為右傾危險，對於我們黨內某些黨員還不是很明顯的。因此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一分鐘也不減弱與“左的”，託洛茨基主義的危險作鬥爭，同時却着重與右傾作鬥爭，並盡力設法達到這一步，就是務必使這個傾向底危險，由我們的黨看起來，是與託洛茨基主義的危險一樣明顯。

右傾問題，如果他不是與我們發展中的困難問題有聯繫，也許不會使現在這樣緊張。可是事情底本質也就在於，右傾底存在，加深我們的發展過程中的困難，阻礙着我們去克服這些困難。正因為右傾危險是阻礙着我們克服困難的鬥爭，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我們看來，關於克服右傾危險的問題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現在要談於我們的困難底性質問題，請聽句話，請當注意，我們的困難不是停頓過程中的或衰落過程中的困難，有經濟倒退過程中或經濟停頓過程中的困難，而在發生這種困難的時候，人們總是努力把經濟停頓現象弄得比較不這樣沉寂，或使經濟衰落狀況比較不這樣深刻。我們的困難，是終毫不除這樣的相對的。我們的困難底特點就是在於，牠們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發展過程中的困難。當我們這裏講到困難的時候，我們通常所謂的，都是關於要把工業提高

百分之幾，要把耕種面積增加多少，要把收成率增加多少，普特以及諸如此類等等。正因為我們的困難是在過渡過程中的困難，而不是在落過程中或停頓過程中的困難。把財物送給，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是不會有什麼特別危險的。可是困難到底還是困難。正因為要克服困難就需要堅強一切力量，需要有堅固性和堅定性，而堅固性和堅定性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的，這也許因為有人覺得難堪和疲勞了，或者因為有人甯願安靜些過活，不願有鬥爭和操勞，——正因為是這個原故，於是就發生猶豫和退縮，向着抵抗力量小的方面走，說要減低工業發展底速度，說要寬待資本主義份子，否認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并根本否認一切日常工作中環境和安靜環境的東西。可是我們如果不克服擋在我們面前的困難，便不能向前進展。而為要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倒右傾危險，首先就必須克服右傾。因為右傾阻礙與困難鬥爭的事業並企圖挑撥我們黨的那種為要克服困難而鬥爭的意志。這裏所講的，當然是與右傾作真正的鬥爭，而不是口頭上的、紙上的鬥爭。我們黨內有些人，因為怕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也不拒絕宣佈與右傾危險作鬥爭，好像傳教師有時唱喚“上帝至善，上帝至善”，一樣，可是並不採取任何實際辦法來把與右傾的鬥爭放在應有的基礎上和在事實上克服這個右傾。這樣的識別，在我們這裏就叫做對公開機會主義的右傾採取調和態度調和派。不難明白，與這種調和態度鬥爭，是與右傾，與右傾危險的絕鬥爭應該組成部分。因為不與這種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態度作有系統的鬥爭，便不能克復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關於右傾代表人物的問題，固然並不能解決事情，但確實是有意思的。我們有過這樣的情形，就是在去年糧食採購工作方面發生危機的時候，我們在黨的下層組織裏曾碰到右傾危險底代表人物，當時，在村鎮裏有些共產黨員起來反對黨底政策，實行與富農份子聯絡起來。你們知道，這種份子在今年春季已被我們派出我們的黨以外，這一點，在今年二月間，已經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所一個著名的文件裏特別提到了。可是如果說我們黨內再沒有剩下這種份子，那就不對了。如果往上面去看著黨的縣組織和黨的省組織，仔細考察蘇維

按照黨和合作社機關，那末，你用不着花費什麼工夫就可以在這裏找到右傾危險代表人物以及對這個危險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底代表人物。大家知道有我們黨的機關和蘇聯機關底一些工作人員底“信”，“申明書”，及其他文件，在這些東西裏面，右的傾向，表現得十分鮮明。你們知道，在中央委員會七月全會底記錄上曾提到了這些信和文件。如果再往上去看看並提出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那麼就須要承認，在中央委員會底委員裏面，也有一些對右傾危險取調和態度的份子，固然，這些份子是極少的。中央委員會七月全會底記錄就是這一點底直接證明。在中央政治局內又是怎樣的呢？在中央政治局內有沒有什麼傾向呢？在我們中央政治局內，也沒有右派，也沒有左派，也沒有對他們取調和態度的調和派。這是應當在這裏十分肯定地說明的。黨內不良份子及各種反對派散佈謠言；說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傾或對右傾的調和態度；這種謠言是應當拋棄的。

在莫斯科的黨組織裏或牠的上層機關莫斯科委員會內，是不是有過動搖和猶疑呢？是有過的。要是現在斷定說那裏未會有過猶疑和動搖，那就愚蠢了。彭可夫同志底演說辭，就可以直接證明這一點。彭可夫同志並不是莫斯科組織和莫斯科委員會裏的最後的一個人。你們聽見了，他直接地和公開地承認了他在我們黨底許多極重要問題上面所犯的錯誤。當然，這並不是說，莫斯科委員會整個都發生過動搖。不，不是的。像今年十月莫斯科委員會告莫斯科組織底全體黨員寄這樣的文件，無疑地是證明，莫斯科委員會已克服了自己的某些委員底動搖。我不懷疑，莫斯科委員會底領導核心還會能夠徹底糾正現狀的。

各區的組織曾經干涉了這件事情，曾提出了要剷除莫斯科組織裏某些領導人底錯誤和動搖的問題，而有些同志對於這一點便表示不滿意。我不知道，這裏的不滿意可以拿什麼來做理由。莫斯科組織裏的各區的積極份子們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要求剷除錯誤和動搖，還有什麼壞處呢？難道我們的工作不是在自下的自我批評情況中進行的嗎？自我批評可以提高黨的和一般的無產階級的下

層份子真積極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要是各區積極份子曾經能盡自己的責任，這又有什麼壞的或危險的東西呢。

中央委員會干涉了這回事情，這是不是做得對呢？我以為中央委員會是做得對的。伯爾津同志認為，中央提出關於撤換一個曾被區組織所反對的區的領導人問題，這是做得太激烈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可向伯爾津同志提起關於一九一九或一九二〇年的幾件小事，那時有幾個中央委員在黨的階級方面犯了幾個錯誤，我想是不很嚴重的錯誤，而依列寧底提議就受了處罰以警告大家，其中一個人被派往土耳其斯坦，而另一個人幾乎是被取消了中央委員底資格。列寧當時是不是做得對呢？我以為他是做得完全對的。那時中央委員會裏面的情況不像現在這樣。當時有一半中央委員是跟着托洛斯基跑的，而中央委員會本身裏面的情況是不穩固的。現今中央委員會底做法已經是柔和得多了。為什麼呢？也許我們想比列寧慈善些吧？不，事情底本質不在這裏。事情底本質是在於，現今中央委員會底情況比當時堅固些，所以中央現在有比較柔和些去做可能。沙哈洛夫同志說中央委員會干涉得太遲了，他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他之所以說得不對，是因為他大概不知道，中央委員會底干涉，事實上是從本年二月起就開始了。沙哈洛夫同志可以信服這一點，如果他願意的話。既然，中央委員會底干涉沒有立刻就收到良好的結果。可是如果拿這一點去責備中央，那就奇怪了。

結論：（1）右傾底危險是我們黨內嚴重的危險，因為她的根源在於我們國家底社會經濟環境中；（2）右傾底危險，因有各種困難而加深，而不克服右傾及反右傾的調和態度，便不能克服這些困難；（3）在莫斯科組織裏有過動搖與猶疑現象，有過不認錯的成份；（4）莫斯科委員會底核心，藉着中央委員會及各區積極份子底幫助，已經採取了一切辦法去剷除動搖現象；（5）莫斯科委員會一定能够克服以前所暴露了的錯誤，這是不能懷疑的；（6）任務就在於剷除內部的鬥爭，使莫斯科的組織團結一致，在擴展的自我批評基礎上順利地進行各支部底改選。（大鼓掌）。



# 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辭底一語錄

##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在什麼地方，這些意見分歧是與什麼有聯繫呢？

我們的意見分歧首先是與我們國內及資本主義各國最近所發生的階級變動成問題有聯繫。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有偶然的性質。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之所以發生了意見分歧，是由於最近所發生的那些階級變動，那種階級鬥爭尖銳化，這種變動，這種尖銳化造成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的主要錯誤，就在於這派人看不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本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就不瞭解黨底和共產國際底新任務，而這種不瞭解就是新反對派底特質。

新反對派底領導人，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聽席會議上說話的時候，完全避開了關於我們黨內的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關於階級鬥爭底尖銳化，絲毫也沒有暗示說到我們的意見分歧正是與這種階級鬥爭底尖銳化有聯繫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感覺到了這一點呢？他們講到了所有的事情，也講了哲學，也講了理論，但是，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那些在現

時決定着我們黨的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階級變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怪事呢？也許是因為他們有健忘病罷。當然不是的！政治家是不會忘記主要的東西的。這是因為，他們在不見和不瞭解現在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各國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為，他們忽略過去了主要的東西，忽略過去了政治家所不應忽略過去的階級變動。本來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新反對派一遇到我們黨的新任務就表示張惶失措和空多無力的樣子。

試回想我們黨內最近發生的那些事變。試回想我們的黨最近因在我們國內發生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了的那些口號。我說的是這樣的口號，如自我批評，加緊與官僚主義鬥爭及清洗蘇維埃機關，組織新的經濟幹部人材及紅色專門家，加緊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運動，進攻富農，減低成本費及根本改善職工會底實際工作，實行清黨等等。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是令人沮喪心驚和令人頭昏眼花的。然而這些口號顯然是現時黨底最必要的和最迫切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沙哈廷案件發生而重新提出了屬於新的經濟幹部人材問題，由工人內部造就紅色專門家來代替舊的專門家的問題。因沙哈廷案件發生而暴露出來的事情是什麼呢？暴露出來了的事情，就是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被徹底擊破，牠在我們經濟建設上組織而且將來還會組織暗害工作，就是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局部地是黨的組織，把我們的階級敵人底暗中破壞工作忽略過去了，就是，因此需要盡力設法鞏固和改善我們的組織，發展和鞏固這些組織底階級的警惕性。

於是，就著急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問題。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不盡量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的各個組織底工作放在羣衆監督下面，那就不能改善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及黨的組織，就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底建設和征服資產階級的暗害行為。而暗害行為，不僅在煤礦區域內，而且在冶金工業方面，而且在軍事工業方面，而且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內，在黃金及白金工業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都發生過並且還在繼續發生，——這是事實。於是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因為有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因為肅農進行反對蘇維埃的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就着重提出了關於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關於進攻富農的問題，關於用壓榨富農富裕份子的方法來組織糧食採辦的問題。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暴露了什麼事情呢？這些困難所暴露了的，就是富農並不是在那裏睡覺，富農是正在發展着，他們是組織着暗害工作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底政策，而我們的黨的機關，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至少是一部份這樣的機關，或者看不見敵人，或者去遷就敵人，而不去與敵人鬥爭。

於是，就更加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審查和改善我們的黨的機關，合作社機關及一般的糧食採辦機關的口號。

其次，因為有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關於有系統的減低成本費的口號，關於單面勞動紀律的口號，關於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的口號等等。這些任務會需要改造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全部監察工作，根本振興這些組織，把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的份子清洗出去。

於是，就着重提出了關於與職工會及蘇維埃機關裏的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問題。如果認為不先把黨本身腐得銳利，而就可以鞏固我們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組織，職工會的和合作社的組織，可以把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底骯髒東西清洗出去，那就是笑話了。官僚主義份子，不僅在經濟的和合作社的組織裏，不僅在職工會的和蘇維埃的組織裏生活着，而且還在黨本身底組織裏生活着，這是無可懷疑的。如果黨是所有這一切組織底領導力量，那末，清黨就顯然是這樣一個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決不能徹底振興和改善工人階級底其他的一切組織。於是就提出了關於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看到牠們不是偶然的，這些口號是一條分不開的鍊子上的幾個必要的環節，這條鍊子就是叫做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

這些口號首先是與我們的工業和農業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時期有聯繫

的。而國民經濟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又是什麼呢？牠就是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向國民經濟或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這是我國工階級向着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一個最重大的任務。可是要實行這個改造，首先就必須改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底幹部人材，——經濟的，蘇維埃的和職工會的幹部人材以及黨的，合作社的幹部人材，必須驅逐我們的一切組織，把這些組織裏的骯髒東西清洗出去，必須提高千百萬工農羣衆底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是與國民經濟裏面的資本主義份子對進攻着的社會主義實行反抗的這件事實有聯繫的。決不可以把所謂沙哈廷案件看作偶然的事情，“沙哈廷派”，現時正盤踞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裏。其中有很多已被拿獲，可是還遠沒有盡被拿獲。資產階級智識界底暗害行為，是對於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的最危險的反抗之一種。況且暗害行為是與國際資本有聯繫的，因此牠更是危險。資產階級的暗害行為，無疑義地指明，資本主義的份子還遠沒有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作反蘇維埃政權的新發動。至於說到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那些富農反對蘇維埃價格政策的發動已經繼續到兩年了，這更不可以看作是偶然的事情。很多人至今還不能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富農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却已經停止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了。可是這個事實却絲毫沒有什麼奇怪。在從前，富農還比較軟弱，還沒有可能去認真佈置自己的經濟，還沒有足夠的資本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因此牠曾經不得不把自己糧食出產底全部剩餘或者差不多全部剩餘都拿到市場上去，可是在現在，在經過了好幾個豐年以後，他已經把自己的經濟佈置周到了，他已經積蓄了必要的資本，——於是，他就有了在市場上投機的可能，就有了把糧食——這個金幣底金幣——藏起來的可能，作為自己的後備資本，而寧肯把肉類，燕麥，大麥及其他次要農產物運到市場上去。現在如果希望富農會自動讓我們從他那裏取得糧食，那就可笑了。富農現在對於蘇維埃政府政策的反抗，其根源就在這裏。

可是城市和鄉村資本主義份子對社會主義進攻的反抗是表示什麼呢？這就

是表示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勢力底重新配合，這種重新配合底目的，就是要維持舊關係而反對新關係。不難懂得，這些情形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可是為要打退階級敵人底反抗和替社會主義底前進肅清道路，就除掉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外，還需要磨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把這些組織裏面的官僚主義清洗出去，改善他們的幹部人材和動員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及農村勞動羣衆去反對城市和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

我們黨底現時的那些口號，就是在這些階級變動底基礎上面產生出來的。

關於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階級變動也應當這樣說。如果認為資本主義底穩定依然沒有改變，那就是可笑了。如果斷定說這個穩定日益鞏固着，日益成為堅固的，那就更是可笑了。實際上，資本主義底穩定是一月比一月，一天比一天削弱起來和動搖起來。爭取市場和爭取原料的鬥爭底尖銳化，武裝底增長，英美對抗底增長，蘇聯社會主義底發展，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左化，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博鬥時期底已經到來，各殖民地——印度在內——革命運動底發展，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國底發展——所有這一切事實都是無疑義地證明，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新的革命高漲底成份是正在增長着。

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加紧鬥爭來反對社會民主黨，首先就是反對該黨底“左”翼，因為她是資本主義底社會支柱。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共產黨內的右傾份子，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底代辦。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與右傾調和的調和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底避諱所。於是就提出了關於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口號。於是就規定了共產主義在職工會內的所謂新策略。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些口號底意思和意義。可是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懂得，不實行這些口號就決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羣衆去作新的階級戰鬥，決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決不能實行挑選共產主義運動底真正領袖——能領導工人階級去為推翻資本主義而鬥爭的領袖。

同志們，這就是在我國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所發生的這樣一些階級的變動，在這些變動底基礎上便產生了我們黨在內部政策方面以及在共產國際方面

的那些現時的口號。

我們黨是看見這些階級變動。牠懂得新任務底意義並動員力量去解決這些任務。所以，牠總是帶著全副武裝去應付事變。所以牠並不害怕擺在牠面前的困難，因為牠總是準備着克服困難的。

新反對派底倒黽處，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倒黽處，就在於牠看不見這些階級變動和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正因為牠不懂得這些新任務，所以牠就抱著完全張惶失措的心理，總是準備着逃避困難，遇見困難而退却，放棄陣地。

你們看見過在大河裏面，比方萊尼察河這樣的大河裏面遇見大風浪時的漁夫嗎？我看見過不止一次了。有這樣一類漁夫，這種漁夫遇見已經到來的大風浪的時候便動員自己的全部力量，鼓勵自己的人心，勇敢地朝着風浪划船：“弟兄們，不要救助，努力抓着舵，破浪前進罷，我們是一定會要勝利的！，，，可是也有另一種漁夫，他們一聞見大風浪，就灰心喪氣，開始叫苦而使自己的人們萎靡不振：“真倒霉呀，大風浪來了，兄弟們，請在船板上趴下，閉着眼睛，也許會可以馬馬虎虎挨到岸邊罷”（全場大笑）。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方針和行為，是與那第二種漁夫，遇困難而驚惶退却的漁夫完全相同，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我們說，在歐洲，新的革命高漲底條件正在成熟着。這種情況給我們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的鬥爭，將右傾份子從黨內趕出去，加強與掩護右傾的調和派的鬥爭，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鬥爭以及其他等等。而布哈林同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布哈林同志“當衆批評一頓”，，，。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給我們提出新的任務，這些任務要求有系統地減低成本費和鞏固企業裏的勞動紀律；而為要執行這些任務，便非有根本改變職工會內的全部實際工作不可。而湯姆斯基同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

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湯姆斯基同志“當衆批評一頓，，。

我們說，國民經濟底改造給我們提出新的任務：加強與蘇維埃經濟機關底官僚主義作鬥爭，消除這種機關裏的腐敗的和異己的份子，暗害份子以及其他等等。而李可夫同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李可夫同志“當衆批評一頓，，。

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可笑嗎？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斯基三同志，除了自己的私情之外，便看不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這難道不明顯嗎？

布哈林同志這一派入底不幸，就是他們看不見新的階級變動和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正因為牠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做事變底尾巴，遇到困難就束手無策。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根源就在這裏。

## 二 關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同志看不見和不懂得共產國際底因新革命高漲日益增長的條件而引起的那些新任務，這些任務就是：從共產黨內趕出右派，征服調和派和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這個情形，已完全為我們在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所證實了。

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同志提交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關於國際狀況的提綱開始的。從前，這樣的提綱，照例都是預先在聯共代表團內審查的。可是這一次却沒有遵守這個條件。結果弄得這樣，就是由布哈林同志署名的提綱一面送往聯共代表團，同時就分給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各外國代表團。可是，在這個提綱上會有許多地方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代表團曾不得不在提綱中加上大約二十個修正。

這種情形就使布哈林同志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是這是誰的過錯呢？試

問布哈林同志為什麼要在還沒有交給聯共代表團審查以前就把提綱送給各外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是不能令人滿意，那末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是可以不加上幾條修正案呢？結果就弄出這樣的情形，就是從聯共代表團內實際上作出了關於國際狀況的新提綱，而各外國代表團就拿這個提綱來與布哈林同志署名的舊提綱對立。顯然的，如果布哈林同志沒有這樣急忙地把自己的提綱分送給外國代表團，就不會有這種不好意思的情形。

我現在要指出聯共代表團所加到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的四個基本的修正。我想指出這些基本的修正，為的是要更明顯地表示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性質。

第一個問題——這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底性質的問題。照布哈林同志底提綱看起來，在現今的時候，並沒有發生着任何一個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而且相反，資本主義是正在改造着和在基本上多少穩固地支持着。顯然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作這樣的估計，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能同意的。牠當時不能同意這一點，因為保存這樣的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就會使那些批評我們的人們有材料來說我們是抱着所謂資本主義“恢復體制”的觀點，即抱着希法亭底觀點，抱着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抱的觀點。因此聯共代表團便作一個修正，從這個修正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穩定是不穩固的，而且不能是繼續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底尖銳化，這個穩定，現在正被和將來還會被事變過程所搖動。同志們，這個問題是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有決定的意義的。資本主義的穩定是動搖着還是鞏固着，——共產黨日常政治工作底整個方針都要由這一點來決定的。我們現在是處在革命運動底低落時期，處在單單是收集力量的時期，或者是處在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處在使工人階級準備去作當前的階級戰鬥的時期，——共產黨底策略方針就是由這一點來決定的。聯共代表團底這個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了——底好處正是在於，牠所規定的方針，是以這第二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是以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運動創造根據的方針。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與社會民主黨作鬥爭的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說到了，與社會民主黨作鬥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這還不够。要使與社會民主黨的鬥爭進行得有成效，就必需要把問題着重在與社會民主黨底所謂“左”，翼作鬥爭的上面，這個“左”，翼玩弄“左”，的辭句而這樣來巧妙地欺騙工人，阻礙工人脫離社會民主黨。顯然的，不粉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就不能戰勝一般的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關於“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問題却完全沒有談到。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此聯共代表團曾不得不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的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說到了有與右傾鬥爭底必要，可是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到要與那個對右傾調和的調和態度作鬥爭。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問題在於，向右傾宣戰的時候，右傾份子就通常裝扮為調和份子而使黨陷於困難地位。為預防右傾份子底這個手腕起見，就必須提出與調和態度作堅決鬥爭的問題。因此聯共代表團曾認為必須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四個問題，就是關於紀律問題。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內沒有提到各共產黨內有保持鐵的紀律之必要。這也不是一個不大重要的缺點。因為什麼呢？因為在加強與右傾的鬥爭的時期，在實行清除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的口號的時期，右傾份子通常總是組織成為派別的組織，造成自己的派別組織的紀律，而打破和破壞黨的紀律。為要使黨不致受到右傾份子底派別組織的襲擊，就必須要提出關於黨內鐵的紀律的問題和關於黨員應該絕對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不是這樣，便根本莫要想去與右傾作認真的鬥爭。因此聯共代表團就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我們當時是不是可以不把這些修正加在布哈林同志底提綱上去呢？顯然是

不可以的。在古代的時候，人們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過：我們尊重柏拉圖，但是我們更尊重真理。關於布哈林同志也可以這樣說：我們尊重布哈林，可是我們更尊重真理，更尊重黨，更尊重共產國際。因此，聯共代表團會不得不把這些修正加到布哈林同志底提議上去。

這可以說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第一階段。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第二階段是與所謂維托爾夫及特爾曼的事件有聯繫的。維托爾夫是漢堡黨組織底以前的書記，被控告為濫用黨的經費的。他曾因此被開除黨籍。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裏的調和派，會利用維托爾夫是與特爾曼同志有接近的關係（雖然特爾曼同志是與維托爾夫底犯罪行為絲毫沒有關係的），就把維托爾夫底案件變成了特爾曼底案件而開始來推翻德國共產黨底領導。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底消息中知道，調和分子愛爾蘭特和黑爾納特當時竟能暫時拉攏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來反對特爾曼同志。怎麼樣呢？他們把特爾曼從領導機關中撤銷了，開始控告他為舞弊營私，並且事先沒有通知共產國際執委，也沒有得共產國際執委底批准，就公佈了“相當的，決議案”。這樣一來，他們不是執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關於與調和派作鬥爭的指示，不是與右傾及調和派作鬥爭，而是最無理地違背這個指示，與德國共產黨底革命領導作鬥爭，與特爾曼同志作鬥爭，這種鬥爭底目的就是在德國共產黨員隊伍裏面掩護右傾和批准調和態度。

而布哈林同志並不去拉轉船舵，糾正現狀，不去恢復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那個已被違背的指示底權力，不去制止調和派底胡行，却反而在自己的一封著名的信內提議批准調和派底這次政變，將德國共產黨交給調和派，而對於特爾曼同志，却又在報紙上加以誹謗，再次申明他犯了過錯。而且這還叫做是共產國際底“領導者”，！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領導者”，嗎？

中央委員會討論了布哈林同志底提議並且否決了這個提議。這當然是布哈林同志所不高興的。可是這裏是誰底過錯呢？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決議，並不是為着要我們去違背這個決議，而是為着要由我們去執行這個決議。如果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曾決定向右傾及調和態度宣佈鬥爭，把德國共產黨底領導工作保留給特爾曼同志所領導的基本幹部，而調和派愛維爾特及黑爾哈特却忽然想來推翻這個決議，那末布哈林底責任就是要制止調和派底越執行動，而不是讓他們把持德國共產黨內的領導。錯在布哈林同志，因為他把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忘記”了。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第三階段，是與同德國共產黨內右派鬥爭的問題有聯繫的，與粉碎布蘭德列爾及達里格麥爾底派別組織以及將該派別組織底首領從德國共產黨裏開除出去的問題有聯繫的。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在這個根本的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就在於他們總是迴避參加這個問題底解決。實質上，當時所解決的問題，是德國共產黨底生命問題。在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是知道這一點的，可是，他們却還是有系統地迴避參加相當模謬底會議，這樣來阻礙這件事情底進行。為什麼呢？大概是為的要在共產國際面前與德國共產黨內右派面前都不失為“潔白君子”。為的是要在後來可以說，“將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開除於共產黨外的，並不是我們布哈林派，而是他們，而是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而且這還叫做與右傾危險的鬥爭哩！

末了，我們意見分歧底第四階段。這是與布哈林同志向中央十一月全會提出的要求有聯繫的。他當時要求從德國召回赫依曼同志，要求制止特爾曼同志底所謂越執行動，說特爾曼同志在自己的一個演說辭內批評了布哈林同志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底主張，因為手內沒有任何文件可以證實布哈林同志底要求。布哈林同志答應了找出文件來證實赫依曼及特爾曼底錯處。然而，任何文件他都沒有找出來。他並沒有找出文件來，而只是把恩伯德洛同志在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內的著名演說辭分發給聯共代表團底同志，而這個演說辭後來被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評判為機會主義的演說辭。布哈林同志把恩伯德洛底演說辭分發給聯共代表團底同志，並把他介紹為控告特爾曼同志的材料，想這樣來證明他關於召回赫依曼同志及所謂制止特爾曼同志底越執行動的這個要求是正當的。而實際上呢，他這樣證明了

，他是與恩伯德洛同志同情的，而恩伯德洛底立場，由共產國際執委看來，却是機會主義的立場。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要點。

布哈林同志認為，我們既然是進行鬥爭反對共產國際各支部裏的右傾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既然是清除德國共產黨裏和捷克斯拉夫共產黨裏的社會民主黨份子和傳統，從共產黨內開除布蘭德列爾和達里格麥爾這般人，這樣我們就是使共產國際“解體”，使共產國際“滅亡”。反之，我們却認為，我們實行這樣的政策，把問題着重在與右傾及對右傾的調和態度作鬥爭上，這樣就是鞏固共產國際，消除共產國際裏面的機會主義者，使共產國際各支部布爾塞維克化，幫助各共產黨去準備工人階級進行臨到的革命搏戰。

可見得，這並不簡簡單單是聯共中央委員會委員裏面有什麼不同的色彩，而是關於共產國際政策底根本問題有很嚴重的意見分歧。

### 三 關於國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和階級鬥爭。我已說過，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沾染了瞎眼病而看不見這些變動，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我已說過，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便抱着張惶失措心理，害怕困難和決心在困難面前束手投降。不能說，新反對派底這些錯誤是從天落下來的。恰恰相反，牠們是與已經過去的那個發展時期有聯繫的，那個時期是叫做國民經濟底恢復時期，那時的建設是依和平的道路進行的，所謂依自流的辦法進行的，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變動，那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却是新的發展時期，與舊時期，就是說與恢復時期不同的時期。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是新的建設時期，整個國民經濟在社會主義底基礎上改造的時期。這個新的時期引起新的階級變動，引起鬥爭底尖銳化。牠需要有新的鬥爭方法，需要重新分配我們的力量，需要改善和鞏固我們的一切組織。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錯誤也就是在於，他們現在還過著舊生活，牠看不見這

個保守派的特點。不得不新的鬥爭方法底必要。因此，他們試着瞞眼睛，抱張惶失措心理，害怕困難。

### 1. 關於階級鬥爭問題

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底這種瞞眼睛，這種張惶失措心理，其理論基礎，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以為，這種瞞眼睛和張惶失措心理底理論基礎，就是布哈林同志對於我們國內的階級鬥爭問題所採取的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我所指的是布哈林同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環境裏階級鬥爭關鍵底不瞭解。

在這裏，已經有人幾次從布哈林同志底“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小冊子裏摘引了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一段著名議論。可是這裏所摘引過的都有一些遺漏。請讓我把這段議論完全摘引出來。同志們，這是必要的，只有這樣，才可以看出布哈林同志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到了何等深刻的程度。聽吧：

“我們的農民的合作社組織底基本網子，將不是由富農式的，而是由‘勞動’式的合作社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會生入我們的一般國家的機關底系統內，這樣就會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這整體鏈子裏的單個環節。另一方面，富農的合作社的財富，也將同樣經過銀行等等而生入這個系統內；可是她們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如同租佃企業一樣。”★

有幾同志從布哈林同志底小冊子裏摘引這一段議論的時候，却不知為什麼把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遺落了。羅季特同志大概是想替布哈林同志幫忙，所以利用了這一點而從座位上叫喊，說人家曲解布哈林底意思。可是這全段引證底要點正在於最後一句關於租佃企業家的話。因為如果把租佃企業家與富農者作同等的東西，而富農又生入社會主義，那末從這裏會得出什麼結論呢？

★布哈林，“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工農聯盟”，第四九頁。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結論只有一個，就是說租佃企業家也生入社會主義，就是說，不僅富農，而且租佃企業家也生入社會主義（全場大笑）。

羅季特同志啊，這就是從這句話裏得出來的結論。

羅季特：布哈林同志所說的是“異類物體”。

斯大林：羅季特同志呵，布哈林所說的，並不是什麼“異類物體”，而是“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所以，富農和租佃企業家，“在某種程度內，是社會主義系統內的異類物體。可是布哈林同志底錯誤也正在於，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雖然“在某種程度內，是異類物體，可是，總還是生入社會主義。你們看，布哈林底理論竟弄到何等荒謬的地步。城市和鄉村的資本家，富農和租佃企業家，都會生入社會主義，——你們看，布哈林同志是說出何等荒謬的話來了。同志們，我們不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讓布哈林同志把他拿給自己去用吧。

直到現今，我們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都是認為，城市及鄉村中的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是有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正是建築在這一點上面的。而現在，照布哈林底關於資本家和平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說來，所有這些原理，都要推翻，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階級利益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正在消滅，剝削者正在生入社會主義。

羅季特：這是不對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需要的。

斯大林：可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鬥爭底最尖銳的形式。

羅季特：問題底本質正是在這裏。

斯大林：而照布哈林說來，資本家是生入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羅季特同志，你怎麼不懂得這一點？如果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家是生入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內，那末，到底是為反對誰而須要進行鬥爭，為反對誰而需要進行最尖銳的階級鬥爭呢？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是為着要與資本主義份子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為着要鎮壓資產階級和根本剷除資本主義。可是如果城市與鄉村中的資本家，如果富農及租佃企業家是生入社會主義，那末是否一般地還需要無

產階級專政呢？如果需要，那末是為誰壓什麼階級呢？

**羅季特：**問題底本質正是在於，照布哈林說來，所謂生入，是要有階級鬥爭的。

**斯大林：**我覺得，羅季特同志已經立誓要替布哈林同志效勞。可是他的效勞正好像是狗熊效勞一樣，因為，羅季特同志本來是想去掩護布哈林的，而事實上，却完全把他沉到水底下去了。難怪俗話說：「喜歡效勞的狗熊比敵人還危險些。」（全場呵呵大笑）

兩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本家階級與爭得了政權及建立了專政的工人階級之間有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或者是沒有這種利益矛盾，那末就只有一個辦法——宣稱階級利益底協和。

或者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或者是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或者是階級利益底不可調和的矛盾，或者是階級利益協和的理論。

兩者必居其一。

像布連唐諾或維伯這類的「社會主義者」，宣傳社會主義生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生入社會主義的主張，這還可解，因為這些「社會主義者」，實際上就是反社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的自由派。可是，一個人既然想做馬克思主義者而同時又宣傳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就不可解了。

布哈林同志曾在他的演說內企圖引列寧底一段著名的話來證實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同時，他斷定說，列寧所說的也同布哈林說的一樣。同志們，量是不對的。這是粗魯地和不可容許地誣蔑列寧。請看列寧這一段話底原文：

「當然，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兩個階級——工人和農民——底合作上面的，現在，在某種條件下，也容許了“耐波曼”，就是說資產階級，來參加這個合作。」★

你們看，這裏沒有一個字是講到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這裏只說到，我

★列寧「我們要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〇五頁。

們“在某種條件之下，，，也“容許了，，耐農變，就是說資產階級，參加工農底合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就是認為有耐農變生入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的。只有不怕羞恥的人才會這樣來解釋列寧底這一段話。這只是說，我們現在不消滅資產階級，我們現在不沒收牠的財產，而在相當條件之下還容許牠存在，所謂某種條件就是，要他們絕對服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法律，就是為要從國民經濟生活中逐漸排除資本家起見而日益加緊限制他們。不作極劇烈的階級鬥爭，而可以實行排除資本家和消滅資本主義的底根源嗎？是不可以的。既然有主張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理論和實際，那還可以消滅階級嗎？是不可以的，這樣的理論和實際，只能培植和永遠保全階級，因為牠，這個理論，是與階級鬥爭底理論相矛盾的。而列寧底這段話却完全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環境內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上面的。在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列寧關於專政是極尖銳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之間，會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顯然的，這裏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的地方。布哈林同志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階級鬥爭就應當熄滅和取消，以便達到階級底消滅。反之，列寧却認為，只有用經過堅持的階級鬥爭，階級才可以被消滅，這種鬥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候比無產階級專政以前還更劇烈些。列寧說：

“消滅階級是長久的，困難的，堅持的階級鬥爭底事情，這種鬥爭，在推翻了資本政權以後，在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以後，在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以後，並不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及舊社會民主黨底卑鄙人物所設想的那樣），而只是變更自己的形式，而在許多方面還成為更殘酷些，，，。這就是列寧關於消滅階級的話。

經過無產階級底極劇烈的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底公式。哈經過階級鬥爭底熄滅和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林同志底公式。

\*★列寧，“給匈牙利工人致信體”，，“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五頁。

這兩個公式之間能有什麼相同的地方？顯然的，牠們之間沒有而且不能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如此，布哈林關於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是離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他的理論就是最近於學院派社會主義底理論。

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所犯的一切錯誤底基礎，就在這裏。

有人會說，關於布哈林底富農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值不得多講，因為這個理論本身就說道——不僅說道，而且喊道——布哈林同志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當這個理論還躲在櫃子內的時候，這可以不去注意牠；在個別同志們底著作裏面有些愚鈍話，這有什麼奇怪呢？直到最近以前我們都是這樣對待的。可是在最近的時候，環境已經有了一些改變。在最近幾年來露張起來了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已經在肢解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使牠帶著迫切的性質。現在已不能說牠是藏在櫃子裏面了。現在，牠，布哈林同志底這個奇怪理論，有野心要成為我們黨內右傾底旗幟，社會主義底旗幟。因此我們已不能把這類理論忽略過去。因此我們一定要打碎這種理論，打碎這個不正確的和有害的理論，以便利我們的黨員同志們去與右傾作鬥爭。

## 2. 關於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問題

布哈林同志底第二個錯誤，是從他的第一個錯誤中產生出來的，這第二個錯誤是在於對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問題。對資本主義份子加強反蘇維埃政權底社會主義政策這個問題有不正確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這裏所說的是關於什麼事情呢？是不是說，資本主義成份比我們黨內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些，因此牠們加強自己的反抗，損害社會主義的建設呢？不，不是關於這一點。況且說資本主義成份比社會主義部份增長得快些，這是不對的。如果這是對的，那末社會主義底前途會已經快到滅亡的邊緣了。這裏所說的，是社會主義有成功地進攻資本主義成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成份增長得快些。資本主義成份底比重因此降落下去，正因為資本主義成份底比重降落下去，他們就感覺得有死亡的危險和加緊着自己的反抗。而他們當時還有加強反抗底可能，這

不僅因為世界資本主義給他們以幫助，而且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是降低了，他們的相對增長與社會主義底增長比較起來雖然是減低了，可是，他們的絕對的增長，還是有的，這也就給他們相當的可能來積累力量，以便反抗社會主義底增長。而在現今發展的階段上，在現今的力量對比條件之下，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和城市及鄉村資本主義成份反抗底加強，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底錯誤，就在於他們不懂得這種簡單的和顯明的真理。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以庸人的態度去觀察問題，企圖用各種的偶然的原因來解釋階級鬥爭底尖銳化，例如說是因為蘇維埃機關底“不中用”，因為地方的同志政策底政策“不謹慎”，因為“缺乏”，圓滑性，因為有“過火行動”，以及其他等等。

例如，在布哈林同志底“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本小冊子內有一段話，就表示他以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觀察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問題。請看這一段讀罷：

“鄉村中的階級鬥爭，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在以前的那種形式中爆發出來，而且這種尖銳化通常都是由富農份子所引起的。例如，富農們，或者是那些靠剝削別人而發財的，侵進了蘇維埃機關內的人們開始槍殺農村通信員，——這就是階級鬥爭表現底尖銳的形式（這是不對的，因為最尖銳的鬥爭形式是暴動。——斯大林註）。然而這樣的情形通常都是在這樣的地方發生的：在這些地方，地方的蘇維埃機關還是軟弱的。隨着這種機關底改善，隨着蘇維埃政權一切下層機關底強固，隨着地方的農村的黨的和團的組織底改善和加強，這種現象——這是完全顯然的——日益稀少，歸根到底將完全消失。★”

這樣說起來，那末階級鬥爭底尖銳化是由於機關方面底原因，由於我們下層機關中用或不中用，軟弱或強固。這樣說起來，那末，比方沙哈廷區農業

★布哈林，“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和工農聯盟”，由第五三到五四頁，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較智識份子底暗害行爲，這種資產階級份子對蘇聯政權的反抗底形式和階級鬥爭尖銳化底形式，並不是因為階級力量底對比，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底發展，而是因為我們的機關不中用。這樣說起來，那末在沙哈廷區內的大規模的暗害行爲未出現以前，我們的機關是好的，而後來，在大規模的暗害行爲出現的時候，機關却不知怎樣成了毫不中用的東西了。這樣說起來，那末，在去年以前，當糧食採辦還是自流式的進行和階級鬥爭沒有特別尖銳化的時候，我們的地方的機關是好的，或甚至是富於靈活性的，而從去年起，當富農底反抗已採取特別尖銳的形式的時候，我們的機關便忽然變壞了和不中用了。這不是解釋，而是拿解釋來陪玩笑。這不是科學，而是術術。

這類階級鬥爭底尖銳化應當拿什麼原因來解釋呢？

應當用以下兩個原因來解釋：

第一，因為我們的前進，因為我們的進攻，因為工業和農業裏社會主義形式的經濟底發展，這種發展同時使得城市和鄉村中相當的資本家隊伍受着相當的排擠。現在情形是這樣，就是我們是依照列寧底這樣一個公式過生活的，這個公式就是：“誰勝誰敗，：或者是我們——資本家——完全打倒，給他們一個——列寧所說過的——最後的決定勝利的鬥爭，或者是由他們把我們完全打倒。

第二，是因為資本主義份子不願自動下台；他們反抗着而且將來也還會反抗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看見他們生存底末日快要到了。而他們暫時還能夠反抗，因為他們的比重雖然降低了，但是在絕對關係上，他們還是增長着；城市和鄉村的小資產階級，如列寧所說過的，每日每時從自己的隊伍中提拔出資本家和小資本家，他們，這些資本主義份子，採取一切辦法來保持自己的生存。

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下台的事情。在歷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用盡一切氣力來保持自己的生存的事情。無論我們的下層階級機關將來是好還是壞，而我們的前進，我們的進攻，將要給資本主義的份子和排擠他們，而他們，垂死的階級，將要不顧一切而進行反抗。

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社會基礎就在這裏。

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把資本家反抗底增長與他們的比重底增長看作是同等的東西。可是這種同等的看法是沒有絲毫根據的。沒有根據，因為要是他們，資本家進行反抗，那末還並不是說，他們已比我們強些。實際上恰恰相反。垂死的階級起來反抗，並不是因為他們已比我們強些，而是因為社會主義增長得比他們快些。因此，他們日益比我們弱些。正因為他們日益變弱些，所以他們感覺到自己的末日要到了，而不得不盡力設法反抗。

現今歷史時期內階級鬥爭底尖銳化和資本家反抗底加強，其關鍵就在這裏。

實際情況既是這樣，黨底政策應當怎樣的呢？

牠應當是要喚醒工人階級和鄉村中被剝削羣衆，提高他們的戰鬥力，發展他們的動員的決心，來和城市和鄉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鬥爭，來和正在反抗中的階級敵人鬥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之所以是好的理論，局部地也就是因為牠使利害動員工人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

布哈林的關於資本家生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布哈林的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的見解，其害處是在什麼地方呢？

害處就在於，牠催眠工人階級，掩護我們國內革命力量底動員決心，解散工人階級底隊伍，便利資本主義份子進攻蘇聯底政權。

### 3. 關於農民問題

布哈林同志底第三個錯誤是與農民問題有關係的。大家知道，關於農民的問題，是我們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我們的條件下面，農民是由各種社會集團組成的，即是由貧農、中農及富農組成的。顯然的，我們對這些集團的態度是不能同樣的。貧農是工人階級底支柱，中農是同盟者，富農是階級敵人——這就是我們對於這些社會集團的態度。這都是很明顯的和大家所知道的。然而，布哈林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却有些不同。在他估計農民的時候，分化底事實是失落了，各個社會集團存在底事實，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而只剩下一個叫做什麼農村的灰色斑點。在他看來，富農不是富農，中農不是中農，而是什麼農村中的一片貧窮現象。他在這裏演講時也就是這樣說：難道我們的富農可以叫做富農嗎？他說：須知道這是窮人。他說：我們的中農難道像個中農嗎？須知道這是餓肚子的窮人。顯然的，這樣一種對農民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與列寧主義不能相容的觀點。

列寧說過，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個原理對不對呢？是絕對對的。為什麼把農民看作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呢？因為農民在構成我們的社會的兩個基本階級中間是這樣一個階級，牠的經濟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和小商品生產上面的。因為，農民，當他們還是經營着小商品生產的農民的時候，經常地和不斷地從自己的隊伍中產生出而且不能不產生出資本家。這種情況，在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對工農聯盟問題的態度問題上，對於我們有決定一切的意義。這就是說，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與農民的無論那個聯盟，而只是這樣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應當以與農民中的資本主義份子作鬥爭為基礎。可見列寧關於農民是最後的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的提綱，不但不與工農聯盟的主張相矛盾，而且相反，是給這種聯盟以根據，使牠成為以反對我們的經濟裏的資本主義成份為目標的工農聯盟。列寧提出了這個提綱，為的是要指明，工農聯盟，只有在牠是以反對那些由農民本身所分泌出來的資本主義份子的鬥爭做基礎的時候，才能是堅固的聯盟。

布哈林同志底錯誤就在於，他不懂得和不領會這個簡單的東西，他忘記在鄉村裏有幾個社會集團，在他的眼光內沒有富農，沒有貧農，而只剩得一片盡是中農羣衆。這是布哈林同志底毫無接觸的右傾，與託洛茨基主義的“左”傾相反，“左”，傾在鄉村中只看見有貧農和富農而看不見有其他的社會集團，看不見有中農。

在興農民聯盟的問題上，託洛茨基主義和布哈林同志這一派間的分別是在什麼地方呢？分別就在於：託洛茨基主義反對與中農羣衆成立聯同聯盟的政策，而布哈林派則主張與農民作無論那個聯盟。用不着證明，這兩個立場都是不

正確的，好像半斤和八兩一樣。

列寧主義絕對主張與農民底基本羣衆作堅固的聯盟，主張與中農聯盟，可是他並不主張無產階級那個聯盟，而是主張與中農作這樣的聯盟，這個聯盟可以保證工人階級底領導作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便利着消滅階級。

列寧說：

“關於工人階級與農民的協定，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法。從工人階級底觀點上來看，只有當這個協定是維持工人階級專政和成為消滅階級的辦法之一的時候，這個協定才是可容許的，正確的和原則上可能的；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工人階級與農民協定底公式，當然還是為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敵人，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敵人所主張的公式，，，★。往下又說：

“現在，無產階級掌握着政權並領導着這個政權。他領導着農民。領導着農民，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第一，以消滅階級為路線，而不是以適應小生產者為路線。如果我們離開這個根本的和基本的路線，那我們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而陷入這樣一些小資產者底營壘，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底營壘，這些小資產者，這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現在就是無產階級底最凶惡的敵人，，，★★

這就是列寧底關於與農民基本羣衆聯盟，與中農聯盟問題的觀點。

布哈林同志這一派入關於中農問題的錯誤，就在於他們看不見中農底兩面性質，介於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中間的兩面地位。列寧曾說：“中農是動搖的階級，，，。為什麼呢？因為中農一方面是勞動者，這是他與工人階級接近，而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財產者，這使他與富農接近。因此就有中農底動搖。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對的。這種動搖，在實際上也每日每時都表現出來。列寧說：

“農民既然是勞動者，他就傾向於社會主義，而願工人專政而不願資產階級專政。農民既然是糧食出賣者，他就傾向於資產階級，傾向於自由

\* “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三八七頁。

★ † “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九九至四〇〇頁。

貿易，就是說，後退到“慣常的”，，，陳舊的“湊來的”，資本主義，，。★

因此，與中農的聯盟，只有當牠是以反對資本主義份子為目標，反對一般資本主義，只有當牠是保證着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裏的領導作用，只有當牠是便利着消滅階級的時候，牠才可以是堅固的。

奇怪得很，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公然把這些簡單而明瞭的東西都忘記了。

### 關於新經濟政策和市場關係問題

布哈林同志底第四個錯誤，是與新經濟政策問題有關係的。布哈林同志在這裏的錯誤就在於，他看不見新經濟政策底兩面性，他只看見新經濟政策底一方面。當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我們曾把這政策底鋒芒用去反對軍事共產主義，反對那些排除任何貿易自由的統制和秩序。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新經濟政策是表示相當的貿易自由。布哈林同志是記住了這一方面的事情。這也是很好的。可是布哈林同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有這一方面，這就錯了。布哈林同志忘記新經濟政策還有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在於，新經濟政策並不是表示完全的貿易自由，在市場上玩弄價格的自由。新經濟政策，就是在保證國家底調節作用和牠在市場上起作用的情形之下的，在相當界限內的，在相當範圍內的貿易自由。新經濟政策底第二方面正是在這裏。而且，新經濟政策底這第二方面，如果不是比第一方面重要些，那至少也不會比第一方面次要些。在我們這裏，沒有像資本主義各國所通常都有的那種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的現象。糧食價格在基本上由我們規定。工業品底價格由我們規定。我們努力實行減低成本費和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同時極力保持農產品底穩定價格。市場上這樣的特殊辦法，是資本主義各國所根本沒有的，這難道不明白嗎？

由此可見，在有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應當保存牠的兩方面：一方面就是反對軍事共產主義底統制及以保證相當的貿易自由，另一方面，就是反對完全的貿易自由及以保證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如果取消這兩方面底某一方面

★“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四頁。

，那就不會有新經濟政策了。

布哈林同志認為，新經濟政策只能“從左邊”，受到危險，從那些想消滅任何的貿易自由的人們方面受到危險。這是不對的，這是最嚴重的錯誤。況且，現在這樣的危險是最不實在的，因為我們的地方的及中央組織內現在沒有或者差不多沒有那個人不懂得，保持相當的貿易自由是完全必要的完全妥當的。現在比較更實在得多的，是從右邊來的危險，是從那些想消滅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想“解放”，市場而這樣來開闢完全貿易自由底紀元的人們的危險。這種從右邊來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危險現在比較實在得多，這是絕不能有絲毫懷疑的。不要忘記，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正在這方面進行工作，——從右邊來進行破壞新經濟政策。也要記着，富農和富裕份子底呼號，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底呼號（我們有許多同志往往受着這些呼號底影響），正是從這方面來衝擊新經濟政策。布哈林同志看不見這種破壞新經濟政策的第二個危險，這個的確實在的危險，這件事實就無疑地證明他是受了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影響。

布哈林同志提議使市場“常態化”，和按區來“運用”，糧食採購價格，即是增高糧食價格。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他不滿意蘇維埃的市場條件，他想漸漸降低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並提議向那從右邊破壞新經濟政策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讓步。

暫時假定我們是聽從了布哈林同志底話。由此會得出什麼結果呢？比如說，在秋季，在糧食採購時期底初頭，我們提高糧食價格。可是因為市場上時常總有人，有各種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能多出兩倍價錢來收買糧食；又因為我們不能同投機商人去搶生意，因為他們總共收買什麼一千萬普特，而我們却需要收買幾萬萬普特，於是糧食所有者反正還是會把糧食拿著不賣，等候糧價漲價。於是到春季的時候，當國家正開始最需要大批糧食的時候，我們又要增加糧食價格。可是在春季來抬高糧食價格，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害死貧苦的農民和力量單薄的農民，這些農民在春季不得不買進糧食，部份地作為种子，部份地以供食用。而這些糧食就是他們在去年秋季以賤價賣出去而現在又以高

價買回來的。花費了這些手續以後，我們是不是能够得到什麼重大的結果，就是說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呢？一定是不能够得到的，因為總是有投機商人和屯賣商人，他們能够又用比我們多一兩倍的價錢來收買同是這些糧食。於是，我們又要去應付糧食價格底提高，白費氣力來與投機商人及屯賣商人競爭。

而既然是這樣，那末我們既然走上了提高糧食價格的道路，我們就應該越往下讀去，還是沒有把握可以得到足夠數量的糧食。

可是事情還不止於此。第一，我們既然提高糧食採辦價格，以後也就應該提高原料價格，以便維持各種農產品價格底相當比例。第二，我們既然提高糧食採辦價格，也就不能在城市裏維持糧食底低廉價格，——於是我們也就應該提高糧食底資價。可是因為我們不能而且不應得罪工人，——我們就應當以加快的速度來提高工資。可是這就不能不使得工業品底價格也提高起來，因為，如果不是這樣辦，那末就會使財源違反着工業化底利益而從城市裏流入鄉村。結果我們就會要不是根據降低的價格或至少穩定的價格來調勻工業品與農產品底價格，而是根據糧食和工業品一同提高的價格來調勻這些價格。換句話說，我們就會要採取使工業品和農產品漲價的方針。不難明白的，這樣的“運用”，價格，不能不弄到完全取消蘇維埃的價格政策，弄到取消國家在市場上的調節作用，弄到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這將對於誰有利益呢？這就是對於城市和鄉村中的豐裕階層有利益，因為高價的工業品和農產品，不能不成爲工人階級和貧農以及能力單薄的農民所買不起的東西。佔便宜的是富農，豐裕份子，耐邊曼及其他富足階級。

這也是聯絡，可是却是特殊的聯絡——是與鄉村及城市裏的富足階層的聯絡。工人和經濟力量單薄的農民將有全權來質問我們：我們究竟是誰的政權，是工農的政權呢，還是富農及耐邊曼的政權呢？

與工人階級及與鄉村裏經濟能力單薄的階層破裂，與鄉村及城市裏的豐裕階層聯盟——這就是布哈林底所謂市場“常態化”，及按著“運用”，糧食價格所要弄出的結果。

顯然的，黨是不能走上這條滅亡的道路的。

布哈林同志關於新經濟政策的一切觀念是混亂到什麼地步，他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牽制是厲害到何等程度，這局部地在下面這件事實裏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他對於城市與鄉村間的，國家與農民間的商品週轉底新形式問題，是抱着極端反對的態度。他氣憤起來和叫喊起來反對這樣的事實，就是國家已變成了用商品來供給農民的供給人，而農民已變成拿糧食來供給國家的供給人。他認為這是違背新經濟政策底一切規矩，幾乎是破壞新經濟政策。試問，有什麼根據呢？要是國家，國家工業變成替農民供給商品的人，而農民變成替工業，替國家供給糧食的人，這會有什麼壞處呢？要是農民變成了替國家工業供給棉花和糖蘿蔔以及大麻的供給人，而國家工業變成了替農業底這些部門供給城市商品，種子和生產工具的供給人，那麼這從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底觀點上來看會有什麼壞處呢？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在這裏是建立城市與鄉村間商品週轉底這些新形式底基本方法。可是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難道與新經濟政策底要求相矛盾嗎？如果因為有這種訂立合同的方法，農民不僅在棉花，糖蘿蔔和大麻方面，並且在糧食方面也變成國家底供給人，這會有什麼壞處呢？為什麼小批生意，零星生意可以叫做商品週轉，而按照關於價格及商品質量的預定條約（訂立定貨合同）來進行的大批生意就不能叫做商品週轉呢？這種荒唐話從那裏來的呢？城市與鄉村間按照訂立定貨合同的方法來實行商品週轉的這些新的普遍形式，正是在新經濟政策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牠們是我們的組織在加強對國民經濟實行計劃的和社會主義的領導方面的一個最大的進步。這難道不容易明白嗎？

布哈林同志已經不會了解這些簡單明瞭的東西，這不是奇怪嗎？

### 5. 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新式聯絡問題

最後就是關於工業發展速度和關於城市與鄉村間的新式聯絡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的意見分歧裏的最重要問題之一。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我們的一切關於黨底經濟政策問題的實際方面的意見分歧底線索，都是集中在

這個問題內面的。

什麼是新式聯絡，從我們的經濟政策底觀點上來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除掉城市與鄉村聯絡底舊形式以外，我們現在還需要這個聯絡底新形式；在舊形式下面，工業在主要方面是滿足了農民底個人的需要（花布，靴鞋一般的布疋等等），在新形式下面，工業將滿足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農用機器，拖拉機，改良的種子，肥料等等）。要是我們以前在主要方面是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而少牽涉到農民農莊底生產需要，那麼現在，我們除繼續滿足農民底個人需要以外，同時還需要盡力供給農用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這些東西都是與農業生產在新技術基礎上的改造有直接關係。過去，當任務還是在於恢復農業及由農民好好經營過去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的時候，我們還能够以舊式聯絡為滿足。可是在現在，當任務已經是在於改造農業的時候，這已經是不夠了。現在須要更加前進，須要幫助農民在新技術及集體勞動底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

第二，這就是說，除了改造我們的工業以外，同時我們還應當開始來認真改造農業。我們正在改造而且局部地已經改造了我們的工業，給我們的工業建立新的技術基礎，供給牠以新的優良的機器，新的優良的幹部。我們建造着新工廠和製造廠，改造和擴大改善舊的工廠。我們發展着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因為這個原故，城市就發展起來，新的工業地點就增多起來，舊的工業地點就擴大起來。因為這個原故，對糧食食品，對工業原料的需求也就增長起來。而農業依舊還是使用舊工具，使用舊的，祖先遺傳下來的耕種方法，使用舊的，原始的，現在已不中用或者差不多已不中用的技術，使用舊的，小農的個人的經營方式和勞動方式。比方，革命以前我們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至少有二千五百萬的農戶，這個事實不是有很大的意義嗎？這一切不是證明農村經濟日益帶有漸散零碎的性質是什麼？而漸散的小農戶經濟底特點，就在於他們不能在既有的限度內利用技術，機器，拖拉機，農業科學成績，就在於他們是少帶商品性的農業。因此，農產品內的商品出產量就感覺不夠。因

此，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之間就有發生破裂的危險。因此，就必需促進農業底發展，使牠趕上工業發展底速度。所以，為要不致有發生這種破裂的危險起見，須開始在新技術底基礎上來認真地改造農業。而為着改造農業起見，就須要把分散的農戶漸漸聯合為大規模的農莊，集體農莊，須要把農業建立在集體勞動底基礎上，須要擴大集體農莊，須要廢農舊的和新的蘇維埃農莊，須要把大批訂立定貨合同的形式有系統地應用於農業底一切基本部門，須要廣設農業機器站，以幫助農民來學會使用新技術和把勞動集體化，——總而言之，須要把小農戶漸漸轉到大的集體生產底基礎上，因為只有公共的大生產才能夠盡量利用科學成績與新技術成績，大大推進我國農業底發展。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應當忽視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不，不是的，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工業供給糧食及原料這件事情上，現在是有而且在最近將來也還會有主要作用。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必須幫助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可是這就是說，單單只是個體的農民經濟已經不夠了。我們的糧食採購方面的困難，正是證明這一點。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以外，同時還須要盡力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因此須要以普遍訂立定貨合同，以成立農業機器站，以盡量發展合作制運動，作為個體的貧農中農農莊和集體的公共農莊之間的橋樑，以便使農民將自己小的個體農莊轉到集體勞動底航道上。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真正發展農業。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解決五級問題。沒有這些條件便不能使經濟力量單薄的農民階層解脫痛苦，解脫貧困。

最後，這就是說，必須努力發展我們的工業，因為我們的工業，是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基本供給來源，必須發展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必須建設拖拉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經過廣泛的訂立定貨合同制來督促基本的農民羣衆達到集體形式的經營，如果不用很多的拖拉機，農業機器等等來供給農業，那末就沒有可能來發展集體農莊，就沒有可能來發展農業機器站。但是，如果不加緊速度來發展工業，就沒有可能來用機器和拖拉機去供給農業。因此，用加快速度來發展我們的工業便是在集體制

度基礎上進行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新式聯絡底意思和意義，就是這樣。

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新式聯絡底必要。可是，這不過是口頭上的承認，其目的是要用在口頭上承認新式聯絡這一點做掩護，以便暗中偷運一種直接相反的東西。實際上，布哈林同志是反對聯絡底新形式的。布哈林同志底出發點並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農業生產改造事業底樞紐，而是發展個人的農民的農業。在布哈林同志看來，最主要的就是使市場“常態化”，以及容許農產品市場上的自由玩弄價格，實質上就是容許完全的自由貿易。因為是這樣，所以他就對集體農莊採取不信任態度，這種不信任的態度，當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上演說時以及當他在中央七月全會以前起草提綱時，他就已經表現了出來。因為這樣，所以他就對於在採辦糧食時為反對富農而採取的所有一切的和各種各樣的非常辦法都抱着否定的態度。大家都知道：布哈林同志最避非常辦法，正好像邪鬼躲避正神一樣。大家都知道，布哈林同志一直到现在還不能了解，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富農不會自願地，按照自流手續來繳納充分數量的糧食。這一點現在已經由我們糧食採辦工作底兩年來的經驗所證實了。

如果商品糧食始終還是不够，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要用非常方法來騷動富農；從外國輸入糧食吧。不久以前，他還提議從外國輸入五千萬普特糧食，就是說，輸入價值一萬萬金盧布的糧食。如果金盧布需要來輸入工業裝置品，那又怎樣辦呢？布哈林同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必須南顧從外國輸入糧食，這顯然是要把輸入工業裝置品的事情放在末尾的地位。

這樣就是說，為要解決五穀問題和改造農業起見所需要的基礎，並不是加快速度發展工業，而是以自由市場及在自由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這一點做基礎來發展個人的農民的農業，富農的農業也在內。

這樣看來，這裏是有兩個不同的經濟政策計劃：

葛底計劃：

一、我們要改造工業；

二、我們要開始認真改造農業；

三、為要做到這一步，就要擴展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底建設，廣泛地採用訂立定貨合同制和設立農業機器站，以作為建立工業與農業間的生產聯絡的手段。

四、至於說到現時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那就必須承認，在這裏採取一種得着中農貧農羣衆底公共贊助的臨時的非常辦法，是可以的，這是打破富農底反抗和盡量取得他的剩餘糧食的手段之一，而為要免得從外國輸入糧食和保存金幣來發展工業，就必須取得這些剩餘的糧食。

五、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在給國家供給糧食和原料這件事情方面，現時有而且將來還會有主要的作用，可是單靠牠已經不夠了，——因此除發展個體的貧農中農經濟以外，同時還要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廣泛地採用訂立定貨合同制，加強發展農業機器站，為的是要易於把資本主義份子排擠於農業以外，易於把個體農莊漸漸移到大規模的集體農莊底軌道上去，移到集體勞動底軌道上去。

可是為要達到這一切，就必須首先努力發展工業，五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拖拉機工廠，農業機器工廠等等。而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能解決五穀問題和改造農業。

結論就是：加快速度來發展工業，便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布哈林同志底計劃：

一、使市場“常態化”，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和提高糧食價格，那怕這一點會弄到工業品，原料和糧食都昂貴起來。

二、盡力發展個體的農民的農業，而同時相當地降低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底發展速度（布哈林同志在七月間提出的提綱，布哈林在七月全會上的演說）。

三、用自流辦法採辦糧食；根據這種採辦法，那末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面都不容許採用——那怕就是局部地採用——非常辦法去對付富農，即使這些辦法得到中農貧農羣衆底贊助，都是不可以採用的。

四、如果採辦的糧食不够，便拿出一萬萬盧布去從外國輸入糧食。

五、要是金幣不夠來同時開支糧食底輸入和工業裝置品底輸入，那就應該減少裝置品輸入，也就是說降低我們工業發展底速度，——不然我們的農業就會“踏步原地”，也許還會“簡直下降”。★

結論就是：發展個體農民經濟，便是農業改造事業底關鍵。

事情底真相，就是這樣的，同志們！

布哈林同志底計劃，就是降低工業發展底速度和放棄新式聯絡的一個計劃。

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這樣。

我們對於發展新式聯絡，發展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等等這件事情，是不是做遲了呢？

有人斷定說，黨對於這件事情，至少遲做了兩年。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只有不懂得蘇聯經濟的“左的”，空談家才能這樣說。所謂在這件事情上做遲了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事情是在於預先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必要，那末我們還在十月革命時就開始了這件事情。而關於黨還在十月革命時期就已預先看到了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這一點，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來了，還可以拿黨底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黨綱來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在那裏已經十分明顯地顧及到了。可是要實行和組織推進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單只靠我們黨底上層領導份子預先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要，還是不夠的。所以，問題不在於預先看到，而在於實現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建設底計劃。可是為要實現這樣的計劃，就需要有好些條件，而這些條件，是我們以前所沒有過的。這些條件

★布哈林：“經濟學家底意見”。

只是在最近才表現出來。事情就在這裏，同志們。

爲要實行這個擁護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羣衆運動底計劃，爲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需要使黨底上層機關在這方面首先得到黨員羣衆底贊助。而我們的黨是人數達百萬的黨，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此，當時需要說服廣大的黨員羣衆，使他們相信上層領導機關底政策是正確的。這是第一。

其次，爲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有農民羣衆裏造成擁護集體農莊的羣衆運動，要農民不害怕集體農莊，而根據經驗相信集體農莊是比個體農莊好些，並自動地跑進集體農莊去。而這一點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是需要花費相當時間的事情。這是第二。

其次，爲要做到這一步，就需要國家有一批爲資助這個運動，爲資助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所必需的經費。而爲要資助這件事情，是需要許多萬萬款子的，親愛的同志們。這是第三。

末了。爲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需要使工業多少充分地發達，以便用機器，拖拉機，肥料等等來供給農業。這是第四。

是不是可以斷定說，在兩三年以前我們已有了這一切條件呢？不，不能這樣說。

不可忘記，我們是執政黨，而不是反對黨。反對黨可以發出口號——我講的是運動底根本實際口號，——而打算在自己取得政權以後去實現。誰也不能說，反對黨不立刻實現自己的基本口號是他的過錯，因爲大家都懂得，當權的不是他這個反對黨，而是別的黨。而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是執政黨，所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這種政黨底口號不是簡單的（鼓動的）口號，而是一種更大得多的東西，因爲這些口號有實際解決底效力，有法律底效力，是應當即刻就實行的。我們的黨決不能提出實際的口號而然後把牠延擱不執行，如果這樣，那就是欺騙羣衆。要發出口號，特別是將千百萬農民羣衆轉移到集體制度底軌道上去這樣重大的口號，須要有可以使牠們直接實現的條件，末了，須要創造和組織這些條件。因此，單只是黨底上層機關預先見到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必

要，這對於我們還是不夠的。正是因為這些緣故，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些為實現和切實執行我們的口號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黨底黨員羣衆，比如說，在兩三年以前是不是已經有決心去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呢？不，他們當時還沒有決心去做這件事情。黨員羣衆向着新式聯絡方面的重大轉變，只是從糧食採辦方面的第一批嚴重困難發生時才開始的。只是因為發生了這些困難，黨員羣衆才感覺得十分需要加速建立新式聯絡，首先就是加緊建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並堅決贊助自己的中央委員會來進行這件事情。這就是我們從前沒有而且現在却有的一個條件。

兩三年以前，我們這裏是不是有過千百萬農民羣衆贊成集體農莊或蘇維埃農莊的重大運動呢？是沒有的。人人都知道，兩三年以前農民是敵視蘇維埃農莊的，至於集體農莊，卻被他們譏笑為毫不中用的“共產社”。而現在呢？現在就不同了。現在我們這裏已有整批農民階層把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看作是使農民經濟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幫助的來源：種子，優良的牲畜，機器和拖拉機。現在，只要是有機器和拖拉機，集體農莊底事業就會以加快的速度前進。

在某一些的，很廣大的農民階層裏的這種轉變是從那裏來的呢？牠是由什麼促進了的呢？首先是由於合作制和合作運動的發展。無可懷疑的，如果沒有合作制，尤其是如果沒有農業合作制——這種合作制已在農民中間造成贊助集體農莊的心理基礎——底強大的發展，我們這裏就不會有像現在整批農民階層所表現的這種趨向於集體農莊的熱心。現有的組織得優良的集體農莊在這裏也起了大的作用，因為她們給了農民好的榜樣，表明將小農的農莊合併為大規模的農莊，合併為集體農莊，是可以怎樣改良農業。這裏發生了相當作用的，還有現成的設備得優良的蘇維埃農莊，因為她們幫助了農民改良他們的農業。我還不說到大家所熟悉的其他的事實。這就是我們從前所沒有過的而現在却有了的又一個條件。

其次，可不可以斷定說，兩三年以前曾有可能去認真地資助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發出數萬萬盧布來資助這件事情呢？不，不能這樣斷定說。你們明

自知道，我們在當時運用去發展最低限度的工業（沒有這樣最低限度的工業便根本不能有任何的工業化）的經費都不够，更不用說去改造農業了。當時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那成為國家工業化底基礎的工業方面取出這些經費，而把他們轉給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據然是不可以的。可是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經費來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了。

末了，可不可以斷定說，兩三年以前我們已在工業方面有了充分的基礎來加緊產拿機器和拖拉機去供給農業等等呢？是不能這樣斷定說的，那時的任務，在於創造最低限度的工業基礎以便將來用機器和拖拉機來供給農業。當時我們的區區的款項也就用去創造這種基礎。可是現在呢？現在我們已有這種工業基礎以供給農業底需要。無論如何，這種基礎，在我們這裏，正在以加快的速度創造起來。

可見，為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底大批發展所必需的條件，只是在最近時候才造成的。

同志們，事情底真相就是這樣的。

正是因為這些緣故，所以不能說我們把發展新式聯絡這件事做得太遲。

#### 6. 布哈林同志是怎樣的理論家

右傾反對派底理論家——布哈林同志——在我們的政策底這些基本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大體就是這樣。

有人說，布哈林同志是我們黨底理論家。他當然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不小的理論家。可是問題底質質就在於，他的理論並不完全都是高明的。這只要看他在黨的政策底問題上所作出的那一大堆錯誤，——關於這些錯誤，我在上面已經講過——就可以知道。這些錯誤，關於共產國際問題上的錯誤，關於階級鬥爭問題，關於階級鬥爭尖銳化問題，關於農民問題，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和關於聯絡底新形式問題所犯過的這些錯誤，決不能是偶然出現了的。不，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他們，布哈林同志底這些錯誤，是從他的不正確的立場，從他的理論缺點中產生出來的。是的，布哈林同志是個理論家，可是他不完全

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這個理論家還得要補習一下以後，才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有些人總是藉口說列寧那封給了理論家布哈林以估計的著名的信。現在來談一談這封信吧。列寧說：

“從年青的中央委員中間，我想關於布哈林和皮謹可夫說幾句話。我以為這是較出色的人材（就最年輕的人材來說），關於他們須要注意以下一點：布哈林不但是黨內部資貴的和極巨大的理論家，他還理應被看作是全黨所喜愛的人，可是要把他的理論觀點算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懷疑的，因為在他的思想裏有些學究氣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並且我知，他從來也沒有完全懂得辯證法），，★。

總之，不懂辯證法的理論家。學究式的理論家。要把他的“理論觀點算作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那是很可懷疑的，，的理論家。列寧對於布哈林同志底理論面目的估計，就是這樣。

同志們，你們自己都懂得，這樣的理論家還得要補習一下。如果布哈林同志懂得：他還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理論家，他還需要補習，他是一個還沒有完全領會辯證法的理論家，而辯證法却是馬克思主義底精髓，——如果他懂得這一點，他就會謙遜一些，而這樣一來，對於黨只有好處。但是倒霉處就在於布哈林並不過於謙遜。倒霉處就在於他不僅不過於謙遜，而且關於好些問題，首先是關於國家底問題，他還想去教訓我們的教師列寧。同志們，倒霉處就在這裏。

在這裏，我要引證一九一六年列寧與布哈林關於國家問題所發生的著名的理論上的爭辯。這一點對於我們很是重要，以便揭露布哈林同志底太不量力的野心，想去教訓列寧的這種野心，同時也可以揭露他在這樣的重要問題上，如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階級鬥爭問題等等上的理論弱點底根源。大家知道，一九

★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底記錄，第四卷第六六頁。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一六年在“少年國際雜誌”上登出布哈林同志底一篇文章，署名為 *Nota Bene*，這篇文章在事實上是用來反對列寧的。布哈林同志在這篇論文內寫道：

“……要是認為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區別，在於前者贊成國家而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了。實際上區別就在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作為集中的，即是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不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却只是退步到舊的技術，舊式企業……。”

“……社會民主黨是，或者至少適當是羣衆底教育者，對於這個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現在的戰爭已經指明國家觀念底根蒂是何等深入到工人底心靈內去了。”

列寧批評布哈林同志底這些觀點。於一九一六年發表了一篇專門論文回答：

“這是不對的。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而所回答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他們對將來社會底經濟基礎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這當然是很重要和必要的問題。可是並不因此而就可以把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的主要區別忘記。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謀工人階級底解放的鬥爭中利用現代的國家及其各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為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特殊的過渡形式。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牠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想‘炸毀，，(sprengen) 牠，如 *Nota Bene* 同志在一個地方就這樣說而把這種觀點誤推在社會主義者頭上。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了，——認為，在資產階級被剝奪以後，國家就要喪亡，“消滅，，“死去，……。

“……要想‘着重指出，，對於國家的‘原則上敵視態度，，就要真正‘明白，，懂得這態度，而作者恰恰就沒有明白性。“國家觀念底根蒂，，這種話，是完全糊塗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並不是“

國家觀念，，確否了國家觀念底否定，而是機會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以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態度去對待國家）確否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去對待資產階級的國家和以這樣的态度去利用國家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推翻這階級）。這是完完全全不相同的東西，。★

這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布哈林同志是滾入了何等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泥潭，這大概是明白了吧！

**斯騰說道：**那時列寧還沒有盡量規定“炸毀，國家底必要。而布哈林顯然是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却已着手去規定這個問題。

**斯大林繼續說道：**斯騰同志，不是的，現在講的不是關於這一點，現在講的是對於國家的一般態度，是關於這一點，就是依布哈林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工人階級底國家也在其內。

**斯騰說道：**那時列寧只講到關於利用國家的問題，而關於“炸毀，問題，他在批評布哈林同志時，却絲毫也沒有講到。

**斯大林繼續我道：**斯騰同志，你弄錯了。我敢給你擔保，這裏講的是關於，依布哈林（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着重指明自己對於任何國家，因而也是對於過渡時期的國家，對於工人階級底國家的原則上的仇視態度。你試去向我們的工人解釋，說工人階級應當極力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國家。布哈林在“少年國際雜志”，上的論文中所發揮的主張，就是否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的主張。布哈林同志在這裏忽略過了一件“小事情，，就是他忽略過了一整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工人階級如果的確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便不能不要有自己的本身所有的國家。這是第一。第二，說列寧同志在自己的批評中沒有講到關於“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列寧不僅講到了這種理論，這從我們所引述的那段話內可以看出來，而且他還曾批評牠，說牠是

★“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九六頁，“少年國際”，。

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提出關於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創造新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與他對立。末了，不要把無政府主義的關於“炸毀”，國家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理論混為一談。同志們中間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觀念混為一談，認為他們都是同一個思想底表現。可是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在批評無政府主義的關於“炸毀”，和“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的時候，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理論為出發點的。

要是我為着更明白起見，把列寧關於國家問題的手稿之——這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或一九一七年初（二月革命以前）寫的——引出來，或許不是沒有益處的。從這篇手稿中可以容易看到：（一）列寧批評布哈林同志底無政府主義的關於國家問題的錯誤的時候，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理論為出發點；（二）雖然布哈林，依列寧底說法，“比考茨基較近真理”，可是他還是“並沒有揭破考茨基派，反而用自己的錯誤去幫助他們”。請看這篇手稿的原文：

“在關於國家問題方面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是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六號至二十八號，恩格斯寫給伯伯爾的一封信。

請看這封信底整段最重要的地方：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照這幾個字底文法意思講來，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自己的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所有這一套關於國家的廢話了，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在原來意思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字眼來攻擊我們已太够了，雖然馬克思底那些用以駁斥普魯東的著作和以後的‘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簡直說過：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施行時，國家就要自行解散(*sich auflöst*)和自行消滅。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時，在革命時不得不利用來以暴力來鎮壓自己的敵人的一種臨時機關，那麼關於自由的人民國家的說話就是純粹的無謂之談：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

時，他不是爲自由起見而需要牠，而是爲壓壓自己的敵人起見而需要牠。而到了有可能來談到自由時，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了。因此，我們要提倡到處用“公社”，(Gemeinwesen)這個字眼來代替國家這個字眼，公社這個字眼是一個很好的德國古字，與法文的“康姆納”，相當，(着重點是恩格斯加的)。

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裏大概是最早著的和最激烈的“反對國家”的議論了。

(一) “應當拋棄所有這一套關於國家的廢話，，。

(二) “公社已經不是在原來意思上的國家了，，。

(到底是什麼呢？顯然是由國家到無國家的過渡形式！)

(三) 無政府主義者利用“人民國家”，這字眼來“攻擊”，(原文 in die Zähne geworfen ——打嘴巴)我們已經够了(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爲他們的德國朋友犯了這個顯然的錯誤而覺得不好意思；然而他們認爲，依當時的情況當然是正確地認爲，這個錯誤比無政府主義者底錯誤是比較不重要得多。這要 NB!! )

(四)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施行時，，，國家便會“自行解體和自己消滅，……“自行解散”，(Nota Bene) (請與以後的“死亡”，字眼對照看)……

(五) 國家是“在鬥爭時，在革命時，，所必需的“臨時機關，，……(當然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六) 國家之需要，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着壓抑 (Niederhaltung)——這個字並不是壓倒這個字底本來意思，而是制止復辟，鎮服)無產階級底敵人。

(七) 有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

(八) “我們(即是恩格斯和馬克思)奏提議“到底，，(在頭上)不講“國家”，而講“公社”，Gemeinwesen，“康姆納”，I

由此可見，不只是機會主義者，而且是考茨基，也是如何俗化了和污辱了馬克思與恩格斯。

這八項最聖潔的思想，機會主義者一項也沒有懂得！

他們只採取了現有東西底實際需要：利用政治鬥爭，利用現代國家來訓練和教育無產階級，來“奪得讓步。這是對”（反對無政府主義者），但這還只是百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如果可以這樣用算術名詞來表示的話。

考茨基在他的宣傳作品和一般的時評著作上，完全抹煞了（或者是忘記了？或者沒有懂得？）馬克思底一、二、五、六、七、八等項和“Zerbrechen”，這個字。（考茨基在一九一二或一九一三年與潘萊枯克辯論時（看下面四十五頁至四十七頁），關於這個問題已完全滾落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

使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主張現在利用國家和（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候也利用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目前對於實際工作最重要的幾項。（布哈林正是把這幾項忘記了！）

使我們與機會主義者不同的，就是以下的幾點更深刻。“更悠久的，真理，就是：（一）國家是有“暫時”的；（二）現在關於國家的“廢話”，是有害的；（三）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底性質；（四）國家與自由是相矛盾的；（五）應當用“公社”，這個字眼代替國家這個字眼，“公社”，這個字眼是比較更正確的觀念（概念，綱領名跡）；（六）應“打破”，（Zerbrechen）軍閥官僚的機器。還有一點不可忘記，就是德國公開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科里布等）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綱領和考茨基便間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因為他在日常鼓動中不談到牠，並容忍科里布等人底叛徒行爲。

一九一六年八月，已經向布哈林寫過：“請你讓自己的關於國家的思想完全成熟罷……可是，他並沒有讓自己的這種思想完全成熟，而就在刊物上發表了，署名為‘Nota Bene’，而且他所發表的意見並沒有指破

考茨基派，反而是用自己的錯誤去幫助了他們！可是實際上布哈林是比較考茨基近於真理的，（列寧）。

關於國家問題的理論爭辯底簡略歷史就是這樣。

問題本來似乎是很明顯的：布哈林犯了半無政府主義的錯誤，——早已應當改正這些錯誤，而跟着列寧底脚步前進。可是只有列寧主義者才能這樣想。布哈林却不同意這一點。他反而斷定說，不是他錯了，而是列寧錯了，不是他跟隨了或者應當跟隨着列寧底脚步走，而是相反，原來列寧不得不跟隨布哈林底脚步走。同志們，你們不相信嗎？如果不相信，請再聽下去吧。自從一九一六年發生這些爭論以後，已經九年了，在這九年之內布哈林同志沒有撤筆，在列寧死後過了一年，就是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同志把他的“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理論”，這篇論文登在“法權底革命”，彙刊上，而這篇論文就是以前“社會民主黨人彙刊”，編輯部（即列寧）所沒有接受來發表的，他在這篇論文底附註上面簡直說，在這次爭論中，對的並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同志們，這看起來是很奇怪的，然而這却是事實。

請聽聽這個附註底本文：

“依里奇（即列寧）曾經發表一稿評論來反對‘少年國際雜誌’，上的一篇論文。讀者容易看到，人家曾經硬說我有錯誤，可是我本來沒有錯誤，因為我明白看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另一方面，從依里奇底評論中可以看出，他那時對於炸毀國家（當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這種原理有了不正確的態度，他把這個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底喪亡問題混淆了。也許我那時應當多多發揮專政的問題。但是我可以這樣來替自己辯白，就是那時社會民主黨人曾經這樣風行一時地讚美資產階級的國家，以至於在這種情形下面，自然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關於炸毀這架機器的問題上。

當我由美國回到俄國而碰見了克魯普斯加姪同志的時候（這是在我們的秘密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這時依里奇已躲藏起來），牠的第一句話就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是這樣說：“依里奇叫我向你轉達，說關於國家問題，他現在與你並沒有什麼意見分歧，”。依里奇研究問題時，也得出了關於“炸燬”的同樣結論★，可是他是這樣發揮了這個題目以及關於專政的學說，以致於在這方面的理論思想發展中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布哈林同志在列寧死後經過一年的時候，就是這樣譏諷列寧的。

這就是沒有學習成就的理論家過分妄自尊大底標本。也許克魯普斯加嫂同志真是對布哈林同志說過他在這裏所寫的話，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從這裏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從這裏只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列寧曾經有了一些根據來意料布哈林同志已經放棄了或者已決意放棄自己的錯誤。不過是這樣罷了。可是布哈林同志却有了另外的打算。他斷定了，從今以後應該算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底創造者或至少是發啓人的。並不是列寧，而是他布哈林同志。

我們向來都認爲，並且現在還繼續認爲我們自己都是列寧主義者。可是現在才知道：列寧和他的學生——我們，原來都是布哈林主義者。同志們，這真是有點兒好笑。可是布哈林同志既然要這樣過分妄自尊大，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也許可以設想，布哈林同志在上述這篇論文底附註上不過是偶然失言，說了一句謊話，後來已經把他忘記了。可是這原來是不對的。布哈林同志底話，原來是完全認真說出來的。這一點可以從這樣一件事實中間看得出來，就是布哈林同志在這個附註中所說的關於列寧底錯誤和布哈林底有理這種話，在不久以前，就是說在一九二七年，就是說在布哈林同志第一次襲擊列寧以後已經過兩年的時候，又在馬列茨基同志所作的布哈林同志底傳略裏發表出來了（請參看“蘇維埃百科全書”，），並且布哈林同志連想都沒有想到要去抗議馬列茨基

★重點是我加的一一斯大林註。

★★“法蘭西革命”，此刊第一冊，一九二五年共產主義學院出版，第五頁。

同林底這種……大膽行爲。顯然的，布哈林同志底反對列寧的言論，決不可以認為是偶然的。

這樣說起來，那末對的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底發聲人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

同志們，布哈林同志底理論上的錯誤和理論上的妄自尊大，就是這樣的。

雖然是這樣，這個人却還是有勇氣來在這裏，在自己的演說裏，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上“有些腐朽東西”，說在我們黨底理論立場上有趨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傾向，而說這樣話的，就正是這個布哈林同志，這個布哈林同志現在正犯着（而且過去已經犯過）好些最粗鄙的理論錯誤和實務錯誤，不久以前還作過托洛茨基底門生，昨天還找過托洛茨基派做同號者來反對列寧主義者，還與他們暗中私通過！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好笑嗎？

### 7. 是五年計劃呢，還是兩年計劃呢

現在來講李可夫同志底演說。要是布哈林同志企圖給右傾思想以理論的基礎，那末，李可夫同志就極力想在自己的演說中替這件事情立定實際提議的基礎，拿我們農業方面的王難底“可怕情形”，來恐嚇我們。這並不是說，李可夫同志沒有提到理論問題。不，他提到了這些問題。可是他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至少是犯了兩個嚴重錯誤。

李可夫同志所提出的關於五年計劃的決議草案，被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否決了，那草案上說，“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國民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把這種完全不正確的立場否決了，可是李可夫同志竟在這次演說中擁護了這種立場。說在蘇維埃國家內五年計劃底中心思想就在於勞動生產率底增長，這話對不對呢？不，不對的。並不是國民勞動生產率底任何的增長，都是我們需要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國民勞動生產率底一定的增長，就是——需要足以保證國民經濟底社會主義部門有系統地超過資本主義部門的這種增長。同志們，問題底實質就在這裏。五年計劃如果忘掉這個中心思想，那末牠就不是五年計劃，而是五年廢話。勞動生產率底一般的增長，是任

何一個社會所願意的，無論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無論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也好，都是願意有的。蘇維埃社會與其他任何社會不同的地方也正在於，牠所願意有的，並不是勞動生產率底任何的增長，而只是這樣一種增長，這種增長要能够保證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超過其他各種經濟形式，首先是超過資本主的經濟形式，如此而保證征服和排擠出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而李可夫同志却把蘇維埃社會發展五年計劃底這種真正中心思想忘記了。這裏就是他的第一個理論錯誤。

他的第二個錯誤就在於，從商品週轉底觀點上看來，他不懂得（比如說）集體農莊和任何個人農莊，——就中也包括資本主義的個人農莊——中間的分別，或不願意明確牠們中間的分別。李可夫同志斷定說，從糧食市場上商品週轉底觀點上看來，從取得糧食的觀點上看來，他看不見集體農莊與糧食私有之間的分別，所以，在他看來，我們是從集體農莊方面，從私有主方面，還是從某個阿根廷的糧食商賈方面去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是重複伏龍金同志底著名言論，伏龍金同志有一個時候曾經對人說，在他看來，在何處以及向何人，向私有主還是向集體農莊去買糧食，橫直都是一樣的。這就是給糧食市場上的富農統計作暗藏式的掩護，辯護與解釋。雖然這種掩護是從商品週轉底觀念上進行的，可是這個事實並不改變事實底質質，就是這種掩護畢竟是替糧食市場上的富農統計辯白。如果從商品週轉底觀點上看來，集體形式的經濟與非集體形式的經濟之間沒有分別，那麼，是不是值得去發展集體農莊，是不是值得給牠們以優待條件，是不是值得去實現那征服農業上的資本主義成份的困難任務呢？李可夫同志顯然是採取了不正確的方針。這裏就是他的第二個理論錯誤。

而且這還不過是順便說的話。現在來講李可夫同志底演說中所提出了的實際問題。

李可夫同志在這裏斷定說，除了五年計劃之外，還需要有另外的平行的計劃，就是發展農業底兩年計劃。他引用農業上的困難作為提議平行的兩年計劃

的根據。他說過：五年計劃是好事情，他也是贊成的，可是如果我們同時還擬定農業底兩年計劃，那就更好，——要不然，農業事情就會停頓。表面上看來，這個提議似乎一點也不壞。可是如果切實去考察一下，就可看出，他之所以想出農業底兩年計劃，原來是爲的要着重指出五年計劃是不切實的，是紙上的，而兩年計劃是切實的，可行的。我們能够同意這一點嗎？顯然是不能够的。我們曾向李可夫同志說過：如果你不滿意農業方面的五年計劃，如果你認爲五年計劃上所規定的用去發展農業的款子不够，就請公開說出你的補充提議，說出你的補充投資數目來，——我們同意把農業上的這些補充投資加在五年計劃上。結果是怎麼樣呢？原來李可夫同志並沒有什麼關於農業上的補充投資的補充提議。試問，那麼農業底平行的兩年計劃要着幹什麼呢？我們往後又向他說過：除了五年計劃之外，還有每年計劃，這是五年計劃底一部份，——請把你關於振興農業方面的補充的具體提議加進頭兩年的每年計劃上面去，如果李可夫同志一般地是有這些提議的話。結果怎麼樣呢？原來李可夫同志並沒有提出這樣的關於補充撥款的具體計劃。那時我們就明白了李可夫同志關於兩年計劃的提議，並不是要去振興農業，而是想來着重指出五年計劃是不切實的紙上計劃，而是想來破壞五年計劃，爲着安慰“心靈”，爲掩飾門面，就需要五年計劃，爲着進行事情，爲着實際工作，就需要兩年計劃，——李可夫同志底戰略，原來就是這樣。李可夫同志提出兩年計劃來，是爲着在以後，在五年計劃底具體實行過程中，好拿兩年計劃來對抗五年計劃，好來改造五年計劃，使五年計劃變成兩年計劃，這樣來縮小和調削那些用來發展工業的經費。

我們之所以否決了李可夫同志底關於平行的兩年計劃，就是因爲有了這些理由。

### 8. 關於耕種面積問題

李可夫同志在這裏恐嚇我們黨，說全蘇聯底耕種面積有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趨勢。同時他暗指前輩，暗示說，耕種面積底縮小應歸咎於黨底政策。他沒有公開說出，我們的事情正趨向於退化。可是從他的著說中可得出這樣的印

象，就是說我們這裏是有類似退化的現象。說耕種面積有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趨勢，這種話對不對呢？是不對的。李可夫同志在這裏所採用了的，是關於全國耕種面積的平均計算。可是平均計算的方法，不用各區的統計材料來參照，就不是科學的方法。也許李可夫同志曾經讀過列寧著的“資本主義底發展”，這本書。如果他讀過，他定當記得，列寧怎樣在那裏闡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因為他們關於耕種面積底發展是採用平均計算法，而忽視各區的統計材料。奇怪的是李可夫同志現在重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底錯誤。所以，要是按區考察耕種面積底變動，即是說要是依科學方法來考察問題，那末，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有的區域裏，耕種面積是有經常不斷的增加，在有的區域裏，耕種面積，主要地是隨着氣候條件為轉移而有時減少，並且沒有這樣的材料可以證明，我們在什麼地方，那怕就是在某一個重大的糧食區域內，是有耕種面積經常不斷的縮小下去的情形。

實際上，在有幾個受了大冰凍或旱災的地方，例如烏克蘭有幾個區域，耕種面積近來有了縮小。

座位上有人說道：並不是烏克蘭。

施里歇特說道：在烏克蘭，耕種面積已增加了百分之二點七。

斯大林繼續說道：我說的是烏克蘭底荒原地帶。可是在其他各區，例如在西伯利亞，在瓦爾河一帶，在哥薩克斯祖，在巴什基里亞，沒有最不良的氣候條件所牽累的地方，耕種面積是有系統地增加着。為什麼在有些區域裏耕種面積有系統地增加，而在別個區域裏却有時減少呢？其實不能說，黨底政策在烏克蘭是一樣，而在蘇聯底東部或中部又是另一樣。同志們，這是講不通的。顯然的，氣候條件在這裏有不小的意義。

對的，富農不管氣候條件如何而縮小着耕種面積。這裏也許可以“歸咎”於黨底政策，因為黨底政策是要幫助貧農中農羣衆反對富農。可是由此得出什麼結論呢？知道我們會在什麼時候答應過要進行一種能使鄉村中一切社會集團都能滿意——連富農也能滿意——的政策嗎？而且一般地說來，如果我們一般

地想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政策，那末難道我們可以實行一種能够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都感滿意的政策嗎？如果由於我們實行了這種以限制和克服鄉村資本主義成份為目標的列寧主義的政策的結果，富農便開始局部地縮小了自己的耕種，那末這有什麼特別呢？難道可以不這樣嗎？也許這個政策是不對的吧。——那末就請向我們公開這樣說。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的人們，看見富農局部地縮小耕種，就大驚小怪地說是一般耕種面積縮小而怠耕，除了富農之外還有貧農和中農，他們的耕種正在推廣，還有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牠們的耕種正在以加大的速度增長着，這不是很奇怪嗎？

末了，在李可夫同志演說辭內，關於耕種面積問題還有一個不正確的說法。李可夫同志在這裏訴苦，說有的地方，就是在集體農莊最發達的地方，貧農中農的個人耕種面積開始在縮小。這是對的。可是這有什麼壞處？不這樣又能怎樣呢？如果貧農中農開始拋棄個人的耕地而加入集體農莊，那末集體農莊底推廣和增多就應當同時引起貧農中農個人耕地相當的縮小，這難道不明白嗎？你想要怎麼呢？現在集體農莊方面有兩百多萬公頃的土地。到五年計劃之末集體農莊將有二千五百萬公頃以上。集體農莊耕地是用什麼人底土地來擴展的呢？是用貧農中農的個人的耕地。而你們想要怎麼樣呢，親愛的同志們？如果不是這樣，那末怎樣來使貧農中農的個人農業轉移到集體農業底軌道上去呢？集體農莊的耕地將在許多區域內靠着合併個人農莊的耕地而發展，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人們不願意了解這種簡單的事情，真是奇怪。

### 9. 關於糧食採辦問題

關於我們的糧食困難，人們在這裏說了一大堆荒唐話。可是把我們的糧食的行情性的困難方面的要點却忽略過去了。首先就是忘記了，我們今年所收穫了的黑麥和小麥。——我說的是收穫總量，——比去年少了五六萬萬普特。這能夠不影響到我們的糧食採辦事業嗎？當然是不能够不影響到。也許這應該歸咎於中央委員會底政策吧？不，這是與中央底政策無關的。這種現象是由於烏克蘭底荒原地帶有了嚴重的歉收（大霜凍，旱災），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區以及

西北區有局部的歉收。主要地也就是因為這一點，所以去年我們在烏克蘭到四月一號時已採辦了二萬萬普特糧食（黑麥和小麥），而今年却總共只採辦了二千六百萬到二千七百萬普特。小麥與黑麥底採辦在中央黑土區差不多降低了七倍，在北高加索差不多降低了三倍，也就是因為這一點。今年在東方糧食採辦，有幾區內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是這當然不能補償，而且也沒有補償我們在烏克蘭，在北高加索和中央黑土區所有過的糧食採辦不足的情形。不要忘記，在常態的收成之下，在烏克蘭與北高加索所採辦的糧食，等於蘇聯所採辦的全部糧食底一半以上，而有時還甚至於三分之二。李可夫同志把這種情況忽略過去了，真是奇怪。

最後，還有第二個情況，這種情況是我們的糧食採辦的行動性的困難方面的主要關鍵。我所指的是鄉村中富農和殷實份子反抗蘇維埃政府的糧食採辦政策。李可夫同志避開了這種情況。可是避開這一點，就是避開糧食採辦事情上的主要關鍵。最近兩年來的糧食採辦方面的經驗證明什麼呢？牠證明，鄉村中的殷實階層，手裏握有大部份剩餘糧食，並在糧食市場上起指揮作用，他們不願意把我們所需要的糧食，依據維埃政權所規定的價格自動地賣給我們。我們每年大約需要五萬萬普特的糧食來供給城市和工業地點，供給紅軍和工藝原料作物區域。依自流底辦法我們大約能採辦到三萬萬到三萬五千萬普特。其餘一萬五千萬普特，不得不用對富農及鄉村殷實階層施行強迫辦法來取得。最近兩年來糧食採辦的經驗所證明給我們看的，就是這樣。

最近這兩年以來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的變遷是從那裏來的，為什麼自流辦法在從前有濟於事，而現在却已經不够了呢？所發生了的事情就是：富農和殷實份子在這幾年內已長大起來了，幾次豐年對於他們不是白白地過去了的，他們在經濟上強固了，積累了一些兒資本，現在他們能在市場上投機，把自己的剩餘糧食屯積起來，以等待高價，而拿別的農作物來週轉週轉。糧食不是平常的商品。糧食不比棉花。棉花不能吃，不是見人就能賣出的。在我們現今這種條件之下，糧食與棉花不同，她是這樣一種商品，這糧商品是大家都有的，

沒有牠就不能生存。富農注意到這一點，因此他把糧食屯積起來，使一般人民食所有人都沾染這種風氣。富農知道，糧食是金幣中的金幣。富農知道剩餘糧食不僅是使自己發財的手段，而且是用以束縛貧農的手段。富農手上的剩餘糧食，在現今的條件之下是加強富農份子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的手段。因此，我們從富農方面取得這些剩餘糧食，這不僅便利着城市和紅軍底糧食供給，而且根本破壞着那個使富農底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加強的手段。

要得到這些剩餘糧食，需要怎樣辦呢？首先需要消滅自流主義底心理，因為這種心理是有害的和危險的東西。需要組織糧食採辦。需要動員貧農中農業來反對富農，並組織他們來共同擁護蘇維埃政權底那些加強糧食採辦工作的辦法。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依自訂規定徵收額的原則所實行的糧食採辦方法底意義，正是在於，牠使得有可能來動員鄉村中勞動階層去反對富農以加紧糧食採辦的工作。經驗指明了，這個方法使我們得到良好的結果。經驗指明了，這些良好結果我們是在下面這兩方面得到的：第一，我們徵取鄉村富裕階層底剩餘糧食，這樣來便利國家底供給事業；第二，我們在這事情上動員貧農中農業來反對富農，在政治上教育他們，將他們組織為我們在鄉村中的強有力的，成千百萬人的政治軍隊。有些同志沒有注意到這第二種情形。然而，這種情形，正是烏拉爾西伯利亞的糧食採辦方法底重要結果之一，如果不是最重要的結果的話。固然，有時候，除這個方法以外，還同時採用非常辦法來對付富農，這就引起布哈林及李可夫兩同志底可笑的叫喊。可是這有什麼壞處呢？為什麼不能在有些時候，在相當的條件之下，採用非常辦法來對付我們的階級敵人，來對付富農呢？為什麼在城市內可以成百地逮捕投機商人，將他們趕到土魯汗去，而對於那些企圖拖住蘇維埃政權底咽喉和束縛貧農的富農們，就不能用社會制裁的辦法，按貧農中農資糧食給我們採辦機關的價格去取得他的剩餘糧食？這是從那裏得出來的結論呢？難道我們的黨曾經說過牠在原則上反對採用非常辦法去對付富農嗎？李可夫和布哈林兩同志，顯然是在原則上反對採取任何一種非常辦法對付富農的。可是親愛的同志們，須知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策。

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你們不能不知道，列寧在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甚至主張——當然是在相當的條件下面——恢復農委會底政策。可是什麼是局部地用非常辦法來對付富農呢？這與農委會底政策比較，甚至於還算不得沧海一粟。

他們，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希望說服階級敵人，使他自動放棄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自願賣給我們。他們希望，富農——已經長大了的，並有可能拿別的農作物來實行迴轉的，那樣着自己的剩餘糧食的富農，——會依照我們的糧食採辦價格而自願把自己的剩餘糧食賣給我們。他們不是發了昏嗎？他們豈不是顯然不懂得階級鬥爭尖銳，顯然不知道什麼是階級嗎？他們是不是知道在我們為着加強糧食採辦工作而召集的鄉村會議上面，富農怎樣譏笑我們的工人員和蘇維埃政權。他們是不是知道這樣的事實，就是例如在哥薩克斯坦，我們的鼓動員費了兩點鐘工夫去勸說糧食所有人把糧食交出來供給國家的時候，有一個富農口裏帶着烟斗出來講話，向着這位鼓動員回答：“喂！小孩子，請你在我面前跳一跳舞，我就給你兩個普特糧食。„

座位上有人喊道：真是混賬忘八輩！

**斯大林繼續說道：**請你們試試說服這樣的人吧。同志們，階級到底還是階級呵。誰也跳不出這個真理，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方法底好處，本來也就在於，牠使得更有可能來推動貧農中農階層去反對富農，使得更有可能來打破富農底反抗和強迫他們把剩餘糧食交給蘇維埃政權機關。

現在新反對派中間，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中間，最時髦的字眼就是糧食採辦上的“過火”，這兩個字。這兩個字在他們那裏是最通行的貨物，因為牠幫助他們掩飾自己的路線。當他們想掩飾自己的路線時，他們通常是這樣說：我們當然不反對壓榨富農，可是我們反對在這方面所犯的和觸犯中農的那些過火行動。然後就來描寫這些過火行動底可怕情形，宣讀“農民，底信。宣讀如馬爾科夫同志這類同志們底大驚小怪的信件，然後做出結論：須要取消壓榨富農的政策。因為實行正確的政策時有了過火行動，所以就需要取消這個正確的政策。

這豈不很好嗎？機會主義者底慣技就是這樣。藉口說在實行正確路線時有過火行動而要求取消這個路線，用機會主義的路線來代替這個路線。同時布哈林同志這派裏面的，小心地瞞着這樣的事實，就是還有另一種過火行動，更危險和更有害的過火行動，——這稱過火行動，就是走向與富農結合，走向還就鄉村裏富裕階層，走向用右傾份子底機會主義政策去代替黨底革命政策。

當然，我們大家都是反對這些過火行動。我們大家都是反對把用去對付富農的打擊拿來觸動中農。這是顯然的。這是不能有絲毫懷疑的。可是如果用布哈林同志這派人所努力使用的關於過火行動的那一套廢話來破壞我們黨的革命政策和用布哈林同志這派人底機會主義政策來暗中代替牠，那我們是堅決反對的。同志們，不行的，“你們的這套把戲是要不通的。”

請你們聽一聽，在黨底政治辦法裏，究竟有那一個政治辦法在實行的時候沒有附帶發生某些過火行動。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要與過火行動作鬥爭。可是難道可以根據這一點就責罵路線底本身，唯一正確的路線底本身嗎？就拿實行七小時工作日這樣的辦法來講吧。這個辦法是我們的黨最近所實行的最革命的辦法之一，這是不容有絲毫懷疑的。誰不知道，這個在實質上很是革命的辦法，在我們這裏實行的時候就附帶發生過好些過火的行動，有時還是極可怕的過火行動。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取消實行七小時工作日的政策呢？新反對派方面的同志們是不是懂得，他們動不動就拿糧食採辦工作上過火行動拿來做藉口，這是滾到何等污濁的泥坑裏去了。

#### 四 關於與右傾鬥爭問題

這樣，我們已經再三分析了我們的意見分歧底一切主要問題。無論是在理論方面，無論是在我們黨底共產國際政策及內部政策方面，都講過了。由以上所述，就可以看出。李可夫同志關於在我們這裏有一派的路線的意見，是不符合實際的。由以上所述，就可以看出，我們這裏實際上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黨底總路線，是我們黨底革命的列寧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就是布哈林同志這一派底

路線。這第二條路線還沒有完全形成，這局部地是因為布哈林同志這一派人裏面觀點非常糊塗不清，局部地是因為這第二條路線由於自己在黨內比重上的微弱，所以總想這樣或那樣戴著假面具。可是牠，這條路線，到底還是存在着，（這是你們所看到的）而且是一條與黨底總路線不同的路線，是一條差不多在黨政策底一切問題上與黨底總路線對立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在基本上是右傾底路線。

布哈林同志在這裏說，中央政治局三個委員受着“精神上的死刑”，他說這三個委員被我們各個組織“當衆批評着”，他說，黨已經使政治局底這三個委員——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斯基——受着“精神上的死刑”，在刊物上和會議上批評他們錯誤，可是他們——政治局底這三個委員——却“不得不”，閉口不言。同志們，這是廢話。這是自由主義化的共產黨員底妄言，這是共產黨員企圖滅掉黨底反右傾的鬥爭。

照布哈林說來，要是他和他的朋友們犯了右傾的錯誤，那末黨是沒有權利來揭破這些錯誤的，黨應當停止與右傾的鬥爭，等布哈林同志和他的朋友們自願放棄自己的錯誤。布哈林同志所要求我們的不是太多了嗎？他是不是以為，黨是爲着他而存在，而不是他爲着黨而存在呢？當全黨動員起來反對右傾，進行決戰去征服困難的時候，誰強迫他閉口不言，靜靜地坐着呢？布哈林同志和他的知己朋友們，爲什麼現在不發言，不去進行堅決的鬥爭去反對右傾及調和派呢？如果布哈林同志和他的知己朋友們決意走上這一個並不是怎樣困難的步驟，那末黨一定會歡迎他們——對於這一點，難道有誰可以懷疑嗎？爲什麼他們不決意走上這一個歸根到底他們還是一定要走的步驟呢？是不是因爲他們把自己派別底利益看作比黨底和黨的總路線底利益更高呢？在反右傾的鬥爭中，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斯基這幾位同志完全沒有參加，這到底是誰的過錯呢？所謂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受“精神上的死刑”，這一套話，就是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底一個掩飾得不很巧妙的企圖——想強迫着我們黨閉口不言和停止反右傾的鬥爭，——這還不很顯然嗎？

與右傾鬥爭，並不是我們黨底次要任務。與右傾鬥爭是我們黨底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之一。如果我們在自己本身的隊伍內，在自己本身的黨內，在領導運動及引導無產階級前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司令部內，——如果我們在這一級司令部內，容許右傾份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動，這些份子企圖拆散黨底隊伍，企圖腐化工人階級，企圖使我們的政策適合“蘇維埃的”，資產階級底胃口並這樣來在我們建設底困難面前表示投降，——如果我們容許這一切，那末這將是什麼意思呢？這難道不就是說我們想漸漸降低革命，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逃之兩極，把蘇地讓給資本主義份子嗎？布哈林同志這一派是不是懂得，拒絕與右傾作鬥爭這就是出賣工人階級，出賣革命呢？布哈林同志這一派是不是懂得，不征服右傾和調和派，就不能征服我們面前的困難，而不征服這些困難，就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建設底決定的勝利？既然這樣，那末驕於所謂政治局底三個委員受“精神上的死刑”的廢話，還有什麼價值？

同志們，不行的，用所謂“精神上的死刑”，這類自由派的廢話，是嚇不倒黨的，黨要求你們來和全體中央委員站在一個行列內去與右傾及調和派作堅決的鬥爭。黨要求你們這樣，為的是要易於動員工人階級，組織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線上的進攻，打破階級敵人底反抗並保證克服我們的建設方面的困難。或者你們執行黨底這個要求，那時黨就會歡迎你們。或者你們不做到這一點，一則你們就只好埋怨自己。